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近代战争史 (2)

 **eBOOK**
网络资源 非精英

中国近代战争史
(第二册)

第八章 收复新疆的战争（1876年7月—1878年1月）

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斗争的日益加剧，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的角逐激化，对中国西部边境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1865年（清同治四年），中亚浩罕汗国（今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军事头目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率兵侵入中国新疆，不久自立为“汗”，建立反动政权。1871年，沙俄也出兵占领伊犁地区（今伊宁市一带）。这样，中国的新疆面临着被肢解侵吞的危险。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在陕甘总督左宗棠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抓紧了进军新疆的准备，接着于1876—1878年间进行了收复新疆的战争，粉碎了英俄企图肢解和侵吞新疆的阴谋。

阿古柏（约1825—1877），真名为穆罕默德·亚库甫，浩罕安集延人，塔吉克族（一说乌兹别克族）。

第一节 英俄争夺中亚和武装入侵新疆

一、英俄对中亚的争夺

1861年以后，沙皇俄国由于对农奴制度实行了改革，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发展，迫切要求掠夺新的地盘，以便从国外攫取更多的财富，加速自己的发展，赶上和超过西欧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由于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的失败，俄国企图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遭受严重挫折，于是，把侵略扩张的矛头转向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1864年，俄国开始向邻近中国新疆的浩罕发动军事进攻。同年，沙俄从中国西部边境割去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妄想侵吞整个新疆。当时，英国已完成了吞并印度的计划，正在积极向北扩张，不仅力图占领中亚，而且还妄想把新疆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因此，英俄两国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的对抗，以及中国反对英俄侵略扩张的斗争，不可避免地紧张和复杂起来。

二、阿古柏侵入新疆

新疆古称西域，历来属于中国。它地处我国西北边疆，绝大部分地区海拔千米以上。天山山脉由西向东，横亘中部，习惯上常称天山以南地区为南疆（或南路），天山以北地区为北疆（或北路），哈密、吐鲁番盆地一带为东疆（或东路）。南疆气候干燥，终年少雨，沙漠居其大半，人口聚居于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富饶地区，主要城市有喀什噶尔（今喀什）、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乌什、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今焉耆），总称南疆八城。北疆气候湿润，多雨雪，水草丰盈，主要城市有巴里坤、古城（今奇台）、乌鲁木齐、玛纳斯、伊犁（今伊宁市西惠远）、塔尔巴哈台（今塔城）等。清朝政府平定了准噶尔贵族的叛乱之后，于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正式宣布西域改名新疆。三年后，清政府在伊犁设将军，统辖新疆一切事务，并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归伊犁将军节制），统辖天山南路及葱岭以西诸地，从而加强了对新疆的统治。

新疆是我国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回、蒙古、乌兹别克、俄罗斯、塔塔尔等十多个少数民族人民的聚居区。清乾隆以后，大兴屯垦，至同治初年，约有一百余万人，其中维吾尔族约占三分之二。由于地广人稀，宜于放牧（特别是北疆），居民以畜牧业为主。家畜以羊、马、牛为大宗，骆驼次之。

1864年（同治三年）夏，新疆的回、维吾尔等各族人民，在内地人民起义特别是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起义，先后占领了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乌鲁木齐、玛纳斯、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和伊犁等地。但是，这次起义不久就被当地封建主和宗教上层人物窃取了领导权，迅速改变了起义的性质。他们乘机实行封建割据，进行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混战，有的甚至勾结外国侵略者，进行分裂祖国的罪

浩罕，一作霍罕，中亚细亚三汗国之一。它是十八世纪初乌兹别克人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建立的封建汗国，首都为浩罕城。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畜牧业和商业也较发达，常与中国新疆喀什噶尔等地通商。1876年，浩罕汗国被沙俄吞并。

恶活动。当时，新疆地区出现了几个互不统属的封建割据政权，其中主要的有：以库车为中心的热西了和卓（即黄和卓）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包括玛纳斯和吐鲁番在内的妥明（或称妥得璘）“清真王”政权，以和阗为中心的哈比布拉“帕夏”政权，以伊犁为中心的塔兰奇“苏丹”政权，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回族金相印和柯尔克孜族思的克为头目的封建地主政权等。

思的克、金相印等占领喀什噶尔回城（今喀什市）后，久攻仍由清军控制的汉城（今疏勒）不下，便向英国支持的浩罕汗国乞援。同时，思的克为了利用宗教贵族的力量统治喀什噶尔一带人民，要求浩罕统治者将匿居于浩罕的新疆宗教贵族后裔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遣返喀什噶尔为王。当时的浩罕摄政王阿里姆·库里，决定派遣在军队中颇有名气的阿古柏“护送”布素鲁克前往喀什噶尔，乘机排除阿古柏这个政敌。1865年1月，阿古柏与布素鲁克纠集一批歹徒侵入我国境内。阿古柏善于玩弄阴谋权术，他被思的克迎入喀什噶尔回城以后，立即把思的克赶走，夺取了统治权。同年4月，阿古柏派兵攻占由思的克控制的英吉沙尔回城，随即又占领英吉沙尔汉城，守城清军二千人惨遭杀害。9月，困守喀什噶尔汉城的绿营守备何步云接受阿古柏的重金贿赂，率清军三千人投降。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奎英等举家自尽。不久，一伙在塔什干败于俄军的浩罕兵七千余人侵入南疆，到达喀什噶尔，进一步增强了阿古柏的势力。布素鲁克见阿古柏的权势不断扩大，密谋剪除他。但事机暴露，许多人因而被杀，布素鲁克也成了阿古柏的阶下囚。这样，阿古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成了喀什噶尔至英吉沙尔一带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1866年秋，阿古柏侵略军攻占叶尔羌。年底，又用诱骗手段擒杀哈比布拉而据有和阗。1867年初，阿古柏将布素鲁克驱逐出新疆，于喀什噶尔自称“毕条勒特汗”（又译作“巴达吾来特汗”，意为“洪福之汗”），并悍然宣布成立伪“哲德莎尔国”。同年夏，阿古柏率军东侵，夺占了热西丁和卓占据的乌什、阿克苏、库车、库尔勒等地。1870年10月，阿古柏军先后攻占妥明控制的达坂城和吐鲁番，妥明军头目马仲、马人得投降。11月下旬，阿古柏军又攻占乌鲁木齐，妥明投降。接着，又派兵袭取玛纳斯。之后，阿古柏返回南疆阿克苏新建的宫殿，俨然以全疆统治者自居。

1873年9月，陕甘回民起义军首领白彦虎从甘肃逃到新疆，不久在吐鲁番投降了阿古柏，与侵略者勾结在一起，进行危害祖国统一的罪恶活动。

阿古柏侵入新疆，建立起反动的“哲德莎尔”政权后，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极其残暴的殖民统治。他将侵占地区划分为若干个维莱耶特（相当于州），其下又分为若干个阿克莎卡尔（相当于乡）。维莱耶特设阿奇木（相当于州长），阿克莎卡尔设谢尔卡尔（相当于乡长）。

在阿古柏的反动统治下，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广大农牧民在交纳宗教税、农业税、军税、附加税等种种赋税之后，只剩下收获的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

张格尔（？—1828），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和卓波罗尼都（即“大和卓木”）之孙。1820—1827年（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七年）间，在英国支持下，由浩罕侵入新疆，煽起南疆西四城叛乱。1828年被擒，解往北京处决。

“哲德莎尔”，突厥语，意为七城，故“哲德莎尔国”又称“七城汗国”。七城说法不一：一说指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乌什、阿克苏、库车、吐鲁番七城；一说有喀喇沙尔而无乌什；另一说有喀喇沙尔、英吉沙尔而无吐鲁番、乌什。

一。除了敲骨吸髓的剥削外，阿古柏还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并利用宗教信仰进行殖民统治。他规定妇女不戴面纱不准上街，并强令“军民髡发，易回服”；对于不愿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则肆意残杀。

阿古柏的军队(约五六万人)分为骑兵(吉杰特——意为“年青的兵士”)、步兵(沙尔巴兹——意为“勇敢的兵士”)和炮兵(托普奇)组成，还有部分抬枪兵。轻武器起先以火绳枪和燧石枪为主，后来装备了大批撞针枪，还有部分连发枪。炮兵大都使用克虏伯和阿姆斯特朗等较先进的火炮。这些轻重武器大多数来自英国和俄国，其中又以英国供给的为主。阿古柏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还在占领区内大量建筑碉堡和城池。

对于阿古柏建立的殖民政权，英俄两国从各自的侵略野心出发，都极力予以拉拢。阿古柏为了巩固自己的殖民统治，也积极投靠英国和沙俄，成为它们的走狗。因此，由于阿古柏入侵新疆而造成的我国西北边疆危机，实际上有着明显的英俄侵略和争夺的背景。

英国早在阿古柏入侵新疆之初，便经常以“经商”、“游历”、“传教”等为幌子，派遣间谍到新疆进行阴谋活动。从1868年开始，英国的商品、军火和特务，便从土耳其、印度等地不断涌进阿古柏占领区。1869年，阿古柏派人去印度接受了英国驻印度总督给予的一大批枪支弹药。1870年，以外交部官员福赛斯为首的英国特派使团，带着英国女王维多利亚(1819—1901)给阿古柏的亲笔信，经印度来到喀什噶尔，打算与阿古柏进一步勾结。适遇阿古柏在东路指挥进攻吐鲁番，因而福赛斯此行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进行密切了双方的关系。不久，阿古柏便派人前往印度“答礼”。1873年底，一个由三百人组成的庞大的福赛斯使团，第二次来到喀什噶尔，向阿古柏转交了英国女王的信件和英印总督送给的一万支步枪及若干大炮。经双方密谋，于1874年春签订了“通商条约”十二条，阿古柏给英国以在新疆驻使、通商和设领等特权，英国则承认阿古柏反动政权为“合法的独立王国”，公开进行分裂中国的罪恶活动。

对新疆凯觐已久的沙皇俄国，也阴谋假手阿古柏来达到侵占中国新疆的目的。在阿古柏侵入新疆之后不久，沙俄便吞并了浩罕的北方领土，并随着浩罕被肢解和布哈拉(中亚三汗国之一)军队在1866年被击溃，俄国的侵略矛头便直接指向新疆。阿古柏为了谋求沙俄对他入侵南疆的认可，于1866年非法与沙俄订立所谓“协议”，约定双方互不干涉对方的行动，互给对方入境追捕逃人的权利等。1867年，沙俄将尚未完全征服的中亚三汗国命名为“俄属土尔克斯坦”(亦称“西土尔克斯坦”)，称我国新疆为“东土尔克斯坦”，其侵吞新疆的野心已暴露无遗。次年，沙俄先后派遣使者和军官至喀什噶尔，和阿古柏进一步勾结。由于此时沙俄在中亚的扩张已经得手，它要求阿古柏步中亚诸汗的后尘，向沙皇称臣纳贡，借以将阿古柏窃据的中国新疆南部地区纳入沙俄的统治范围。但沙俄的贪欲，引起了阿古柏的疑忌，使他进一步向英国靠拢，以谋求英国的更大支持。

三、沙俄强占伊犁

由于阿古柏进一步投靠英国，沙皇俄国政府恼羞成怒，积极图谋用武力

强占伊犁地区，进而夺取整个新疆北部。因此，当阿古柏由南疆向北疆窜犯时，俄国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立即上奏沙皇，“列举各种理由，说明必须对伊犁进行占领，以保障边境安全和对抗阿古柏的意图”。1870 年秋，俄国派兵进驻特克斯河上游，侵占天山穆查尔特山口（冰岭），扼住伊犁通往南疆的交通要道；同时，派兵入据我国博罗胡吉尔（赛里木湖西）地区，对伊犁构成夹击之势。这是俄国用武力侵占伊犁并进一步侵略新疆的一个重大步骤。

伊犁位于伊犁河谷地中心，是我国西北边陲重镇，清政府统辖新疆南北两路的伊犁将军治所，即设于此。伊犁河横贯伊犁地区，自东向西注入巴尔喀什湖。伊犁既是通往中亚的要冲，又是新疆西部地区联系南北两路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沙皇俄国对我国伊犁地区垂涎已久，亟欲侵占。1871 年夏，俄国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命科尔帕科夫斯基率兵近二千人，悍然进犯伊犁地区。伊犁人民同俄国侵略军浴血苦战了五十个昼夜，最后由于粮尽弹绝，加上地方割据政权上层人物的叛降，伊犁九城被俄军侵占。同年冬，俄国又派军队由伊犁东进，企图夺取乌鲁木齐。俄军把前锋部队伪装成商队，带着大批驼马货物向东开进。新疆人民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民团领袖徐学功预先在玛纳斯西八十里的石河子布置埋伏。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伏兵四起，歼敌数十名，并缴获驼马二千多匹（峰），迫使俄国侵略军狼狈逃回伊犁。

沙俄强占伊犁，也是向阿古柏炫耀武力，阻止其由玛纳斯继续向西北扩张。阿古柏在俄国的军事压力下，于 1872 年 6 月同俄国非法签订了“通商条约”五条。俄国承认阿古柏为“哲德莎尔元首”，阿古柏则同意俄国人可以在南疆自由通商和旅行，设置商务专员，并规定进出口税仅按 2.5% 征收等等，从而扩大了俄国对新疆的侵略特权。

沙俄强占伊犁地区后，撤销中国设在那里的一切机构，非法拘留和拷打清政府派去的官吏。同时，对占领区人民“横加赋敛，中户每年纳丁畜税银十数两，上户数十百两，最下亦须数两，兵役、通事人等供应需索在外，日朘月削，劳扰不堪”。

对于阿古柏和沙俄的最黑暗最野蛮的统治，新疆各族人民不断地进行反抗斗争。例如，被阿古柏任命为乌鲁木齐阿奇木的马仲，就是因他充当侵略者的走狗、鱼肉人民而被民军所诛杀的。在伊犁，“所有满、绿、索伦、锡伯、察合尔、额鲁特各营，以及民人，并有崑河（今精河）土尔扈特贝勒等人众，均已同心能死，不降俄夷”。新疆人民为了摆脱黑暗统治，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盼望中国政府早日出兵赶走侵略者，光复失地。

茨楚勒：《土尔克斯坦》第二卷，第 168 页，转引自《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191 页。
清乾隆期间，先后在新疆伊犁河北今伊宁市和伊宁、霍城二县 境内修筑塔勒奇（今霍城县治西）、绥定（今霍城县治）、惠远（今霍城县治南）、惠宁（今伊宁市西北）、宁远（今伊宁市）、广仁（今霍城县治北）、熙春（今伊宁市西北）、瞻德（今清水河子）、拱宸（今霍城）等城，总称“伊犁九城”。伊犁将军驻惠远城。

左宗棠：《俄国哈萨克人来著勒土斯山游牧陈明办法片》，《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五，第 29 页。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四，第 10 页。

第二节 清政府的战略方针和战争准备

一、收复新疆和“缓进急战”、“先北后南”方针的确定

当阿古柏入侵新疆和俄国强占伊犁之际，清王朝正忙于镇压内地人民起义。其间，清政府曾命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自甘肃赴新疆，会同尚留在巴里坤的乌鲁木齐都统景廉收复乌鲁木齐。但成禄一直逗留于甘肃高台，迁延不进。1873年，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肃州（今甘肃酒泉）之役结束后，清政府便抓紧收复新疆的准备工作，将成禄革职拿问，改派参加肃州之役的原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率军（包括成禄旧部）出关，屯于巴里坤。景廉部则由巴里坤进驻古城。随金顺出关的还有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骑兵一营一起（一起相当于半个营）。先于金顺出关的则有广东陆路提督张曜所统河南嵩武军十四营（步兵十二营、骑兵二营），屯于哈密。出关的金、张、额三军的总人数共计一万数千人。1874年9月，清廷命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顺为帮办大臣；又命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关外粮饷转运事宜，以侍郎袁保恒为帮办。

正当清政府陆续派兵出关，准备收复新疆之际，日本侵犯台湾，东南沿海防务吃紧，于是在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一场塞防与海防的争论。当时同治帝（清穆宗载淳）刚死，光绪（清德宗载淳）新立，西太后那拉氏临朝称制，因此，清政府在收复新疆问题上一度犹豫不定，难以决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张放弃塞防（也就是放弃新疆），专重东南沿海的防御。他声称“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要求把用兵新疆的费用移作海防之饷。陕甘总督左宗棠则主张塞防与海防不可偏废。他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而当务之急则是立即出兵收复新疆。“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今蒙古吉尔格朗图）、乌里雅苏台（今蒙古扎布哈朗特）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

左宗棠镇压过太平天国和陕甘回民起义，但在国家领土完整遭到严重危害的关头，他主张抵抗英俄侵略，收复新疆，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和新疆各族人民愿望的。清廷在全国舆论要求抵御英俄及其走狗阿古柏的侵略的压力下，采纳了左宗棠等人的爱国主张，于1875年（光绪元年）4月正式作出了收复新疆的决定。5月3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仍帮办新疆军务。同时，撤销了景廉和袁保恒在新疆的任职，调回北京，从而使左宗棠掌握了收复新疆的最高指挥权。景廉调京后，所部各营由金顺接统。

左宗棠认为，阿古柏已与白彦虎、马人得等勾结在一起，占据了新疆大部地区，控制着南疆和北疆的许多战略要地及交通要道，是当前的主要威胁。沙俄虽然居心叵测，但对于占领伊犁地区，曾假惺惺地表示“并无久占之意”，

金顺所部号称三十营，成禄旧部号称十七营，实则都仅半数，后左宗棠将其合并为二十营。

1874年，日本在美国支持下出兵侵略台湾。台湾人民据险抵抗，侵略军遭到重大伤亡，无法前进。后美国出面“调停”，清政府赔偿日本白银五十万两，日本撤兵。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第19页。

左宗棠：《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36页。

“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因此，决定以消灭阿古柏入侵势力为第一期作战目标，而驱逐伊犁地区的沙俄侵略军则作为第二期作战目标。

根据敌我情况和新疆地区的地理条件，左宗棠提出了一个“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

关于“缓进急战”。新疆地处西北边陲，远离内地，交通不便，人烟稀少，产粮不多。经过长期的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战争之后，陕甘地区的粮食十分缺乏；新疆地区也由于连年战乱，“户口凋敝，田地荒芜”，粮食同样短缺。因此，左宗棠认为：“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鉴于这种情况，宜采取“缓进”的方针，以充分做好兵员的调集，军饷的筹措，粮食的采办、转运和屯集，以及军火的购制等工作。又鉴于运输线过长，极易遭敌袭扰和切断，决定在粮运和进军出发地准备好之后，则力求速战速决，避免旷日持久。

关于“先北后南”。在作战方向上，是先北后南，还是先南后北，开始清政府内部的看法并不一致。景廉在 1874 年曾有对天山南北同时发起进攻的三路并进的方案；1875 年春，清廷又发出“张曜，宋庆两军，或北至古城，合兵进取，或由南路进攻吐鲁番”的谕示。左宗棠受命之后，主张首先收复北疆，然后进军天山南路。从敌情方面看，当时，阿古柏的主力部署在天山以南，天山以北主要是马人得、白彦虎等武装，力量较弱。因此，左宗棠认为：“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鲁木齐各处之贼，而后加兵南路”。当北路进兵时，阿古柏有可能督军北援，经过几次较大的战斗，马、白等部或可歼灭，而阿古柏军亦多就戮，“由此而下兵南路，其势较易，是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也”。从地理条件看，左宗棠认为“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因而亦应先北后南。清军当时尚控制哈密、巴里坤、古城、济木萨等要点，可以保障新疆与内地的交通。尤其是天山东部的哈密，系新疆通往内地的咽喉，东北与乌里雅苏台相呼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政府虽然失去了吐鲁番、乌鲁木齐等要地，但仍有哈密、巴里坤可以作为进军北路的进攻出发地和补给地。只要收复了乌鲁木齐，就能扼其总要，驻守有地，然后加兵南路，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此外，左宗棠还考虑到，首先克复乌鲁木齐，对于制止伊犁俄军东窥，也是大有裨益的。

对于具体的进军方案，左宗棠本着“兵事未可遥度，然大致必须先为筹及”的精神，也作了安排，大体步骤是：“先北路而后南路”，进攻古牧地，乌鲁木齐时，如果阿古柏敢于增援北路，则“猛打数仗”，“挫其凶锋”，以张军威；北路克复后，刘锦棠部“下兵南路”，与此同时，张曜部由哈密西攻吐鲁番，“节节扫荡而前”，“壮后路声威”，以保证刘锦棠部“长驱大进”；待“吐鲁番之守既固，后路无虞”之后，张曜、徐占彪所部“分途

袁大化等：《新疆图志》，交涉二，第 2 页。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续录》，光绪一，第 20 页。

左宗棠：《金军未能迅速出关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三，第 68 页。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续录》，光绪一，第 21 页。

左宗棠：《新疆贼势大概片》，《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 34 页。

左宗棠：《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 35 页。

并进，一向阿克苏，一向叶尔羌，则南路大局亦可速定”。

二、以筹粮、整军为中心的战争准备

为保障收复新疆的战争得以顺利进行，清军根据左宗棠所提出的战略方针，进行了较充分的战争准备。

（一）筹集军饷

进军新疆，主要是继续使用原陕甘军费中的各省关协饷，即浙江、广东、福建等省的协饷和上海、福州、广州、汉口、宁波五个海关的关税，以及浙江、湖北、江西、福建、广东、江苏、安徽七省的厘金。此外，还通过举外债、借商款等办法，较快地解决了所需的大批军饷。军费的数量是庞大的，仅外债一项，据统计，自1875年4月至1881年5月，由左宗棠承借和胡光墉经手，以“西征借款”名义，先后向丽如、怡和、汇丰三个洋行借银就达一千三百七十五万两之多。

（二）采运军粮

左宗棠组织了一套庞大的机构，专门负责军粮采运工作。粮源和粮运线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以肃州为起站，在此设一粮局，采购甘州、凉州、肃州等府州粮食。北路以归化（今内蒙呼和浩特市）为起站，在此设置西征采运总局，并在包头、宁夏（今宁夏银川市）等地设分局，采购归化、包头、宁夏一带的粮食，经由外蒙古南部商道运送到巴里坤和古城等地；同时，大力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一带采购粮食，径运巴、古等处备用。在运输方法上，南路安西以东以车运为主，安西至哈密，哈密至巴里坤，均用驼运，在肃州、安西、哈密各建可存粮二万石的仓库，采取节节转运的方式；北路以骆驼运输为主，采取直达方式，即由归化驼行三十余日直抵巴里坤。截至1876年夏季为止，运存于安西、哈密、巴里坤、古城等处的军粮达二千余万斤。这些粮食主要是供给军队开进和战争初期的需要，尔后主要靠就地取给和军屯生产解决。

左宗棠深知仅靠关内运粮是不行的，因而强调塞外用兵“非力行屯田不可”，并且认为，“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民有余粮，“皆可给价收买，何愁军粮无出？官军能就近买粮，省转运之费不少”。在就地取给中，巴里坤、古城、济木萨（今吉木萨尔）一带约可购粮四五万石。军屯产粮为数也不少，仅张曜部在哈密屯垦的二万亩地，每年就产粮数千石。在大力屯垦的同时，为了改变边塞荒凉和交通不便情况，左宗棠还下令大力筑路，并夹道植柳，后人称“左公柳”。

左宗棠：《答张朗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牋》卷十六，第20—21页。

参见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9）》第6页。

左宗棠：《与总统嵩武军张朗斋提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牋》卷十四，第6—7页。

1878年，杨昌浚奉诏赴西北参与筹边（任甘肃布政使），见到驿路两旁杨柳绿荫成行，写下七绝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通过俄商购粮也是一条途径。“俄商”索斯诺夫斯基（沙俄陆军上尉）愿意采买五百万斤粮食包运到古城。另一“俄商”也揽办了一千万斤粮食，由乌苏包运到昌吉。这批粮食实际上是伊犁地区出产的小麦。俄国准许出售粮食的真实目的，是企图利用军粮问题达到其坐观局势变化，伺机干预和梗阻清军的行动。但是，由于阿古柏反动政权的迅速瓦解，沙皇俄国未能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清军从肃州至哈密的进军是很艰苦的。这段路程一千五百八十里，人烟稀少，水草缺乏，行军十分困难。从肃州到安西一段六百六十里，清军的开进方法是，先将甘、凉的粮秣运至肃州，再由肃州运至玉门，然后第一批部队开至玉门就食，接着用私驼把玉门存粮运往安西，腾出部队辎重队回肃州转运第二批粮食，第二批部队再随之出发。余均仿此办理。部队抵安西之后，稍作停顿，又分批前赴哈密。由安西到哈密一段九百二十里，一路戈壁，水草为艰，由于每日宿营地的水源不足千人之用，所以每批一千人，裹粮而行。

（三）整顿军队

左宗棠认为：“自古关塞用兵，在精不在多。”鉴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肃州之战刚刚结束，“各军劳乏过甚，损折亦多，亟须整理，……若干各营中零星抽拨，凑合成营，则兵将两不相习，恐难骤收实效”，因此，他主张在进军新疆以前，“酌量汰撤，稍节虚糜”。截至1875年初，各路楚军和原在甘肃的部队陆续裁遣四十余营（二万余名），仅存一百四十一营，省常年饷银二百余万两。其中金顺所部原来号称三十营，成禄旧部号称十七营，经过整顿，两部合并为二十营，减少二十七营。原在新疆的景廉旧部号称三十七营，由金顺接统后，汰弱留强，归并为十九营。其他原在新疆的部队也都先后逐加甄别裁并，以免虚糜粮饷。

（四）改善装备

通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大量购买外国武器装备 加之洋务运动 中兴办起

索斯诺夫斯基供称：“假如七万武装良好、守纪律、善战但由于缺粮而无法作战的军队，依靠我们的给养，那末请注意——所有的机会都会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同意让步和达成协议，就给你们粮食；不同意，就不给你们粮食，并要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这就是与左宗棠订约时所依据的前提。”（索斯诺夫斯基等：《1874—1875年对中国的考察》第546页，转引自复旦大学编《沙俄侵华史》第219页。）

左宗棠：《官军出关宜分起行走并筹粮运事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四，第45页。

左宗棠：《请敕张曜额尔庆额带所部出关并简重臣总司粮台片》，《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四，第25页。

参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34、46页，及《左文襄公全集·书牋》卷十四，第44页。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通常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期间，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官僚（中央以奕訢、文祥等为代表，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推行的、以采用某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为中心内容的自救运动。运动前期（六、七十年代）以“求强”为主要目标，大力引进西方军事装备和军工生产技术，创办制造局、船政局等近代军事工业，筹办海防，训练新式军队等等。后来，洋务派认识到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因此，运动后期（七十至九十年代）在“求强”的同时，开展以兴办近代民用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求富”活动。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性及其

来的军事工业陆续投入生产，为改善军队装备提供了一定条件。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以来，先后在西安、兰州创设制造局，就地制造军火，并在上海、汉口、西安等处设立采运军需军火的专门机构。这些固然是为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而设，但对于尔后收复新疆的战争，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至 1874 年，兰州制造局已能仿造当时较为先进的德国后膛开花炮和后膛七响枪，并改进部分清军旧式枪炮，以图“参中西之法而兼其长”。鉴于阿古柏匪军的枪炮多系英国装备，数量较多，左宗棠也给出关清军补充了大量枪炮弹药（多系德国制造），从而改善了军队的武器装备。

清军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准备之后，于 1876 年开始了收复新疆的作战（参见附图十三）。

它种种原因，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和近代工业的发展。

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四，第 49 页。

第三节 北疆的收复（1876年7月—11月）

一、作战部署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从兰州移驻肃州，准备发起进攻。当时，清军已出关的兵力有：广东陆路提督张曜的河南嵩武军十四营和总兵桂锡桢的骑兵一营一起，驻哈密；乌鲁木齐都统金顺的马步三十九营（包括归其统辖的景廉旧部马步十九营）和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的骑兵一营一起，驻巴里坤、古城一带。左宗棠命张曜所部固守哈密，防敌由吐鲁番东犯；命金顺部进驻济木萨，监视敌人行动。4月底，总理行营营务、湘军统领刘锦棠率马步二十五营分批入疆，经哈密前往巴里坤。不久，记名提督徐占彪率所部蜀军马步五营也出关继进。至此，先后出关各军总计八十营。加上原在新疆的伊犁将军荣全所部八营（驻塔尔巴哈台）、哈密办事大臣文麟所部四营（驻哈密）等，总兵力约六七万人。此外，在星星峡以东担任警备的部队尚有二十余营，起着战略预备队的作用。左宗棠率亲兵数营，坐镇肃州指挥，“其前路进止机宜，悉委总统湘军刘锦棠相机酌度”。

清军按照先北后南的既定方针，第一个目标是收复南北疆的交通要冲乌鲁木齐。左宗棠命刘锦棠和金顺两部担负此项任务。

乌鲁木齐位于东西天山接合部的北麓，三面环山，北部及西北部较为开阔，但有古牧地（今米泉）为其外卫，南面有天山作为依托，地形比较险要。由济木萨西行二百四十里是阜康，由阜康又西南行百里是古牧地，古牧地的西南才是乌鲁木齐。因此，左宗棠认为，“官军必先攻古牧地，撤乌垣、红庙（乌鲁木齐汉城，即迪化州城）之藩篱，乃可成捣穴犁巢之举”。

阿古柏得知清军西进的消息后，急忙从阿克苏赶到托克逊，调兵遣将，布置防御：命妥明余党马人得、马明和白彦虎等分守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古牧地等地，企图以天山为依托，以乌鲁木齐为支柱，控制南北疆的交通要冲，阻止清军南下。鉴于达坂城及其东南的狭窄河谷是东西天山的接合部，为乌鲁木齐通往吐鲁番、辟展（今鄯善）、托克逊的交通咽喉，派重兵把守；为了防止清军从哈密、巴里坤方向进攻吐鲁番，还派兵一部控制要点胜金台及辟展、七克腾木（今七克台）等地。阿古柏的主力部署在吐鲁番和托克逊：吐鲁番由布素鲁克之侄艾克木汗防守；托克逊由阿古柏之次子海古拉（即哈克·库里）防守；阿古柏本人则在托克逊督战。其总兵力约四万人。

二、作战经过

1876年7月，刘锦棠率所部各营到达巴里坤，并进驻古城，侦知马人得踞乌鲁木齐，白彦虎踞红庙子，马明踞古牧地。根据当面敌情，刘锦棠于21日轻骑赴济木萨，与金顺商议进军事宜，并察看地形。28日，金顺部进驻阜康城，刘锦棠部则于城东的九运街扎营，沿途各要隘均派营守护。此时，马明已被阿古柏逮往南疆（阿古柏和白彦虎怀疑他与清军私通），古牧地由王

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卷二，武功记二，第8页。

左宗棠：《出关诸军进至古城留防要隘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61页。

治、金中万率兵数千驻守。为阻止清军前进，白彦虎等由红庙移据古牧地，阿古柏也派出部分侵略军助守。刘锦棠考虑到当时正收获麦豆，有粮可因，“虽后队尚未到齐，然师期不宜再缓”，毅然决定提前进攻古牧地。

从阜康至古牧地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大道，从阜康县城西行二十里至西树儿头子，有废渠可引县西之水供给饮用，但从此再往西五十里至黑沟驿，除甘泉堡有可供百人一天的饮水外，全是戈壁，供水困难；另一条是途经黄田的小道，水源充足，但敌军已在该处筑卡树栅，严密防守。显然，白彦虎企图引诱清军由大道越过五十里戈壁而来，迫使其处于前阻坚城、人马渴乏的不利境地。

8月8日，刘锦棠率军进至阜康县城西十里处，开沟引水，节节疏通，将水引至西树儿头子，就地筑垒。9日，派出步骑各队故意在甘泉堡掘井挖渠，佯装要从大道进攻。10日夜半，刘锦棠与金顺所部突然从小路偷袭黄田。11日清晨到达后，迅速抢占附近高地。接着，金顺所部从右路进攻，刘锦棠所部从左路进攻。左路又分为两翼：左翼以总兵余虎恩、陶鼎金的骑兵为前锋，总兵谭拔萃、参将董福祥、副将张俊的步兵殿后；右翼以提督黄万鹏的骑兵为前锋，总兵谭上连和提督肖元亨、戴宏胜、谭慎典、汤秀斋的步兵殿后。炮兵及辎重随后跟进。左路左翼的余虎恩和右翼的黄万鹏两支骑兵分驰下山，敌军骑兵也向前迎战。由于清军勇猛冲击，敌骑不支，不得不出动步兵配合作战，妄图阻止清军骑兵的进攻。此时，清军骑兵分张两翼，向敌左右包抄，谭拔萃、谭上连、董福祥等则率步兵投入战斗，由中路攻击敌军。于是敌军阵势大乱，刘锦棠督率步骑各营乘胜追杀至古牧地。与此同时，右路的金顺部也取得了胜利。刘锦棠鉴于古牧地城池坚固，不易很快攻下，便回驻黄田。

8月12日，清军进扎古牧地城东和东北。13日清晨，阿古柏派往北疆的数千骑兵在阿托爱的率领下，从红庙来援。刘锦棠针对敌人已在城东和东北的山地依山筑垒，加强了外围防御，并得到阿古柏派兵增援等情况，决定采取先扫外围，再攻坚城的战法。他当即命余虎恩、黄万鹏率骑兵驰赴山前严阵以待，并派步兵一部为后应；命步兵分两路攻取山垒，分两路夺占南关；命炮兵构筑临时炮台，配合步兵轰击山垒和南关之敌。战斗打响后，清军很快夺占了山垒和南关，守敌退入城中。赶来增援的阿托爱所部骑兵也被清军骑兵击败，向南溃退。

刘锦棠和金顺策马巡视古牧地，知敌军守备甚严，必须强攻，便令各营四面包围敌人：金顺部在城正西、西北、西南三面筑垒；刘锦棠部在城正北、东北、正东、东南、正南筑垒。与此同时，抽派兵勇于南城外昼夜赶修炮台，要求以高过城墙一丈为度；其它各面炮台也都培土铺板，以便安炮。8月15日，炮台竣工，刘锦棠命谭拔萃率千总庄伟等用开花大炮轰塌古牧地东北面城墙，并对准缺口进行了连续轰击。16日，将开花大炮移至城之正东，轰开另一个缺口，接着用开花小炮及劈山炮继续进行轰击。夜半，刘锦棠传集将领布置攻城任务：命谭拔萃督同提督席大成、副将汤仁和率兵三营由城东北缺口进攻；谭上连督同肖元亨、戴宏胜率兵三营由正东缺口进攻；知府罗长祜督同副将杨金龙及庄伟率亲兵用开花大炮轰击南门，并调标针快响枪、七

左宗棠：《会师攻拔古牧地坚巢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大概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73页。

响洋枪以及劈山炮配置于开花大炮两侧，同时轰击南门；命谭慎典、董福祥等率部潜伏墙壕待机，一旦南门轰开，即行攻入；命知州袁尧龄、提督唐国华等率部列队于城南左右两侧，准备接应，并截击逃敌；命余虎恩、黄万鹏、陶生林等率骑兵一部分布于正南一带山冈，提督张春发、陈广发率步兵两营分布于城西南一带平地，担任警戒和截击逃敌的任务。

8月17日黎明，炮兵轰塌南城，攻城部队冲入缺口，各以火药包投向敌人。后续部队迅速挖土填壕，涌入城中展开巷战。金顺所部亦由东北面并进。敌军大部被杀，少数由缺口逃出者，也被预伏的清军歼灭。当时白彦虎未在城中，幸免一死。守城头目王治、金中万及阿古柏的部将多人均被击毙。

这次战斗，歼敌近六千人（其中有阿古柏兵三百五十八人），俘敌二百一十五人，获战马二百余匹以及火药、硝磺数千斤。清军阵亡一百五十八名，伤四百五十人。

攻克古牧地时，清军缴获守城敌军头目王治、金中万向乌鲁木齐求救的信件一封，上有马人得的批复：“乌城精壮已悉数遣来，现在三城（按：即乌鲁木齐、迪化州城及妥明所筑的伪王城）防守乏人，南疆之兵（按：指阿古柏军）不能速至，尔等可守则守，否则退回乌城，并力固守亦可”。刘锦棠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不失时机地乘虚蹈隙，除留两营兵力扼守古牧地外，即率所部于8月18日黎明急速向乌鲁木齐挺进。白彦虎和马人得不料清军来得如此迅速，一闻炮声，即弃城向达坂方向逃跑。清军在乌鲁木齐城北十余里处，即发现敌人有弃城南逃的企图，刘锦棠当即命余虎恩率骑兵三营、谭拔萃率步兵四营由左路追击，命黄万鹏率骑兵一部、谭上连率步兵四营由右路追击，命谭慎典等率步兵三营向乌城疾进。敌人望风溃逃，清军立将乌鲁木齐、迪化州城及伪王城收复。阿古柏所遣援军五千骑进至达坂城后，闻败而止。

乌鲁木齐收复后，左宗棠命刘锦棠驻守该城，并继续搜捕山中逃敌；命金顺挥军西进，攻取乌鲁木齐以西各城。盘踞于昌吉、呼图壁与玛纳斯北城之敌如惊弓之鸟，清军尚未到达即弃城逃走。惟玛纳斯南城之敌，凭借城垣坚固，地形开阔，易守难攻，仍并力死守。9月2日起，金顺率部从昌吉进攻玛纳斯南城，久围不克。10月4日，刘锦棠派罗长祜、谭拔萃、董福祥等率部增援。10月13日，伊犁将军荣全也率部前往合攻。直至11月6日，才将玛纳斯南城攻克。至此，天山以北，除伊犁地区外，所有敌占据点全部克复。这时冬季来临，大雪封山，不便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清军利用这一机会，一面继续肃清残敌，一面就地整训部队，并征集粮秣，建立采粮和转运机构，准备明春向南疆进军。

乌鲁木齐的收复，具有重要意义。诚如左宗棠所说：“不得乌鲁木齐，无驻军之所，贼如纷窜，无以制之，不仅陕甘之忧，即燕晋内外蒙古，将无息肩之日。若停军巴、古以东瘠区，兵少无以扼奔冲，兵多徒以耗军饷，……断难为持久之计”。由于北疆作战的速战速决，使清军巩固了在新疆的战略地位，不仅解除了敌军窜犯内地的后顾之忧，更为以后进军南疆创造了有利

左宗棠：《详陈攻拔古牧地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战状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九，第3页。

左宗棠：《详陈攻拔古牧地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战状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九，第6页。

的条件。

第四节 南疆的收复（1877年4月—1878年1月）

一、三路并进，打开南疆门户

1876年9月中旬，当围攻玛纳斯南城的战斗尚在进行之际，左宗棠即上奏清廷，提出让金顺所部（当时已增至四十余营）留守北疆各城堡要隘，办理善后事宜，“调张曜、徐占彪会同刘锦棠进规南路，并增派马步各营及枪队炮队赴前敌助剿”。清廷同意左宗棠的建议，并多次催促他“飭令刘锦棠等约定师期，并力进取南路，迅扫逆氛”。

清军在北疆的胜利，使阿古柏的支持者英帝国主义惊惶不安。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一面阻挠英商向清政府贷款，一面代阿古柏进行所谓“请降”，要求清政府准许阿古柏伪政权作为“属国”而继续存在。阿古柏为了配合英国的调处阴谋，命令“各处不要和清军纠杀”，暗中则加紧部署防御。他下令在达坂另筑一新城，控制东西天山的隘口，以其大通哈（即大总管）爱伊德尔胡里防守，并增派骑兵四五百人，使之成为天山北面的防守要点。东面则以重兵防守吐鲁番（驻有骑兵三千五百人、步兵五千人、炮二十门）。该处原有满汉两城，后又筑一坚固高大的伪王府。白彦虎、马人得溃逃南疆后，阿古柏将他们派往吐鲁番，加强该处防御。由海古拉驻守的托克逊有骑兵四千、步兵二千、炮五门，并新筑两城以资防守。阿古柏本人则坐镇喀喇沙尔指挥。这样，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构成鼎足之势，而以托克逊为重点。

左宗棠根据敌人部署，判断阿古柏军“守吐鲁番者拒哈密官军，守达坂者拒乌垣官军，皆所以护托克逊坚巢也”。他针对敌人的企图和设防情况，于11月初提出了一个三路并进的作战方案，即由刘锦棠、张曜、徐占彪各部克复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打开南疆门户，然后乘胜西进，收复所有失地。具体部署是：刘锦棠部由乌鲁木齐南下，进攻达坂城，为北路；张曜部由哈密西进，为东路；徐占彪部出木垒河，越天山南下，为东北路。张、徐两部在盐池取齐，协力攻取七克腾木、辟展和吐鲁番。得手后，立即指向托克逊。届时如达坂未克，即配合刘锦棠部会攻达坂，以收夹击之效。左宗棠预计，“南路贼势，重在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处”，“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清军能否攻下达坂，进而克复吐鲁番和托克逊，是关系到战争全局的一次作战。为了慎重起见，左宗棠一再强调：“察酌彼己情形，仍非缓进急战不可。”

按照上述方案，清军用了较长的时间调运粮食，补充兵力，调整部署，巩固后方。当时，刘、张、徐三部共计马步四十余营。左宗棠考虑到，“师行日远，留防之兵日增，进战之兵日减”，“况转战数千里，士卒之伤亡疾病又在所不免，额数有缺，则士气易堕”。因此，由关内加拨副将秦玉盛马队一营加强徐占彪部；加拨副将武朝聘马队一营加强张曜部，并令炮队游击

左宗棠：《详陈攻拔古牧地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战状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九，第5页。

《德宗实录》卷四十，第19页。

左宗棠：《搜剿窜贼布置后路进规南路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九，第36页。

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牋》卷十七，第31页。

左宗棠：《筹调客军以资厚集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九，第40页。

陈文英带开花炮往助；令参将侯名贵所率炮队护开花后膛大炮两门、车架开花后膛小炮四门及后膛七响枪三百杆，赶赴乌鲁木齐，续调肃州镇总兵章洪胜、总兵方友升率所部马队两营及总兵桂锡桢马队一营，加强刘锦棠部。为了巩固后路，防敌窜扰，左宗棠又奏调驻防包头的记名提督金运昌所部淮军马步十营出关，分屯古城至乌鲁木齐一线要隘，以保护运输线。同时，抽调徐万福等五营从安西进驻巴里坤，替换徐占彪所部蜀军的防务；以新授哈密办事大臣明春所部四营接替张曜所部嵩武军的防务。对于北路新授伊犁将军金顺所部各营，由于只担任防守，由四十余营裁减为步骑二十营，以节军饷。经过调整，既加强了后方的防护，又集中了进攻的兵力。

1877年1月9日，清廷谕令左宗棠：“一俟春融冰泮，即著飭令各军鼓勇前进，迅扫逆氛，廓清疆圉。”左宗棠规定：张曜部待金运昌部过巴里坤时开始西进；徐占彪部待金部过古城再进；刘锦棠部则待金运昌抵乌鲁木齐商酌后再行南下。并指出：“但能速战，则缓进未尝非策也。”但是，刘锦棠鉴于金运昌部“远道奔驰，未能速赴春融之约，而南路天气炎热甚旱，麦秋收割每在春夏之交”，认为“机有可乘，时不可失，多候一日即多耗一日之粮”，决定提前进军，并约张、徐两部于4月中旬开始行动。

1877年4月14日，刘锦棠率主力万余人及开花炮队由乌鲁木齐南下，16日进至达坂城西北的柴窝铺（今柴窝堡）时，侦知达坂城敌军尚以为清军仍在乌鲁木齐未动，只在城郊预引湖水遮断通道，造成深及马腹的一片泥淖。刘锦棠根据这一情况，立即派余虎恩等率马队九营、谭上连等率步队四营，分别于夜间乘敌不备，将达坂城四面包围。4月17日黎明，达坂守敌发觉被围，慌忙用英制快枪和开花大炮射击清军，自晨至午不绝。清军虽有伤亡，但阵容屹立如故。刘锦棠赶到后，令各营一面防敌突围，一面筑垒挖壕，准备攻城及阻援。18日，清军炮队抵达，立即察看地形，修筑炮台。当天，海古拉派来增援的骑兵五六百人接近达坂，刘锦棠派提督陶生林等率骑兵一部迎击。敌骑被清军左右包抄，大败而逃。继来增援的一千多敌骑也掉头狂奔。维吾尔族人民冒死出城报告清军：城中阿古柏军“盼援不到，官军锁围日逼，群议突围而走”。刘锦棠得此情报，传令各营加倍严防，夜间遍燃火炬，严密监视敌人动向。4月19日，清军炮兵在城东修筑的炮台竣工。当夜，用开花大炮三尊，连续轰击，先后将城中大炮台、月城及城垛炸塌。后又击中敌弹药库，引起强烈爆炸，大风骤起，火势更旺，敌军死伤甚众。守敌企图从东门突围，遭清军截杀未逞。清军乘势喊话，敌军大小头目俱降，遂克达坂城。是役，总计毙敌二千数百人，俘敌一千二百余人（其中有阿古柏的大总管爱伊德尔胡里等安集延人二百一十三名），缴获战马八百余匹、枪炮等一千四百余件，其中有大开花铜炮一门。刘锦棠下令宽待俘虏，并将俘虏中的南疆回民等全部释放，“给以衣粮，纵令各归原部”。

《德宗实录》卷四十三，第8页。

左宗棠：《与刘毅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牋》卷十八，第11页。

左宗棠：《与金景亭提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牋》卷十八，第16页。

左宗棠：《攻克达坂城及托克逊坚巢会克吐鲁番满汉两城详细情形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第34页。

左宗棠：《攻克达坂城及托克逊坚巢会克吐鲁番满汉两城详细情形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第36页。

与此同时，由哈密西进的张曜部和出木垒河南下的徐占彪部，在盐池会师后，于4月21日克七克腾木，22日克辟展，25日克胜金台，并向吐鲁番挺进。

刘锦棠所部自4月20日收复达坂之后，于24日夜继续前进，次日上午抵达白杨河，然后分兵两路：罗长祜、谭拔萃等率步骑六营助攻吐鲁番；刘锦棠自率谭上连、黄万鹏等步骑十四营直捣托克逊。

这时，托克逊的阿古柏侵略军正在四出抢掠，焚烧村堡，准备逃窜。被裹胁的回族士兵，得知清军优待俘虏，盼望清军早日到来。有鉴于此，刘锦棠立即命骑兵先发，步兵随后跟进。在托克逊城外经过激烈战斗，重创敌军。4月26日上午，海古拉等慌忙烧毁存粮和火药，仅率二千余骑仓皇逃往喀喇沙尔。未及逃窜的二万余人，全部投降。是役，毙敌二千余名，清军仅亡三十九名，伤五十三名。

罗长祜分领的湘军进抵吐鲁番后，配合张曜和徐占彪部会攻该城。由于白彦虎早已闻风西逃，把防务交给了马人得，而马人得见大军压境，不敢负隅顽抗，开城乞降。于是，清军顺利地收复了吐鲁番满汉两城。

清军三路并进，不到半个月时间便连下三城，为直捣敌巢、收复南疆八城创造了条件。此时，迭遭阿古柏匪帮暴虐压迫的南疆各族人民纷纷起来反抗，使阿古柏完全陷于绝望境地。这个帝国主义的走狗，由喀喇沙尔退至库尔勒后，见大势已去，遂于5月下旬服毒自杀。海古拉赶往库尔勒，携其父尸西逃，防务交白彦虎负责。海古拉逃至库车时，被其兄伯克·胡里所杀。伯克·胡里率部退保西四城，在喀什噶尔称王。他企图在沙俄的羽翼下，苟延残喘，进行垂死挣扎。

达坂、吐鲁番、托克逊收复之后，南疆八城门户洞开，清军本拟乘胜“整旆长驱，以符缓进急战之议”。但是，左宗棠考虑到，要进军喀喇沙尔，途中粮食缺乏，必须靠随军携带，而吐鲁番地区存粮甚少，需要从哈密、巴里坤粮局转运屯集，因此，必须等待新秋采运充足之后，才能继续进军。另一方面，在达坂就擒的阿古柏的大总管爱伊德尔胡里等曾表示愿派人劝说阿古柏投诚，左宗棠和清廷对此都一度心存幻想。直至7月下旬，确知阿古柏自杀、余部西逃之后，左宗棠才决定一俟新秋采运充足，立即向西进军。

二、长途追击，收复南疆八城

1877年8月10日，清廷谕令左宗棠：“刻下已届秋令，著即檄飭各军克日进兵，节节扫荡”。当时，白彦虎已由喀喇沙尔退往库尔勒。为了阻止清军前进，他下令决开开都河，造成河水泛滥。开都河自北而东南注入博斯腾湖，洪水期（5—8月）水宽数百米，是一条障碍性河流。白彦虎决河之后，使喀喇沙尔与库尔勒之间一百数十里的地带成为泛区，深者过顶，浅处亦及

关于阿古柏之死，英人报导不一，有谓病死者，有谓被部将杀死者。左宗棠认为，英人之所以如此，“无非为帕夏（指阿古柏）忧惧服毒讳言之耳，所以欲为之讳者，意在占喀什噶尔为其保护立国耳。”（《左文襄公全集·书牋》卷十九，第31页。）

左宗棠：《攻克达坂城及托克逊坚巢会克吐鲁番满汉两城详细情形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第38页。

《德宗实录》卷五十三，第2页。

马背。此时刘锦棠禀报：一俟清军进逼，白彦虎有可能翻山北窜伊犁、玛纳斯一带。左宗棠经过分析，认为敌人屡遭失败，已出现混乱溃散状态，其残余各部中，以伯克·胡里和白彦虎两股为最大。这两股敌军的特点是：伯克·胡里长于据守，白彦虎则长于流窜。左宗棠判断白彦虎“悍鸷不足，狡猾有余。现虽偷息开都河西岸，一闻官军进逼，其避兵鼠窜，自在意中”。而其流窜的方向，则有三种可能：一是西窜库车、阿克苏一带；二是由西转北，绕道伊犁边境回窜昌吉和玛纳斯；三是往东南罗布淖尔（罗布泊）取道吐鲁番边界，东窜敦煌，入青海。在三个方向中，以窜往昌吉、玛纳斯威胁最大，因为这个方向“地势平行，道路纷歧，难于遮截，非预为择要堵剿不可”。为此，左宗棠一面通知金顺等“远发侦探，加意预防”，一面告知新任署理乌鲁木齐都统英翰饬令金运昌部“加意侦探防剿，毋稍疏忽”。同时，调留防吐鲁番的徐占彪部回扎巴里坤与古城之间，另调记名提督易开俊率马步七营进驻吐鲁番一带。

正当阿古柏反动势力土崩瓦解、行将灭亡的时候，英帝国主义又公然出面干涉。它通过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向清政府提出保存伯克·胡里汗位、将喀什噶尔作为中国“保护国”的无理要求。这时，俄土战争（1877—1878年）业已爆发，英国正忙于维护它在土耳其的利益，不可能给阿古柏残余势力以有效的援助。清廷有鉴于此，对英国再次玩弄的“调停”花招不予理睬。左宗棠更是义正词严地驳斥了英国政府的无耻谰言，指出：“安集延非无立足之处，何待英人别为立国？”如果英国要越俎代庖，“则割英地与之，……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并尖锐地揭露英国不可告人的阴谋是“侵占中国为蚕食之计”。他决心乘胜追击，彻底消灭阿古柏匪帮残余势力。

（一）收复东四城

1877年9月，清军乘秋高气爽之际，开始了收复南疆八城的作战。刘锦棠率马步三十二营为前锋，张曜率马步十六营为后队，并兼筹粮运和办理善后。刘、张两部总兵力为二万余人。

刘锦棠先派数营由托克逊出发，分两路前往曲惠安营：一路沿苏巴什、桑树园子、库米什、榆树沟、乌什塔拉大道；一路由伊拉湖小道前进。沿途搬运柴草，开浚泉井，按程预备，以待大队继进。9月27日，刘锦棠部大队出发。他命步兵各营走大道，自率骑兵各营走小道，于10月2日同抵曲惠。

这时，侦知敌人已发现清军主力开始行动。刘锦棠乃于10月3日命余虎恩、黄万鹏等率马步十四营取道乌什塔拉，沿波斯腾湖南岸指向库尔勒侧背为奇兵；5日，刘锦棠自率主力沿大路指向开都河为正兵。由于开都河泛滥，刘锦棠部一面搭桥修路，一面堵塞上流。10月7日，刘部抵达喀喇沙尔城，

左宗棠：《官军克期进剿应防贼踪纷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一，第2页。

左宗棠：《官军克期进剿应防贼踪纷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一，第3页。

俄国为夺取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地区，自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与土耳其发生了多次战争。1877年4月，俄国利用巴尔干斯拉夫民族的反土起义，向土耳其宣战，旋派兵入罗马尼亚，长驱南下。1878年1月，俄军占领亚德里亚那堡，土耳其被迫请和。根据同年7月签订的《柏林条约》，俄国占领巴统等地，并获巨额赔款（八亿法郎）。战后，土耳其完全沦为半殖民地。

左宗棠：《复陈办理回疆事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一，第18页。

但城空无人，水深数尺，官署民舍，荡然无存。9日，刘锦棠与余虎恩、黄万鹏会合，接着进入库尔勒，同样是一座空城。原来白彦虎劫掠四乡秋粮后，已西逃库车。此时，清军粮食不继，刘锦棠一面传令后路迅速转运接济，一面令军士觅掘窖粮，获数十万斤。

刘锦棠根据敌军西逃库车、立足未稳等情况，决定亲率精兵乘胜追击。于是，从各营中挑选健卒一千五百名和精骑一千名，先行进发，命罗长祜率后队各营及辎重跟进。清军三昼夜疾驰四百余里，于10月15日追至布古尔（今轮台），击败敌骑千余，毙敌百余名。16日，追四十里，见前方步骑甚众，但用望远镜观察，其中持枪者不过千余人，余皆被裹胁西行的民众。刘锦棠立即传令：“执械者诛，余勿问！”顿时号鼓齐鸣，马步并进，敌军败逃。10月18日，清军追至库车城外，发现大量敌军。刘锦棠立即作出三路进攻的部署：命黄万鹏等率骑兵七营从右路进击，谭拔萃等率步兵三营继之；命章洪胜等率骑兵四营由左路进击，张俊等率步兵三营继之；刘锦棠自率骑兵从中路进攻，罗长祜率后队马步跟进。战斗开始后，敌军虽遭重创，仍然顽抗，直至罗长祜所率后队马步各营赶到战场时，敌始大溃。清军乘势收复库车，并追杀数十里，毙敌近千人。白彦虎率余部狂逃，企图继续投靠已在喀什噶尔称王的伯克·胡里。

清军此次由库尔勒出发，日夜兼程，六天之内前进八九百里，歼敌虽只千余，但救出难民约十万人。左宗棠随即遣员设置善后抚辑局，办理各地善后事宜。

10月19日，刘锦棠率军继续西进，21日抵拜城，闻白彦虎于20日由此西逃，便决定穷追不舍。22日凌晨，清军将士冒着冰霜，不顾困乏，向西急进。抵达铜厂时，侦知敌军正在渡木杂喇特河（今木扎提河），清军立即扑向敌人，斩杀甚众。敌人顽抗，白彦虎军居左，伯克·胡里军居右，列阵于上铜厂，“枪炮环轰，连珠不绝”。清军也张两翼包抄，奋勇冲杀。副将夏辛酉跃马突入敌阵，生擒敌右路指挥官，敌军顿时大溃。清军乘胜追杀，直至察尔齐克台（今拜城西南察尔齐）西三十余里。10月23日，清军师行戈壁，裹粮而前。敌军惊魂未定，只顾狂奔，不复拒战，清军遂于24日克阿克苏城。接着，一面安抚拒绝随敌西逃的群众，一面分兵追击敌人。

据俘虏供称：敌人为了分散清军兵力，自阿克苏以后分兵两路，阿古柏军残部逃往叶尔羌，白彦虎率余部逃往乌什。刘锦棠决定暂舍阿古柏军残部，专追白彦虎。他命黄万鹏、张俊马步两营直捣乌什，调谭慎典、夏辛酉各率骑兵从翼侧绕进。10月26日，在乌什城东击败小股敌人，次日追至乌什西九十里的阿他伯什地方，只见一片戈壁，并无敌军踪迹。原来，白彦虎已从间道逃向喀什噶尔。黄万鹏等回军阿克苏，清军大队也已抵达该处。张曜所部则正由喀喇沙尔向库车前进中。

（二）收复西四城

清军于一个月之内驰驱二千余里，经过两次较大的战斗，收复了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这时，西四城（叶尔羌、英吉沙

王定安：《湘军记》卷十九。第22页。

魏光燾：《勘定新疆记》卷三，武功记三，第12页。

尔、和阗、喀什噶尔)的敌人内部已发生重大变化。和阗的叛军头目呢牙斯向清军请降，当闻知清军克库车后，即主动率兵围攻叶尔羌。伯克·胡里闻讯，令其头目阿里达什留守喀什噶尔，自率精骑五千，前往增援，击败呢牙斯，占领和阗。当伯克·胡里率兵进攻呢牙斯时，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乘机反正，率数百满汉兵民占据喀什噶尔汉城。阿里达什据回城自保，并约白彦虎围攻汉城；伯克·胡里也赶忙回救喀什噶尔。何步云等派人到刘锦棠处乞援。刘锦棠原来计划先取叶尔羌，当得知喀什噶尔何步云反正的消息后，认为速克喀什噶尔是当务之急，于是不待张曜全军到达，便分兵三路前进：一路由余虎恩等率步兵三营、骑兵二营，从阿克苏取道巴尔楚克(今巴楚东)直趋喀什噶尔为正兵；一路由黄万鹏率骑兵六营、张俊率步兵三营，经乌什取道布鲁特边境出喀什噶尔西为奇兵，约定于12月18日两路同抵喀什噶尔，形成包围之势；刘锦棠自率马步各营，经巴尔楚克直捣叶尔羌和英吉沙尔，策应攻取喀什噶尔。12月17日，余虎恩、黄万鹏等部同时到达喀什噶尔，当晚一举收复该城。伯克·胡里、白彦虎等在沙俄的庇护下，分别率残部逃入俄境。余虎恩、黄万鹏等分途追击，至边界而止。12月21日，刘锦棠亲自率领的清军收复叶尔羌，然后派总兵董福祥率部指向和阗，自率主力于24日收复英吉沙尔，随即前往喀什噶尔。1878年1月2日(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董福祥部克复和阗。至此，新疆全境除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

在收复南疆西四城的作战中，清军以破竹之势，横扫敌巢，生俘数千人(内有阿古柏子女八人、阿古柏军头目多人、叛军头目余小虎、马元及反动封建主金相印父子等)，缴获各种开花炮百余门、战马万余匹、枪械若干，取得了巨大胜利。

第五节 伊犁的索还

在收复新疆的战争进行过程中，清政府多次同俄国交涉，要求归还伊犁，但沙俄政府制造种种借口，拒不交还。阿古柏侵略势力被消灭以后，清政府乘胜向俄国索还伊犁，并要求引渡白彦虎等。沙俄政府一面答称，如果赔偿俄国占领伊犁之军费，可以交还伊犁；一面唆使白彦虎、伯克·胡里残部等多次回窜，骚扰边境，企图借口边境未靖，缓交伊犁。清军粉碎了敌人的骚扰，并从俘虏口供及查获俄国所给的路票，证实这些骚扰均系俄国政府所指使。

俄国政府的阴谋败露，只得答应进行谈判。清廷派吏部侍郎崇厚为钦差全权大臣赴俄交涉。1878年底，崇厚到达俄都圣彼得堡（今苏联列宁格勒）。这时，俄土战争已经结束，狡猾的沙俄政府利用清政府深恐与俄国作战的心理，趁机敲诈。在沙俄的威胁讹诈下，崇厚于1879年10月在黑海岸边的里瓦基亚（靠近雅尔达）与俄方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基亚条约》）。条约规定：俄国归还伊犁东部地区，但由中国赔偿俄国占领费五百万卢布（合银二百八十万两），并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伊犁南部特克斯河流域领土，修改《塔城界约》所规定的斋桑湖地区国界，增辟由新疆到西安、汉口、天津的通商路线；在嘉峪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七处增设领事馆。这样，伊犁虽在名义上归还中国，实际上却变成一座三面临敌、险要皆失的孤城。这一讹诈性条约传出后，激起了中国朝野的极大义愤，以致“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左宗棠也表示反对，主张对于解决伊犁问题必须“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而李鸿章则主张履行崇厚所订的卖国条约。清政府慑于朝野舆论，最后拒绝批准这个条约，并判崇厚“荒谬误国”之罪，逮捕下狱。1880年2月19日，清政府正式照会沙皇政府：崇厚所议条约“多有违训越权之处”，“窒碍难行”。同时，另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授权谈判改约问题。

俄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恼羞成怒，决定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其驻华使馆代办凯阳德扬言：“俄国并非无力量，至条约准与不准，在俄国总是一样”。与此同时，沙俄在我东北、西北边境调集上万军队进行威胁，甚至出动黑海舰队到中国黄海示威，并增兵伊犁。清廷为了自卫，也在中俄边境和沿海地区采取防御措施，并命左宗棠部署新疆军务，准备用武力收复伊犁。左宗棠拟定了分三路向伊犁进军的计划：东路由金顺率步骑二十五营一万二千余人，扼住晶河一线，严防俄军窜犯；西路由刘锦棠率步骑二十八营一万一千人，取道乌什，从冰岭以西经布鲁特游牧地区直指伊犁；中路由张曜率步骑十九营八千五百人，从阿克苏冰岭之东，沿特克斯河指向伊犁。此外，以六

《塔城界约》即1864年10月7日中俄两国于今新疆塔城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通过此约，沙俄把中国西部的三个大湖——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塞克湖及其周围共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土地割占了去。

奕訢：《请乘英法调停之际以赦崇厚为条件挽回俄约折》，《清季外交史料》卷二十一，第10页。

左宗棠：《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五，第38页。

《大清国大皇帝致俄国声明崇厚所议条约违训越权窒碍难行国书》，《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九，第3页。

《总署奏俄署使凯阳德因议处崇厚谕旨提出抗议折》，《清季外交史料》卷十八，第11页。

千人分屯阿克苏、哈密为后应，以三千人增强塔尔巴哈台防务。准备参战的部队共约五万余人。5月，左宗棠“亲自舆榘出关，誓与俄人决一死战”。6月，左宗棠进驻哈密，积极部署进军事宜。然而，清廷却在沙俄的压力下“暂免”崇厚死刑，不久又将左宗棠调回北京。

同年7月底，曾纪泽由伦敦抵达圣彼得堡，与沙俄政府谈判。曾纪泽自称此行是“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深知任务艰巨。但由于此时俄土战争结束不久，沙俄又忙于镇压中亚地区少数民族的反抗，已经没有多大力量进犯中国，特别是注意到左宗棠等的军事准备，加之对曾纪泽的威胁刁难又未收到预期效果，最后于1881年2月24日与曾纪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以代替崇厚所订的条约。中国虽收回了伊犁地区及特克斯河流域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万九千平方公里土地，但条约规定“赔款”增加到九百万卢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仍被沙俄强行霸占。条约还规定中俄已定的西北边界有“不妥之处”应重新“勘改”，为沙俄下一步继续侵占我国西北领土留下了伏笔。随后，沙俄根据这个条约的原则，于1882年至1884年与清政府签订了《伊犁界约》等五个子约，分段勘定新疆的中俄边界，把七万一千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正式并入了俄国的版图。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14页。

曾纪泽：《巴黎致总署总办》，《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70页。

第六节 战争胜利的原因

驱逐阿古柏侵略军、收复新疆的战争，是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战争。这次战争的胜利，粉碎了英俄勾结阿古柏侵占新疆的可耻阴谋，收复和保卫了祖国西北的这一片大好河山，使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了遭受英、俄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阿古柏奴役的命运，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在一定程度上洗雪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所蒙受的耻辱，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灭了侵略者的威风。

这次战争所以取得胜利，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

新疆各族人民饱受外国入侵者和地方割据政权的欺压，早就盼望祖国予以救援。他们得知清军出关作战，莫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并积极行动起来，准备支援战争。特别是清军进军南疆过程中，维吾尔等各族人民“相望于道，军行所至，或为向导，或随同打仗，颇为出力”。当白彦虎败逃至拜城时，百姓紧闭城门，不许其进入，而刘锦棠所部清军一到，则立即开城欢迎。阿克苏民众也拒绝随敌西逃，“严守以待官军”。西四城收复后，当地人民还积极协助清军肃清侵略者的残余势力和内部分裂叛乱分子。当年勾引阿古柏入侵的金相印等人及匿居喀什噶尔等地的英印官员、土耳其军事教官等，都是在人民的积极配合下查获的。另一方面，清军也能注意安抚百姓，宽待俘虏。左宗棠曾指示各部：“各遵行军五禁，严禁杀掠奸淫”，“只打真贼，不扰平民”。“安集延虐使其众，官军抚之以仁，安集延贪取于民，官军矫之以宽大”。这对于争取民心，瓦解敌军，筹措军粮，保证“戎机顺迅”，无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大大鼓舞了参战将士的战斗意志和战胜侵略者的决心。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清军士气高，勇于克服地形、天候等各方面的困难。如收复南疆东四城时，“官军整旅西征，于冰霜凜冽、弥望戈壁之中，一月驰骤三千余里，……诸将士踊跃用命”。收复西四城时，同样是不顾疲劳，远程追击，其功成之迅，连力主西征的左宗棠也感到“非意料所及”。除了将士用命之外，出关清军在装备和军事素养方面较以前有所提高，加之他们大多有在陕甘地区作战的经验，而新疆的某些自然条件又与陕甘相近，这也是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之一。

二、清政府决策正确，选将得当

左宗棠：《新疆缠回打仗出力请酌量奖叙并委署各城阿奇木伯克等职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一，第74页。

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兵事二，第20页。

左宗棠：《答刘毅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七，第62页。

左宗棠：《答张朗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八，第22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一，第53页。

左宗棠：《答刘克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九，第73页。

在这次战争中，清政府对英、俄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英帝国主义对中国收复新疆曾多次进行干涉和阻挠，清廷采纳左宗棠等人的正确主张，断然予以批驳，拒绝其无理要求，坚决实施驱逐阿古柏、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战争，并将其进行到底，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在索还伊犁问题上，清政府以武力为后盾，配合外交上的折冲，使伊犁得以索还。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左宗棠等的积极备战，单凭外交斗争，想叫贪婪成性的俄国侵略者吐出已经吞下的猎物是不可能的。

选将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此次收复新疆，清政府不但采纳了力主进军西北的左宗棠的正确意见，而且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同时，在战争准备和实施过程中，能授予左宗棠以应有的权力，使其事权专一，能实施集中统一的指挥。而左宗棠对于前敌指挥刘锦棠也能做到充分信任，不加遥制，使其有随机应变之权。这些，对于保证战事的顺利进行，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正确

这次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军事战略和作战指挥的正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左宗棠提出的“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作战方针，体现了因地制宜、稳扎稳打、积极主动的思想。有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加上负责前敌指挥的刘锦棠又能比较准确地判断敌情，灵活机断地进行指挥，因而基本上做到了每战必胜，兵锋所指，侵略者望风披靡。

清军在战争指导上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充分做好战前准备

“军事莫重于转饷，而转饷莫难于塞外。”这次作战的地区，人稀地广，远离中原，交通不便，地形复杂，又是特殊的大陆性气候，雨量稀少，冬夏、昼夜的寒暑变化急剧。军队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运动和后勤保障有极大的困难。新疆产粮本来就不多，加之由于地方割据政权之间的混战和阿古柏等的入侵，人畜流亡，田园荒芜，就地补给不易。因此，筹集和运输粮食问题，自然成了保证整个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必须首先解决的战略性问题。左宗棠强调“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正是把后勤保障问题提到战略的高度，集中力量加以解决，并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始终予以重视。实质上，这就是“缓进”所包含的核心问题。为了准备好粮食、军械的屯集，清军对于需用多少兵力、多少粮食、多少经费、多少车驮，都作了周密的计算和积极的筹划。

整个战争中，清军的准备时间是较长的。从1874年9月开始，准备了一年半之后方正式发起进攻。战争历时一年半，其中实战时间不过半年多一点，其余大部分时间都用之于战前准备。收复北疆后到进军吐鲁番，准备了半年，利用冰雪严寒的冬天整训部队，到第二年春天才发起进攻。从收复吐鲁番到边军南疆又准备了四个月，避开了酷暑，等到秋天转凉后才继续西进。在进军过程中，清军一段路程一段路程地凿井开渠，备粮、备水、备草。在准备工作尚未完成之前，决不轻易对敌发起进攻。一旦完成了战前准备，则不失

时机地发起进攻，力求速决。收复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之战，实战时间不到半个月；奔袭数千里，收复南疆八城，也只用了四个半月的时间。

粮运问题始终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行动，这是当时进军新疆的一个重要特点。清廷认识到，“此次远道进兵，粮饷必须充裕”。“必须士饱马腾，方足以壮军威而张挞伐。”左宗棠反复强调“担迟不担错”，其用意也主要在于充分做好粮运工作。每次作战开始的时机，总是以粮食问题为转移。如进军北疆，必待“占城储峙稍充”和“新谷遍野，有粮可因”时，才令各营“长驱大进，直捣贼巢”。转兵南路和收复南疆八城时，也总是先考虑粮食是否充裕，确保前敌将士无悬釜待炊之虞，而后开始行动。

（二）正确选择战略方向

战略方向的选择，是一个胜败攸关的问题。进军新疆，清军有几个战略方向可以选择，一个是先北后南，另一个是先南后北，再就是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并进。如果南北并进，势必分散兵力，即所谓“减后劲之军，增前路之贼，非计之得也”。如果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根据当时的态势和道路情况，即是以主力从哈密西攻阿古柏军的主要设防地域吐鲁番和托克逊，得手后，再由南而北夺占达坂，进取北疆。采取这一方针，弊病甚多。首先，不能利用清军已控制东天山北路许多城镇的有利条件，如果北路之敌乘机东进，即使这些城镇不失于敌手，也会造成白彦虎等回窜陕甘，扰乱后方，出现既要顾前又要顾后的不利局面。其次，吐鲁番、托克逊乃是阿古柏军的主力所在，如清军首攻南路，阿古柏势必倾全力抗拒。即使清军能进至吐鲁番，也将因师行戈壁，粮草难继，顿兵坚城而兵疲惫沮。一旦北路之敌由古城南下抄袭后路，那么，清军非但不能速决，且有可能进退维谷，导致失败。再次，外蒙古是清军北路运粮的重要通道，又是清军进退的依托，如果清军主力配置在天山以南，敌军势必威胁清军这一重要翼侧。事实上，在战前，敌人已多次袭扰这一粮道。正是由于清军集结主力于北路，加强了后方供应线的保护，才阻止了敌人窜扰的行动，使其失去在北路广大地区回旋的余地。相反，清军采取先北后南的战略，则处处主动，措置裕如。阿古柏侵略军的巢穴和主力均在南疆，北疆（不含伊犁）则是刚归附阿古柏的白彦虎及马人得等的势力，他们虽然盘踞北疆的大部地区，但互有矛盾，指挥不统一，力量不集中，便于乘虚而入，各个击破。首先消灭北路之敌，进可打开南疆门户，迅速扩张战果，退可守住稳固的基地。因此，清军采取“先北后南”的方针是正确的。正是由于正确地选择了战略方向，从而做到了首战告捷，取得了主动，然后由北而南，节节深入，使阿古柏侵略势力节节败退，直至被消灭。

（三）灵活实施作战指挥

清军之所以能够速战速决，还由于作战指挥比较灵活，能审时度势，正确选择打击目标，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如收复北疆的作战，攻乌鲁木齐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41页。

左宗棠：《驰抵肃州各军分起出关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48—49页。

左宗棠：《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38页。

齐以前，先打古牧地；在攻古牧地时，佯示敌以从大路进攻，而把主攻方向选择在黄田，采用奇袭战法，突然行动，打乱了敌军部署；得手后，立即以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从两个方向实施突击，并注意步、骑、炮兵之间的协同动作，形成拳头，迫使古牧地之敌纷纷溃降，从而动摇了北疆守敌的全局，保证了乌鲁木齐和北疆其它各城的迅速收复。进兵南路时，则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使贼备多力分，不至为所牵缀”，取得了决战的胜利，歼灭了阿古柏的主力，为收复南疆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在进军过程中，清军还十分注意侦察敌情，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大胆实施机动。如收复达坂、吐鲁番和托克逊后，本打算在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之后再逐步西进，但经过侦察，发现敌人企图逃跑时，前线指挥刘锦棠能立即机断行事，挑选精壮，跟踪追击。在长途追击中，前锋部队不顾饥饿劳累，昼夜兼程，敢于以少胜多，勇猛冲杀，使敌人得不到喘息之机，后续部队也能快速跟进，紧密协同，从而保证了南疆八城的迅速收复和战争的最后胜利。

从敌人方面看，阿古柏依靠英俄帝国主义支持，进行投机冒险的侵略活动，其本质和基础自然是虚弱的，经不起为保卫祖国而战的优秀清军的打击。阿古柏在军事上固然有其狡诈的一面，但毕竟还是愚蠢的。他在新疆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殖民统治，而战前准备却并不充分。当清王朝忙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无暇西顾时，阿古柏未能控制哈密这个新疆通往内地的咽喉要地；在清军进疆之初，又未能趁清军主力尚未到达哈密及巴里坤、济木萨等地时，事先抢占这些战略要点，使清军陷于不利境地。阿古柏仗恃其主子英国的势力，寄希望于清政府屈从英国的压力，承认其所谓的“哲德莎尔”殖民统治，因而错误地判断了中国军民驱逐侵略者的决心。在作战指挥上，他基本上是实行一种被动挨打、消极防御的方针。在清军进攻古牧地时，他躲在托克逊；当清军进攻达坂时，他更远逃喀喇沙尔。这样，势必使其内部固有的矛盾迅速发展，以致互相观望，互不协同，为清军逐个歼灭提供了条件。

第九章 中法战争（1883年12月—1885年4月）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年，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化的过渡时期。在这期间，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日益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随之而来的是资本输出越来越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殖民地的依赖性更大了。它们一方面力图垄断殖民地原料和市场，一方面为金融资本寻找更多的投资场所。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加强，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急剧变化，美、德、日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为了取得与其经济威力相适应的殖民地，不断向占有较多殖民地的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挑战，要求重新分割世界。所以，正是在七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由于法国武装侵略越南和中国而引起的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就是资本主义列强夺取殖民地大高潮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第一节 战争爆发前后的政治军事形势

一、法国武装入侵越南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国内资本空前未有的集中，金融资本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迅速膨胀，使法兰西共和国成了金融君主国。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法国的金融寡头们加紧向国外投资，并更加强烈地要求法国政府进一步推行殖民政策。列宁于1916年指出：“在法国，恰好是金融资本特别迅速的发展（在工业资本削弱的情况下），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使兼并政策（殖民政策）特别加紧地推行起来”。残酷镇压过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茹费理（1832—1893），正是法国大金融资本家利益的忠实代理人 and 殖民政策的狂热执行者。1880—1881年和1883—1885年，他代表法国温和派共和党人两次组阁。1881年，当他初次主持政府的时候，不经众议院表决，就出兵占领突尼斯。以后，又向非洲其它地区进行殖民侵略。在印度支那（通常指越南、老挝、柬埔寨）地区，法国企图完全占领越南，进而侵入中国。

越南位于印度支那半岛（即中南半岛）东部，东南两面临海，北面与中国云南、广西二省邻接，西面与老挝、柬埔寨为邻。南北长约一千六百多公里，东西最宽处（北部）约六百公里，最窄处（中部）仅五十公里，总面积约三十二万九千多平方公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人口约二千三百万，军队约七万人。越南全境五分之四为山地和高原，北部和西北部为高山、高原，红河以北地区海拔在五百至一千五百米之间。中越边境有的山峰海拔二千米以上，山间谷地较宽，高平、那岑、谅山等处的谷地为中越间天然通道。出于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气温高（年平均24℃以上），湿度大，风雨多，雨季（5月至10月）、旱季（11月至次年4月）明显，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十九世纪时，越南划分为南圻（南部十省）、中圻（中部四省）、北圻（北部十六省）三部分，国都为顺化。

法国凯觐越南，由来已久。早在十七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就来到越南，大搞间谍活动。十八世纪下半叶，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势力被殖民劲敌英国排挤之后，越南更成了法国向东方扩张的主要目标。它企图在印度支那建立强大据点，阻拦英国人进一步向远东扩张的去路，以便自己独占在远东（主要是中国）的利益；同时，企图以越南为基地，开辟一条通向中国西南和中部地区的侵略道路。法王路易十六（1754—1793）曾根据百多禄主教（在越南等地传教的法国殖民主义者）1787年的奏议，制定了未来“法兰西东方帝国”的庞大计划，并采取了侵占越南的实际步骤。

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统治者拿破仑第三（1808—1873）继承路易十六的衣钵，加紧对越南推行炮舰政策。1856年，法国远东舰队借口越南处死传教士，公然炮轰土伦港（今岷港），并于1858年强行登陆，一度予以占领。次年，又攻占西贡（今胡志明市）。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国随即从侵华法军中抽调三千五百人进攻南圻，先后占领嘉定、定祥、边和、永隆等省和昆仑岛，于1862年6月强迫越南阮福时封建王朝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即《柴棍条约》），把越南南方以西贡为中心的大片地区割归法国。这标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10页。

志着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开端。1863年，法国又强迫越南承认柬埔寨受法国“保护”，进一步控制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湄公河下游广大地区。

在第一次《西贡条约》中，法国特地把法国船只（包括军舰在内）有自由航行湄公河的特权塞了进去，这是与它企图利用越南为基地向中国云南等省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经过几年的调查，法国侵略者发现湄公河的上游（中国境内称澜沧江）滩多流急，航行甚为困难，同时又得知红河为中越交通要道，于是，便把注意力从湄公河转移到了红河。它决定占领北圻（西方人称为东京），以便沿红河侵入中国西南地区。

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1870—1871年）暂时推迟了法国对越南北圻的军事侵略，但准备工作从未间断过。1871年，法国殖民主义者堵布益以帮助云南清军采购军火为名，对红河进行了实地考察，证明溯红河可以航抵中国，保胜（今老街）以下可通汽船。从此，占领北圻，由红河直达中国，便成为法国殖民者在亚洲扩张的主要目标了。

1873年11月，由法国驻西贡总督杜白蕾派出的一支侵略军在安邨率领下侵占河内，接着组织上万雇佣军，连陷海阳、宁平、南定等城。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驻在中越边境保胜地区的黑旗军帮助抵抗法国侵略者。

二、黑旗军援越抗法

黑旗军原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活动于中国广东、广西边境地区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因以七星黑旗为战旗，故称黑旗军。其领袖刘永福（1837—1917）系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雇工出身，早年参加天地会起义。1867年因受清军逼迫，刘永福率众数百，进入越南北部，后以保胜为根据地，聚众耕牧，势力逐渐壮大，发展至二千余人。与越南人民休戚与共的黑旗军，对法国侵略者十分痛恨，因而接受了越南政府的邀请，由刘永福率领千余人，配合越南军民抗战。1873年12月21日，黑旗军于河内近郊击毙法国侵略军头目安邨，大获全胜。然而，腐朽的越南阮氏封建王朝又怕黑旗军的胜利招致法国的更大报复，急忙与法议和，于1874年3月15日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把越南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另一方面，越南政府授予刘永福以“三宣副提督”之职，由他管理宣光、兴化、山西三省，利用黑旗军阻止法军对红河上游的侵略。

由于红河上游地区为黑旗军所控制，法国侵略者无法直窥中国云南，因而视黑旗军为眼中钉，决心拔去。1879年6月，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公开叫嚣：“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1881年7月，在茹费理主持下，法国议会通过了二百四十万法郎的侵越军费。1882年3月，法国西贡殖民当局派海军上校李威利（又译为李维业）率军数千北上，再次发起对越南北圻的武装侵略，4月占领河内，次年3

堵布益本法国商人，英法联军侵华时侨居上海，后移居汉口，1869年春经西安、汉中、重庆抵达昆明，劝说云南巡抚岑毓英等沟通滇越交通，采购西方军火镇压回民起义。1871年，堵布益以通过红河向云南当局运送军火为借口，探航红河。其后，他回到巴黎，向海军部汇报情况，得到法国当局的赏识和重用。

依罗神甫：《法国——东京回忆录》，转引自〔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一卷（1960年中译本），第41页。

月又占领南定。法国侵略者还不断溯红河向上游进犯，并悬赏十万元攻取黑旗军的根据地保胜，气焰十分嚣张。

法国侵略者再次侵犯北圻，刘永福深知“法鬼贪心无厌，非武力不能解决”，因而又一次接受越南政府的邀请，发兵数千人，会合越南北圻统督黄佐灸所部军队，向法军发起反击。1883年5月19日，黑旗军在越南军民配合下，于河内城西的纸桥附近以伏击战法歼敌数百人，毙李威利等法国军官三十余人，迫使法军残部龟缩河内。纸桥战后，越南政府任命刘永福为“三宣正提督”。

法国政府不甘心失败，立即以西贡法军司令波滑继李威利为北圻法军统帅，除增派陆军外，并成立北圻舰队，由海军少将孤拔（1827—1885）指挥，又以法国驻曼谷领事何罗芒为特派员，代表法国政府监督侵越法军的军事行动。8月，法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波滑率领，沿红河进攻黑旗军；一路由孤拔率海军进攻越南首都顺化。由波滑率领的法军在怀德、丹凤等地屡遭黑旗军和越南军民的痛击，损失惨重，何罗芒不得不派波滑返回巴黎，要求增加援军。但是，由孤拔率领的海军却攻入顺化，趁越王阮福时病死、政局不稳之机，强迫越南政府于8月25日签订第一次《顺化条约》，企图把越南完全置于法国的严格控制之下，使其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接着，法国便肆无忌惮地把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

三、中法战争的爆发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彼此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越南统治者与清朝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历史关系，其国王接受清朝皇帝的“册封”，并定期派人到北京“朝贡”，清王朝对越南则负有保护之责。正是根据这种特殊的历史关系，当越南遭受法国侵略时，其国王一方面邀请黑旗军协助抗法，一方面派遣使者向清朝政府告急，要求中国派兵前往救援。

可是，当时的清朝政府在西太后那拉氏的把持下，为了维护其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实行对内残酷镇压、对外退让妥协的反动政策。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是恭亲王奕訢，而一切重大外交事宜，实际上经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办理。奕訢和李鸿章等俯首听命于那拉氏，对外推行退让妥协政策。面对法国的武装挑战，清统治者虽然从1882年起，应越南政府之请，陆续增派了一些军队驻扎于越南北圻，但一再交代“不可衅自我开”，对黑

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以下简称《中法战争》——第一册、第261页。

1882年，法军攻破河内后，越南国王在乞援咨文中称：“下国久赖天朝封殖，豫列职方，二百余年，尺土一民，皆天朝隶属。”（《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三第37页。）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写的《越南历史》（越南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也指出：“阮朝诸王对清朝仍然一贯保持臣服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越南历史》第一集，中译本第458页。）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为清政府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它由恭亲王奕訢奏请，于1861年1月批准成立。以后职权不断扩大，总揽外交及涉外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大权，实际上成了清政府的“内阁”。1901年，按《辛丑条约》的规定改为外务部。

旗军的抗法斗争也不予公开支持，始终寄希望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与李鸿章等为代表的主和派的态度相反，清朝政府中以两江总督左宗棠、山西巡抚张之洞、兵部尚书彭玉麟等为代表的主战派，积极主张抵抗法国的侵略。这种主张，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和清军中爱国官兵对法国侵略者的义愤和对中国西南边境危机的深切关注。清廷外受法国的逼迫，内有人民的压力，从其切身的统治利益出发，最后才不得已对法国的侵略行径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

1883年9月下旬，清廷命兵部尚书彭玉麟前往广东，会同两广总督张树声办理海防。10—11月间，清政府在给前敌将领的谕令中明确提出：“北宁为我军驻防之所，如果法人前来攻逼，即着督饬官军，竭力捍御，毋稍松劲”，山西“与北宁相距较近，必应固守，以成犄角之势”；同时，公开奖励黑旗军的抗法斗争。

以越南为跳板，侵入中国云南等省，是当时法国政府的既定方针。1883年2月，茹费理第二次组阁，并由一贯蔑视中国、认为中国“不足道”的沙梅拉库担任外长，更加加紧了侵华步伐。侵略者供称：“我们在东京（越南北部）的行动所能获得的利益，主要将由中国领土的开放得来”。同年5月15日，法国议会通过增加新的军事拨款五百五十万法郎，并决定派遣军队一千八百名，配以各种舰船十二艘，前往越南，支援驻越侵略军。第一次《顺化条约》签订以后，法国便威逼清政府撤退所有驻在北圻的中国军队，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占领，并要求中国和它签订不平等的商务协定和国境条约。清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法国便决定诉诸武力。

1883年12月，法国议会通过二千九百万法郎军费和派遣一万五千名远征军的提案，决定夺取山西、北宁，迫使清朝政府让步。12月中旬，法国侵略军悍然向驻扎在北圻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清军被迫应战，中法战争正式开始。

战争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83年12月到1884年5月，战争主要在越南北圻红河三角洲内的山西、北宁等地进行；第二阶段从1884年8月到1885年4月，战争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越南北圻两个战场上同时进行。

四、双方军队概况

（一）法军概况及其远征军的编成

从1880年起，清朝政府驻英、法、俄三国公使曾纪泽就多次抗议法国对越南的侵略，但并不反对举行和平谈判。1882年，曾纪泽又主张利用当时国际间错综复杂的形势，废除越、法之间的不平等条约，遭到李鸿章的拒绝，李鸿章的妥协退让态度，得到西太后慈禧的支持，并被指派对法交涉。同年11—12月间，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达成初步协议：法国表示“无意”侵占越南；中国驻北圻军队适当后撤；开保胜为商埠。1883年2月，法国内阁改组，茹费理重新上台。他召回宝海，另派驻日公使脱利古来华。同年6月，脱利古到达上海，随后与李鸿章重开谈判。脱按茹指示，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李鸿章仍然委曲求全，建议总理衙门让步接受。由于遭到清政府中另一部分人的反对，迟未达成协议。谈判过程中，法国已进一步武装入侵越南，并于8月25日逼签第一次《顺化条约》，完成了变越南为殖民地的步骤，于是于10月下旬命令脱利古中止谈判，返回日本任所。

《军机处密寄署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上谕》，《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七，第15页。

[法]沙梅拉库：《致法驻伦敦大使瓦定敦》，《法国外交文牍》，《中法战争》（七），第178页。

在发动中法战争时，法国已从普法战争失败所造成的窘境中摆脱出来，军事力量有所恢复，但并不十分强大。普法战争前，法国有步兵三百七十六营，加上其它部队，约有常备军六十万人。普法战争失败后，为了适应殖民战争和对付普鲁士军事威胁的需要，法国加紧进行军事制度的各种改革。废止代役兵制度，恢复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时期首创的国民义务兵役制，规定男子自二十岁至四十五岁止，凡符合当兵条件者，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一律不准替代赎免。由于实行举国皆兵的制度，每年可招新兵十五万人，保证了充足的常备军现役兵源和战时大量扩编部队的需要。根据 1875 年通过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法国总统为全军最高统帅，指挥海陆军全部。有关国防的重大事项，由高级国防会议决定。高级国防会议由内阁总理主持，有外交、财政、陆军、海军、殖民等各部部长参加。法国陆军分本国军及殖民地军二种。本国军由步、骑、炮、工、宪、辎重、经理、卫生诸兵种组成，殖民地军只有步、骑、炮、工、经理、卫生诸兵种。

在武器方面，法国在弥补了普法战争的损失之后，从 1875 年开始，又逐渐依靠自己的军事工业所生产的新式枪炮把军队重新装备起来。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能生产口径三十七到三百二十毫米的各种火炮，其性能与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炮及德国的克虏伯炮不相上下。法军轻武器主要是夏什普式中心发火击针后装线膛枪，口径十一毫米，射速为每分钟七发，射程一千八百米。此外，还有克罗帕契克连发枪和哈齐开斯机关炮（机关枪的前身）等。普法战争后，法国海军舰艇工业也有较大发展。1873 年，法国首建钢甲舰，至 1881 年，便能建造万吨级军舰，装甲厚达十五英寸，航速达十四节。舰艇主要装备口径一百至一百九十毫米的中重型火炮和三十七、五十七毫米的速射炮。速射炮的射速每分钟四十至六十发。

当时，法国扩军备战的军费开支是相当惊人的。据统计，1883 年法国陆军经费为五亿八千四百万法郎，海军经费为两亿零五百万法郎，共七亿八千九百万法郎，占国家总开支的 22% 强。正因为这样，法国政府有恃无恐地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

但是，法国为巩固和扩大其在非洲的殖民掠夺，占用了不少兵力，加上财力毕竟有限，又要防备德国的进攻，不可能派出大量军队远涉重洋来远东作战。因此，中法战争过程中，法国远征军的兵力是逐次增加的，总兵力最多时也只有两万余人。在大举进犯北宁中国防军时，法国远征军司令部下辖两个旅和一个内河舰队。每旅辖三个步兵团和炮兵、骑兵、工兵、电信兵等部队。步兵、骑兵全部装备后装线膛步枪以及少数机关枪。炮兵每连有火炮六门，射程最大的可达十公里，有的是连珠炮（机关炮）。

法国远征军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本国兵约占三分之一；雇佣兵（由欧洲其它国家招募来的流氓打手）为数不多；附庸兵（阿尔及利亚和越南人）数量最大。这几种成分的军队待遇各不相同，装备、补给也不一样，因而互有矛盾。

法国长期盛行代役兵制度，每个应服兵役的人，都可缴付一定 钱款雇人代服兵役，18 世纪末法国革命时期，代役制遭到禁止，但拿破仑重新在法律上加以承认。1855 年起，代役者由国家代雇，赎金则归入“军队补贴”这项特别基金中。1868 年的法令对当时的代役兵制度加以肯定。

（二）清军概况

中法战争时期，中国的洋务运动正处于发展阶段。当时，除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四大兵工厂以外，还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规模较小的地方性兵工厂，仿制各种近代枪炮，并大量从外国进口武器，从而使军队装备有了较明显的改善。进口的步枪主要有英国 1871 年式马梯尼—亨利、李·恩飞后装枪，法国 1866 年式和 1876 年式夏什普击针后装枪，奥地利的曼利夏后装枪，美国的林明敦后装枪等。进口的火炮主要有英国阿姆斯特朗炮厂、德国克虏伯炮厂生产的各种口径的后装钢炮，美国的诺登飞和加特林机关炮等。仿制的近代枪炮也为数不少。其中江南制造总局在 1867—1884 年共生产了各种步枪近三万五千支，各种炮二百门。但由于生产和进口的新式武器有限，远难满足全国军队的需要。据李鸿章当时奏称：“近年北洋购新式枪皆精坚适用，淮、练各军皆改习洋操；而滇、粤、闽、浙防军器械缺乏，操法尚未讲求。”因此，和法国侵略军相比，清军不但组织编制和训练等方面相形见绌，在武器装备方面也差距很大。陆军武器土洋参杂，既有后装枪炮，又有不少刀矛、鸟枪、土枪等，且式样繁杂，质量较差，又无统一的后勤机构保障作战供应。这些，都使军队作战行动受到影响。

参加中法战争的中国军队主要是练军和勇营。勇营包括湘军、淮军和由湘淮军演变而成的防军，以及大量临时招募成军的地方部队。这些军队的营制饷章大体都沿袭湘军旧制，均以营为单位。营一般辖前、后、左、右四哨。各营兵额，大营约五六百人，小营约二三百人。战争过程中，由总督、巡抚或提督负责指挥一个方向的作战，统领数营以至数十营的兵力。“而兵与兵不相习，将与将不相能，统帅、疆臣又复观望迟徊，各怀畛域”，极大地影响了军队的指挥和协同作战。

除陆军外，中国海军也部分地参加了战斗。早在光绪初年，清廷鉴于日军依仗军舰侵扰台湾，即有加强海防之议，认为“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1875—1879 年间，清廷对海防事宜抓得较紧，曾多次谕令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沈葆楨认真筹办。初未形成舰队，南北洋大臣分别向外国订购和自造舰只，自行节制。后由沈葆楨等倡议，经总理衙门核准，每年从关税和厘金中调拨四百万两作为筹建海军的专款，拟于十年内建成北洋、南洋、粤洋海军三大支。由于经费有限，建设的重点始终放在北洋。1879 年，清廷鉴于海军建设进展缓慢，又令福建船政局将当时已有轮船先行练成一军，以备不虞。中法战争前夕，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初步形成，分别由北洋大臣李鸿

参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 48 页。

罗惇勳：《中法兵事本末》，《中法战争》（一），第 6 页。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清政府在直隶军额之绿营兵内挑选一部分士兵，依照湘军、淮军营制，提高饷额，加强训练，称为练军。后各省相继仿行，练军数量大增。

清朝政府一贯以八旗、绿营为经制之兵（即正规军队），有事时暂募之兵则称为勇营，事定后即行解散。但在镇压太平军、捻军等作战中，清政府几乎全靠湘勇（军）、淮勇（军），军事结束后，仍以勇营留防各地，且兵饷高于绿营，遂有防军之名。

《鸿胪寺卿邓承修奏折》，《中法战争》（五），第 618 页。

《德宗实录》卷八，第 8 页。

章、南洋大臣曾国荃、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掌握。三支海军各有舰船十余艘，大多购自外洋，质量较好的铁甲舰以北洋居多，南洋次之。

中法战争时期，有线电报已成为军队指挥通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也开始采用这一手段，从而打破了几千年来单纯依靠驿站传递命令和报告的状况。从 1881 年底上海至天津的电报线路正式启用开始，两三年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福州、武汉等大城市之间，以及广州与龙州、天津与山海关等地之间，都建立了电报联系。不过，云南以及北圻战场方面，尚未通报，仍靠驿递，以致“奏折往返须五十余日。滇桂军队相距远，常月余不通问”。迨至 1885 年初，龙州至宣光前线始通电报。

第二节 山西、北宁之战（1883年12月—1884年3月）

一、双方作战方针和部署

在法国侵略者强迫越南封建王朝签订第一次《顺化条约》之后，清政府对法国武装侵略的态度虽已转趋强硬，但统治集团内部在作战方针上存在很大分歧。主战派鉴于黑旗军屡创法军，越南义军也在北圻红河三角洲地区纷纷响应，而法军增援部队又未赶到，极力主张采取攻势。兵部尚书彭玉麟建议由广西、云南“各派骁将，率领精兵数千，督同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疾捣顺化河暨西贡敌营，覆其巢穴”。内阁学士周德润等建议迅速调回在德国定购的两艘新式军舰，会同广东水师，“突入越洋，直泊海防，封住海口”，然后以滇桂之师，由北宁、山西会攻河内。清朝最高统治者排斥了上述主动进攻的主张，决定采取保守求和的方针，即：在越南，“保守北圻，力固滇粤门户”；在中国，扼守沿海各海口与长江沿江一带。总的指导思想是希图“久与相持”，使敌“情见势绌，自愿转圜”。其实质依然是以军事上的防守达到政治上求和的目的。基于上述方针，作了如下部署：

北圻方面——以北宁为重点，山西为犄角，分别命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驰赴前敌，督率各营，严密防守，以固门户。鉴于“保全北圻，总以克复河内为要著”，决定“激励刘永福整顿队伍，联络越南义兵，相机进取，力图恢复”。

沿海方面——鉴于广东当南洋首冲，天津为畿辅重地，确定以天津、广东为重点，在沿海各省海口择要布置，以防法国海军袭扰；同时，命令长江中下游各省察看沿江形势，分布扼守，防敌兵船沿江内犯。

法国用兵北圻，其目的在于变整个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然后以之为基地，进窥中国。在清政府发出法军不得侵及北圻清军驻地的照会之后，以茹费理为首的法国内阁便决计用武力攻取山西、兴化、北宁等地，驱逐黑旗军及中国驻越军队，完全占领北圻。

山西、北宁互为犄角，瞰制河内。清军欲取河内而保北圻，非守此两地不可；法军欲保河内而取北圻，亦非夺此两地不可。因此，山西、北宁实为中法两军必争之地。法军鉴于当时山西主要由黑旗军驻守，若先攻北宁，须渡红河、新河（今急流河），且后路空虚，黑旗军随时有可能从山西直捣河内，届时难以回救；若先取山西，驻守北宁的清军不一定渡河策应。因此，决定采取先攻山西，后取北宁的方针。

1883年10月25日，法国以孤拔为远征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在北圻的海陆军队。在待援过程中，法军在河内、海防、海阳、嘉林、丹凤等地不断增筑炮台，加强防御，同时，加宽河内至丹凤的道路，以便向山西发动进攻。12月初，北圻法军已增至九千余人，大部分集中于河内地区，作战准备基本

彭玉麟：《拟疾捣顺化等处敌营片》，《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七，第18页。

周德润：《越南边患愈滋请妥速密议以定大计折》，《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七，第11页。

《军机处密寄广西巡抚倪文蔚等上谕》，《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七，第27页。

《军机处密寄署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上谕》，《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八，第3页。

《军机处密寄广西巡抚徐延旭上谕》，《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八，第5页。

就绪。

在法军即将大举进攻之际，负责北圻东线防务的广西巡抚徐延旭托病滞留谅山，所部桂军计三十余营，主要集结于北宁及其附近地区，由广西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担任前线指挥。

负责西线指挥的岑毓英虽奉命力保山西，但尚未起程；革职留任的云南巡抚唐炯也远在云南边境。驻守山西的部队只有黑旗军三千人，以及12月初才赶到的滇军三个营、桂军两个营，共计五千人左右。

二、山西保卫战（参见附图十四）

1883年12月11日，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按照其先攻山西、再取北宁的作战方针，率军六千人，分成水陆两队，由河内向山西进发。法军企图先夺取山西城东北的扶沙要塞及城北的堤岸阵地，再从右翼迂回城西，切断山西与兴化的联系，一举攻占山西。其部署是：第一队，以大炮舰三艘、小炮舰十余艘和民船数十只，载兵三千三百余人，溯红河西上；第二队二千六百余人，由陆路进至丹凤后，渡喝江，沿红河南岸向山西推进。陆路随行的还有大量胁从的民夫，以及五百辆弹药车。

山西位于红河南岸，是控制红河中上游的战略要地。城周长约二十里，有砖石内城和土质外城。黑旗军进驻山西后，进一步加强了这里的城防工事，并在红河上设置竹筏阻塞河面，沿河岸修筑炮台，北门至河堤相距五里，筑栅五重。刘永福鉴于山西的存亡关系重大，而协助防守的滇、桂军队为数既少，斗志又不高，因而决心发扬黑旗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依托城垣及外围工事粉碎敌人的进攻，并确保河堤和城北市区为防御重点。在得知河内法军倾巢出动的情报后，刘永福和唐景崧（清政府派至黑旗军的官吏——吏部主事）立即巡视阵地，激励将士，准备痛击来犯之敌；同时，函请北宁清军会同越南义军乘隙进取河内，或于新河、嘉林方向佯动，牵制敌人。

山西守军五千人的防御部署是：黑旗军六个营加桂军一个营扼守城北河堤；黑旗军五个营扼守城东；黑旗军、桂军各一营扼守城南；滇军三个营扼守城西。此外，越南北圻统督黄佐炎等率领的越军约二千人，驻扎于南门外村落中。

12月14日上午9时左右，法军发起攻击，以舰炮和哈齐开斯机枪掩护其步兵展开，并摧毁了扶沙要塞。防守堤岸的黑旗军奋起还击，竭力迟滞敌军的行动。与此同时，刘永福命令东门外的黑旗军五个营利用地形秘密地向敌人侧后机动，以便配合堤岸守军夹击敌人。约中午12时许，迂回敌后的黑旗军突然出现于陆路法军及水路舰队之间，从翼侧攻击向西运动之敌，法舰炮火无法发挥威力。孤拔见情况危急，立即命令法军转入防御，并集中所有炮火还击黑旗军。在敌人密集炮火和机枪的阻击下，黑旗军迂回部队伤亡较大，被迫撤退。下午4时，法军重新发起攻击，城北黑旗军顽强抵抗，战斗

广西边防各军赴越后，分左右两路驻守北宁、太原。左路统领为广西提督黄桂兰，右路统领为广西候补道赵沃。开始每路十二营（每营四百二十人），后陆续有所增加。1883年12月初，徐延旭出关驻谅山，将左右两路统领并调同驻北宁一城。

1883年11月28日，清廷根据云贵总督岑毓英“自请统兵出关筹办”的奏折，命其统带所部二十营，克日出关，前往山西，择要驻扎。（参见《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八，第10页。）

非常激烈。当法军迫近城北堤岸时，黑旗军从工事中一跃而出，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经过一小时激战，法军以死伤士兵二百人、军官二十二人的代价，夺取了河堤阵地。

15日凌晨1时，守军一部乘夜接近河堤，突然发起反击，冀图夺回河堤阵地。由于当晚月明如昼，加上法军拚死抵抗，偷袭未获成功，但毙伤不少敌军，并生俘非洲兵二十名、法海军陆战队兵士五名。刘永福、唐景崧知沿河阵地难保，便将守军撤至外城，分段固守。当日上午，双方调整部署，法军不停地进行炮击。下午，孤拔以主力向西机动，企图夺取扶里炮台，从西门攻入城内。刘永福判明情况后，亲率黑旗军主力增援西门，并加强防御工事。

16日拂晓，法军猛攻北门和扶里炮台。北门守军沉着应战，连续向城下投掷火药包，阻止了敌人的前进。防守扶里炮台的滇军也奋起还击，但终因炮台设施陈旧，被敌突破，撤入外城，以致敌人得以进逼西门城垣。当日上午，法军炮兵配合舰炮以猛烈炮火将西门城楼轰塌，并摧毁全部防御工事。守军伤亡较大。下午，法军由西门突入城内，守军依托市区建筑物顽强阻击，激战至夜。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黑旗军和清军乘夜从南门和东门撤出山西城，经不拔县向兴化集中。城南村落中的越军随即溃散。

侵略军入城之后，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据英国记者披露：法军“把所遇见的男人、女人、小孩——一切生物，全都杀死”。《泰晤士报》记者于次年2月前往山西采访时，目睹那里的炮台及滨河之村落，“悉被法人焚毁”，城北大村“屋宇虽存，惟寂其无人，只觉鸟鸣于屋颠而已”。

山西虽然失陷了，但守军在伤亡逾千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浴血奋战，毙伤法军近千人，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特别是黑旗军，在刘永福“纵敌人我重地，始能痛歼”的思想指导下，敢于以劣势装备和优势装备的敌人拼杀，顽强抗击。在指挥上，刘永福能根据法军水陆并进的特点，着重加强河堤及城北城东的防御，并善于抓住战机，适时地对突入之敌实施反击。当法军集中注意力攻击城北河堤守军之际，果断地集中所有可能机动的兵力，迅速隐蔽地迂回敌后，插入进攻之敌及法军舰队之间，给敌人以突如其来的打击。对此，法军中的外国随军记者也佩服地说：“他们的迂回动作是聪明地设计出来的：华军就在法军及舰队之间，所以舰队不敢开炮……”这次反击，虽然未能奏效，但刘永福在掌握反击时机、选择反击方向、适时机动兵力等方面，表现出了他的指挥才能。

山西作战之所以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驻守北宁的桂军无所作为。他们临战观望，既不增援山西，又不乘隙向河内方向出击，给敌军以必要的牵制，致使法军得以集中兵力西上，而山西守军则得不到友军支援，陷入孤军作战。同时，由于云南巡抚唐炯消极避战，以致滇军主力推进

[英] 斯各特：《一八八四年法国进军越南记》，《中法战争》（三），第363页。

[日] 曾根啸云：《法越交兵记》，第470—471页，《中法战争》（三），第360页。

唐景崧：《请纓日记》卷三，《中法战争》（二），第99页。

[英] 斯各特：《一八八四年法国进军越南记》，《中法战争》（三），第360页。

唐炯一到越南，就声称“出境兴师，甚非长算”，“务一时主战之虚名，贻将来全局之实祸”。（见《中法战争》第二册第231页。）早在法军向山西进攻之前，他就擅自撤走原驻山西的滇军，并一度“率行回省，置边事于不顾”。（见《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十三，第3页。）

迟缓。直至战斗前夕，才有少量部队进至山西、兴化，起不到支援山西守军作战的作用。此外，刘永福等在作战指导上也有不当之处。如面对优势敌人的进攻，未能利用有利地形，伏击、袭击敌人于运动之中。单纯采取固守城池的战法，自难抵挡住拥有强大炮火之敌的强攻。

山西保卫战是清廷被迫应战后的首次作战。首战失利，丢掉了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要地，不但失去了对河内法军的威胁，而且使东西两线的联系增加困难，给尔后的北圻作战造成很不利的影响。

法军占领山西的消息传到巴黎，法国反动当局兴高采烈，得意忘形，大叫什么“色当被山西掩蔽了”，企图以侵占山西掩盖和粉饰其在普法战争中色当大败的羞辱。

三、北宁等地的失陷（参见附图十四）

山西失守后，清廷命广西巡抚徐延旭严守北宁，令云贵总督岑毓英迅即出关，加强兴化方面的防御，并令两广总督张树声“选派得力将领，统带劲旅，驰赴镇南关（今友谊关），以实后路”。

1884年2月22日，岑毓英进抵兴化前线。这时，黑旗军经过休整补充，编为十二个营，共计四千余人。滇军调至兴化、临洮、端雄、宣光一线的兵力已逐次增至二十余营，约一万人。鉴于东线军情紧急，岑毓英遣唐景崧偕同刘永福率领全部黑旗军赶赴北宁。当时，岑毓英被指定为北圻东西两线军事总指挥，但他以两线阻隔，不便指挥为由，不愿挑此重担，以致东西两线军队始终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负责东线作战指挥的徐延旭，是一个贪生怕死而又体羸多病的投降派。他拥兵五十余营，二万余人，却不亲临前线积极部署作战。他一面向清廷吹嘘“北宁守御，固可无虞”，一面借故留在谅山，将前线指挥权仍委诸左右两路统领黄桂兰和赵沃。黄桂兰虽为淮军“宿将”，但有勇无谋；赵沃则文弱书生，不懂军事。二人又彼此不和，对战守之策，并无通盘谋划，只注意沿北宁至河内的大道布阵设防，正面防守，不注意翼侧的掩护。

法军在攻占山西之后，由于伤亡较重，后方又不时受到越南义军的袭扰，无力继续发展进攻，只能固守山西、河内一线，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

1884年2月，由法国陆军部派来的一个步兵旅和两队炮兵、一队工兵到达北圻，使远征军总数达到一万八千余人，炮舰二十余艘。根据法国政府指令，新到的米乐将军于2月12日接替孤拔为远征军总司令。孤拔重返舰队，指挥海上作战（后被任命为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升为中将）。米乐接任后，将法军分为两个旅，分别由副总司令波里也和尼格里二将军指挥，又以莫列波约统率北圻江防舰队。米乐按照原定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驻守山西，牵制兴化方面的清军；主力集中于河内、海阳两处，以便大举进攻北宁。

《军机处密寄两广总督张树声等上谕》，《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八，第44页。

岑毓英奏称：“臣所部万人，计出关到兴化，由保胜、河阳两路皆有一千五六百里，不能不留兵四千分佈后路，同臣到前敌者，前后不过六千余人。”（《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十二，第11页。）

山西失守后，广西又添募兵勇二十余营，使北圻东线清军由万余人增至二万余人。

徐延旭：《北宁守御尚可无虞及调派勇营西联滇军东防江口情形折》，《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十一，第39页。

北宁西接山西，东临海阳，南拒河内，北蔽凉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驻越清军全力经营的军事重镇。它的得失，对北圻全局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1884年3月7日下午，法军开始行动。米乐、波里也率第一旅由河内出发，于当夜渡过红河，扬言由嘉林波新河沿大道向北宁前进。实际上，米乐决定避开清军设防坚固的正面，从翼侧进攻北宁。

3月8日晨，法军从两个方向同时进军：尼格里率第二旅从海阳出发，乘船沿太平江北上；米乐、波里也则以一部兵力佯攻新河，主力沿新河南岸向东疾进。水陆两路各六千人左右。同日上午，法军第二旅主力在舰炮掩护下，由扶朗两侧登陆，围攻驻守该处的四营清军。当地天主教民也四出响应，为虎作伥。守军凭借炮台工事抵抗，并派人赴北宁乞援。黄桂兰派出的三营清军于半路得悉扶朗已失，折回北宁。扼守扶朗的清军向西退至桂阳时，黑旗军一部赶到，与之协力堵截法军，使其前进受阻。黄桂兰调扼守三江口一带的党敏宜所部八营回防北宁；党敏宜避战自保，拒不执行命令。

3月11日，法军第一旅在北宁东南方向渡过新河，与第二旅会合，准备次日从北、东、南三面会攻北宁。

3月12日，法军第二旅一部在舰炮火力支援下，向桂阳、春水等地进攻；第一旅迅速向西机动，从北宁南面发起攻击；第二旅另一部由水路绕至城北，企图夺占涌球（今答求，北宁东北四公里），切断清军后路。涌球对北宁的防御有重要作用。据当时随军者记述：该处“有河宽十丈，深八尺，轮船可至河边。有土山两座，商民无不言，敌若据此山，将开花炮近指入城，点滴不差，昼夜不绝，则城断难守”。可是，黄桂兰只派陈朝纲两营守涌球，直至3月11日，才调黑旗军千人加强该处防御，并挖地营（有被覆的野战掩体）十座。但是，第二天早晨黄又突然变计，将黑旗军调离涌球。就在这天下午，法军第二旅轻取涌球，“曳炮阜顶，俯击北宁城。弹三落，城市哗奔，越官张登惶等开城遁”。正在城外督战的黄桂兰、赵沃见情况紧急，竟放弃指挥，分别向谅江、太原方向逃跑，清军顿时全线溃散。黑旗军及少数清军试图抵抗，因大势已去，不得不撤往太原。黑旗军不久又从太原返回兴化。

3月15日起，法军分路追击清军。至19日，谅江、郎甲（今盖夫）、太原相继失守。东线清军被迫退至山区，大部溃散，余部集结于凉山、镇南关一带。

4月初，法军为转移兵力夺取兴化，主动放弃太原，仅以少数兵力在郎甲一带筑垒防守，主力经河内向山西集中。岑毓英闻风丧胆，随即将滇军主力后撤至保胜、河口一带，于是，兴化、临洮、宣光一线不久就被法军占据。至此，法国侵略军达到了占领红河三角洲全部重要城市的战略目的。

北宁作战，是双方在第一阶段中的主力决战。清军东路主力二万余人，全聚于此，为数不为不多，经营防备，不为不久。其所以一触即溃，主要是由于清廷墨守其消极应付的战争指导造成的。山西失陷后，清廷仍只是要求前敌将领“严饬各军，力保完善之地，毋使再行深入”，以致在山西战后至

无名氏：《关外随营笔述》，《中法战争》（三），第64页。

唐景崧：《请缨日记》卷四，《中法战争》（二），第115页。

署理广西巡抚潘鼎新于1884年4月15日奏称：“粤西五十余营，自北宁败后，有妇女者四处逃散，全不归伍；无妇女者，只归得十余营。”（《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十三，第34页。）

《军机处密寄两广总督张树声等上谕》，《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八，第44页。

北宁作战前的一个多月时间内，东线清军竟无所作为，坐待法军增兵进攻，各个击破。其次，作为东线指挥官的徐延旭，“平日既无调度之方，临事复无应变之策”，前线指挥一概由彼此不和的黄桂兰、赵沃二人负责，以致北宁失陷前一日，对于前线紧急情形一无所知，失后两日，仍未得信。为此，清廷责备他“于前敌军情，形同聋聩，殊堪痛恨”。以如此昏庸之辈指挥一个方向的作战，要想取得胜利当然是不可能的。此外，桂军临战扩兵，缺乏训练，纪律涣散，也是北宁失守的重要原因之一。徐延旭筹办广西边防以来，广西防军由原来的十余营增至五十余营；但求多而不求精，以致粮饷不敷，兵无斗志，且未经训练，不习火器。尤有甚者，将弁贪污腐化，毫无纪律，“此次法人进攻北宁，不过遥遥相击，并未逼攻城池，该军弁勇有室家居半，吸食洋烟者居半，闻警先携妇女逃走，致使军械饷银概以资敌”。

四、《中法简明条约》的签订

山西、北宁之战以后，清廷下令将徐延旭、唐炯等人革职查办，党敏宣等军前正法，以署湖南巡抚潘鼎新为广西巡抚，以贵州巡抚张凯嵩为云南巡抚，以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署理广西提督，并命原广西提督冯子材速赴前敌，接替黄桂兰统率关外各营。西太后还乘机把战败的责任推到和她有矛盾的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身上，更换全部军机大臣，命礼亲王世铎管理军机处，并让她的妹夫、光绪帝（载湉，谥德宗）的生父醇亲王“会同商办军机处要政”，又任命贝勒奕訢（后封为庆亲王）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但是，清廷关于中央和前线人事方面的变动，仅仅是为了掩饰败绩，丝毫不意味抗战决心的加强；相反，前线的军事失败，给了主和派以可乘之机，李鸿章等又加紧进行妥协求和活动了。为迎合法国侵略者的意图，李鸿章通过总理衙门，任命淮系的李凤苞接替湘系的曾纪泽（主战派）为驻法公使，以便为和谈铺平道路。法国也希望有一段休整时间，因而趁北圻取胜的有利形势，一面扬言进攻广州，一面加紧向清廷诱和。

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祿诺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二）中国将驻北圻的军队调回边界，并对越法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条约一概不加过问；（三）法国不索赔款，但商品可从云南、广西输入中国内地；（四）法国答应在与越南订约时，决不出现有损中国体面的字样；（五）三个月后，双方各派全权大臣，照以上各节，制定详细条款。6月6日，法国又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二次《顺化条约》，以确定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中法简明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法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

志锐：《徐延旭败师辱国请革职治罪折》，《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十二，第5页。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十二，第25页。

潘鼎新：《接据凉山军报请饬催后军继进及筹画饷械各情形折》，《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十三，第34页。

第三节 战争的扩大

一、法国借故扩大侵略战争

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完全屈从了法国侵略者的讹诈，正因为这样，茹费理致电福祿诺，通过他向李鸿章表示敬意。李鸿章博得了侵略者的喝采，却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连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人指责李鸿章通敌，“致比诸秦桧、贾似道”。在举国舆论的压力下，清廷只得命令驻北圻的军队仍扎原处，不得撤回。

侵略者欲壑难填，清政府的妥协政策，并没有换来它所希望的“和局”。《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的第六天（5月17日），福祿诺就向李鸿章提出：法军将于6月5日进据高平、谅山，7月1日进据保胜。李鸿章不敢答应，福祿诺当即勾销这条无理要求，并画押为据。可是，法国远征军总司令米乐竟令其陆军中校杜森尼率军北上，企图以武力强占谅山。6月22日，法军九百人（一说七百）行抵北黎（观音桥，即今北丽），接近清军阵地。清军前敌将领通知杜森尼说，没有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请暂缓进兵，“并非合理地请求他通知法国当局转递必要的命令”。23日，杜森尼扬言“和与不和，三日内定要谅山”，随即指挥法军炮击清军阵地，守军被迫还击，将法军击退。此次战斗，清军伤亡三百人，法军死伤近百人，并丢弃大量军用物资。这就是法国侵略者蓄意挑起的“北黎冲突”，或称“观音桥事变”。接着，法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反诬中国破坏《中法简明条约》，乘机扩大事端。茹费理命令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暂缓讨论《中法简明条约》细节，要求中国立即从北圻撤军，并索取二亿五千万法郎的巨额赔款。

7月9日，茹费理通知中国驻法公使李凤苞：中国政府必须立即满足法国的要求，否则，法国“将有必要直接地获取担保与应得的赔偿”。7月13日，法国海军殖民部长海军中将裴龙电令孤拔遣派所有可调用的船只前往福州和基隆。孤拔随即率领法国远东舰队驶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准备直接进攻中国领土，扩大侵略战争。但由于茹费理考虑到法国占领越南后，“与中国将成为直接邻邦”，彼此造成太深的仇恨，于法国不利，因而法军这时的作战意图，主要在于“踞地为质”，迫使清廷就范。

清政府在敌人的威逼下，一面立即下令撤回北圻清军，一面以新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为全权代表，与法使巴德诺在上海举行谈判，并呼吁美、英等国进行“调解”。与政治上向敌屈服相适应，清廷在军事上并不做认真的准备。虽曾电谕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密饬各军，严阵以待”，但同时又束缚军队手脚，告以“倘有法军前来按兵不动，我亦静以待之”，继续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罗惇勳：《中法兵事本末》，《中法战争》（一），第11页。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91页。

潘鼎新：《法人扑犯官军迎击获胜折》，《中法战争》（五），第422页。

《茹费理致李凤苞》，《法国黄皮书》，《中法战争》（七），第223页。

参见《茹费理致巴德诺》，《中法战争》（七），第239页。

《军机处电寄各省将军督抚谕旨》，《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十九，第3页。

二、基隆清军反击获胜

法国侵略者一面与清政府举行谈判，一面加紧推行炮舰政策，企图“踞地为质”，索取赔款。孤拔等人狂妄主张派舰队前赴江宁（今江苏南京）、福州，或北上直隶湾，袭取旅顺、威海卫，威胁京师。茹费理认为法舰过于北上会引起其它资本主义列强的疑忌和干涉，不得不将法国远东舰队的攻击目标暂定为福州、基隆两处。在侵略者眼中，孤悬海外的台湾是可以轻而易举地侵占的。夺取了台湾，不但“担保政策”得以实现，而且有了新的前进基地；同时认为，一旦占据基隆煤矿，军舰燃料供应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台湾防务，初由兵备道刘璈主持。他将全台四十个营的兵力分驻各地，台南多至三十一营，台北仅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所部三营、总兵曹志忠所部六营。1884年7月16日，奉命督办台湾军务的淮系将领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新授巡抚衔）率亲兵百余人抵达基隆，加紧设防练兵，增筑炮台。当时，法舰一艘已在基隆港附近进行侦察活动。刘铭传根据基隆地形和敌情，重新组织海岸防御：以新从台南调来的总兵章高元部两营兵力扼守八尺门高地和东岸炮台，以曹志忠部六个营的主力扼守田寮港附近高地，一部扼守八斗子附近海岸，由杨洪彪率一个营扼守西岸仙洞山高地。淡水方面，则由孙开华部防守。

8月4日，法国远东舰队副司令、海军少将利士比率军舰两艘（“拉加利桑尼亚”号和“鲁汀”号）及法军四百余人闯进基隆港，与原在该处活动的另一法舰（“费勒斯”号）会合。当日，利士比发出“劝降书”，要守军交出基隆地区所有防御工事。守军置之不理，一面加紧备战，一面飞报尚在淡水的刘铭传。

8月5日晨，法舰逼近基隆港东海岸，上午8时开始炮击。守军奋起抵抗，炮弹连续命中敌舰，但由于弹丸威力较小，未能给敌舰以致命打击。炮战约一小时，守军炮台、工事大部被毁，弹药库也中弹起火，被迫后撤。法军陆战队约二百人先后换乘小艇登陆，占领大沙湾附近高地，进行整顿巩固，准备次日继续进攻。

刘铭传赶回基隆后，鉴于法舰火力较强，决定让登陆法军脱离舰炮火力支援后，再行反击。8月6日下午2时，法军一部沿滨海道路向基隆城前进，另一部在大沙湾附近进行掩护。扼守田寮港西侧高地的曹志忠部给前进之敌以迎头痛击，迫使其后撤。曹志忠率二百余人乘势追击。为了围歼敌人，刘铭传立即命令章高元率百余人向敌人左侧反击，并以六十人迂回敌之右侧，形成三面合围之势。法军节节败退，最后在舰炮火力的掩护下，狼狈逃回军舰。利士比无奈，率舰队退走，法军第一次进犯基隆宣告失败。

8月10日，清政府就法国在谈判期间突袭台湾提出强烈抗议，并呼吁各国“秉公评论”。可是，法国驻北京代办谢满禄反而借口“基隆事件”，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继续要求对“北黎事件”进行赔款（此时已由二亿五千万法郎减为八千万法郎），勒索未遂，便于8月21日下旗离京。与此同时，中国驻法公使李凤苞也离开巴黎去柏林，中法外交关系完全破裂。

三、马江海战

马江又称马尾，位于福州东南，是闽江下游的天然良港。清朝除南北洋

海军以外的第三支海军——福建海军和创建近二十年的福建造船厂，均在此港。马江港是一个河港，四周群山环抱，港阔水深，可泊巨舰。从闽江口至马江，距离三十余公里，沿岸形势险峻，炮台林立，仅马江附近就有七座炮台，并有部分克虏伯大炮，防御能力较强。

从1884年7月中旬起，法国军舰就陆续闯入闽江口，进泊马江，伺机挑衅，勒索赔款。当时，负责福建军事指挥的要员有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州将军穆图善等。他们根据清廷“不可衅自我开”的指令，对法舰的侵入非但不敢阻止，反而给孤拔以友好款待；同时，命令各舰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于是，法舰在马江者日或四五艘，或五六艘，出入无阻。“它们与中国军舰首尾相接，日夜监视港内福建海军，不许其移动，前后为时月余。其间，马江一带人民纷纷要求先发制敌，呈递“万民书”，建议潜水破坏敌舰。他们怒不可遏，坚决表示：“要是官家害怕，不敢抵抗；那抗法的事，我们愿承担下来。”但是，人民请缨杀敌的正义要求，却遭到了张佩纶等人的阻挠，直至尔后局势非常紧张时，部分民众武装才被允许参战。

8月17日，清政府见和谈无望，不得不撤回上海谈判代表，令沿海沿江各省极力筹防，严行戒备。但对马江方面，仅指示“法舰在内者应设法阻其出口，其未进口者不准再入”，并未解除不得主动出击的禁令。

当时，马江一带水陆防军的兵力已有所加强：海军舰只十一艘，江防陆军逐次增加到二十余营，还有大量自动参加战备的民众武装。清军的部署是：以十一营兵力扼守马江和船厂一带江岸；十一营守长门、琯头等炮台，又以民壮近二千人协守闽安至琯头沿江两岸；十一艘舰只与法舰相持于马江江面，另以旧式战船及渔船各二十余艘分泊于罗星塔两侧。张佩纶、何如璋负责指挥马江一带水陆各军，穆图善驻长门，何璟、张兆栋驻福州。由于清廷和战不定，前敌将领昏聩无能，水陆各军缺乏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的周密计划，加之装备不良，弹药不足，因此，总的兵力虽然较法方优势，而战斗力却很弱。

8月22日，即法国驻北京代办谢满禄下旗离京的次日，法国政府电令孤拔消灭中国福建海军。孤拔立即进行战斗部署，决定于次日下午趁退潮船身转移方向的时候开战。当时，泊于马江的法国舰队有军舰八艘，共计一万四千五百余吨，另有鱼雷艇两艘，还有两艘军舰在金牌、琯头一带江面，阻止清军塞江封口，保障后路安全。参战法舰共有重炮七十七门，还有不少射速为每分钟六十发的哈齐开斯机关炮，兵员约一千八百人。福建海军的十一艘军舰（其中九艘为木质）共计只有六千五百吨，炮四十五门（大口径炮很少），兵员约一千一百人。从吨位、防护能力、重炮数量、兵员素质等方面比较，法国舰队显然占有优势。另一方面，孤拔“只在退潮时方攻击”的决定，对法舰非常有利。这是因为，当时用船首系泊，船身随潮水涨落而改变方向（涨潮时，船头指向下游，落潮时船头指向上游），孤拔选择落潮时开战，可使大部分中国军舰位于法舰之前方，从而暴露于敌人主要炮火之下，无法进行有力的回击。

林世芬：《尚干乡万人请战》，《福建日报》1961年5月21日第3版。

《军机处寄福州将军穆图善等电旨》，《中法战争》（五），第503页。

[法] 罗亚尔：《中法海战》，《中法战争》（三），第549页。

8月23日上午8时，法国驻福州副领事向何璟投递最后通牒，限福建海军于当日下午撤出马尾，否则开战。何如璋得知后，竟然对福建海军将士封锁消息，并企图要求法方把开战日期改在8月24日；遭到拒绝后，才匆忙下令进行临战准备。

当日13时56分，孤拔趁落潮的有利时机，指挥法舰突然发起攻击。福建海军舰只未及起锚，就被敌舰第一排炮弹击沉两艘（“琛航”号和“永保”号），重创多艘。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福建海军下层官兵英勇还击。旗舰“扬武”号（福建海军唯一的一艘轻巡洋舰）用尾炮准确地还击在它下游的法国侵略军旗舰“窝尔达”号，首发命中舰桥，击毙其引水和五名水手，孤拔仅以身免。正在这时，敌46号鱼雷艇向前猛扑，发射鱼雷，击沉了“扬武”号旗舰，但该艇也被清军岸炮击中，锅炉爆炸。“扬武”号沉没时，管带（舰长）兼舰队指挥张成擅离职守，泅水（一说乘小舟）逃跑。炮艇“福星”号离敌舰最近，在开战时就受了重伤，但它立即断锚转向，冲入敌阵，瞄准敌旗舰猛烈射击，连续命中。后遭敌舰三面围攻，火药库中弹爆炸，全艇官兵壮烈牺牲。受伤的“福胜”、“建胜”两炮艇也奋力抵抗，直至沉没。在罗星塔下游，炮艇“振威”号被刚从闽江口外赶来的一艘法国装甲巡洋舰“凯旋”号击穿，首尾均已着火，船身失去控制，随波漂向下游。但艇上官兵仍英勇奋战，直到最后被敌鱼雷击中沉没前的一刹那，还发射了最后一颗炮弹，重伤一敌舰舰长和两名士兵。

江面战斗仅进行了约半小时，福建海军十一艘舰艇全部被法舰击沉，海军将士伤亡七百余人，还损失了数十艘商船。法军仅死伤三十余人，有两艘鱼雷艇受重伤，其余为轻伤。

8月24日上午，法军部分炮艇乘涨潮上驶到福建造船厂附近，用重二十八公斤的榴弹轰击船厂，“对凡力所能及的东西，均予摧毁”。与此同时，法舰继续对马江附近的帆船、舢板进行毁灭性的破坏。

8月25日，法海军陆战队一部在罗星塔登陆，夺去三门克虏伯大炮。此后几天，法舰驶向下游，逐次轰击闽江两岸炮台。由于炮台门对准下游，不能掉转炮口回击从后方攻击的敌舰，因而全部被毁。这样，法舰得以鱼贯而出，退至马祖澳（今定海湾）。

马江战后，清廷撤销了张佩纶、张兆栋、何璟、何如璋等人在福建的任职，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以福州将军穆图善和漕运总督杨昌浚（改任闽浙总督）为帮办大臣，闽中防务逐渐恢复。

马江海战的惨败，固然有舰艇“我小彼大，我脆彼坚”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清廷妥协求和政策造成的。很明显，法国利用谈判麻痹清政府，以达到突然袭击的目的；清廷却一味求和，在军事上丧失警惕，致使马江守军仓促应战，措手不及。马尾军港形势险要，闽人张茂才就曾评论说：“天下滨海诸省，独福州海口奇险天生，当事者苟未雨绸缪，虽铁胁亦难飞波，何至令人直捣而入哉！”清统治者唯恐有碍和谈，竟听任法舰违犯国际惯例，肆意闯入，进出无阻，沿岸炮台形同虚设。这就无异于把主动权拱手让给敌人，自己只有坐待失败的命运了。其次，前敌将领昏聩畏敌，也是招致马江战败

[法] 罗亚尔：《中法海战》，《中法战争》（三），第557页。

《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奏折》，《中法战争》（五），第523页。

转引自唐景崧《请纒日记》卷五，《中法战争》（二），第144页。

的重要原因之一。张佩纶等明知敌人“有密据要害先发制人之意”，却借口“不敢事先张皇”，不做认真的应敌准备，甚至将舰上的炮弹也控制起来。张佩纶与何如璋，都是不懂军事，只知奉承李鸿章的昏庸官僚。8月23日，当战云密布、端倪尽露之际，仍不利用早晨涨潮移转船身的有利时机，先发制敌，而这点正是孤拔所非常恐惧的。侵略者自供：“如果他们（指福建海军）于潮水来时进攻，那地位便完全倒转，提督（指孤拔）所打算可得到好处的所有优势，都将转到他们手中去，反而对我们不利。”战斗开始以后，张佩纶竟吓得神慌意乱，晕倒在地，由随从扶起逃命。那个“只图一己口腹，不顾民生涂炭”的张兆栋，以及由于有点口才而被张佩纶赏识提拔的舰队指挥张成，也都先后逃之夭夭。由这样一群战前调度无方、临阵争相逃命的懦夫庸人指挥福建前线故事，失败是必然的。此外，北洋、南洋海军各分畛域，不予支援，对马江战局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果当时的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能联合起来，发挥近海作战的长处，利用法舰远道而来、补给困难的弱点，并力围攻，完全有取胜的可能。可是，淮系、湘系军阀都把自己掌握的舰队当作巩固个人权势的资本，彼此之间经常倾轧摩擦，势如水火。福建海军受优势敌人直接威胁，一再吁请支援，直隶总督李鸿章竟以“北洋轮船皆小，本不足敌法之铁舰大兵船”，“若一抽调，旅顺必不能保”等等为由，拒绝派舰前往马江。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荃控制下的南洋海军也拒不支援，造成福建舰队孤军苦战，全军覆没。

马江海战虽然失败了，但是，广大中国军民在这次作战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忱，他们誓死抵抗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和上层统治阶级畏葸投降的可耻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法]罗亚尔：《中法海战》，《中法战争》（三），第549页。。

采樵山人：《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中法战争》（三），第130页。

《北洋大臣李鸿章来电》，《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二十，第9页。

第四节 清廷对法宣战及双方战略方针

法国远东舰队偷袭马江，清政府感到有损“天朝”体面和尊严，在主战舆论的压力下，被迫于8月26日发布宣战诏旨，命令前线海陆各军准备对法作战。鉴于法国侵略者已把战火引向中国本土，清廷认为：“惟当一意备战，应以进兵越南，规复北圻，俾彼族不敢悉众内犯，为制敌要策。”根据“牵敌以战越为上策”这一总的指导思想，在战略上确定了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的方针。为此，下令“沿海各口，如有法国兵轮驶入，著即督率防军，合力攻击，毋任蔓延。其陆路各军，有应行进兵之处，亦即迅速前进”。同时，公开表示支持黑旗军首领刘永福，“著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侵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

清廷宣战后，法国为了能够继续利用香港等“中立”口岸作为基地，并取得英、美等国的煤和食品等物资供应，因而没有正式宣战。同时，法国再次从政治上对清政府进行诱降活动，由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为拉线人，大搞幕后外交，以此作为它在军事上暗中积极部署的烟幕。早在马江海战之前，孤拔和巴德诺就极力主张法舰北上袭取旅顺和威海卫，威胁清朝京畿重地。马江偷袭得逞之后，他们认为“虽然中国此次完全失败”，但“福州距离北京太远，不足使帝国朝廷获得教训”，因而“复又坚决主张将战争移至北方”。

茹费理政府曾一度赞成孤拔等人的侵略计划，并令其立即在北方各海口行动，但不久又改变了决心。其所以如此，一则担心北上扩大战争，可能招致其它列强的干涉，而当时法国正对由于埃及问题同英国的矛盾尖锐化所造成的欧洲局势颇为不安；一则担心北上与北洋舰队交锋，影响李鸿章的地位，而他正是法国政府“应该尽量宽待”的未来谈判的极好对手。于是，夺取台湾北部，又成了法国侵略军的战略目标。茹费理希图通过“继续执行报复”的军事行动，迫使清政府屈服，允许赔款，或将基隆、淡水两埠口的行政、经营、海关、矿山等权让给他们，以“提供同等价值的赔偿”。北圻方面，法国政府以谅山为中国军队入越的主要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且思雪北黎惨败之耻，因而决计于雨季过后占领谅山，并相机进犯广西边境，以配合孤拔舰队的海上进攻。所以，法国当时的战略方针是：东攻台北，西取谅山，踞地为质，勒索赔款。

《军机处寄前两广总督张树声等电旨》，《中法战争》（五），第511页。

《军机处寄前两广总督张之洞等电旨》，《中法战争》（五），第520页。

《德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九，第12页。

赫德（1835—1911），英国人，从1863年至1911年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生大部分时间在中国活动，是英国侵华代表人物之一。

《巴德诺致茹费理》，《法国黄皮书》，《中法战争》（七），第289页。

《茹费理致顾赛尔》，《法国黄皮书》，《中法战争》（七），第260页。

第五节 东南沿海防御作战（1884年9月—1885年8月）

一、基隆弃守

法舰退出闽江之后，集结于马祖澳休整待援。1884年9月中旬，法军由越南调来三个步兵大队，使海军陆战队增至二千余人，军舰增至二十多艘。根据法国政府的指令，孤拔立即准备进攻台北。他决定自率五舰进攻基隆，占领基隆和煤矿，派利士比率三舰进攻淡水，得手后，两路向台北府发展进攻，进而占据台湾北部。

台湾守将刘铭传判断法军“不得基（隆）煤，万难用兵中国”，决心亲率主力扼守基隆，而以孙开华率部扼守淡水。当地民众也积极参加战备，保卫海防。

9月29日和30日下午，孤拔和利士比分别率领舰队自马祖澳出发。9月30日上午9时，孤拔率领的“胆”号等五艘军舰到达基隆港口海面，连同先期到达的“梭尼”号等三艘军舰，共计八艘。孤拔立即进行侦察，连夜部署，准备次日于港湾西海岸登陆。其登陆部队由海军步兵大队和炮队各三个、宪兵和工兵各一队组成，共约千余人。另有一批来自西贡和海防的民夫。孤拔的企图是：首先从仙洞山脚登陆，并抢占仙洞山顶，以便安设炮位，配合舰炮掩护步兵沿岸边的山脊路线绕袭基隆守军翼侧，控制通往台北府和淡水的大道，夺占狮球岭和基隆城，尔后向台北府前进。

当时，基隆清军共有九个营，以曹志忠部六个营防守港湾东岸，章高元部两个营及陈永隆部一个营防守西岸，以民众武装数百人防守基隆城。

10月1日晨6时，法军一个海军步兵大队在舰炮掩护下，换乘小艇向仙洞山海岸前进。陈永隆、章高元部坚决抵抗。经过四小时战斗，法军夺占仙洞山，炮队在山顶展开，轰击清军阵地。清军坚守二重桥一带，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中午，法军另两个海军步兵大队相继登陆，准备次日继续进攻。

在基隆交战的同时，利士比率率领的“拉加利桑尼亚”号等三艘法舰也已到达淡水。刘铭传被淡水前敌营务处李彤恩夸大该地敌情所迷惑，强调“沪尾（淡水）为基隆后路，离（台北）府城只三十里，……该口除沉船外，台脆兵少，万不足恃，倘根本一失，则前军不战立溃，必至全局瓦解，不可收拾”，便不听曹志忠等人劝阻，竟然连夜率主力往援淡水，仅留三百人守狮球岭高地。

10月2日，法军轻取基隆和狮球岭，由于兵力不敷分配，未敢进据基隆港东岸煤矿。刘铭传到达台北府后，发现淡水情况并不紧急，即以章高元部援淡水，曹志忠部仍折回基隆。但由于法军已占据基隆和狮球岭，曹部只得扼守台北府东面的水返脚一带，以防法军南下。在前敌指挥官刘铭传的错误决心下，基隆轻易弃守。清廷认为，“基隆要地，岂容法兵占据”，命令刘铭传乘法军喘息未定，“联络刘璈，同心协力，合队攻剿；并募彰，嘉劲勇助战，将敌兵悉数驱逐”。同时，命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帮办左宗棠军务，向福建增调援兵，“设计渡台”，增强台北防御力量。

转引自《直隶总督李鸿章电》，《中法战争》（五），第531页。

《督办台湾事务刘铭传奏折》，《中法战争》（五），第563页。

《军机处寄督办台湾事务刘铭传电旨》，《中法战争》（五），第576页。

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见法军在台湾进展顺利，便狂妄地声称：“我们希望很快地把整个台湾北部，不可动摇地置于我们统制之下”，并再次向茹费理建议，让孤拔舰队北上进攻旅顺等地。巴德诺没有想到，他所得到的下一个消息便是法军在淡水的惨败。

二、淡水获胜

淡水港位于淡水河口，沿河可直达台北府，北岸滨海沙滩便于登陆，是清军仅次于基隆的防守重点。1884年8月下旬以来，淡水守军即以木船满载石块沉塞港口，并敷设电力操纵的水雷，封锁航道；又在北岸构筑两座炮台（法军称之为红炮台、白炮台），封锁港口及海滩。

10月1日，利士比率领“拉加利桑尼亚”号等巡洋舰三艘到达淡水海面，与原在港外活动的一艘炮艇会合，决定于次日上午10时开始发起攻击。利士比企图以舰炮火力摧毁岸上炮台和军营，打开港口，保障舰队在淡水河的行动自由，尔后登陆占领淡水街，策应基隆方面法军主力的作战。

当时，淡水守军由于从大陆增援的刘朝祐部两个营的到来而有所加强。章高元部两个营由基隆赶来后，总兵力增至九个营。守将孙开华判断敌军无法突破港口障碍，必然由北岸海滩登陆夺占淡水街。因此，他决心在北岸浅近纵深内利用丛林和高地埋伏一部兵力，歼灭登陆之敌。

10月2日晨6时30分左右，守军趁法军逆着阳光不便瞄准之际，先敌发起炮击，打乱了利士比的进攻准备。双方展开激烈炮战。白炮台距敌较近，大部被毁。红炮台尚未完全竣工，只安好了三门一百七十毫米的克虏伯炮；尽管这样，炮战中仍然起了很大作用。法国侵略者自称：红炮台的守军十分勇敢，“不顾在他们周围落下如雨的子弹，不停发炮约一小时”。当夜，利士比派舰侦察港口航道，接着又派炮舰及小艇前往侦察和排除水雷，其中一艇中雷受伤。利士比判明水雷为电发火式，而且点火站在白炮台附近。于是，他决定派陆战队由北岸海滩登陆，避开丛林，经红炮台山坡绕到白炮台东侧，夺取点火站，引爆水雷，以打通港口航道。为完成这一任务，利士比报请孤拔由基隆增派登陆兵力前来淡水。

4日，法军援兵二百余人、军舰三艘，由基隆赶到淡水海面，连同原有兵力，共拼凑了军舰七艘、登陆部队六百余人，准备在大风浪停止以后立即行动。

10月8日，海面风平浪静。淡水守将见法舰忽然散开，知其意在登陆，便督令各营按预定计划分散荫蔽。上午9时，法舰舰炮以榴弹向北岸海滩及守军营地猛烈轰击，掩护其登陆部队换乘小艇分三路上岸。约一小时后，法军登陆完毕，开始向目的地前进。他们因没有遇到抵抗，便不再绕经红炮台山坡，直向白炮台扑去。孙开华待敌兵逼近丛林，立率两营从正面拦击，并命令埋伏于红炮台山后的章高元部和刘朝祐部从右翼出击，围歼登陆之敌。双方展开激战。中午12时许，孙开华亲率卫队奋勇直前，各路合力齐进，与敌短兵相接，加上爱国艺人张李成率领的民兵从敌人侧后阻截，法军溃败，纷纷向海边逃窜。守军追至海滩，敌兵争渡，溺死者数十人。

《巴德诺致茹费理》，《法国黄皮书》《中法战争》（七）第264页。

[法]罗亚尔：《中法海战》《中法战争》（三）第566页。

此次战斗，法军被歼百余人。侵略者哀叹：“这次的失败，使全舰队的人为之丧气”。孤拔也惊呼：“我们的损失十分严重”。此后，法军除以部分舰只对港口进行监视封锁外，直至战争结束为止，再不敢贸然进犯淡水。

淡水战后，基隆法军向南进犯，清军由水返脚北上阻击，在暖暖附近展开激烈争夺，战事呈胶着状态。后来双方又陆续增加兵力，并相持于暖暖、八堵、七堵地区。

三、镇海退敌

淡水清军获胜，粉碎了法军以钳形攻势一举占领台北的企图。为了孤立台湾守军，法国侵略者于10月23日宣布封锁台湾海峡，由利士比率领一支分舰队沿台湾西海岸海域进行巡逻截击，并以三至六艘军舰在马祖澳附近海域游戈，控制南北海运和截断闽台间联系。为了保卫祖国领土，全国各地掀起了支援台湾的运动。福建前线军民利用夜雾偷渡等办法进行反封锁斗争，有的胜利到达彼岸，将一批批物资和兵员送到台湾，不断加强守军的防御力量。但是，偷渡援台毕竟缓不济急，且损失过重。有鉴于此，新授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等人纷纷建议由南、北洋海军各派军舰数艘，组成援台舰队，打破敌军封锁。清政府也以“台湾信息不通，情形万紧”为虑，经过多次催促，最后由南洋派出“开济”、“南琛”、“南瑞”、“驭远”、“澄庆”五舰，交提督衔总兵吴安康统领，执行援台任务。舰队从11月起在上海进行准备，添置炮位，迟至次年1月18日才出发南下。孤拔早已得知这一消息，他决定亲率法舰七艘，拦击中国援台舰队。

1885年2月7日，孤拔率舰队自马祖澳出发，北上搜索中国援台舰只。2月12日，双方舰队于浙江石浦檀头山附近洋面遭遇。吴安康不敢与敌交锋，率舰队逃跑，“驭远”、“澄庆”两舰航速较低，落在后面，被迫驶入石浦港隐蔽。法舰追赶“开济”等三艘巡洋舰未及，便返回封锁石浦港，并于14日夜间用水雷将“澄庆”、“驭远”两舰击沉（一说自沉）。之后，孤拔得知“开济”等三舰躲避在镇海口内，便又率舰队进犯镇海。

镇海位于甬江海口，北岸为沙滩，敌舰不能靠岸，易于防守，南岸港汊较多，便于登陆。法舰侵扰东南沿海以来，浙江提督欧阳利见认识到镇海系“浙东之咽喉，防浙以防镇为急务”，便以南岸为重点，进一步加强镇海的防御。其主要措施是：充实兵力，调整部署，以一千人驻金鸡山，五千人分守南北两岸，另以二千五百人为后应，分扼镇海至宁波沿江各隘；在甬江口钉桩沉船，堵塞航道；在金鸡山险要处修筑暗炮台，安设进口大炮，台上覆土一丈，护以毛竹、草皮，又在高阜显露之处筑假垒十余座，只插旗帜，不设一兵，以迷惑敌人，并在沿岸险要处加修围墙、长堤，挖掘壕沟，密布地雷、障碍物等，从而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此外，在各乡组织民团，盘查奸细，把法国教堂的传教士全部迁至后方，派兵监护，以切断敌之内应，并高价收买外国引水人员，使其不为法军所用。

[法]罗亚尔：《中法海战》，《中法战争》（三），第572页。

转引自《巴德诺致茹费理》，《法国黄皮书》，《中法战争》（七），第266页。

《军机处寄直隶总督李鸿章等电旨》，《中法战争》（六），第94页。

欧阳利见：《金鸡谈荟》，《中法战争》（三），第284页。

2月28日夜间,孤拔率法舰四艘侵入镇海海面。欧阳利见下令沉船堵口,命各营严阵以待。援台三舰和原在港内的“超武”、“元凯”两舰也都做好战斗准备。

3月1日下午,一艘法舰企图进港侦察,被北岸招宝山炮台守军开炮击退。接着,四艘法舰合力来犯,守军岸炮和舰炮一齐轰击,击穿敌先头一舰。法舰不支,施放烟幕逃走。当夜,法军以两小船于乾口门靠岸,企图登陆偷袭,被守军击退。3月2日,受伤法舰驶离镇海,其余三舰仍泊原处。入夜,法以二鱼雷艇进行偷袭,又被守军水陆炮火击退。3日上午,孤拔再次率领舰队进攻,同样遭到守军的猛烈炮击,其中一舰烟筒中炮受损,各舰掉头逃跑。此后,法军又数次利用夜暗进行偷渡和鱼雷攻击,均遭失败。孤拔智穷力竭,不得不于8月7日率队南返。

此次镇海作战,由于守军预有准备,水陆防守严密,伤亡甚少。法军则有两艘巡洋舰负伤,两只舢板沉没,并死伤不少官兵。孤拔本人也中弹受伤,后死在澎湖岛上。

第六节 北圻陆路反攻作战（1884年10月—1885年4月）

一、双方作战方针和部署

清廷于1884年8月26日被迫对法宣战以后，虽然确定了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的方针，命岑毓英催促刘永福赶紧督军进取，又令岑毓英、潘鼎新率滇、桂各军速赴北圻战场，尽力反攻。但是，究竟如何反攻，开始并不明确。后来根据前方奏报，才逐渐确定：东线桂军进攻谅江、太原，西线滇军和黑旗军进攻宣光，并推进到白鹤、永祥附近地域；两军在太原、永祥一带会师后，合力进攻北宁、河内。10月初，清廷鉴于基隆失守，更急于攻法之所必救，电令北圻各军力图进取，“直逼西贡等处，庶使分兵西援，台湾乃可稍松”。对此，岑、潘二人一开始就没有信心。潘鼎新当即表示：“台北吃重，此间一军前进，恐不足牵制；法方于河内、北宁增兵迎拒，西贡万难骤达。”

岑毓英也强调“西贡系南圻地方，隔顺化及宁平、南定等处，皆有法人坚守，道阻且长，万难进取。”潘鼎新和岑毓英等固然有畏敌怯战的一面，但清廷进军西贡的要求也是当时清军兵力难以胜任的，这反映了清廷战略指导上的无知。

法军方面，因米乐回国养病，由波里也于9月8日接任远东军总司令。当时，北圻法军计有第一、第二两旅及内河舰队等共约一万八千余人，分守陆岸（今陆南）、谅江、太原、宣光、馆司等前沿要地，兵力比较分散。波里也根据法国政府东攻台北、西取谅山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北圻采取西守东攻的作战方针，即西线坚守宣光、兴化，东线集中兵力夺取谅山，得手后，再转兵西向。

二、东线桂军反攻失利

东线桂军奉命再度开赴北圻战场后，开始进展顺利，至1884年9月中旬，署理广西提督苏元春率领的桂军主力十三个营（约四千八百人）进抵船头（今陆岸），10月初曾一度攻占陆岸；与此同时，记名提督方友升及总兵周寿昌等所部九个营（约三千二百人）进占郎甲及其以北地区。上述东、西两路桂军“互相犄角，自为战守”。潘鼎新率淮军五营及道员赵济川一营驻谅山，“整理操练，以备两路策应”。此外，副将马盛治所部六个营驻于牧马、新街一带，牵制太原守敌。东线清军兵力共约一万二千人，然而，“营哨各官大半代理，精壮能战者仅十之二三”。

这时，法军已在河内、北宁集结完毕。波里也为了粉碎东线清军的反攻，进而夺取战略要地谅山，以第二旅编成两个纵队，分别进攻郎甲、船头，以第一旅一部兵力配置于谅江附近，准备随时机动。法军主力于10月8日自河内出发。

《军机处寄云贵总督岑毓英等电旨》，《中法战争》（五），第573页。

转引自李鸿章《寄译署》，《中法战争》（四），第203页。

《云贵总督岑毓英奏折》，《中法战争》（六），第80—81页。

《广西巡抚潘鼎新奏折》，《中法战争》（五），第561页。

李鸿章：《寄译署》《中法战争》（四），第196页。

10月8日，尼格里率领第二旅主力约三千人进攻谅江北面十余里的郎甲。驻守该村的方友升等麻痹大意，没有做好必要的防御准备，对关系郎甲安危的南堡高地也未予以足够重视。因此，法军轻取南堡高地，随即在此布置炮兵，以密集炮火掩护主力从两侧迅速包围了郎甲村。守军仓促应战，除方友升率领一部撤至郎甲东侧高地外，尚有数百人被围于村中。清军为解救被围部队，两次由侧翼反击敌军炮兵阵地，均未成功。法军乘势抽出部分兵力进攻村北高地周寿昌部。该部兵力数倍于进攻之敌，但稍事抵抗就向观音桥、屯梅方向溃退。法军接着全力进攻郎甲村，守军浴血奋战，与敌人肉搏拚杀，直至全部牺牲。此战，清军伤亡七百余人，法军死伤百余人。尼格里也在这次战斗中受伤，暂时返回河内。波里也兼统第二旅，以一部兵力守郎甲，其余撤至谅江，后又向东增援船头。

进犯船头的法军第二旅一部千余人，由端尼埃上校率领，搭乘炮舰五艘、拖船十余只，于10月2日离北宁，经七庙，沿陆南江（今陆岸河）前进。苏元春率领的东路清军在船头附近筑有堑壕、堡垒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并在西南二十里的尼村附近配置部分兵力，防止敌军上岸。10月6日上午，法军进至尼村，舰炮齐发，与守军展开激战。清军伤亡较重，但仍竭力抵抗，终于迫使敌人后撤。此后，双方相持于船头以西地区。9日，法军得到增援，10日再次发起进攻。清军总兵陈嘉督军迎战。当法军第一梯队四个连向船头主阵地冲击时，陈嘉以一部兵力依托阵地顽强抵抗，亲率主力向法军右翼猛烈反击，将敌两个连大部歼灭，并击毙其右翼指挥官。残余法军狼狈逃窜。与此同时，法军左翼两个连仍在拚死挣扎，端尼埃也以其所控制的机动兵力在炮兵及舰炮火力支援下疯狂反扑。陈嘉见翼侧受到威胁，主动撤回主阵地。此后，战斗又成对峙状态。

清军在船头重创法军精锐部队，歼敌二百余人，士气为之一振。法国侵略者为船头守军“这样奋不顾身地激烈作战”而惶恐不安。但是，株守谅山的潘鼎新未能及时调部增援。苏元春在获知西路郎甲失守、后援无望的情况下，便于10月11日夜间率部撤回谷松。

郎甲、船头既失，桂军东、西两路的形势为之大变，战局开始陷入被动。清廷力促滇、桂两军联成一气，规复北宁、河内，甚至直捣西贡的战略意图，随之成了泡影。但是，这时法军对台湾淡水的进攻遭到失败，士气为之沮丧。巴德诺声称：“尼格里将军在郎甲的胜利，在某种范围内，可减轻台湾消息的令人不快印象，但其效能，是否将被北京朝廷敏锐地觉到，尚属疑问。我们东京的远征队，距离中国边境还太远，不能使帝国政府受到严重的警告。”

茹费理也认为只有乘胜向广西边境推进，方足以“有力地引起帝国政府的忧虑”。然而，波里也在攻占郎甲、船头之后，鉴于援兵未到，加之后方受到越南义军的牵制，无力继续发展进攻，不得不暂取守势，于是将主力撤回北宁、河内，以一部兵力在船头、郎甲一线巡逻警戒。12月以后，法国陆续增兵远东，三分之一赴台，三分之二赴越，并将北圻战场的法军改归陆军部指挥（原由海军部指挥）。在待援期间，波里也积极进行攻取谅山的各种准备，以船头为基地，修筑工事、道路，屯积作战物资。

[法]黎贡德：《远征谅山》，《中法战争》（三），第397页。

《巴德诺致茹费理》，《法国黄皮书》，《中法战争》（七），第267页。

《茹费理致巴德诺》，《法国黄皮书》，《中法战争》（七），第269页。

清军方面，西线滇军和黑旗军已于1884年10月底进抵宣光城下，正在竭力围攻。东线桂军也陆续补充了兵力，调整了部署：以驻谷松的苏元春、陈嘉所部十八营为中路；以驻观音桥的杨玉科、方友升所部九营为西路；以驻车里、那阳一带的王德榜所部湘军十营为东路；另以叶家祥所部淮军五营、董履高所部桂军五营驻谅山为后应。此外，马盛治所部桂军六营仍驻新街一带。以上共有兵力五十余营，约二万人。

为了策应西线的军事行动，打乱北圻法军西守东攻的作战部署，清政府曾命令东线清军乘北圻法军转入防御之机，主动出击，先发制敌。但是，潘鼎新根据李鸿章“切勿攻坚伤精锐”等指示，仅以小规模出击牵制船头方向的法军，作出一点策应西线作战的姿态。12月16日，中路清军二千人在纸作社（船头东北）伏击法军巡逻部队，毙伤敌军百余人，取得了胜利。年底，东路湘军进至船头东面的丰谷，准备配合中路进攻船头。1885年1月3、4两日，丰谷清军突遭法军四千余人猛烈攻击，“王德榜督军苦战，死伤颇多，因少后门枪，且子药已尽，势难抵御”，被迫丢弃大量物资，撤回车里。潘鼎新恐法军由那阳迂回苏、王两部之后而攻取谅山，急忙从谅山调淮军两营守那阳，并要求清廷迅速增援。

在此以前，两广总督张之洞也认为法军专注谅山，“桂军各道分防，兵力尚薄，必应由东路再增劲兵，以收犄角夹击之效”，于是命冯子材率粤军十营，总兵王孝祺率淮军、粤军共八营，分别由钦州、梧州起程，经由广西赴越。由于谅山吃紧，冯子材以八营由上思州直接入越，协同王德榜部守东路；自率两营赴龙州筹办粮饷军械和招募新兵。王孝祺部中途哗变，溃散近半，至龙州时不及二千人。

1885年1月底，法军第一、第二旅主力七千余人，在船头一带集结完毕，准备转守为攻，向广西边境大举进军。法军扬言分两路前进：一路攻谷松，一路攻车里。实则全军指向谷松，并力进攻中路。

潘鼎新企图阻止法军进攻，命中路清军（包括新配属的董履高部五营）前出到竹山附近高地设防。2月4日，法军集中炮火轰击竹山清军营垒，随即展开猛攻。守军顽强抵御，但因仓卒移防，工事不坚，伤亡甚众，被迫后撤。次日，法军再次发起攻击，守军不支，退守谷松。2月6日，法军在炮火掩护下猛攻谷松，清军被迫撤至谅山南面三十五里处的委坡一带。

中路清军溃败，谅山垂危。“东西两军相去远，闻调赴援，一日之间号令屡改。”潘鼎新时而令王德榜、杨玉科等部回援谅山，时而令其仍扎原处，时而令其夜袭法军后路，最后又令其飞援谅山，但为时已晚，无济于事了。就在2月12日，法军攻占委坡，潘鼎新于当夜逃离谅山入关，苏元春随之率部退入关内。2月13日，法军未经战斗，即占领了战略要地谅山。至此，法军在东线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波里也随即于2月17日率领第一旅（约三千人）离开谅山，以便经河内赶赴西线，解救被围于宣光的法军。

谅山弃守后，冯子材毅然以守关自任，亲率一营从龙州赶到镇南关，和王孝祺部一起拦截溃散兵丁，并急调协守东路的冯军八个营回守镇南关。可

李鸿章：《寄龙州速递潘中丞》，《中法战争》（四），第202页。

《督办军务广西提督苏元春等奏折》，《中法战争》（六），第445页。

张之洞：《照会右江镇出关援剿》，《中法战争》（四），第439页。

无名氏：《克复谅山大略》，《中法战争》（三），第77页。

是，潘鼎新竟“告以守关无须该军，令仍顾东路”。2月19日，西路杨玉科部自观音桥、屯梅绕道撤至文渊（今同登）。杨玉科以主力防守文渊两侧高地，自率一部驻镇南关。2月23日，尼格里指挥法军第二旅进攻文渊，守军浴血奋战，节节抵抗。杨玉科亲临前线指挥战斗，阻止了敌人的前进。但由于清军发射的炮弹多未爆炸，未能予敌以大量杀伤。午后，杨玉科中炮牺牲，守军随即溃散，退入关内。法军乘势侵占镇南关，前锋一度侵入我国境内近十公里的幕府附近。

由于兵力不足，补给困难，加之不时受到当地群众武装的袭扰，法军于2月25日炸毁镇南关城墙及其附近工事，退回文渊、谅山。根据波里也离开谅山前的指令，法军在镇南关废墟上立一木牌，上书“……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但是，当地军民在同一地方写着：“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以此作为对侵略者的回答。

冯子材闻镇南关失守，立即疾驰二百余里，由东路统兵回援；王德榜也率部赶回，驻于镇南关东面三十里的油隘一带。

潘鼎新则畏敌如虎，在文渊战斗之前，即由镇南关继续后逃至幕府。2月23日，正当文渊前线激战之际，他又经凭祥、海村连夜逃到关内一百余里的龙州，由于遭到当地各阶层人民的愤怒斥责，“始乘船由水路返海村，日驻岸，夜驻船”。事后，他竟谎报自己在文渊战斗中“督亲兵助战，枪炮声震山谷，逆党（法军）纷纷倒地”，并诡称由他指挥各军“收复”了镇南关等等，以推卸东线反攻失利的责任。

东线清军反攻失利，主要原因在于前敌指挥潘鼎新消极怯战，畏敌如虎，以致屡误战机。“潘军不是没有战争经验，又用新式枪械，节节败退，完全是接受李鸿章失败主义的影响。”潘鼎新在作战指挥上，明显地犯了消极被动、分兵把口的错误。东线清军顺利进抵船头、郎甲一线以后，正值法军兵力分散、援军未到和越南义军纷起袭扰的有利时机，战场的优势和主动，基本上在清军方面。然而，潘鼎新却滞留谅山，与西线方面互相观望，消极等待，强调“一俟滇军牵制西路，此间有隙可乘”，才能“趁势袭取”，使法军得以从容集结兵力，分别夺取郎甲，船头。清军被迫退守山区，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尔后，清军经过调整补充，实力大为加强；法军则因国内援军未到，宣光被围，处境相当困难，不得不转攻为守，仅以部分兵力守备前沿阵地。这时，清军在全局形势上仍有可能挽回颓势。以越北山区的有利地形，完全可以正面钳制，侧后攻击，粉碎法军的进攻。可是，由于清军在总的战略指导上消极被动，以致在兵力部署上仍将前线数十营部队分散于观音桥、谷松、车里各点，正面宽广，没有形成重点，加上配置于谅山纵深的兵力又没有适时向前机动，起不到预备队的作用，以致形成前后分兵把口，被动挨打的态势。在作战过程中，潘鼎新决心犹豫，朝令夕改，不能组织第一线各部之间的相互协同，特别是法军专攻中路，苏元春部节节败退之际，没

《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折》《中法战争》（六），第456页。

[法]加尔新：《在侵略东京时期》，《中法战争》（三），第530页。

无名氏：《克复谅山大略》，《中法战争》（三），第78页。

《广西巡抚潘鼎新奏折》，《中法战争》（六），第344页。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34页。

《广西巡抚潘鼎新奏折》，《中法战争》（五），第561页。

有及时机动翼侧军队加强纵深防御或向敌人侧后出击，使法军得以长驱直入，连续突破中路防御，直逼谅山。此外，清军中派系矛盾的长期存在，也严重影响了各部之间的统一与协同。如王德榜“自负湘中老将，每与督师（潘鼎新）龃龉”，潘鼎新便有意“征调屡更”，使之无所适从，疲于奔命，最后反诬王“催援不至”。丰谷之战，苏元春不及时援救王德榜部，法军攻中路苏元春部时，王也就消极观望，不主动支援，给了法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三、西线滇军东下受阻

在正式对法宣战前后，清廷多次命令西线指挥官岑毓英再度督师出关，与东线桂军合力规复北圻各城。但岑迟至 1884 年 9 月 28 日才命令原留驻于文盘、大滩一带的黑旗军十个营（约三千七百人）、滇军张世荣部五个营（约二千五百人）分道前进：黑旗军黄守忠、吴凤典两部由山路绕赴陆安，出馆司之后；刘永福、张世荣率部沿红河直下，期收夹击之效。岑毓英企图先后夺取馆司、宣光，并以集结于云南边境的滇军主力六千余人沿红河逐次进占夏和、清波以及临洮等地，得手后，再与东线清军会师，并力进攻北宁、河内。

北圻法军为贯彻其西守东攻的作战方针，于 10 月 11 日撤走馆司守军，以便缩短防线，固守兴化、端雄、宣光，保证河内以西地区的安全。岑毓英鉴于馆司之敌自动撤离，便将黑旗军及滇军张世荣部集中指向宣光。

宣光城筑有石墙，依山傍水，“向称天险，城内一山耸峙，悬炮可击外军，城外植竹五六重，兵难破入”。10 月中旬，清军陆续进抵宣光附近，因法军水陆防守甚严，便在离城十里的琅玕、中门等处扎营。此时，东线桂军已失郎甲、船头，清廷严令滇军速进，以分敌势。岑毓英乃于 10 月 20 日由保胜移驻文盘，并调原驻扎于云南边境的记名提督吴永安、邹复胜所部四千人及记名总兵覃修纲所部二千余人进扎馆司、夏和、清波一带，伺机向兴化等地进击，威胁敌军后路；同时，令宣光清军逐步进逼城下，四面围困敌人。

法军为确保宣光，稳定北圻西线防御态势，从 11 月 4 日至 12 日，多次派兵增援，但大都被清军击退。11 月 12 日起，清军于宣光东南十余华里的左育地方清河（今泸江）两岸挖筑地营，并将以前截获的船只装石塞河，以期截断法军水路交通。11 月 18 日，法军端雄、山西地区指挥官多米尼亲率步、炮、工兵千余人，搭乘炮舰五艘、民船十余只，趁连日大雨、清河水涨之机，增援宣光，遭到埋伏于左育清河两岸的清军夹击，不能通过。次日，法军舍舟登岸，分两路进犯左育。清军依托地营毙伤法军百余人，但因工事尚未全部构成，又遭敌人腹背夹击，被迫撤出阵地。法军立即上船，驶抵宣光，加强了城防力量。岑毓英强调必须先取宣光，滇桂各军联为一气，才能相机进取，因而使黑旗军和大量滇军长期顿兵于坚城之下，不能东进，坐视法军集中兵力专注谅山。

12 月，清军围城部队又得到补充。月初，唐景崧在龙州招募的四个营（二千人）经牧马进抵宣光城外（后又扩编为六个营）；月底，记名总兵丁槐所

唐景崧：《请纓日记》卷七，《中法战争》（二），第 178 页。

唐景崧：《请纓日记》卷六，《中法战争》（二），第 152 页。

部十三小营（共三千人）出马白关，经河阳（今河江）进至宣光。1885年1月中旬，岑毓英由文盘进扎馆司，随即派兵三千六百人由记名提督何秀林率领前往宣光方向，进一步加强围城兵力。在此期间，宣光清军重新调整了部署：由黑旗军和何秀林部担任阻援，唐景崧、丁槐（兼统张世荣部）两部分驻城北和城南（均离城一公里左右），担任攻城。

1月26日，唐、丁两部合力夺取宣光城南法军据点，法军开东门出援，双方展开激战，彼此伤亡很重。后因何秀林部赶来增援，法军又撤入城内。接着，清军采用“滚草龙”的战法，于31日夺取了南门炮台，并歼敌二百余人。此后，法军被迫龟缩城中，由于水路被黑旗军切断，供应日缺，处境极艰，只好用玻璃瓶、竹筒等封装求援信，投入清河顺流而下，向端雄、河内告急。2月，清军连续攻城，多次挖地道用地雷炸开城墙，从缺口突入城内，但因法军阻击火力较猛，均未成功。

波里也为解宣光之围，亲率由谅山撤回的法军第一旅溯河而上，2月27日于端雄登陆，与不久前派出的先遣部队会合。

清军侦知法军大队来援，立即由何秀林部拨一千人前往左育，协助黑旗军阻援。另以覃修纲部二千人出扎临洮府附近，待法军攻左育时，向端雄前进，断敌后路。3月2日，法军分路进攻左育及对岸的同章。左育黑旗军依托地营顽强抗击，并引发地雷，多次打退法军的冲击，毙伤大量敌人。后由于防守同章的黄守忠部黑旗军被敌击溃，法军占据对河高地，安设炮位，向左育黑旗军轮番炮击。刘永福所部黑旗军伤亡近千人，不得不撤出左育阵地。新赶到的何秀林部也不支败退。覃修纲部进至端雄，闻法军已抵宣光，只得仍回临洮、清波。

岑毓英见宣光法军兵力大增，随即命令疲惫不堪的围城部队撤至宣光附近山区休整；唐景崧所部六营则经占化撤往牧马。西线清军围攻宣光的计划半途而废，东下河内的意图随之落空。据岑毓英奏称：此次以近万人攻城，“历三十五、六昼夜，久雨泥滑，死者一千数百人，伤者二千余人，疲惫不堪，不能不暂为休息。”岑毓英明知“顿兵坚城，徒伤精锐”，唐景崧也“明知攻坚，兵家下策也”，可是又强调“事急不得不攻，且城垂拔亦不肯松劲”。不难看出，此次行动的失利，实属作战指导上的严重错误所致。以滇军当时的兵力，一面围宣光，一面沿河东进，威胁河内，使敌不敢增援宣光，是可能办到的。此着不行，顿兵坚城，反为敌所牵制，置优势兵力于无用。宣光既久攻不下，就应适时把作战重点改为打援，援兵既挫，宣光不

唐景崧《请纓日记》载：“……赴丁统领营，商必先夺炮台始能攻城。丁统领议用‘滚草法’，度离炮台数百丈，潜掘土为垛，可蔽数人，即伏垛下开濠。掘濠渐长，容人遂多，人行濠中，可避枪炮。乃缚草把长三尺，计数万束，滚掷而进。草把墙立，人不受枪，草压炮台，即可立破，滇人谓之‘滚草龙’。”（《中法战争》第二册，第168页。）

岑毓英奏称：“黄守忠守对河同章，不遵调度，不安地雷，被贼攻破。”（《中法战争》第六册，第333页。）唐景崧《请纓日记》则谓“黄守忠泣诉左育之役，非不顾主将，亦非彼军先失营垒，包抄不到，乃为敌后队截住。刘（永福）挟嫌诬罪，捏禀彦帅（岑毓英）参劾。”（《中法战争》第二册，第179—180页。）

《云贵总督岑毓英奏折》，《中法战争》（六），第334页。

《云贵总督岑毓英奏折》，《中法战争》（六），第370页。

唐景崧：《请纓日记》卷七，《中法战争》（二），第175页。

难攻下。此着又不用，结果丧失主动，为敌所败。

四、清军陆路大捷（参见附图十五）

（一）临洮败敌

1885年3月，法军既解宣光之围，即以第一旅留守宣光，其余部队撤回端雄、河内等地。接着，波里也企图向兴化以西红河两岸滇军发动进攻，进一步改善法军在北圻西线的态势，保障主力继续在东线发展进攻。岑毓英获此情报，即令覃修纲部（此时约为四千人）严守夏和、清波、锦溪等红河两岸要点，令云南农民军竹春、陶美等部千余人及越南义军一部，与滇军李应珍部共同防守临洮府以东村落，刘永福则率黑旗军进驻临洮。

3月23日，法军非洲兵千余人及越南教民一批，由兴化渡红河，进攻临洮东南的山围社。在此防守的中越军民联合部队坚守地营，沉着应战。待敌接近时，枪炮齐鸣，并引发地雷，打退了进攻之敌。法军连续几次冲击，守军均依托工事，发挥近战火力，顽强奋战，毙伤不少敌人，守住了阵地。傍晚，正当法军进退维谷之时，与刘永福有联系的越南义军在村落四周遍插黑旗，用中国话齐声喊杀。法军以为突遭黑旗军包围，惊魂落魄，纷纷脱掉军服，乘夜从附近的河沟泅水，偷偷向越池方向逃窜。守军没有发觉，未予追击。

中越军民在临洮附近大败法军，毙伤敌军数百人，缴获法军红白衣裤、军帽等千余件。这是西线战场上取得的一次较大胜利。这次战斗的主要特点，是中越两国军民紧密配合，英勇战斗。另外，守军充分利用地形，构筑了比较适应当时作战情况的野战工事——地营，减煞了敌人的火力优势，弥补了自己火力不强的弱点，也是这次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景崧对滇军构筑地营一事，作了相当详细的记载，这表明滇军在这方面有其独到之处，至少在他看来，如此完善的地营是当时战争中的新鲜事物。

“野战筑城工事具有和军队同样悠久的历史。”“兵力上处于劣势的军队，可借以成功地抵抗优势敌人，因而野战工事能对战局的结果起重大影响。”随着野战炮兵的大量使用和火炮射速与弹丸威力的加大，仅凭地面工事远远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从而迫使人们向地下发展，构筑既能防护自己、又能攻击敌人的地下工事。地营的出现和发展，正是战争发展的必然产物。

据岑毓英奏称：临洮之战，“阵毙白帽法匪二百余名，红衣鬼四百余名、教匪千余名。”（《中法战争》第六册，第369页。）但刘永福称，这是岑毓英邀功谎报战绩。（参阅《中法战争》第一册，第281—282页。）

据唐景崧《请纓日记》卷三载：滇军地营的构筑是相当完善的。“其制，掘地作方坑，深六尺，大小度地势为之。坑内四周密竖大木，出地尺许，开枪眼，上铺大木，覆土，取其低不受炮，遥见不知有营也。坑背开地槽，通入坑，坑口有栅，一人闭栅坐，则坑内数十人皆不得出，既可避炮，且免溃走。……或回环掘数营，皆于地下开槽，营营可通，互相策应，水米药弹均储其中。又于地营外开曲折明槽，人顶齐地，宽仅尺五，长至一丈即转，太宽弹易落入，一丈即转，弹虽落亦仅击及一丈也。明槽所以护地营，恐军全在暗坑，不明敌情也。地营三丈外用槎枒树枝，以藤缠之，密排三层，是谓鹿角架，防敌冲突。再于四角埋置地雷，尤为有备。但须离本营二十丈远，始不自轰。”（《中法战争》第二册，第106页。）

恩格斯：《筑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351—352页。

在中法战争中，滇军和黑旗军一直重视这一作战手段，“扎营之处，兵卒均荷锄铲刀锯之类，掘地锯木”，修筑基本上相当于今日有被覆的野战掩体的地营，在各次战斗中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镇南关大捷（参见附图十六）

在潘鼎新不战而逃、东线法军直逼广西国门的情况下，龙州等地商民惊徙，游勇肆掠，难民蔽江而下，广西全省大震，形势十分严重。清廷以广西关外各军迭次失利，于2月17日电令冯子材帮办广西关外军务。冯子材虽已年近七旬，但“久任广西提督，三次出关，威惠素著，得桂、越人心”。由于潘鼎新远离前线，前敌将领公推冯为东线总指挥。冯子材决心“保关克谅”，并相机收复北圻各城。他一面调整部署，令部下赶修工事，一面整顿军纪，安定民心，迅速稳定和改善了防御态势。

与此同时，清政府通过总税务司赫德的私人代表金登干在巴黎与法国政府之间的秘密谈判正在加紧进行。由于法军在北圻东线占领谅山之后，接着于3月3日在西线解了宣光之围，法国政府急于趁胜迫和，以缓和国内人民对旷日持久的战争所表现的强烈不满。为了保证它在和议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法国政府要求东线法军继续发展进攻。波里也随即于3月16日电告尼格里：现在正与中国进行谈判，若能对龙州有所动作，派北非骑兵前去，将大有裨益。你看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中国人相信我们不久就要向龙州进攻。接着，波里也向谅山方面增派援军。尼格里认为威胁龙州是“玩一种危险的把戏”，但还是积极备战，待命行动。

根据当面敌情和广西中越边境的地形条件，冯子材经过反复勘察，选定关前隘（今隘口南）附近的有利地形构筑防御阵地。关前隘在镇南关内约八华里处，东西两面高山夹峙，中间为宽约二华里的隘口。东面的大青山高八百余米，向南倾斜与小青山相连，再南为马鞍山，一直延伸到镇南关的东面。西面的凤尾山高六百余米，同样向南倾斜，直至龙门关（一东西向峡口，有小路可通扣波），然后经一座大石山延伸到镇南关的西面。关前隘南面的谷地宽二华里多，谷地南端有几座小石山，往南直至镇南关都是起伏不平的山丘，统称横坡岭。冯子材命令部队在关前隘附近筑起一道土石长墙（长三里多，高约七尺，宽约四尺），横跨东西两岭之间，墙外挖掘四尺宽的深堑，以利坚守，并在东西岭上修筑堡垒多座，构成一个较完整的山地防御阵地体系。

在兵力部署上，冯子材亲率所部冯军担任关前隘正面防御，扼守长墙和山险要地；王孝祺部八个营屯于冯军后面半华里处，作为正面防御的第二梯

何慧青：《援越抗法光荣史》《逸经》第三十五期，第38页。

无名氏：《克复谅山大略》，《中法战争》（三），第78页。

《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六：“李秉衡集诸将举前敌主帅，孝祺曰：‘今无论湘、粤、淮军，宜并受冯公节度。’秉衡称善。”

金登干（1833—1907），英国人，1862年进中国海关，1873年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成立，就以驻外税务司资格主其事，一直到1907年死去为止。

参见[法]黎贡德：《远征谅山》，《中法战争》（三），第晁*434—435页。

[法]黎贡德：《远征谅山》，《中法战争》（三），第439页。

队；王德榜所部湘军十个营屯于油隘，保障入关旁路的安全，并相机袭击敌后；苏元春及陈嘉所部桂军十八营屯于幕府（关前隘之后五华里），作为总预备队；魏纲所部鄂军八个营驻平而关，控制由茆封（今七溪）至龙州的水道。此外，蒋宗汉部（杨玉科阵亡后，所部由蒋统领）及方友升部共十余营屯于凭祥，潘鼎新率淮军五营屯于海村，以镇后路。加上驻龙州、新街等处部队，东线清军总兵力约达八十余营。

8月9日，尼格里派北非骑兵和越伪军各一部，企图由文渊练扣波进占茆封、牧马，绕出镇南关之北，摆出一副威胁龙州、切断唐景崧部（当时已由宣光撤至占化）和马盛治部（驻新街）归路的架势。冯子材根据越南人民提供的情报，立即派驻龙州的冯军五个营前往扣波，苏元春则率桂军暨魏纲部前往茆封。8月13日，法军进至茆封，见清军已先期到达，便掉头南撤。到达扣波的冯军奋力拦击，法军败回文渊。尔后，苏元春部仍回幕府，魏纲部八营和冯军五营则分别留守茆封、扣波。

3月21日，冯子材为打乱敌人的进攻部署，不顾潘鼎新等人的阻挠，决定先发制敌，毅然率王孝祺部出关夜袭法军前哨据点文渊，一度冲入街心，毙伤不少敌人，并毁炮台两座后主动撤回，取得了较大胜利。由于清军的主动出击，尼格里感到自己已处于被动地位，为争取主动，他不待援军到齐，决定提前发起进攻。

3月23日晨，法军第二旅主力一千余人趁大雾偷偷进入镇南关。上午10时30分，大雾开始消散，法军便分两路进攻：主力沿东岭前进；另一路沿关前隘谷地前进，企图在主力夺取大青山顶峰大堡之后，两路前后夹击，攻占关前隘清军阵地。此外，法军一部近千人配置于镇南关东南高地，作为预备队，并向油隘方向担任警戒。冯子材立即商请驻于幕府的苏元春部前来接应，又通知王德榜部从侧后截击敌人。冯子材自率所部和王孝祺部奋力迎击当面之敌。法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经过几小时的拚死争夺，占领了尚未完工的东岭五座堡垒（分别构筑于小青山五个相连的山峰上）中的三座。冯子材见形势逐渐危急，激昂地高呼：“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冯、王两部将士在爱国热情激励下，誓与长墙共存亡，个个奋不顾身，英勇抗击，阻止了敌人的前进。下午4时许，苏元春、陈嘉等率部自幕府赶来增援。不久，蒋宗汉、方友升部也闻讯赶来。各部奋力抵抗，战斗甚为激烈，彼此势均力敌，死伤相当。当天，王德榜部自油隘出击法军右翼，牵制了敌预备队的机动，并一度切断敌人运送军火、粮食的交通线，有力地配合了东岭的战斗。入夜，清军进一步调整部署，由苏元春部协助冯军守长墙，王孝祺部守西岭，陈嘉部守东岭，蒋宗汉、方友升部扼守大青山顶峰。冯子材还派人持大令飞调驻扣波的五营冯军前来抄袭法军左翼。附近群众连夜挑水送饭，赶运弹药。将士们磨刀擦枪，修补工事，严阵以待。经过一番整顿，前线军民更加同仇敌忾，决心与侵略者血战到底。

3月24日晨，尼格里指挥法军分三路再次发起冲击。在侥幸取胜的心理支配下，尼格里首先派其副手陆军中校爱尔明加率兵一部，利用大雾偷偷向大青山顶前进，企图突然夺取大堡，控制东岭制高点；但由于地形险峻，道路难行，法军偷袭未逞，不得已沿原路退回。上午11时许，尼格里见山顶久

冯子材原有粤军十营，后在龙州等地增募八营，共计十八营。

《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折》，《中法战争》（六），第455页。

无动静，以为偷袭部队已不战而占领了山顶大堡，便命令以猛烈炮火轰击清军正面防御工事，企图掩护沿谷地前进的法军接近长墙，配合东岭法军一举突破关前隘阵地。冯子材立即传令各部统领：“有退者，无论何将遇何军，皆诛之！”并于各路设卡，堵截逃兵。当敌人接近长墙时，冯子材持矛大呼，率领两个儿子跃出长墙，冲入敌阵，展开白刃格斗。全军将士见主帅身先士卒，一齐大开栅门，向敌人冲去。当地人民群众和部分散兵游勇也主动前来助战，“伺便随处狙击”。中午，从扣波赶来增援的五营冯军在游击杨瑞山、都司麦凤标等率领下，由摩沙村（龙门关西口）冲进龙门关，突然出现在法军侧后，给进攻之敌以意想不到的打击。经过一场激烈的殊死战斗，中路法军狼狈退回谷地。在关前隘长墙激战的同时，陈嘉、蒋宗汉相继率部反复争夺被法军占领的东岭三座堡垒。直到傍晚，王德榜部在击溃敌之增援部队及消灭其运输队后，从关外夹击法军右侧后，配合东岭守军夺回了全部敌占堡垒。这时，王孝祺部也已击退沿西岭进攻之敌，并由西岭包抄敌后。法军三面被围，伤亡甚众，后援不及，弹药将尽，开始全线溃散。于是，尼格里不得不下令撤退，法军丢下数百具尸体，狼狈逃回文渊。

冯子材指挥东线清军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共毙伤敌军精锐近千人，缴获大批枪炮、干粮，大大鼓舞了中越两国军民的斗志，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气焰。这是中法战争中关系全局的一战。它不仅使北圻东线反攻转败为胜，而且使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法人自谓入中国以来，从未受此大创。”3月27日晚，法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立刻在法国统治阶级中引起巨大的震动和恐慌。他们害怕因此而动摇法国在远东初步建立起来的殖民统治，因而群起抨击茹费理的远东政策。法国人民也纷起反对茹费理政府的殖民战争。3月29日，法军在谅山惨败的消息接踵传至巴黎，茹费理内阁随即于3月31日在一片责骂声中垮台了。

东线法军经镇南关惨败之后，人数不满二千，在文渊稍事休整，主力即仓卒撤至谅山，和已经到达那里的援兵会合，总数增加到四千五百人左右。冯子材为了不给溃败之敌以喘息机会，于3月26日亲率所部及王孝祺部出关进攻文渊，并通知王德榜部由小路抄袭敌之右翼。文渊守敌倾巢出战，清军“分路四面环攻，枪炮雨密”。战不多时，守敌头目中弹落马，余众溃逃，清军立将文渊收复。

这时，越南义军已在谅山通往那阳、屯梅等交通线上加紧袭扰，给法军后方以很大威胁。尼格里企图坚守谅山，等待更多援兵到达后再次进犯镇南关，做了如下部署：主力扼守驱驴北面的一个高地，以确保驱驴，屏蔽谅山；一部兵力配置于淇江（今奇穷河）南岸，分守通向谷松、屯梅的交通要道；将老弱残兵编成“城堡班”，驻守谅山城垣碉堡。

冯子材鉴于谅山为越南北部军事要地，“若不急先攻取，实难成破竹之势”。并且认为，法军连战皆败，心胆已寒，“与其明攻多损士卒，不如暗取更易见功”。因此，与苏元春等密商，“以正兵明攻驱驴，出奇兵暗取谅

《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折》，《中法战争》（六），第455页。

《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折》，《中法战争》（六），第456页。

李鸿章：《寄译署》，《中法战争》（四），第240页。

冯子材：《军牒集要》，《中法战争》（三），第94页。

山”。3月27日，冯子材派杨瑞山率所部绕道而进，乘夜渡过淇江，于次日黄昏潜至谅山，散伏城外各处。

3月28日，冯子材、苏元春、王德榜、王孝祺各部次第向前挺进，分三路逼攻驱驴：冯子材、苏元春率主力进攻正面；王孝祺部和冯军一部进攻西面；王德榜部进攻东面。法军依托驱驴北面高地的坚固工事，负隅顽抗，阻止了清军的进攻。尼格里鉴于其左翼和正面阵地工事坚固，而东面地形较难防守，决定由爱尔明加率军一部，向东面的王德榜部发起反击。下午2时许，冯、苏两部趁敌人调动兵力、正面防御力量有所减弱之机，再次发起猛烈攻击。激战中，尼格里胸部中弹重伤，接替指挥的爱尔明加随即下令向淇江南岸撤退。谅山守敌在慌乱中砍断浮桥，致使部分法军在溃逃中落水溺死。之后，法军退入谅山城，并立即部署分两路向南撤退。

3月29日拂晓，清军主力徒涉淇江，向谅山挺进。在此之前，埋伏于城外的杨瑞山部乘法军熟睡之机，突然发起攻击。城中法军仓皇应战，一片混乱。杨瑞山等“督率各营员弁、勇丁，蚁附而上，劈开城门，兵刃交下”。法军死伤累累，残部向南逃窜。清军追击二十余里，并边进边搜山，从山谷中俘获不少敌人。

清军在克复谅山的过程中，共毙伤法军近千人，并缴获大量军械物资，仅杨瑞山部就夺获大小火炮三十余门。

谅山既克，清军乘胜分东西两路向南追击。3月31日，东路陈嘉部及王德榜部攻克谷松，西路冯军一部克复屯梅，进逼郎甲。法军犹如惊弓之鸟，一口气逃到郎甲、船头一带。

在这大好形势鼓舞下，越南义军的活动更加频繁。北宁总督黄廷经集合各路义民二万余人，“建冯军旗号，自愿挑浆饭，作向导，随军助剿，或分道进攻”。河内、海阳、太原、西贡等地人民也纷纷酝酿起义，盼望清军早日挥戈南下，赶走法国侵略者。冯子材决定于4月中旬亲率东线全军进攻北宁、河内；唐景崧部也准备出牧马，攻太原；广东方面，准备派兵出钦州，沿北圻东海岸进攻广安；会办云南军务鲍超所部三十余营生力军正向龙州前进，随时准备入越；西线滇军也已克复广威等地，正向兴化发展进攻。但就在这时，清廷下达了妥协求和的停战撤兵令，彻底破坏了前线军民乘胜进军的作战计划。

冯子材：《军牒集要》，《中法战争》（三），第95页。

冯子材：《军牒集要》，《中法战争》（三），第96页。

无名氏：《克复谅山大略》，《中法战争》（三），第80页。

第七节 战争的结局与经验教训

一、中法战争的结局和影响

中国军队在北圻的军事胜利，为中越两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带来了光明的前景。然而，本来就是被迫宣战的清朝政府，这时不仅没有利用这种极为有利的形势，去争取战争的彻底胜利，反而把军事胜利当作求和的资本。李鸿章在谅山大捷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叫嚷：“当借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清朝最高统治者立即采纳，表示仍然愿意按照金登干与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在巴黎已经谈妥的条件恢复和平。法国方面，军事失败和由此而引起的政局混乱，迫使它同样急切地希望按已经谈妥的条件终止战争，所以不待新内阁成立，便由总统授权毕乐于1885年4月4日与金登干匆促签订停战协定。

4月7日，清廷向前线各军下达定期停战撤兵令，规定：越南宣光以东，4月15日停战，25日中国军队撤回，5月5日齐抵广西边界；宣光以西，4月25日停战，5月5日撤军，6月4日齐抵云南边界；台湾于4月15日停战。

前线将士接到停战令后，莫不痛心疾首，不肯退兵。冯子材等致电张之洞，要求奏请清廷“诛议和之人”，表达了爱国将士对屈辱求和的卖国贼的无比义愤。张之洞、左宗棠、彭玉麟等也都极力反对撤兵。但清廷一意孤行，竟电告张之洞：“冯、王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著该督遵旨，亟电各营，……如期停战撤兵；倘有违误，惟该督是问！”就这样，前线军民浴血奋战赢得的胜利，被腐败无能的清统治者白白断送了。

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天津条约》，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二）在中国边界指定两处通商，法国可在此设领事馆；（三）法国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减轻；（四）中国日后修筑铁路时，应与法国商办；（五）法国撤退其在基隆和澎湖的军队。显然，法国侵略者利用清廷的昏庸怯懦，在战争失败的情况下，仍然达到了它发动这次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这就是当时人对中法战争结局所作的评价。这种奇特现象，无疑是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的。

在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耗帑金二千余万”，不得不大借外债。据统计，从1883年9月到1885年3月，直接用于军费，以“广东海防”、“福建海防”、“援台规越”、“滇桂借款”、“神机营借款”等名义所借的外债共八次，总数约为库平银一千七百六十万两。当然，法国侵略者也不可能不付出代价，那几年，仅军费即达十二亿法郎，死伤士兵数以万计。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深恐卓有功勋的黑旗军以越南西北部为根据地，继续抗法，或联合滇、桂人民反抗清廷；法国侵略者对黑旗军更是又恨又怕，声言黑旗军一日不离越境，法国就一日不交还澎湖。于是，清廷诱之

罗惇胤：《中法兵事本末》，《中法战争》（一），第26页。

《军机处寄两广总督张之洞电旨》，《中法战争》（六），第385—386页。

《清史纪事本末》卷六十。

参见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第8页。

以官禄，接二连三地催刘永福率部回国。在法国侵略者和清政府的威逼与利诱下，刘永福终于在 1885 年 9 月率三千人入关，次年被委派为南澳镇总兵。他所带回的黑旗军战士，最后仅剩三百人，百分之九十被逐次解散了。

中法战争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推行殖民扩张政策，进一步侵略我国邻邦越南，并企图以越南为基地，进而侵略中国引起的。中国为了阻止法国吞并越南和保卫中国领土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完全是正义的战争。从军事上说，中国军民在这次规模远比两次鸦片战争为大的战争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取得了胜利，使法国在“北黎事件”后一直坚持的“踞地为质”、索取赔款的企图终究没有能够全部实现。可是，由于清朝政府怯懦妥协，最终造成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结局，从而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首先，清政府在战争中所表现的软弱态度，进一步助长了早已垂涎中国的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野心，以致边境危机愈益加重。其次，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扩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日益加深了。中法战争以前，沿海各省虽已门户洞开，内地商埠则还不多；中法战争以后，到九十年代初，为外国开辟的商埠共有三十多处，不仅分布于沿海和长江两岸，也出现于内地和甘肃、新疆、蒙古、西藏等边远地区。根据《中法天津条约》，清政府还首次给予外国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权利，这样，外国侵略者不仅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沿海、内河的航行权，而且控制了中国的陆路交通命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侵入中国广大地区和渗透到许多重要经济部门的结果，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越来越遭到破坏。此外，中法战争的失败，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以及清政府更趋反动和腐败，促使人们为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而寻找新的出路，于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开始汇合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为后来的变法维新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二、中法战争的经验教训

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除收复新疆之战以外，历次反侵略战争都遭失败，但就中法战争来说，军事上虽互有胜负，而最终胜利却属于中国军民。这一胜利的取得，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中法双方各种条件在战争中发展变化的结果。

（一）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是军事胜利的根本保证

法国的殖民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中国人民发扬了反对外来侵略、支持正义战争的革命传统，英勇顽强地开展抗法斗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清统治者的妥协投降活动，而且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人民，愤于侵略者的暴行和民族败类的无耻行径，也纷纷起义，直接打击侵略者和依附法国殖民者的文武官员。战争爆发前，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高举义旗，助越抗法，在纸桥、怀德、丹凤等战斗中屡创法寇，给中越两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同时，也推动了清统治集团中部分官吏积极提出抗法的主张，并最终促成了清朝政府的抗战。在战争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战场上，中越两国人民主动支援前线，参加战斗，给前线将士以巨大的鼓舞和支持。临洮战斗前后，云南农民军和越南各阶层人民数千人编列成营，参加赴越滇军序列，并肩战斗，开创了红

河中上游反攻作战的有利局面。在保卫台北和东南沿海的历次战斗中，当地人民群众自动武装起来，英勇抗敌，加上沿海军民积极参加渡海援台的反封锁斗争，从而稳定了这一重要战场的防御态势，牵制了大量法军。特别是当法国侵略者进逼广西国境、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时刻，进一步激起了中国广大军民的抗法热情。在镇南关、谅山大捷过程中，边疆各族人民踊跃参战，予冯子材军以积极支持，热情鼓励。越南人民也“争为耳目，敌人举动悉来报知，近自北宁，远至西贡，皆通消息”。冯子材在镇南关大捷前的两次主动出击，就是由于越南人民及时提供情报而先发致胜的。除直接参战外，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还表现在其它各种形式的斗争方面，如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教会斗争，1884年9、10月间香港中国工人拒绝修理受伤法舰和搬运作战物资的斗争，以及旅居旧金山、日本、古巴等地的海外侨胞积极捐款等等，也都有力地支援了这次反侵略战争的进行。

（二）前敌将领是否得力，有无集中统一指挥，是能否取得作战胜利的关键之一

北宁作战时，由于徐延旭调度无方，招致惨败。陆路反攻前期，桂军又一败涂地，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没有一个象样的统帅人物，实施集中统一指挥。当时，潘鼎新名义上节制东线各军，实际上责任不专，指挥不灵，加上他本人昏聩无能，毫无威望，不能组织各部的协同行动。谅山失陷前一日，潘鼎新才电告李鸿章：“军情瞬变，请饬各军均暂听调派”。几天之后，清廷正式明确：镇南关外各军均归潘鼎新调遣，以一事权。然而，此时谅山已经陷落了。后来镇南关反击作战时，由有威望而又勇负重责的老将冯子材担任前敌总指挥，集中统一了前线军队，采取了适合当时情势的战法，加强了战场指挥，才使各部密切协同，并力杀敌，接连取得了扭转全局的镇南关和谅山大捷，保证了陆路反攻的最后胜利。

（三）武器装备的改善，技术战术的提高，是夺取作战胜利的重要因素

中法战争时期，世界军事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也随着洋务运动的继续开展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军事状况。当时，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特别是海军舰艇方面虽然仍比敌人差得很远，但和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相比，这种差距已经相当明显地缩小了。这是中法战争与两次鸦片战争主要不同点之一，也是法国侵略军不能轻易取胜，并最终在军事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随着战争经验的不断积累，部分中国军队在战术运用上比较地注意了避敌之长，补己之短。如镇南关、谅山大捷过程中，依靠边疆各族人民群众的积极参战和支援，选择有利的地形条件，构筑较坚固的防御阵地，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有把握的决战等。又如基隆、淡水抗登陆作战中，预设埋伏，引诱敌人上岸，待其脱离舰炮火力支援后，与之短兵相接，近战歼敌。再如镇海海岸防御作战中，事先堵塞航道，封锁港口，合理部署兵力，利用事先构筑的防御工事，水陆结合，连续打退了孤拔舰队的进攻和偷袭。又如

《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折·附片》，《中法战争》（六），第459页。

转引自李鸿章《急寄译署》，《中法战争》（四），第229页。

滇军和黑旗军普遍构筑地营，大大减弱了敌人的武器优势，在左育阻援、临洮败敌等战斗中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实践证明，战争是各种因素的全面较量，人的勇敢，加上武器的精良和战略战术的正确，才能取得作战的胜利。

（四）貌似强大的侵略者，不是不可战胜的

中法战争的经过表明，侵略者在军事上的一时强大是不足畏的。法军并不象当时清朝政府中的主和派所形容的那样厉害可怕。黑旗军以简陋的武器装备多次痛歼法寇，冯子材指挥的镇南关、谅山大捷等，都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了这点。纵观战争全局，法国侵略者的有利因素并不多，不利因素却不少，特别是它发动的战争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加之它的战线很长，兵力不足，远隔重洋，补给困难等，使它并不具备必胜的条件。它的战略决策主要是建立在清军不敢打、不能打的基础上的，是一种以军事冒险配合政治讹诈的政策。在作战指导上，法又犯有逐次增兵和分散兵力的错误。如果清军在海上集中舰队，陆上集中兵力，采取积极坚决抗击的方针，实行集中统一的指挥，那么，法军无论在陆地、海上，都将遭到更大的失败。至于它将大量舰只驶入闽江口，长期与中国舰船首尾相连地同泊一处，完全是一种极端冒险的军事赌注。如果清廷稍有胆识，敢于趁涨潮的有利时机先发制敌，则全军覆没的很可能不是福建海军，而是孤拔舰队。法军对基隆的占领及其在台北与清军的长期相持，也是它在军事战略上的一大错误。对此，巴德诺和孤拔均曾深为忧虑，他们“怕这个占领，对于（中国）中央政府不能发生任何效力，甚而使它安了心，因为它知道所有孤拔提督能支配的援军，从此停滞在台湾，不能活动了”。沙俄外长则嘲笑法军攻台不过是“蜂螫象背”而已。法军在北圻战场上的一时得势，主要是利用了清军前敌将领的无能，一旦清军加强了前线指挥，貌似强大的法国侵略军便难免连战皆败，狼狈溃逃。（五）清王朝的妥协求和政策，导致了中国的“不败而败”和两次鸦片战争一样，清统治者在对待中法战争的态度上，也总是和人民的意志背道而驰。尽管他们从自身的统治利益出发，有时不得不下令对侵略者进行某些抵抗，但始终没有坚定的抗战决心；即使在不得已而决心一战时，依然寄希望于外交谈判解决问题。这正好适应了法国侵略者外交讹诈与军事冒险相结合的战略需要，也给了其它资本主义列强和政治投机分子如赫德之流以“调停”为名从中渔利的机会。更为严重的是，清廷的妥协求和政策，大大束缚了前线军民的手脚，招致了战争过程中的多次失利，并造成在作战胜利的情况下反而卑屈求和的可耻结局。本来，当时法国侵略者在普法战争中新败于德，元气稍有恢复便大举向非洲和远东同时扩张，力量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直接进攻中国本土，不但力不从心，而且不可避免地和英、德、美等资本主义列强的在华利益相冲突，在某些方面受到它们的制约（如战区限于长江以南，且不得进攻上海、广州等等）。法国统治集团内部对发动这场侵略战争是有很大大分歧的。它之所以终于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逐步升级，正是利用了清王朝一再妥协求和的软弱立场。

当时，中国虽在海军方面居于劣势，难与法军在海上争雄，但陆军却占有兵力优势，而且桂军、滇军、黑旗军等基本上都是本地人，能适当地自

《巴德诺致茹费理》，《法国黄皮书》，《中法战争》（七），第290页。

然环境，熟悉地形，又有人民群众的支援，只要作战方针正确，选将用兵得当，彻底打败投机冒险、兵力有限的法国侵略军，是完全可能的。无奈清政府在政治上妥协求和，在军事上也就无所作为。因此，前线军民的抗战胜利，不仅未能根本改变中国反抗外国侵略的战略形势，反而成了最高统治者屈辱求和的资本，最后造成“不败而败”。这种历史的悲剧，一方面加深了中国人民的灾难，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暴露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加速了它自己的灭亡进程。

第十章 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7月—1895年10月）

十九世纪末年，随着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大部分土地都被分割完毕。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一面要求重新分割殖民地，一面与老牌殖民强国一起，竞相向政治、经济、军事都很落后，仅在形式上保持独立的国家加紧渗透和扩张。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的中国，自然更加成了列强激烈争夺的主要对象。在所有企图瓜分或鲸吞中国的列强中，日本是野心最为狂妄、威胁最为严重的一个。发生于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就是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由于1894年是农历甲午年，故这次战争通常称为中日甲午战争。

第一节 战前形势

日本原是一个如同中国一样的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自1854年美国用武力强迫它打开门户之后，德川幕府（1603—1867年）相继同美、英、荷、俄、法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促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连绵不断，反对幕府统治和外国侵略，要求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尊王倒幕”、“尊王攘夷”运动迅速展开。1868年1月，日本倒幕派发动政变，迫使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交给十五岁的睦仁天皇。同年，睦仁改元“明治”，称明治天皇。接着，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日本近代史上发生的这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史称“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取得了和中国的洋务运动截然不同的效果，使日本较快地摆脱了半殖民地化的危机，由封建社会迅速地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建成了当时亚洲唯一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国家。然而，明治维新又是一次很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这主要表现在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中保留大量封建因素，特别是天皇制及其军国主义。明治政权实际上是地主与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具有特殊的反动性和侵略性。它对内残酷压迫劳动人民，对外疯狂扩张掠夺，使日本很快走上了“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道路。

早在明治政权成立之初，日本统治集团就确定了以侵略扩张为其最高国策，并炮制了一个把矛头首先指向中国和朝鲜的“大陆政策”。明治天皇在即位当年发表的《天皇御笔信》中，声称日本要“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就是要以武力征服世界这一狂妄野心的明显暴露。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日本统治集团为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立即开始实践其“大陆政策”。1872年，日本政府擅自宣布琉球为其“内藩”。1874年，又以琉球船遇风飘至台湾，被台湾居民劫杀数十人为由，悍然出兵侵袭中国领土台湾。这次入侵，虽然因遭到台湾军民的英勇抗击而未能达到霸占台湾的目的，但腐败的清王朝却向日本赔款五十万两，从而助长了它以后的侵略野心。随后，日本便把侵略的魔爪伸进了朝鲜。

早在明治初年，日本统治集团中就有人积极主张西征朝鲜，掀起“征韩论”。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征韩论”更是甚嚣尘上。朝鲜毗连中国的东北地区，是日本通向中国的桥梁，也是日本海入口处的锁钥阵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日本侵略者把朝鲜视为“保全皇国之基础”，“进取万国之根本”，亟欲占领它。这样做，虽然同俄国在远东的侵略政策发生尖锐的矛盾，但当时俄国在远东的势力有限，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兴建，没有力量阻止日本向朝鲜扩张。英国虽不愿意日本妨害它在中国的侵略特权，但为了钳制俄国南下，不反对日本的侵朝行径，甚至向日本官员示意，“如果日本不把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38页。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奏折中披露了“大陆政策”的基本内容，他说：“窃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既皆实现，惟第三期之灭亡满蒙，以及征服中国全土，使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畏我服我，仰我鼻息等等之大业，尚未能实现，……”（转引自贾逸君：《甲午中日战争》第19页。）

转引自万峰：《日本近代史》第205页。

[日]中塚明：《日清战争的研究》，日文版第15页。

矛头指向台湾而去侵略朝鲜，将得到英国的援助”。德国当时正在觊觎中国和朝鲜，也希望日本发动战争，以便趁火打劫。美国则想“利用日本在远东与英法抗争”，采取“对日友善”的政策。日本正是在这种有利于它的国际形势下，加快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步伐。

中国和朝鲜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清朝统治者同朝鲜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历史关系。这种关系，成为朝鲜政府向清朝政府求援和清政府给予外交以至军事援助的根据，有利于中国和朝鲜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加强联系与合作。但是，当时光绪帝载淳尚未成人，由西太后慈禧垂帘听政。西太后是一个顽固的守旧派，她挥霍无度，置国家命运于不顾。而掌握清朝军事和外交大权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是慈禧的宠臣，在日本侵朝问题上，采取所谓“息事宁人之计”。1876年日本胁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时，李鸿章不但不向日本提出抗议，反而密劝朝鲜政府与西欧各国通商，企图以此牵制日本和俄国。他在给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的信中说：“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至俄国所据之库页岛、绥芬河、图们江一带，皆与贵国接壤，形势相逼。若贵国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而俄亦必随即讲和通好矣。”李鸿章的这种所谓“以敌制敌”的政策，不但没有牵制日本的步步进逼，反而使美、英、德等西方列强趁机侵入朝鲜。

1882年7月23日，汉城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胁迫朝鲜签订《仁川条约》，取得了在汉城驻军的特权。1884年，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机，在朝鲜制造“甲申政变”，又胁迫朝鲜签订《汉城条约》，并于第二年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这个条约肯定了日本有向朝鲜派兵的特权，为中日甲午战争时日本出兵朝鲜提供了借口。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鉴于清朝政府在中法战争中的怯懦表现，主张“速取朝鲜，与中国一战”；一部分人则认为日本实力尚弱，有待加强，同时，深恐战争一起，俄国趁机南进，夺占朝鲜，坐收渔利，因而主张继续积蓄力量，“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三五年后，“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明治天皇采纳了后一种意见。

九十年代初，日本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国内各种矛盾十分尖锐。这时，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眼中，为了摆脱危机，除发动侵略战争外，似乎再没有其它可供选择的余地。于是，1892年组阁的伊藤博文，便抓紧进行侵华战争的临战准备了。

[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上册，中译本第97页。

[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上册，中译本第96页。

李鸿章：《论日本派使入朝鲜》，《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四，第31页。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十六，第15—16页。

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第2—3页。

第二节 日本侵华的军事准备与中国的军事概况

一、日本侵华的军事准备

日本政府为对中国和朝鲜发动一场侵略战争，在军事上进行了长期的准备。

(一) 改革军制

日本的明治政府从诞生之时起，就具有浓厚的军国主义倾向。在“富国强兵”的总方针指导下，加紧进行军制改革，建立和扩充适应近代军备的军队。早在1871年，便从参加倒幕军事行动的部队中挑选精壮八千人，组成“御亲兵”（后改称近卫兵），然后整顿原属各藩的军队，并实行中央集权的“镇台”制，在全国设立东京、东北（今仙台）、大阪、西海（今熊本）四个镇台（后又增设名古屋、广岛两镇台）。1872年，为适应武装力量的发展，废除1869年设立的兵部省，分设陆军省和海军省。1873年初，颁布《征兵令》，用普通义务兵役制取代武士职业兵役制，正式着手建立拥有现役和预备役的近代常备军。1878年，设立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与内阁并行的机关），由它掌管用兵作战等军事大权，政府无权过问。这意味着军国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强化。为适应对外战争需要，日本还陆续创办各种军事学校，制定各种军事条例、章程、官制等，并多次修改陆军编制和《征兵令》。

(二) 扩充军备

早在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就以其详细论述中国军备情况的《邻邦兵备略》呈于天皇，力言为了准备日中战争，扩充军备是当务之急。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之后，参谋本部便着手制订具体的对华作战方案，变本加厉地进行扩军备战活动。至1890年，日本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30%，1892年高达41%强。自1883年至1895年，共开支陆海军费二亿六千九百余万日元。

七十年代前期，日本陆军兵力按平时编制为三万一千余人，战时编制为四万六千余人；海军只有十七艘军舰（大部为木制舰），总排水量为一万三千八百吨。经过大力扩充，至甲午战争时，按新的战时编制进行动员，陆军七个师团（含近卫师团），加上屯田兵团和对马警备队等，总兵力可达二十二万余人。海军则拥有军舰三十一艘，鱼雷艇二十四只，加上四艘代用军舰（武装商船），总吨位达七万二千六百余吨。其中一部分舰只编成常备舰队，其余分属于横须贺、吴、佐世保三个镇守府。

按照新的战时编制，日本陆军每个野战师团的兵力编成为：两个步兵旅团（每旅团辖两个联队，每联队辖三个大队，每大队辖四个中队）、一个骑

镇台系日本师团的旧称，1888年废止，陆军改为师团编制。

参见[日]松下芳男：《近代日本军事史》，日文版第154—155页。

参见日本参谋本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日文版第一卷，第63页。

参见[日]松下芳男：《近代日本军事史》，日文版第140页。

兵大队（辖三个中队）、一个炮兵联队（辖两个野炮大队、一个山炮大队，每大队辖两个中队）、一个工兵大队（辖两个中队）、一个辎重兵大队（辖两个中队）。七个师团总计将佐以下十二万三千余人、马三万八千余匹、野炮一百六十八门、山炮七十二门。根据战时需要，可将若干师团合编为一个军，军配有野战电信队和军兵站部等。中日甲午战争时，日本实际动员兵力达到二十四万零六百一十六人，其中十七万四千零一十七人在国外参战，六万六千五百九十九人留守本土。

在扩军备战过程中，日本当局还抓紧军国主义教育，对士兵灌输绝对尊崇和效忠天皇的思想，培养封建的“武士道”精神。1878年以陆军卿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1882年以天皇名义发布的《军人敕谕》，都是强调军人应该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等等，使之成为穿军装的奴隶，在侵略战争中盲目地为统治集团卖命。

（三）改善武器

明治初年，日本大多使用从英、法、荷等国购入的旧式枪炮，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适应军国主义的需要，建立起本国的军事工业体系。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日本军工生产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生产了一定数量的枪炮弹药和舰船，为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初步的物质保证。

1880年（明治十三年），日本陆军中佐村田经芳对“施涅德”、“李·恩飞”等后装线膛枪作了改进，制成“村田十三年式”单发步枪（口径十一毫米、最大射程二千四百米），后又改进为“村田十八年式”（加大初速，缩短枪身，以减轻重量）。随着无烟火药的使用，又于1889年制成“村田二十二年式”连发枪（口径为八毫米、最大射程达三千一百多米）。甲午战争中，日军步兵除近卫师团和第四师团装备有村田式连发枪外，其余主要使用村田式单发枪。

1885年以后，日军装备的火炮，主要是大阪炮兵工厂生产的口径七十毫米、最大射程为五千米的青铜野炮，和最大射程为三千米的青铜山炮。野炮以六匹马拖行，山炮炮身和炮架可以分解，用三匹马驮载。

从1872年起，日本着手自造军舰，以求改变海军落后的局面。1877—1884年，共自造六百至一千五百吨的军舰六艘，并基本掌握了英法造船技术。以后执行新的造舰计划，在1887—1893年间，造成钢骨铁皮舰和钢质舰共八艘，总排水量为一万三千二百五十吨。与此同时，又从英法等国购入军舰八艘，总计二万七千余吨。这些军舰都具有当时较先进的技术水平，装备有较多的速射炮。它们编入舰队以后，使日本海军面貌为之一新，战斗力大为提高。不过，由于日本财力毕竟有限，无力购买和建造大型装甲舰，而又企图击穿中国北洋舰队七千吨级的装甲舰“镇远”和“定远”，只好在四千二百多吨的“桥立”、“严岛”、“松岛”三艘军舰上装配三十二厘米口径的大炮，开创了世界造舰史上罕见的“奇迹”。

（四）实地侦察

参见[日]林克也：《日本军事技术史》，日文版第103页。

在扩军备战的同时，日本当局还不断派遣大批特务，到中国 and 朝鲜进行实地侦察，搜集有关情报。早在参谋本部成立的第二年，就以“武官”、“留学生”等名义派遣官员来华，刺探清朝政府各方面的情况。1880年山县有朋上呈天皇的《邻邦兵备略》，就是根据派遣人员的见闻与调查编撰而成的。1893年4—7月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等又亲自溜到朝鲜釜山、仁川和中国天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重点窥探中国的军备、士兵训练、军队装备、地形地貌等等。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侵略者早就绘好了包括朝鲜和中国东三省、渤海湾在内的详细军用地图，上面标明了这些地区的每一座小丘和每一条道路。

（五）战备演习

为做好实战准备，日本还多次进行各种军事演习。1889年2月，专门制定了《陆海军联合大演习条例》。在次年3月举行的陆海军联合大演习（“尾参大演习”）中，共动员官兵三万余人、军舰二十艘、运输船三只。1892年10月，又举行有二万七千余人参加的陆军特别大演习，除检验一般内容外，还特地演习了预备役的动员、军队的铁路运输等项目。

1893年5月，日本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至此，侵华战争的各种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二、中国的军事概况

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清朝政府缺乏清醒的估计，始终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没有进行足够的战争准备。但自琉球事件以来，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对于日本的狂妄野心，还是有所察觉的，因此，随着洋务运动的继续进行，不断增强防御能力。特别是朝鲜“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之后，清朝政府加深了对“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的认识。鉴于中法战争的教训，深感有必要加强防御措施，以备不虞。由于日本是东方岛国，因此，清政府为对付日本侵略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始终以筹办海防、建设海军为第一要务。

（一）筹办海防

日本侵台事件之后，李鸿章等见日本学习西方兵制兵法，与英国勾结，“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今虽勉强就范，……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建议清廷从速筹办海防。于是，经过总理衙门奏准，海防问题被列为“当务之急”、“久远之图”。可是，当时中国生产力很低，加之宫廷挥霍，官吏贪污，外债累累，财政拮据，海防筹款非常困难，只好由各省关协款，分年呈解。户部初定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四百万两，实际上历年解送不足半数，以致海防建设进展缓慢。尽管这样，南北洋沿海各口的防务毕竟有所加强，主要是兴建或重修了一些

李鸿章：《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七，第54页。

李鸿章：《筹办铁甲兼请遣使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第26页。

新式炮台，添置了一批新式岸炮，并在重要海口增设水雷营，加强海防兵力。

北洋所辖直隶（今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三省，沿海各口较南洋为少，但由于地近京师，又和日本、沙俄二强相近，故北洋海防始终被置于优先地位。其中直隶的津沽海口更是京畿门户，“北连辽东，有旅顺、大连以为左翼，南走登、莱，有威海卫以为右翼，为北洋第一重镇”。清朝政府一贯重视此处防务，鸦片战争以后，又陆续修筑了大沽、北塘、新城等处炮台，并以芦台为北塘后路，设营驻守。筹办海防以来，李鸿章复于上述各处增筑近代炮台和营垒，增调淮、练各营驻守，并将沿海防区一直延伸至山海关一带。李鸿章又鉴于旅顺和威海卫扼渤海之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其防务同样予以特别关注。从 1882 年起，在旅顺口的黄金山顶，仿筑德国新式炮台，安设巨炮，海口内布置水雷，并于沿岸便于登陆之处择要埋设地雷，后又在大连湾老龙头等处筑炮台多座。在威海卫，则筑南北岸炮台，继又增筑黄泥崖、灶北嘴等新式炮台，并于刘公岛新筑地阱炮台，设二十四厘米口径后膛巨炮于隧道内，用机械升降，颇为灵便，其西之黄岛，水中之日岛，都筑炮台，与南岸相应。经过多年经营，使旅顺和威海卫两处成为两个重要的海军基地。甲午战争前，总计直、东、奉三省沿海各口驻有马、步、水师共五十余营，其中约二万人用于把守沿海各炮台。

（二）建设海军

建设海军是与筹办海防紧密相关的一环。早在筹建之初，李鸿章等就积极主张购买外国铁甲军舰，认为“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所以，尽管筹款至艰，还是耗费巨资，从国外进口了一些舰船。据统计，自 1875 年至甲午战争前，共向英、德等国订购舰艇四十六艘，计有七千吨级铁甲舰二艘、钢甲舰一艘、巡洋舰八艘、炮舰十三艘、鱼雷艇二十二只。与此同时，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造成各种小型舰船二十三艘。这些舰只，大部分编入由李鸿章直接控制的北洋海军。

中法战争中，福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但所损舰只大多属于同治年间福建船政局自造的木质兵船，故对整个海军实力的影响不大。1885 年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成立，标志着筹建海军的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此后数年，除加紧训练南北洋所属各舰外，又添购新舰，并增设水师学堂，抓紧培养海军专门人才。1888 年，海军衙门奏定北洋海军官制，设提督一、总兵二、副将五、参将四、游击九、都司二十七、守备六十、千总六十五、把总九十九、经制外委四十三。同年，拥有舰艇二十五艘的北洋舰队正式成军。由李鸿章推荐，委派淮系将领丁汝昌为海军提督，由留学英国的刘步蟾、林泰曾分任右、左翼总兵兼“定远”、“镇远”舰管带。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共计大小军舰七十八艘（不包括其它武装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4098 页。

李鸿章奏称：“窃查大沽、北塘、山海关各海口所筑炮台，均系石灰和沙土筑成，旅顺口黄金山顶炮台仿照德国新式，内砌条石，外筑厚土，皆欲使炮子陷入难炸，即有炸开，亦不致全行坍塌。”（《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九，第 11 页。）

参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七十七第 40 页及《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第 5 页。

李鸿章：《筹议购船选将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五，第 28 页。

运输船)、鱼雷艇二十四只,总排水量八万余吨,约有炮六百余门、鱼雷发射管近七十具。除北洋舰队外,其余三支舰队船数虽不算少,但大多为陈旧小舰。战争爆发后,参战海军只有北洋舰队和参加北洋操练的广东舰队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舰。

(三) 整顿陆军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陆军一直处于新旧并存的局面,既有防军、练军和勇营,又有早已形同虚设的八旗、绿营,兵制相当混乱。中法战争以后,清廷力图通过裁额并饷等办法改革绿营,并加强防、练各军的整顿。由于偏重海防,陆军的改革和整顿收效不大。直至甲午战争前夕,能出征的部队主要是防军、练军,其中防军保持的编制又比练军较为接近战时水平。按照当时编制,步兵每营定额为五百人,骑兵每营二百六十三人,由于军饷不足和各级官吏吃空额,实际上步兵平均每营只有三百五十人左右,骑兵每营约二百五十人。全国防、练各军(不含八旗、绿营)步兵八百六十二营、骑兵一百九十二营,按上述人数推算,共约三十五万余人,加上战争爆发后临时招募的数十万新兵,总共有近百万军队。但是,这些军队分散于全国各地,由于交通不便和各分畛域等原因,战时很难集中。甲午战争爆发后,实际参战的主要是直隶、山东和东三省的军队,后期从其它各省调来的军队,特别是刘坤一统率的湘军,只是赶上尾声,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四) 改善装备

中法战争以前,中国只能生产几种弹药和水旱雷,以及来福前膛枪、马梯尼后膛枪和林明敦后膛枪等,而且为数不多。中法战争以后,军工生产能力有所提高,为改善清军装备创造了一定条件。但由于自造数量甚为有限,不得不继续以高价从国外进口武器装备。各地将军、督抚各自与外商订购,以致式样参差,弹码互异,彼此不能通用,给作战和后勤供应带来不少困难。甲午战争中,参战清军主要使用前膛来福枪和后膛毛瑟、黎意、马梯尼、哈齐开斯、林明敦等枪。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土枪、抬枪和刀矛等旧式武器。

在备战过程中,清朝政府除仿造和购买近代枪炮等武器以改善装备外,还兴办了一些为军事服务的其它企事业,如铁路和电报等等。

“初,法越事起,以运输不便,军事几败。事平,执政者始知铁路关系军事至要。”于是,把铁路视为“海防要工”,并归入海军衙门管辖。至甲午战争爆发时,已修通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并向关外延伸六十四公里,加上台北至基隆与台北至新竹的铁路,总长约四百公里。尽管为数甚少,但对于增强沿海军事运输能力,改善海陆联防态势,确曾起过不小的作用。

出于同样动机,李鸿章极力倡办电报事业。1880年,于天津设立电报总局。次年,即建成津沪陆线,使南北洋讯息相通,调兵馈饷,大为便捷。至甲午战争前,除沿海各要地之间以外,内地各主要城市之间也陆续建立了电报联系。战争爆发后,李鸿章还提出:“各军相隔较远,应设行营电线,以

通声息；沿海各要口，凭高了远，应设德律风（电话）电线，以报敌情。”

战区内的电信设施，大致如下：由奉天（今沈阳市），西与山海关、天津、北京连接，东经凤凰城与朝鲜义州相连，南经营口、复州、金州达于大连、旅顺；在山东，从成山角西经威海卫、烟台至莱州，通过济南、济宁分别与天津、上海相连；在朝鲜境内，以汉城为中心，北经平壤、义州与中国相连，东北经加平、春川、狼川直达元山，西通仁川，南达釜山，再通过海线与日本连接。

第三节 战争的爆发和双方战略方针

一、战争的导火线

1894年春，朝鲜全罗道爆发农民起义。在东学党的领导下，起义者举起“尽灭权贵”、“逐灭洋倭”的革命旗帜，反对国内封建剥削，反对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6月1日，起义军占领全罗道首府——全州，各地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势力逐渐波及全国，朝鲜封建王朝惊恐万状。

东学党起义后，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认为借口侵朝的良机已到，不可失之交臂。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也向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建议：“东学党势甚猖獗，韩兵不能镇压，目下趋势必向清国请求援兵，清国政府必容纳此种请求。我国如欲保护在韩臣民，维持帝国均势，殊有出兵之必要。”

中国方面，李鸿章开始并不主张出兵朝鲜，但当时清朝政府派驻朝鲜的商务大臣袁世凯积极主张派兵“助剿”，并援引日本驻朝使馆译员郑永邦所说“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府必无他意”等语，鼓动李鸿章派兵赴朝。这样做正好上了日本侵略者的圈套，因为中国一旦出兵，日本便有了出兵的借口，进而把清朝政府拖入预设的战争陷阱中去。

6月4日，李鸿章接到朝鲜政府关于“酌遣数队，速来代剿”的正式请求，随即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连同已在仁川的“平远”号共计三舰），并命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统兵二千余人，由海道赴朝。6月6日，聂士成所率前锋九百人搭乘招商局轮船“图南”号自大沽出发，8日抵牙山口后，换乘驳船，9日于白石浦登陆，进驻牙山。叶志超自率后队一千五百余人，搭乘“海晏”、“海定”号，6月8日自山海关出发，于11日抵达朝鲜，登陆后，与聂部合屯牙山县。在派兵赴朝的同时，按照中日天津条约的规定，由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将出兵情况通知日本外务部，并表明一旦完成镇压东学党起义后，随即班师回国。

在中国派兵赴朝之前，日本内阁会议已于6月2日作出决定，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名义出兵朝鲜，并立即下达秘密动员令。日本侵略者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政策，命正在休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返回朝鲜，由海军陆战队四百余人以“护送”公使为名，直入汉城。接着，又悍然派出一个混成旅团（以驻广岛的第五师团第九旅团为基础，计有第十一和第二十一两个步兵联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野战炮兵大队、一个工兵中队，以及辎重队、卫生队和两个野战医院，共八千余人），由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领赴朝，占据汉城至仁川一带战略要地。海军则派出“松岛”（常备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的旗舰）、“千代田”、“高雄”、“赤城”、“筑紫”、“大和”、“八重山”和“吉野”等军舰，控制海港釜山和仁川，监视海面，并布设水雷障碍等。

在清军既已前去朝鲜，日军剑拔弩张，战争迫在眉睫之际，李鸿章并未采取紧急措施，做好应战部署，仍然寄希望于“以敌制敌”，徒劳地奔波于

日本参谋本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日文版第一卷，第95页。

《北洋大臣来电一》，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中日战争》——第二册，第546页。

《北洋大臣来电》，《中日战争》（二），第547页。

俄、英等国驻华公使之间，乞求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出面“调停”，结果四处碰壁。他明知“日兵分驻汉、仁，已占先著”，非但不与抗争，反而于7月初将在朝军舰全部调回。这一行动，在战略上是一大失策。因为放弃仁川，无异于给日军提供了由海道进犯中国的前进基地，并使牙山清军处于孤立无援的严重地位。

日本方面，挑起战争是其既定方针。当清朝政府以“韩乱”已息，要求根据中日天津条约同时撤兵时，日本政府不仅不同意，反而无理提出于涉朝鲜内政的所谓“改革方案”，故意制造纠纷。同时，日本政府又以默许英、俄等国的在华利益为条件，换取了列强在中日两国冲突中采取有利于日本的“中立”立场。7月14日，日本政府见其阴谋外交得逞，而且军事上已占先着，便照会清政府，断然拒绝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兵的建议，反诬中国政府“有意滋事”，声言“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企图把中日开战的责任归咎于清政府。实际上，陆奥宗光早在7月12日即已电告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随后，日本海军主力舰艇于佐世保军港集结，成立联合舰队（由常备舰队和西海舰队合编而成，伊东祐亨任司令官），下分本队和第一、第二游击队。7月23日，日军闯入朝鲜王宫，非法囚禁朝鲜国王李熙及闵妃，诱胁大院君李昱应主持国事，并强迫朝鲜宣布废除过去同中国所签订的一切条约。25日，日军在丰岛附近偷袭中国舰船，并进犯牙山清军，正式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

二、战争的序幕

（一）丰岛海战

由于日本侵略者蓄意挑衅，清廷不得不责令李鸿章速筹战备。7月16日，光绪帝又电谕李鸿章“断不可意存畏葸”，并严厉指出：“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李鸿章见乞求列强调停的希望破灭，又受到光绪帝的严厉责问，只得增兵赴朝。他派出四支援军，即：从天津出发的盛军总统总兵卫汝贵率领的盛军六千余人，从旅顺出发的宋庆所部提督马玉昆率领的毅军二千人，从奉天出发的奉天练军统领总兵左宝贵率领的奉军三千五百人，从奉天出发的奉天盛军总统丰升阿率领的吉军、盛军一千五百人。上述各军共约一万三千余人，均取道辽东过鸭绿江进军平壤。由于道路迂远，不能救牙山之急，李鸿章决定从天津一带再抽兵二千余人，由海道前往牙山，认为“合叶原队共五千人，可当一面”。因轮船招商局般只正在运载盛、毅两军赴大东沟（今东沟），只得雇英商“爱仁”、“高升”、“飞鲸”三轮应急。7月21日至23日，“爱仁”载兵一千二百人，“飞鲸”

李鸿章：《复译署》，《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十五，第49页。

《日本使臣小村照会》，《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第32页。按：小村，即小村寿太郎，时为代理公使。

[日]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34页。

《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第35页。

《北洋大臣来电四》，《中日战争》（二），第631页。

载兵约五百人，“高升”载兵九百五十人，先后由大沽口开出。为保证登陆安全，由副将方伯谦率军舰“济远”、“广乙”、“威远”自威海卫开赴牙山。24日，“济远”等三舰及“爱仁”、“飞鲸”两轮先后抵牙山内岛，部队登陆。

当时，在天津潜伏多年的日本间谍石川五一等勾结汉奸刘芬，获得了援牙清军的出发日期及航渡运载等情况，密告日军。日军决定在清军增援部队只到达一部分的时候，采取偷袭手段，不宣而战。7月23日上午，日本联合舰队从佐世保启航，次日到达牙山以南的群山浦。伊东祐亨命第一游击舰队司令坪井航三率军舰“吉野”、“浪速”、“秋津洲”向牙山湾搜索前进，伺机攻击。24日这天，停泊在仁川的英舰透露，日舰将要截击中国舰只。这时，北洋舰队主力远在威海卫，“高升”号和运送饷械的“操江”号则已离开大沽，正在赴牙途中。当日20时和21时15分，“爱仁”、“威远”先后离牙返航，“济远”、“广乙”两舰继续帮助“飞鲸”赶卸兵马。25日晨4时，“飞鲸”驳卸将毕，“济远”、“广乙”两舰离牙，拟于途中告知“高升”、“操江”掉头西归。行抵丰岛西南时，突遭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的袭击，“济远”、“广乙”被迫还击。两舰爱国官兵在敌强己弱的情况下，沉着应战。“广乙”号是福建船政局自造的排水量仅有一千零三十吨的炮舰，火力不强，开战不久即受重伤，船身倾斜，退出战斗后在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纵火自焚。“济远”号是一艘二千三百吨的德制钢甲巡洋舰，配备有舰炮十八门，并有鱼雷发射管四个。战斗中，船舵被毁，便向西退走。日舰“吉野”尾追不舍。

9时许，正当“济远”向西退走时，“高升”号向东驶来，日舰“浪速”号鸣炮令其停航。在后面不远的“操江”号见状即调头西返。坪井航三命“浪速”号俘虏“高升”，令“秋津洲”追赶“操江”，以自己乘坐的“吉野”号继续追击“济远”。“济远”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躲在舱内铁甲最厚的地方瑟缩不出，并下令悬挂白旗投降（一说诈降）。舰上士兵极为愤怒，水手王国成、李仕茂等毅然发尾炮击中“吉野”，使它不敢再追。

“济远”向西退却途中，曾赶上调头西返的“操江”号（因“操江”时速只有八海里），但方伯谦只顾自己逃命，致使“操江”号被日舰“秋津洲”掳去。

“高升”号上清军全体官兵面对日舰“浪速”的威逼，坚贞不屈，宁死不降。13时许，日舰“浪速”号鱼雷、舰炮齐放，“高升”号上的清军官兵以步枪还击。不久，“高升”号沉没，船上清军九百五十人，除二百五十余人后来得救外，其余全部死难。

（二）成欢之战

在日舰进行丰岛偷袭的同时，日大岛旅团长率主力三千余人，携山炮八门以及辎重、电信、野战医院等，自汉城向南开进，企图消灭牙山一带清军，以解除尔后北进时的后顾之忧。而丰岛偷袭，则正是为了阻止清军从海道增援牙山，保证其陆路战斗的首战获胜。

孤守牙山一带的清军（加上由海道新到的援军，共计八营，约四千一百

参见[日]中塚明：《日清战争的研究》，日文版第226页。

余人)失去了与天津的联系,又鉴于滨海地形开阔,不利防守,因此,由总兵聂士成率军三营,于7月26日移驻牙山东北五十里的成欢驿。聂士成得知日军已进抵距成欢四十里的振威,立即请援于叶志超。27日,营官江自康、许兆贵率队前往增援。28日晨,叶志超也赶到成欢。聂士成鉴于海道已阻,援军断难飞渡,牙山绝地,不可再守,而公州背山面江,形势险要,建议叶志超马上去占据。并且说:“幸而胜,公为后援;不胜,犹可绕道出。”这时,日军已进逼素沙场,离成欢仅十里之遥。于是,叶志超率叶玉标一营进据公州,聂士成率六营扼守成欢,另留一营守牙山。

成欢驿东西皆山,北通汉城,南达公州。北面临河,南北两岸皆水网沼泽地。有桥一座名“安城渡”,为南北往来隘道。清军在成欢驿东面山顶筑垒自固,西面山顶则设有炮兵阵地,控制日军必经的驿道。

28日夜,日军自素沙场分两路进犯:一从大道进攻,钳制清军主力;一从东面迂回,进攻清军右侧。当夜,武备学堂学生于光炘等冒雨侦察敌情,发现日军偷袭,立即报告聂士成,并率兵一部预伏安城渡桥侧,控制要点。半夜,日军右路前锋进抵安城渡桥北,于光炘等奋力阻击,杀伤不少日军,使其前锋败退。可是,聂士成未能及时增援,而日军后队又至,于光炘等英勇抵抗,力战牺牲。29日黎明,日军攻占成欢西北面山坡,聂士成率主力抵抗,战斗甚为激烈。正在这时,日军迂回部队突然袭占清军右翼之东北面山坡,并发炮轰击清军东面诸垒。经过激战,清军不支,聂士成率队退往公州。这时,叶志超已放弃公州向北逃跑,于是两部合军北走。

日将大岛原来判断清军必退牙山,因而率队向牙山追击;及抵牙山,不见清军踪影,便留一小队驻防该处,自率大队返回汉城。

叶志超逃跑时,因害怕同日军遭遇,绕道远离汉城的朝鲜东部山区,经清州、忠州、堤川、原州、狼川、金化、平康、伊川、遂安、祥原,渡大同江抵平壤,途中历时近一个月。当时正逢炎夏,“残军饥疫死者相属”,而叶志超竟无耻地向李鸿章谎报战功,诡称“沿途叠败倭兵”。于是清廷“论功行赏”,嘉奖员弁数百人,赏军士银二万两,并提升叶志超为平壤各军的总指挥。

日军丰岛偷袭,并进犯驻朝清军,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但是,李鸿章不但不积极准备抗战,反而认为“高升系怡和商船,租与我用,上挂英旗,日敢无故击沉,英人必不答应”,幻想英国出面干涉。可是,随着后来战事的发展,英国见日方处处居于优势,竟然不顾事实和国际公法,声称7月23日日军侵入朝鲜王宫之时,即中日开战之日,“高升”号系“开战后”驶离大沽口,因此责任不在日方。清政府不敢抗争,最后竟由出面租船的轮船招商局赔偿英商损失。

三、中日宣战和双方战略方针

清政府见日本侵略者已公然揭开战幕,被迫于8月1日对日宣战,日本也于同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一),第18页。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一),第19页。

李鸿章:《寄译署》,《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十六,第32页。

早在宣战之前，日本即已成立战时大本营，统一筹划和指挥陆海军作战事宜。大本营首席长官由参谋本部总长陆军大将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担任（1895年1月炽仁亲王死后，由陆军大将小松宫彰仁亲王代理），由参谋本部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和海军军令部长中牟田仓之助（7月17日，中牟田仓之助免职，海军中将桦山资纪接任）二人共同辅佐。在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首相等的亲自参与下，日本战时大本营在战前已制订好侵略中国的“作战大方针”，即：以主力在山海关附近登陆，于直隶平原同清军主力决战，夺取北京。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日军制定了如下作战计划：首先派陆军第五师团进占朝鲜，钳制和击败在朝清军；海军则以联合舰队击破中国北洋舰队，迅速夺取黄海和渤海制海权。下一步则视海军胜败情况而定：第一，如海军主力决战获胜，则将陆军主力输送至渤海湾（以山海关为主）登陆，实施直隶平原决战；第二，如果海上决战不分胜负，中日双方均不能掌握制海权，就用陆军主力侵占整个朝鲜；第三，如果海上决战失败，清军控制了制海权，本国又受威胁，则尽力援助在朝的陆军，而把陆军主力留守本土，以防清军反攻。日军这一作战计划的核心是，消灭北洋舰队，夺取黄海、渤海的制海权，控制海上运输线，进而与清军进行直隶平原决战。

清军方面，事先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为“后党”和“帝党”两派。光绪帝自1889年“亲政”以来，力图有所作为。他与户部尚书翁同和为首的“帝党”，竭力主战。而实际把持朝政的西太后慈禧与李鸿章为首的“后党”，为了保持实力，竭力主和，积极推行“屈辱求和”、“避战自保”的政策。由于政治腐败和内部纷争，清廷始终不能协调一致地统筹全局，因而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又未制定相应的战略方针，以对付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开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所谓“调停”。当朝鲜形势极度紧张，全国舆论和清军某些爱国官兵强烈要求清政府积极抗战时，主和派既不敢公开反对，又不愿认真备战。直至战争爆发之后，清王朝为形势所迫，才临渴掘井，在宣战诏书中提出了一个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根据这一方针，决定增调陆军赴朝，先在平壤集中，然后南下驱逐在朝日军；以海军各舰队分守各自防区内的海口，北洋舰队即集结于黄海北部，扼守渤海海峡，策应在朝清军，并确保京畿门户的安全。

参见[日]誉田甚八：《日清战史讲授录》，中译本第7—8页。

《上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六，第2—3页。

第四节 平壤之战（1894年9月）

一、 双方作战方针及部署

日本大本营为迅速获得制海权，于宣战的次日（8月2日）即命令联合舰队搜索并击破中国北洋舰队，以求年内实施其“作战大方针”的重点——直隶平原决战。不久，得知大批清军将于平壤附近集中并相机南下，于是，日军大本营已无暇等待其海战的结果，乃命令第五师团的其余部分立即赴朝。8月14日，日本大本营根据其联合舰队未能与北洋舰队决战，并为检修舰只而移泊朝鲜半岛南端的长直路等情况，确认年内已无法实行直隶平原决战的原定计划，必须等到来年解冻之后再作考虑，于是重新制定冬季作战方针，即：增派第三师团（先编成混成第五旅团）与已在汉城附近集结的第五师团合编为第一军，以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司令官，执行北攻平壤，相机进攻奉天，吸引直隶清军主力出援的任务；同时准备组建第二军，以待机攻占辽东半岛，为将来实施直隶平原决战建立进军基地。

山县有朋到达朝鲜（9月12日于仁川登陆）以前，在朝日军由第五师团长陆军中将野津道贯统率。9月2日，野津道贯等议定，以第五师团及第三师团之一部，共约一万五千人，分四路进攻平壤。其部署是：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混成第九旅团（步骑约五千、炮二十门）由汉城出发，沿大道指向平壤东南，从正面进攻，牵制清军。野津道贯自率步兵第二十二联队、十二联队及骑兵、工兵、炮兵各一部（步骑约五千、炮十二门）继后，渡大同江之下游，进攻平壤西南。第十旅团长陆军少将立见尚文率步兵第十二联队之第一大队、第二十一联队之第二大队及骑兵、炮兵各一部（步骑约二千、炮六门），自朔宁经新溪、遂安、祥原、江东，渡大同江进攻平壤东北，称“朔宁支队”。陆军大佐佐藤正率步兵第十八联队及骑兵、炮兵、工兵各一部（步骑约三千、炮十二门）自朝鲜东北部的元山登陆（称“元山支队”），经文川、阳德、成川（今新成川南）、顺安，绕攻平壤北部，截断清军后路。

日军根据这一分进合击的作战计划，预定9月15日包围平壤，发起总攻。

早在8月上旬，清政府派出的四支援军先后抵达平壤。丰升阿、卫汝贵等以兵力不足、后路空虚为由，要求“先定守局，再图进取”。李鸿章也认为“非有劲旅三万人，前后布置周密，难操胜算”，“目前只能坚扎平壤，扼据形胜”。尽管清廷急于要按原定方针向南进军，多次电催李鸿章饬令各军“相机进取”，“直指汉城”，李鸿章总是借故延宕，以致前敌各军既不南下进攻汉城，又不择险据守，互为策应，“而以二十九营万四千余人聚平壤，置酒高会，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坐待日军来攻。8月下旬，叶志超抵达平壤。这个败军之将被任命为平壤各军总统，“一军皆惊”，进一步破坏了士气。叶志超对于军事更加漫无布置，身为前线统帅，不亲自组织侦察，及时获取准确的情报，主要依靠天津的电报通报，因而对前线敌人情况很不了解，只知道日军主要从中和大道来攻，而不知其从几个方向同时包围平壤。9月5日，叶志超与诸将议定，以一部兵力监视元山方

《北洋大臣来电二》，《中日战争》（三），第29页。

李鸿章：《寄译署》，《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十六，第48页。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一），第19—20页。

向之敌，以主力南下迎击自黄州北进之日军。6、7两日，部队已按计划出发。此时，叶志超得到日军一部已抵成川的消息，因顾虑平壤后路发生危险，于是突然改变决心，急忙将部队调回，仓卒作出防御平壤的部署，而此时各路日军已完成了对平壤的合围。

平壤是朝鲜的旧都，山环水抱，形势险要，城墙高约十米，墙基厚约七米，南北绵亘十余里。大同江自城东至西南流过。城有六门：南为朱雀门，西南为静海门，西北为七星门，北为玄武门，东为长庆门，东南为大同门。长庆、大同二门紧靠大同江。玄武门跨牡丹台山修筑。由于牡丹台紧靠城墙，因而成了守卫平壤的命脉所在。

清军依城划分各军防区：城北方面，由左宝贵所部奉军、丰升阿所部盛军及江自康之仁字两营防守；城西方面，由牙山军（即叶志超原来所部）防守；城南方面，由卫汝贵所部盛军及马玉昆所部毅军之一部防守；城东南大同江东岸，由马玉昆所部毅军防守，有浮桥一座沟通两岸联系。叶志超坐镇城内，居中调度。

二、作战经过

9月13日，四路日军均已逼近平壤，其中元山支队已进至顺安，切断了清军退往义州的后路。

14日清晨，日军元山、朔宁两支队一齐发起攻击，占领了城北山顶数垒。左宝贵亲自督队争夺，未能取胜，便率部入城，用大炮轰击敌人。日军坚伏不退。当晚，叶志超主张弃城撤退，遭到左宝贵的坚决反对。左宝贵派亲兵监视叶志超，防止其逃跑。

15日拂晓前，日军发起总攻。大同江东岸的日军混成第九旅团分三路进攻平壤城东南。扼守大同江东岸的马玉昆所部毅军奋力抵抗，与敌展开肉搏战，自清晨激战至午后，终于打退了东路日军的进攻。北路战事也十分激烈。日军朔宁、元山两个支队又于当天拂晓发起进攻，左宝贵亲自登玄武门指挥，士兵拚死拒敌。战至上午，日军先后攻破玄武门外的五座堡垒，并向玄武门猛烈突击。左宝贵为了表示与城共存亡的决心，身穿黄马褂，继续指挥。11时，左宝贵中炮阵亡，士气大挫，玄武门遂被日军攻占。叶志超随即悬白旗乞降，并下令撤军。当时，马玉昆部正与东路日军相持于大同江东岸，偷袭平壤西南的日军第五师团主力也被卫汝贵所部击退，伤亡惨重。

正当东西两路清军准备乘胜出击的时候，忽闻北路失利，并接到叶志超的撤军命令，马玉昆、卫汝贵只得率部回城。日军准备宿营，未再前进。当晚，叶志超率守军乘夜暗仓皇逃出平壤。日军于城北山隘堵截，清军伤亡二千余人，被俘数百人。途经顺安，又遭日军拦击，死伤枕藉。

16日，叶志超等逃至安州，始与吕本元、聂士成等部会合。安州距平壤九十公里，北倚清川江，南有群山依托，城垣高大，是平壤以北的第一重镇。聂士成建议叶志超凭借安州有利地形，阻敌北犯。叶志超不同意，继续率军向义州狂逃。19日，李鸿章曾电告叶志超驻守义州，不准退往鸭绿江以西。三天以后，李鸿章又认为与其株守义州孤城，不如全线撤回，于是，清军于22—24日放弃了义州等战略要地，退过鸭绿江。

平壤之所以轻易陷落，关键在于前敌总指挥不得其人。叶志超于成欢之战打响时，立即弃军逃奔平壤；惊魂未定，又以谎报战功而被任命为平壤各

军总统，由于不孚众望，“各将领均不受节制”。他庸懦怯敌，既不敢驱军南下，也没有保卫平壤的决心，一经接战，再次率先逃跑，致使军心大乱，“凡有大小炮四十尊，快炮并毛瑟枪万数十杆，将弁私财，军士粮饷，军资、器具、公文、密电，尽委之而去”。此外，清军纪律甚差，不能与当地人民呼吸与共，也是平壤失守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来，由于中朝两国同遭日寇侵略，共同的命运把两国军民联系在一起。当清军刚到平壤时，朝鲜人民夹道欢呼，以各种物资慰劳、供给清军；朝鲜官员也盼望清军多打胜仗，“其王京（汉城）自大院君以下，时密输倭人消息于我，日盼我军进趋汉城”。可是，清军入朝后不但无所作为，而且侵害群众利益，致使朝鲜人民大失所望，不再尽力支援，这就大大影响了保卫平壤的作战。

《军机处寄帮办北洋军务四川提督宋庆上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十一，第 33 页。

李鸿章：寄译署，李文忠公全书·电稿 卷十六，第 48 页。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一），第 23 页。

第五节 黄海海战（1894年9月17日）

一、丰岛海战以后双方舰队的行动

丰岛海战以前，日本政府“预料陆战可操胜券，但对海战的胜败如何尚抱疑虑”。日舰丰岛偷袭得逞，使日本海军增强了战胜中国海军的信心，自那以后，联合舰队一直活动于朝鲜海域，一面掩护后续陆军和军械粮秣的海上运输，一面声援在朝日军的陆路作战。8月5日，联合舰队接到日本大本营关于搜索和击破中国舰队的命令，伊东祐亨随即于8月7日率舰队从隔音岛出发，驶往黄海西部海面，甚至闯到威海卫和旅顺军港，进行搜索和挑战。

北洋舰队方面，7月25日的丰岛海战只是稍有损失，对整个舰队的战斗力并无多大影响。战后第二天，李鸿章电令丁汝昌“即带九船开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但同时又说：“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

丁汝昌于7月27日率队由威海卫出发，由于受李鸿章“保全坚船”指示的束缚，不敢前往汉江口，仅至大同江口外即返回威海卫基地，以“未遇倭兵商各轮”敷衍了事。中日宣战的当天（8月1日），李鸿章又电告丁汝昌：“总署催汝统铁、快各船往仁川附近……相机截击”。但又继续强调：“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于是，丁汝昌于出发前复电李鸿章，以无侦察快船、又少快炮等为由，言明不能去汉江口，只宜“远巡大同冰洋，遇敌痛剿；近顾北洋门户，往来梭查”。李鸿章当即转告总理衙门，称丁所言“似系老成之见”。8月5日，清廷得知叶志超军已经溃败，预料日军必将北攻平壤，于是令北洋舰队专顾大同江口一带海面的安全，以便由海路增援平壤。8月9日，丁汝昌第三次率队出巡。第二天黎明，日舰二十余艘突然现于威海卫港外，遭到海岸各炮台的猛烈炮击。当晚，日舰又窜至旅顺口外，与城头山炮台交相炮战。清廷闻知威海、旅顺一带洋面有日舰活动，甚为惊骇，急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速回北洋海面，跟踪击剿”。8月23日，清廷进一步指示：“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此后，北洋舰队再未远巡，不出北洋一步。这样，日本海军便完全控制了朝鲜仁川、大同江口等重要港口，占领了从海路进攻中国的有利前进基地。

由于丁汝昌多次率队出巡无功，受到朝野不少人的攻击。8月26日，光绪帝下令将丁汝昌革职，但仍“戴罪自效”。李鸿章不得不上奏为丁汝昌辩护，同时乘机正式提出“保船制敌”的方针，进一步强调“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建议清廷放弃争夺制海权。他认为，“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因而主张北洋舰队“不必定与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从此，北洋舰队更加陷入了消极自保的被动局

[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70页。

李鸿章：《寄丁提督》，《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十六，第31页。

上海图书馆藏《李鸿章未刊稿（抄本）》，电稿八。转引自《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第53页。

《北洋大臣来电一》，《中日战争》（三），第19页。

《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中日战争》（三），第35页。

《军机处电寄丁汝昌谕旨》，《中日战争》（三），第51页。

《直隶总督李鸿章复奏海军提督确难更易缘由折》，《中日战争》（三），第72—73页。

面。

二、海战经过

9月上旬，清廷鉴于平壤将有大战，拟派兵增援。为了及时到达前方，决定将驻防大连一带的总兵刘盛休所部铭军八营四千人由海道运至大东沟，然后转由陆路赴朝。这样，海军掩护，责无旁贷。李鸿章乃令丁汝昌率舰队护航。9月15日上午，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主力抵达大连湾。其编成如下表：

舰名	舰种	排水量 (吨)	航速 (节)	武器		管带
				炮	鱼雷管	
定远	装甲炮塔舰	7,335	14.5	22	3	右翼总兵刘步蟾
镇远	装甲炮塔舰	7,335	14.5	22	3	左翼总兵林泰曾
来远	装甲炮塔舰	2,900	15.5	17	4	副将邱宝仁
经远	装甲炮塔舰	2,900	15.5	14	4	副将林永升
致远	巡洋舰	2,300	18	23	4	副将邓世昌
靖远	巡洋舰	2,300	18	23	4	副将叶祖珪
济远	巡洋舰	2,300	15	18	4	副将方伯谦
广甲	巡洋舰	1,296	15	10	0	都司吴敬荣
超勇	巡洋舰	1,350	15	12	0	参将黄建勋
扬威	巡洋舰	1,350	15	12	0	参将林履中
平远	巡洋舰	2,100	11	11	1	都司李和
广丙	巡洋舰	1,000	17	11	0	都司程璧光
镇南	炮舰	440	8	5	0	游击蓝建枢
镇中	炮舰	440	8	5	0	都司林文彬
福龙	鱼雷艇	115	23	2	2	都司蔡廷干
左队一号	鱼雷艇	108	24	6	3	守备李仕元
右队二号	鱼雷艇	108	18	2	2	守备刘芳圃
右队三号	鱼雷艇	108	18	2	2	守备曹保赏

9月16日2时左右，铭军搭乘招商局“新裕”、“图南”等五艘轮船，在北洋舰队的护卫下，由大连出发，午后抵大东沟。“平远”、“广丙”泊于港口，由“镇南”、“镇中”两炮艇护送进港，“定远”等十舰均泊于港外十二海里之大鹿岛东南。铭军四千人连夜上岸，安全到达目的地。不过，此时平壤已失，铭军无法起到应援的作用。

日本联合舰队早想与北洋舰队决一雌雄，当得知中国海军将护送陆军赴朝的消息后，便于9月14日午后由仁川港出发，15日到达大同江口。因不见有中国舰船，伊东祐亨命部分舰只溯大同江支援第五师团进攻平壤，其余舰只暂泊于小乳麁角的东北。伊东祐亨判断，北洋舰队有可能护送陆军往鸭绿江口一带，于是不待全舰队集中，立率军舰十二艘，于16日下午出发，向黄海北部的海洋岛方向航进，17日晨抵达该岛附近。其战斗序列如下表：

舰名	舰种	排水量 (吨)	舰速 (节)	武器		舰长
				炮	鱼雷管	
松岛	海防舰	4,278	16	29	4	海军大佐尾木知道
严岛	海防舰	4,278	16	31	4	海军大佐横尾道昱
桥立	海防舰	4,278	16	20	4	海军大佐日高壮之丞
扶桑	巡洋舰	3,777	13	21	2	海军大佐新井有贯
千代田	巡洋舰	2,439	19	27	3	海军大佐内田正敏
比睿	巡洋舰	2,284	13.2	18	2	海军少佐櫻井规矩之左右
赤城	炮舰	622	10.25	10	0	海军少佐坂元八郎太
西京丸	代用巡洋舰	4,100	15	4	0	海军少佐鹿野勇之进
吉野	巡洋舰	4,216	22.5	34	5	海军大佐河原要一
高千穗	巡洋舰	3,709	18	24	4	海军大佐野村贞
秋津洲	巡洋舰	3,150	19	26	4	海军少佐上村彦之丞
浪速	巡洋舰	3,709	18	24	4	海军大佐东乡平八郎

其中“松岛”(旗舰)、“严岛”、“桥立”、“扶桑”、“千代田”、“比睿”、“赤城”、“西京丸”为本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为第一游击队。

9月17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北洋舰队正准备起锚回航旅顺时,发现日本舰队自西南驶来,丁汝昌随即命令舰队起锚迎战。这时,双方舰队的力量对比如下表所示:

国别	参战军舰	装甲情况		总排水量 (吨)	平均航速 (节)	鱼雷发射管数	火炮			鱼雷艇数
		装甲	非装甲				总数	21厘米以上	20厘米以下	
中国	12*	5	7	34.466	15.34	27	195	23	172	2
日本	12	3	9	40.840	16.33	36	268	11	257	0

*包括后来参战的“平远”、“广丙”二舰。

从上表可以看出,日本联合舰队吨位总数大,航速快,机动性好,火炮多,攻击力较强;北洋舰队拥有两艘巨型装甲战列舰,重炮多,防护性能较好。

战斗之前,丁汝昌曾规定三条训令:“1、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2、始终以舰首向敌,借保持其位置,而为基本战术;3、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之。”

北洋舰队开始成“并列纵阵”(“定远”、“镇远”两舰居前),以每小时五海里的速度向西南方向航进。各舰爱国官兵,“皆同仇敌忾,凝视敌队,自负决心,勇气百倍”。日舰则以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艘速率最高的巡洋舰为先锋,伊东祐亨自乘旗舰“松岛”,率领本队“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跟进,12时许,又将武装商船“西京丸”及小炮舰“赤城”移至本队的左侧(非战斗一面)。丁汝昌、刘步蟾及总查德国人汉纳根等在“定远”舰前方的飞

《北洋海军总查汉纳根致北洋大臣报告》,转引自《海事》月刊第八卷,第五期,第63页。

归屿:《中日海战评论撮要》,《海事》月刊第十卷,第三期,第39页。

桥上，见日舰成“单行鱼贯阵”（单纵队）扑来，决定采取以主舰居中的“夹缝雁行阵”（交错配置的双横队）应战。由于阵形尚未完全组成，旗舰即以每小时八海里的速度前进，“济远”、“广甲”、“超勇”、“扬威”等后续舰斜行追赶不及，以致形成半月形而类似“后翼梯阵”（又叫“燕剪阵”）。因此，日方认为，北洋舰队当时所列队形“似为不规则之单横阵，又似后翼梯阵，而‘定远’、‘镇远’居中……”。

日舰第一游击队开始指向北洋舰队的中央，约距离一万二千米时，稍向左变换航向，然后又按原方向前进，准备首先进攻北洋舰队的右翼。本队也取大致相同的航向继进。

17日12时50分，双方舰队相距约五千七八百米，“定远”首先发主炮攻击，其余各舰亦相继开炮。弹丸落于日舰第一游击队近旁，但均未命中目标。当时正值微弱东风，硝烟弥漫于北洋舰队之前，日舰趁机以每小时十四海里的速度向前急驶。当前出到离北洋舰队右翼约三千米时，日第一游击队四舰陆续以其右舷速射炮猛轰“扬威”、“超勇”。13时5分，彼此仅距一千六百米，日舰以低弹道向“超勇”、“扬威”实施抵近射击，二舰相继起火，退出战斗。日舰“吉野”也中弹起火，但很快被扑灭。约13时30分，“超勇”沉没。这时，“平远”、“广丙”和两艘鱼雷艇已赶到，但因火力均不强，未能改善右翼态势。

当第一游击队绕攻北洋舰队右翼时，本队也与北洋舰队主力交相炮击。北洋舰队虽然阵形已被打乱，但各舰随时变换方向，力求使舰首对敌，以充分发挥主炮威力。“‘定远’猛发右炮攻倭大队各船，又发左炮攻倭尾队三船”。日舰“比睿”、“赤城”因速度迟缓掉队，正好被北洋舰队所截击。13时10分，“比睿”突然改变航向，向右急转舵，冒死从“定远”、“来远”之间窜逃（距“定远”约一千米，距“来远”约四百米）。“定远”、“来远”以及“经远”等舰乘机予以夹击，重创“比睿”，迫使其向左转舵，逃出包围圈，追赶本队。“赤城”企图营救“比睿”，受到“来远”等舰的猛烈炮击，其舰长坂元八郎太等多人当场毙命。“西京丸”也受重伤，“舵已轰断，舟中观战之大吏（按：即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几被华军连船擒去”，“后遁至济物浦（仁川），丸中人如已赴法场重邀恩赦者然”。

日舰第一游击队掠过北洋舰队右翼以后，又向左作一百八十度回航，企图利用其速度快、便于机动的优点，配合本队作战。但本队旗舰“松岛”发信号令其归队，便又向左作一百八十度回航。于是，北洋舰队主力舰只对准第一游击队右侧后方，猛烈炮击。14时15分，第一游击队刚刚追上本队最后一舰“扶桑”，又见“西京丸”发出“‘比睿’、‘赤城’危险”的信号，只得再次向左作一百八十度回航。与此同时，本队已绕至北洋舰队的背后，与第一游击队形成夹击之势。这样，北洋舰队便陷入了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队形更加混乱。

战斗过程中，丁汝昌身负重伤，仍然坚持在“定远”甲板上鼓励士兵作

关于北洋舰队应战队形问题，历来其说不一，诸如“夹缝雁行阵”、“犄角雁行阵”、“后翼梯阵”、“后翼单梯阵”、“相并横列”等等。此处采用丁汝昌致李鸿章报告的说法。

《伊东祐亨致大本营报告》，转引自《海事》月刊第八卷，第五期，第60页。

李鸿章：《大东沟战状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七十九，第7页。

蔡尔康等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四，第13页。

战。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代替丁汝昌督战，沉着指挥。北洋舰队大部分官兵都能英勇战斗，奋不顾身。“致远”管带邓世昌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致远”舰多处受创，船身倾斜，弹药将尽。邓世昌见日舰“吉野”十分猖狂，毅然下令开足马力，准备用冲角撞击“吉野”，与敌同归于尽。

“吉野”慌忙规避，并发射鱼雷。“致远”不幸重伤，锅炉爆炸。约 15 时 30 分，“致远”沉没，邓世昌等二百五十名官兵壮烈牺牲。“经远”也中弹起火，管带林永升浴血抗战，不幸中弹阵亡。

“致远”沉没后，“济远”管带方伯谦和“广甲”管带吴敬荣，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日第一游击队尾追不及，又折回猛攻已受重伤的“经远”。约 17 时左右，“经远”沉没，全舰二百七十名官兵除十六人获救外，余皆殉难。“广甲”仓皇逃跑时，“避大洋，傍岸行”，以致在大连湾的三山岛外搁浅（23 日，遇日舰“秋津洲”、“浪速”巡航，便自行炸沉）。

“靖远”、“来远”因中弹过多，力不能支，退出战斗，避至大鹿岛附近紧急修补损坏的机器。“平远”、“广丙”及“福龙”雷艇也因尾追单独逃跑的“西京丸”，而为敌第一游击队所断，未及归队。

在“致远”、“经远”等舰同第一游击队激战的同时，“定远”、“镇远”两舰正同联合舰队本队进行着艰苦的鏖战。一小时后，“定远”只有三门炮、“镇远”只有两门炮尚能发射。两舰以寡敌众，始终保持相互依恃的距离。虽中弹甚多，几次起火，全体官兵仍然坚持奋战，一面救火，一面拚死抵抗，并重创敌旗舰“松岛”。日方承认：“（午后）三点三十分，‘镇远’所发的三十公分半巨弹两门，命中了我旗舰‘松岛’下甲板炮台的第四号炮，放在近旁的十二公分炮的装药因此爆发，霹雳一声，船舳倾斜了五度，冒上白烟，四顾黯澹，炮台指挥官海军大尉志摩清直以下，死伤达一百余人，死尸山积，血流满船，而且火灾大作，更加困难。”由于无法继续指挥，伊东祐亨不得不下令各舰自由行动。

不久，“靖远”、“来远”抢修完毕，重新投入战斗。“靖远”帮带大副刘冠雄知“定远”舰号旗桅杆断裂，不能升旗指挥，建议管带叶祖珪代悬信旗集队，指挥各舰绕击日舰，并调出泊于港内的“镇南”、“镇中”等前来助战。于是，“平远”、“广丙”及各鱼雷艇也都折回。这时，日旗舰“松岛”已经瘫痪，“吉野”只剩下一具躯壳，失去战斗力，其余日舰也伤亡惨重，不能再战，又见北洋舰队重新集队，伊东祐亨便于 17 时 40 分左右下令各舰向东南方向遁逃。北洋舰队稍事追击，由于时已日暮，加之炮弹告竭，于是收队返回旅顺。

这次海战，历时五个多小时，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近代世界海战史上所罕见。战斗中，日海军“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五舰受重伤，共死伤约六百人。北洋舰队“致远”、“经远”、“扬威”、“超勇”被击沉，“广甲”自毁，“来远”等舰重伤，共伤亡近千人。

黄海海战，北洋舰队的损失虽然大于日方，但亦给日舰以重创，并迫使其率先逃跑。因此，当时中外舆论对于谁是这次海战的胜利者，众说纷纭。从客观效果看，经过黄海海战，日本联合舰队虽未能达成“聚歼”北洋海军的目的，但由于北洋舰队嗣后不敢再战，日军基本上掌握了黄海制海权，为

下一步实施花园口（今旅大市庄河西南九十里）登陆进攻辽东半岛创造了条件，对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鸿章视北洋海军为私人资本，他不愿“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然更不愿意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喋血一战，因而一再强调，“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主张将黄海制海权拱手让与日本。这就不难看出，李鸿章提出的“保船制敌”方针，并非着眼于“制敌”，而是在于“保船”，其实质是避战自保。李鸿章先则不准丁汝昌率舰队护航增援牙山之清军，致有丰岛之败、“高升”之沉，助长了日本联合舰队的嚣张气焰；继则多次阻挠北洋舰队出海巡航，使日舰得以在汉江口至旅顺、威海卫之间的广阔洋面自由往来，而无后顾之忧。汉纳根曾指出：当时“已有责北洋海军之不出者，不知此不能为海军咎，且亦不能为丁汝昌咎也，有钳制海军者（如饬令毋得失船之类），丁汝昌不能专主也。”此语颇为切中要害。所以，清政府的腐败怯懦，李鸿章的消极防御与避战自保方针，实为海战失利的根本原因。当然，除了战略指导上的错误以外，还与其它因素特别是作战指挥和战术运用等有关。

丁汝昌以陆将任海军提督，指挥海上作战，自难得心应手。由于缺乏海战经验，因而不善于根据敌我舰船的战术技术特点，采取避敌之长、击敌之短的灵活战法。黄海海战开始时，北洋舰队以夹缝雁行阵对付敌人的单纵阵，这种战斗队形诸多不利，如最难维持阵形，不便行动自由，不易发挥全舰队炮火之威力等等，因而颇遭后人责难。当然，黄海海战中丁汝昌等决定采用横阵应战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晨园漫录》指出：由于北洋舰队各舰购置较早，其装备“大抵专注重舰首之重炮，而于两舷侧之速射炮则不甚加意，……其后速射炮日益发达，我各舰仍然依旧，未曾加以改造”，为了充分发挥重炮的优势，“自以布成横阵为最便”。北洋舰队的中坚是“定”、“镇”二舰，各有三十点五厘米口径的主炮四门，它们不是安装在中心线上，而是位于军舰前部的两侧，只有基本上保持舰首对敌，才便于充分发挥其威力。因此，丁汝昌在战前训令中规定“始终以舰首向敌，借保持其位置，而为基本战术”，在海战报告中，也有“各船均以船头抵御，冀以大炮得力”的说法。北洋舰队战术运用上的错误，主要在于把速度不同的军舰混合编组，并驾齐驱，致使“致”、“靖”、“经”、“来”四舰徒具高速而不能充分发挥其战术性能，丧失了巡洋舰应有的机动攻击作用，而陷于被动。相反，日方正是正确地利用了这一特点，将四艘高速舰单独编为一队，加之采用便于机动的单纵阵，因而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不受本队航速的限制，进行机动突击，而居于主动地位。其次，北洋舰队在编队上置弱舰于两翼，当敌舰迂回包抄其侧翼时，得不到强大炮火的支援。正是由于这一错误，一开始就造成“扬威”、“超勇”两舰中弹起火的恶果。此外，旗舰“定远”在战斗开始后不久就中弹负伤，失去升旗指挥的能力，对于整个舰队的作战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在实力对比方面，北洋舰队是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近代海军，不仅拥有当时世界上有数的大型装甲舰和优良军港，而且将领中不少人是受过西方

李鸿章：《据实陈奏军情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七十八，第61—62页。

蔡尔康等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七，第41页。

《中日战争》（六），第72—73页。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七十九，第7页。

海军专业训练的留洋学生，士兵大多是选自沿海一带的劳动者，并聘有外国军官担任炮术、驾驶等各科教习，按西法进行训练，战前还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校阅和演习，但和日本海军相比，总的实力毕竟居于劣势。军舰的速度是关系海战胜负的重要条件。北洋舰队速度最快的“致远”、“靖远”二舰，最高航速为十八节（由于使用日久，实际只有十五六节），最慢的“镇中”、“镇南”二炮舰，只有八节，而日舰最慢的“赤城”是十点二五节，最快的“吉野”达到二十二点五节。在战斗过程中，日舰（特别是第一游击队）正是利用其速度快、便于机动的特点，始终居于“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的有利地位；北洋舰队则处处显得被动，“惟随敌队之运动以为运动”。在当时条件下，舰队的攻击力主要在于火炮。日本联合舰队不仅火炮总数大大超过北洋舰队，而速射炮更是众寡悬殊。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黄海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的火炮发射力超过北洋舰队六倍，以致“日军以其胜利归功于速射炮”。除此以外，北洋舰队虽有巨炮八门，“惟清廷怠忽无状，平时不事补充，战时全舰队中，仅有榴弹数发而已，瞬息之间，榴弹告罄”。尤有甚者，有的炮弹实以泥沙，有的弹丸火药内掺水泥。因此，尽管战斗中命中弹丸不少，却未能击沉一艘日舰。

黄海海战虽然失利了，但在力量对比居于相对劣势和指挥失灵的情况下，北洋舰队大部分官兵仍能奋勇拚杀，开创了海上鏖战五个多小时的纪录，其英烈精神和光辉事迹，是值得称颂的。

《北洋海军总查汉纳根致北洋大臣报告》，转引自《海事》月刊第八卷，第五期，第 63 页。

《海事》月刊第十卷，第二期，第 33—34 页。

《海事》月刊第十卷，第二期，第 31—32 页。

第六节 辽东半岛之战（1894年10月—11月）

一、辽东半岛的战略地位

辽东半岛面临黄海，不仅是日军从海上进攻东北的唯一方向，更重要的是它与山东半岛遥望相对，共同封锁着渤海海峡，因而是保卫京津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口，地势险要，又是控制渤海海峡的锁钥。其地东有黄金山，西有老虎尾，互相环抱，雄峙口门。口门内水域宽广，港阔六百余米，水深六米左右，可锚泊舰艇三十余艘。平均气温为摄氏十度左右，严冬不冻。

清王朝鉴于旅顺的战略地位和易守难攻的良好地形，决定在此构筑船坞、炮台、厂房、仓库和电报局等军事设施，作为北洋舰队的基地。自1880年开始修建，1890年基本完工，历时十年之久，费银数千万两。建于东岸的大船坞，是旅顺军港的主体工程之一。李鸿章奏称：“北洋创办海军，历年添购铁甲钢快等船，规模略具。从前并无修船巨坞，遇有修理要工，必须驶赴日本、香港各洋厂，诸多不便。自旅顺造办石船坞，各战舰均可就近修理，无须借资外国，缓急可恃，洵为海军根本至计。”

旅顺口炮台林立，至甲午战争时，东西海岸新旧炮台共计十二座，安设各种海岸炮七十余门，另有依山建筑的陆路炮台十七座，大小火炮近八十门。总兵黄仕林和张光前各统亲庆军四营，分驻于东西海岸炮台。四川提督宋庆统毅军九营一哨，专防旅顺。

与旅顺口互为犄角的大连湾，也建有炮台、仓库、火药库、水师学堂等。甲午战争爆发时，大连计有海岸炮台五座、陆路炮台一座，共有大小火炮近四十门，由提督刘盛休统铭军十二营驻守。

宋庆和刘盛休所部由北洋大臣直辖。为便于节制，在旅顺设有北洋前敌营务处，由道员龚照琦负责。

具有坚固设防的旅顺口，是日军从渤海湾登陆，遂行直隶平原决战方针的严重障碍。

二、双方作战方针及部署

（一）日军方面

黄海海战之后，日军大本营为在来年进行直隶平原决战，决定按照其冬季作战方针，首先实施辽东半岛的登陆战役，夺取旅顺、大连。9月21日起，大本营即着手组建由第一师团、第二师团（预备队，后未参战）和第十二混成旅团（第六师团的一半）编成的第二军，以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司令官。为了荫蔽攻占辽东半岛的企图，大本营命令第一军在鸭绿江东岸义州一带集结，以牵制对岸清军，届时向九连城（今丹东市东北二十五里）发起进攻，掩护第二军的登陆作战。

李鸿章：《酌定旅顺船坞薪费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七十四，第50页。

（二）清军方面

1、清军战略方针的转变

为阻遏日寇向中国本土进攻，李鸿章提出了“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的方针，同时强调，必须“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旦夕之功，庶不堕彼速战术成之诡计。”李鸿章还要求指派大臣专门督办奉天军务。清廷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随即令宋庆帮办北洋军务，由旅顺驰赴九连城一带，督率前敌各军合力严守鸭绿江西岸。不久，又将从平壤溃退过江的叶志超、卫汝贵撤职，所部交由聂士成统带。

清廷采纳李鸿章的上述建议，意味着由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转变为战略防御的方针。按照这一方针，清廷命北洋舰队尽快修复受伤各舰，不时巡弋于大连、旅顺、威海之间，扼守渤海湾门户；为力保沈阳，以东三省军队之大部集结于沈阳、辽阳之间，并增强第一线兵力；为保卫北京，在天津、大沽间，山海关与秦皇岛间，以及通州（今通县）附近，厚集外省兵力。

2、鸭绿江沿线的防御部署

清军以九连城一带为主防御阵地。九连城南依鸭绿江，东枕暖河。暖河东面的虎山，是屏障九连城的要塞。再东至安平河口，逾安平河而东为苏甸，再东为长甸。九连城以西为安东县（今丹东市），再西为大东沟，更西为大孤山（今孤山）。

在这一沿江地带，清军部署分中、东、西三段：

中段：帮办北洋军务宋庆率亲兵四百人，设司令部于九连城北面的苇子沟；总兵刘盛休率所部铭军专防九连城；总兵聂士成率牙山军驻守栗子园及虎山附近；总兵马玉昆率毅军五营驻守九连城北面的榆树沟附近；总兵宋得胜率毅军四营驻守榆树沟北面的苇子沟一带。

东段：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齐字练军及镇边军共十二营分守安平河口至长甸河口一线。

西段：丰升阿、聂桂林率奉天盛军和原左宝贵所部奉军共十二营分守安东、大东沟、大孤山各城邑。吕本元、孙显寅率原卫汝贵所部盛军十八营驻守沙河镇（安东县）一带。

鸭绿江沿线清军虽有七十余营，两万三千多人，但因是一线设防，兵力分散，纵深内没有强大的预备队实施机动，加之宋庆与依克唐阿互不统属，因而总体防御能力是脆弱的。

3、旅大地区的防御部署

辽东半岛正面的沿海陆地，西起老铁山，东至鸭绿江口，整个地形前低后高，山地重迭，原是组织抗登陆作战的良好地区。但是，自1888年以来，由于西太后挪用海防经费修建颐和园，以及官吏们中饱私囊，以致除旅顺、大连有坚固设防外，全线并没有完整的防御体系。当日军攻占平壤进逼鸭绿江时，李鸿章等不了解日本大本营的战略意图，错误地判断了日军的主攻方向，加之奉天是清王朝的陪都，以致陆续把长期守备旅顺、大连之兵（宋庆所部毅军和刘盛休所部铭军）调赴鸭绿江前线。为了填防，李鸿章令宋庆所部的分统姜桂题新募桂字四营、提督程允和新募和字三营调赴旅顺，后又令

提督卫汝成新募成字六营及所部马队两营，正定镇总兵徐邦道新募拱卫军三营并所部马队两营、炮队一营，由天津调赴旅顺协防，而以铭军分统赵怀业新募怀字六营，代替铭军防守大连湾。日军进攻时，旅大地区清军的部署是：

金州大连地区：副都统连顺率捷胜营步队一营守金州城，以马队二哨驻皮子窝（今皮口）监视附近海岸；总兵徐邦道以拱卫军步队三营守徐家山，以炮队一营驻金州城南，马队二营巡防金州东北一带；总兵赵怀业亲率步队二营守大连湾和尚岛，另以二营守老龙头及黄山，一营守南关岭，一营二哨守苏家屯。连顺受奉天将军裕禄遥制，徐邦道、赵怀业受李鸿章节制，互不相属，而无统一的指挥。

旅顺地区：总兵张光前率亲庆军四营守西炮台，总兵黄仕林率亲庆军四营守东炮台；毅军分统姜桂题新募桂字四营、提督程允和新募和字三营、提督卫汝成新募成字六营，均依陆路炮台分守旅顺后路。凡无炮台处，则配置野战炮，野战炮间的空隙，则配置步兵，依托山地修筑临时工事。

三、作战经过（参见附图十七）

（一）鸭绿江防线被突破

1894年10月22日，日第一军二万五千人于朝鲜义州一带集结完毕，准备渡江攻取虎山，进而夺占九连城。为了牵制对岸清军，日军采取“近而示之远”的战法，于24日以一部兵力故意在义州作出渡江的姿态，暗地则命第三师团的佐藤大佐（第十八联队长）率领一个支队（步兵二大队、炮兵一小队）于九连城东北的水口镇（在朝鲜境）附近徒涉渡江，向依克唐阿所属副都统倭恒额防区安平河口、鼓楼子一带发起攻击，企图由东而西，绕攻虎山清军，击九连城的侧背。驻守该处的清军一听枪响，即纷纷向宽甸方向逃走。佐藤支队轻取安平河口等处，随即向虎山方向前进。在佐藤支队渡江的当天上午，日军还派遣奥山少佐率领一个支队（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之第三大队）沿鸭绿江而西，屯于安东对岸的麻田浦，以两门野炮轰击安东，牵制该处清军。

义州日军在佐藤支队渡江的当夜，其架桥队利用夜暗在虎山附近江面架设了浮桥（清军竟然没有发觉）。25日凌晨，日军第三师团在炮火掩护下首先渡江，第五师团之第十旅团继进。战斗开始后，宋庆急调苇子沟、栗子园、九连城的清军进行拦击，一度迫使日军不能向纵深发展，后续日军无法通过浮桥。战至上午10时左右，沿岸清军及守备炮台的铭军不支，相继溃逃，只有聂士成部仍坚守虎山阻击日军。由于各路清军溃退，日军（包括由安平河口西进的佐藤支队）得以集中兵力围攻虎山。聂士成部终以寡不敌众，不久亦退往叆河以西。宋庆不敢继续抵抗，于当夜率部退守凤凰城（今凤城）。26日，日军进占九连城，随即分兵一部西占安东，丰升阿、聂桂林率部西奔岫岩。仅三天时间，鸭绿江防线即被日军突破。此后，日军向我东北境内步步进逼。

（二）金州、大连陷落

已集结于朝鲜大同江口渔隐洞锚地待机的日第二军（第二军司令部及第

一师团），在第一军发起鸭绿江战斗的同时，即开始实施辽东半岛的登陆作战。10月24日、26日、27日，日军由联合舰队十四艘军舰担任护航，用三十余艘运输船分三批输送第二军第一师团在花园口登陆。登陆后，即布置警戒，建立起登陆场，以掩护混成第十二旅团继续登陆。

徐邦道、赵怀业获悉日军登陆的消息后，以金州、大连兵力薄弱，向旅顺龚照珩请援。龚照珩不明日军是北犯还是南下，因而按兵不动。这时，在皮子窝一带巡防的连顺所部捷胜营马队捕获日本间谍钟崎、山崎二人，获悉日军将攻金州、大连。赵、徐等据以电告李鸿章，希望旅顺分兵北援，并要求速令北洋舰队（已修复的“定”、“镇”等六艘军舰于10月中旬由丁汝昌统率驶回威海）赴援大连。龚照珩也发电向李鸿章请援。李鸿章一面令由营口方面增援旅顺的山西大同军二千人（由总兵程之伟统领）兼程前往金州，一面以责备的口气复电赵、徐等前敌统领：“倭匪尚未过皮子窝而南，汝等只各守营盘，来路多设地雷埋伏，并无守城之责；旅顺兵单，同一吃紧，岂能分拨过湾？可谓糊涂胆小！”金州守军多次催促程之伟部南下增援，程之伟竟逗留复州（今复县）、熊岳不进。

11月1、2日，进至皮子窝的日军停止前进。徐邦道分析日军之所以不进，可能在皮子窝开辟新的登陆场，掩护后续部队登陆，或是等待粮秣弹药的输送，因而认为机不可失，应主动出击。于是，连顺与徐邦道亲向大连的赵怀业请援，而赵按兵不动，以致丧失了战机。赵怀业部营官周鼎臣等自告奋勇要求赴敌，赵竟说：“我奉中堂（李鸿章）令守炮台，不与后路战事；汝辈欲往鼻[皮]子窝拒敌，须请令方可。”最后仅派出步队两哨，不及三百人。

徐邦道主动出击的计划不能实现，便以右翼依托金州城东面的大和尚山，占领该山北麓格条沟之西方高地至破头山一带，左翼则占领通复州的大道十三里台南方高地，紧急修建临时工事。11月3日，日军先头部队（步兵第十五联队的第一大队、工兵一大队和骑兵一中队）已达亮甲店。同日，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率师团主力由皮子窝出发南下。4日，日军一部切断复州电线。5日，日军先头部队遭到大和尚山徐邦道部炮击，不能前进。师团主力便由石拉子（亮甲店西南）折向金州北面的三十里堡一带，进攻金州守军的左侧背。

11月6日，徐邦道部溃败。接着，日军攻破金州城。连顺早已逃走，其余清军奔向旅顺方向。

7日，日军在联合舰队配合下，分路进攻大连。由于赵怀业已于6日弃大连炮台逃跑，兵勇溃散，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大连，获取了清军遗弃的大小炮一百二十余门和炮弹二百四十六万余发，以及大量的军用物资。当天，发自仁川港的日混成第十二旅团亦在花园口登陆完毕，随即向金州方向前进。

（三）旅顺失陷

10月底，当日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并缓慢向前推进之际，丁汝昌曾率北

李鸿章：《寄大连湾赵统领等》，《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十八，第22页。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一），第37页。

洋舰队由威海卫抵达旅顺，但未敢前往日军登陆之处，进行任何必要的袭扰。11月7日，大连湾失陷，丁汝昌认为旅顺“万难久支”，便借口“旅顺后路警急，各船在口内，水道狭隘，不能展动为力，有损无益”，率舰队返回威海。11日，丁汝昌奉命率舰队抵大沽，并前往天津与李鸿章等面商援旅事宜。

12日下午，北洋舰队由大沽开赴旅顺，稍事游弋，13日晚即离旅折回威海，此后再未北巡。

本来，日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拟待第二师团到达后再向旅顺进攻，后获悉旅顺请军仅有陆军一万二千人（含金州、大连溃兵），又多系新兵，便决定不待第二师团到达即进攻旅顺。

11月17日，日军在大连休整了十天之后，开始向旅顺进攻。大山岩决定，除以步骑二千留守金州、一千留守大连外，将其余部队分为搜索骑兵（骑兵第一大队）、左翼纵队（步兵第十四联队、骑兵一小队、山炮一中队、工兵二中队）、右翼纵队（第一师团和混成第十二旅团之主力），沿旅顺北面大道展开进攻。

当时，负责旅大前线总指挥的龚照玕，在金州失守之后即乘鱼雷艇经烟台逃往天津，其余大小官员也纷纷抢掠财物，准备逃走，以致旅顺军心涣散，人心惶惶。18日，日军控制了旅顺陆路咽喉南关岭，前锋进至土城子。

旅顺危急，诸将互不统属，公推姜桂题担任临时指挥。姜桂题无所作为，坐待敌攻。这时，只有徐邦道率领残军主动迎战。19日，徐部在土城子南面同敌人先头部队遭遇。徐邦道挥军奋击，将敌截为数段，重创日军，一直追击至营城子西南的双台沟。由于日军不断增援，徐邦道兵力薄弱，又没有后援，整整激战了一天，士兵饥饿疲乏，只得退回旅顺。这时，驻防旅顺的八艘鱼雷艇已逃往威海，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个统领也仓皇乘船逃跑。

21日，日军舰队在港外游弋，借以牵制旅顺东西炮台的清军，陆军则集中兵力猛攻可以瞰制各台的椅子山炮台。22日，椅子山炮台为敌攻占，接着，案子山、松树山、二龙山等各炮台相继失陷，守军溃散，旅顺随即陷落。

就在日军占领旅顺的当天，宋庆所率援军约七千人（含刘盛休所部铭军）进抵金州城北。日军以步骑二千、火炮四门阻击，激战半天之久。宋庆所部清军未能越过金州赴援旅顺，于当晚退至三十里堡，后又向盖平（今盖县）退却。

日寇陷旅顺后，兽性大发，对旅顺人民（二万余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个中国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供认：“把俘虏绑上屠杀，杀害平民，甚至妇女也不例外，这些似乎都是事实”。

在日第二军进攻旅大的同时，业已突破鸭绿江防线的日第一军继续向纵深发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即攻占了辽东半岛的大部要点，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十四，第37页。

11月11日，李鸿章、丁汝昌、汉纳根等在天津商议援旅事宜。汉纳根认为“旅顺日船游弋，运兵船断不可往”。丁汝昌也认为若令北洋舰队护送陆军援旅，“适以资敌”，主张即率六舰由大沽开赴旅顺口外巡弋，“遇敌即击，相机进退”。李鸿章表示同意。（见《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十八，第41页。）

[英]胡兰德：《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转引自[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63—64页。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日文版第179页。

达到了为进行直隶平原决战夺取前进基地的战略企图。

对于日军在辽东半岛登陆，清军缺乏抗登陆的应有准备。事前，既未根据地形情况对敌人可能登陆的地点进行认真研究，在威胁最大的地段重点地部署兵力，并加强沿海观察和巡逻；又缺乏必要的机动部队，无法及时组织反击。因此，日军在登陆作战的航渡、换乘、登陆各个阶段，均未受到北洋舰队的任何袭扰。花园口是丰升阿所派盛字营马队的防区，日军在此登陆，该部竟未及时发现和抗击。这一切，表明前敌清军在敌人重兵压境的严重情况下，仍然漫无布置，戒备松弛。李鸿章虽然早在9月29日即曾电告旅大前线各军将领和丁汝昌：“各国探报，均称日派大队分路北犯，尤注意金州各岛左右，欲窜旅后路，毁我船坞，实在意中。各炮台须昼夜分班了望严守，……师船速修，择其可用者，常派出口外，靠山巡查，略张声势。”但是，基于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的错误，在实际部署上却以鸭绿江方向为重点，忽视了旅大方向的守备。当日军已在花园口登陆，并准备进攻金州之际，盛京将军裕禄等仍错误地认为，“倭寇分兵窜扰，明系包抄前敌各军后路。目下九连城既被抢渡，难保不合谋北犯。”并以兵力不足为由，不及时分兵增援旅大。旅大的军事总指挥龚照琦，在敌人已从侧后抄袭而来的情况下，仍不出兵阻击。李鸿章也未采取得力措施。更有甚者，当日军已占金州、正向大连挺进的当天（11月7日），慈禧竟不顾前线军情紧急，仍若无其事地在北京庆祝其六十大寿。清廷和前敌将领如此昏庸，自然不可能对战事实行正确的指导。

11月23日，清廷以辽东半岛溃败责怪李鸿章“调度乖方，救援不力”，下诏“革职留任”，并令其亲赴大沽、北塘等处“周历巡阅，严密布置”，以防日军直逼京畿。与此同时，清廷进一步开展求和活动，准备屈辱投降。

李鸿章：《寄旅顺黄张姜程各统将并丁提督》，《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十八，第1页。

《盛京将军来电一》，《中日战争》（三），第170页。

《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十四，第31页。

第七节 山东半岛之战（1895年1月—2月）

一、山东半岛的战略地位

山东半岛突出于黄海与渤海之间，北隔渤海海峡与辽东半岛遥遥相望，共扼渤海门户，对于保卫京津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位于山东半岛北岸东部的威海卫，北与辽东半岛的旅顺口相对，西与烟台互为犄角，地当要冲，是控制渤海海峡、保卫京畿门户的锁钥之一。“其海湾形若箕张，两臂斜伸入海，作半环形”。口外刘公岛横置于前，形成东西两条水道，水深十米左右，一般舰船均可通行。刘公岛之西端为黄岛，东南有日岛等分布海中，形成海防的天然屏障。

1887年，清王朝开始在威海建立海军基地，布置防御，作为北洋舰队的停泊场。清军在威海的设防，是围绕着南岸、北岸及刘公岛进行的。南岸筑有炮台三座（灶北嘴、鹿角嘴、龙庙嘴），统称南帮炮台；北岸也有炮台三座（北山嘴、黄泥崖、祭祀台），统称北帮炮台；刘公岛有炮台二座（黄岛、东风扫滩）；日岛有炮台一座。另有南帮陆路炮台（所前岭、杨峰岭等）、北帮陆路炮台（合庆滩、老姆顶等）多座。绥巩军统领道员戴宗骞自统绥军四营驻北帮炮台，而以分统总兵刘超佩统巩军四营驻南帮炮台，记名总兵张文宣统北洋护军二营驻守刘公岛。甲午战争爆发前后，威海又陆续增修炮台和添置火炮，迨至日军进攻时，共有各种炮台二十三座，大小火炮一百六十余门。此外，在东西两条水道布有各种水雷：西口七十九个；东口一百六十九个。

旅顺口既失，威海卫便成了北洋海军的唯一基地，战略地位显得更为重要了。当时，停泊在威海军港的北洋舰队舰只有：“定远”、“镇远”、“来远”、“靖远”、“济远”、“平远”、“广丙”、“威远”、“康济”、“镇边”、“镇中”、“镇南”、“镇北”、“镇东”、“镇西”等十五艘军舰；此外，尚有水雷艇十二艘、水雷布设船“宝筏”号一艘、附属汽船“飞霆”号一艘。其中“来远”尚在修理，“镇远”触礁负伤（林泰曾即因此事自杀），勉强修补，航速仅达每小时七海里。

黄海海战之后，德国人汉纳根辞去北洋海军总查，不久，李鸿章改请英国人马格禄帮办北洋海军提督。马格禄以前是“金龙”号商船船长，对于海军军事问题一无所知。

二、双方作战方针及部署

（一）日军方面

日军攻占旅大之后，其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和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于12月6日联名向大本营建议：鉴于渤海湾封冻，登陆困难，若欲继续作战，不如出兵山东半岛，海陆夹攻，歼灭北洋海军，以保障从渤海湾登陆的安全。

日本大本营采纳了这一建议，随即任命大山岩为“山东作战军”的司令官。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一），第51页。

参见日本参谋本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日文版第六卷，第2页。

其军队编成为：第二师团（辖步兵第三、第四旅团）及第六师团之第十一旅团，此外，还包括两个骑兵大队、一个野战炮兵联队又一个大队、三个工兵大队以及后方勤务部队等，共计二万五千余人。1895年1月中旬，上述部队自日本广岛航运至大连湾集结，待机进发。与此同时，大本营命令联合舰队负责护送山东作战军的登陆兵团，并与之相配合，攻打威海卫军港，消灭北洋舰队。

联合舰队经过多次侦察，确知北洋舰队仍在威海港内。但威海军港正面设防坚固，不易夺取，因而日军决定把登陆场选择在清军防御薄弱的荣成湾龙睡澳内落凤冈东北的浅滩地段，登陆后再西进，从侧后夺取威海卫。大山岩鉴于从荣成（今旧荣成）至威海的地形复杂，冬季积雪一般深达二尺，车辆难以通行，决定改用人力搬运物资，并计划在二十四小时内将一个师团的兵力登陆完毕。航渡时，联合舰队护送运输船，登陆时则负责海上警戒，并以主力封锁威海港，以防北洋舰队出击。

（二）清军方面

旅大失守之后，清政府判断，日军第一、第二军将并力攻取奉天，以主力打通锦州走廊，进逼山海关，再别遣一部从渤海湾登陆，会攻北京。基于以上判断，“调兵多往顾辽沈”，并以重兵严防山海关至天津一线，关内外总兵力共约十万以上。

由于清朝政府专注京津方向，以致山东防务十分薄弱。整个山东半岛沿海地区的兵力仅四十八营二哨，约一万七千人。主持山东防务的山东巡抚李秉衡，规定在四个方向上防止日军登陆：即宁海（烟台东南）方向、旧馆（今酒馆）方向、威海方向、荣成方向。其中以旧馆为主要防御方向，荣成方向兵力最弱，仅有参将赵得发所部一营、巡检徐抚臣所部一营、副将阎得胜所部二营，共一千四百余人，均受阎得胜节制。

山东半岛的防御重点是威海卫海军基地。1894年11月30日，李鸿章曾指示威海前敌各军：“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且新炮能击四面，敌虽满山谷，断不敢近。多储粮药，多埋地雷，多掘地沟为要。”这是一个消极自保的错误方针。而丁汝昌在执行时更加消极，他连在台炮射击范围内傍岸击敌也没有去做。戴宗骞鉴于“大连湾守兵不并力陆援，旅顺诸军不据南关岭而株守营墙，均以失事”的教训，要求采取“虽布近局，仍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的战守方针。然而，李鸿章还是坚持“仍以扼要埋伏地沟为妥”的错误指导。

12月25日，李鸿章得知荣成湾龙须岛有日舰和小火轮活动，才指示丁汝昌：“应速统现有师船赴龙须岛、成山一带巡探，如日船少，即设法驱逐；

曹和济：《津门奉使纪闻》，《中日战争》（一），第157页。

李鸿章：《寄威海丁提督戴道刘镇张镇》，《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十九，第1页。

《戴道来电》，《中日战争》（四），第304—305页。

李鸿章：《复戴道》，《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十九，第6页。

否则，听其由后路包抄，则威危而兵船无驻足之地”。但丁汝昌没有执行。1895年1月13日，李鸿章接到光绪帝关于北洋海军应“相机迎击，以免坐困”的谕旨，又指示丁汝昌等：“查倭如犯威，必以陆队由后路上岸抄截，而以兵船游弋口外牵制我师，彼时兵轮当如何布置迎击，水陆相依，庶无疏失，望与洋弁等悉心妥筹”。李鸿章根据光绪帝指示而作出的这一判断，仍不为丁汝昌所重视，北洋舰队始终蛰居威海港内，不敢与敌争锋。

三、作战经过（参见附图十八）

（一）荣成湾抗登陆战斗

1895年1月19日，集结于大连湾一带的日本山东作战军在联合舰队二十五艘军舰护航下，开始分批向荣成湾航进。为了迷惑清军，荫蔽自荣成登陆的企图，1月18日和19日，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向登州（今蓬莱）连续轰击。坐镇烟台的山东巡抚李秉衡果被日军的佯动所迷惑，他在19日的奏报中说：“前荣成之成山岛、宁海之金山寨均有倭船窥伺，昨登州又有倭船开炮一时之久。由登州至威海、威海至成山，共五百余里，处处吃紧”。由于他不明敌军将从何处登陆，于是采取应付态度，强调“明知兵分则力单，而地面太长，有不能不分之势”，结果处处兵力薄弱。1月20日，日军第二师团开始登陆。这时，北洋舰队尚堪一战，本应出击，但丁汝昌“震于倭舰声势，坚匿坐毙”。日军在龙须岛登陆时，驻岛之清军四哨用七五毫米口径火炮轰沉日军舢舨二只。日军受挫后，集中舰炮火力猛轰岸上清军，并仍以小火轮拖带舢舨强行登陆。清军不支，向西败退，日军前锋千余人跟踪追至荣成。驻守荣成的团练纷纷逃散，城门大开。阎得胜等四营清军多系新兵，又少枪械，因而一触即溃，荣成遂为日军所据。

（二）威海南北两岸炮台的陷落

日军登陆之后，主持山东防务的李秉衡虽知日军约近两万人已从荣成登陆，但仍然错误地认为，日军“又难免不从西面乘隙上岸”，因此，集结在威海、宁海、文登一带的三十五营清军仍然按兵不动，只抽出总兵孙万龄所率嵩武军千余人自旧馆前往增援。由于李秉衡未能集中兵力对从荣成方向登陆之敌进行反击，使日军得以在荣成从容地进行了两天休整。

1月25日，日军分左右（南北）两路西犯威海：左路（南路）为第二师团，自荣成经桥头、温泉汤、虎山，指向威海，负责切断南帮炮台清军退路；右路（北路）为第六师团之第十一旅团，自荣成经三官庙、崮山后，直扑南帮炮台。

李鸿章：《寄丁提督》，《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十九，第26页。

李鸿章：《寄刘公岛丁提督刘镇》，《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十九，第37页。

《山东巡抚来电二》，《中日战争》（三），第326页。

同上。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一），第70页。

《山东巡抚来电》，《中日战争》（三），第341页。

孙万龄部于1月22日到达桥头，收集了从荣成败退的阎得胜部。次日，戴宗骞所派知府刘树德率领的两营绥军亦抵桥头一带。在清军东进过程中，沿途人民自动支援，在风雪中帮助拉炮和运送粮草，并协助侦察敌情，修工事，抓特务，给清军官兵以很大鼓舞。26日起，孙、刘两部清军在桥头附近奋勇阻击南路日军前锋，使敌人接连两天不得西进。但北路日军由于清军阻击不力，较快地进抵鲍家村、崮山后一带，严重威胁着南帮炮台的安全。

28日，李秉衡命孙万龄、戴宗骞夹攻北路日军。但是，戴宗骞违令不至，而阎得胜又不战而退。孙万龄部孤军力战，终因众寡不敌，退回桥头。此时，驻守桥头的刘树德所率绥军竟被戴宗骞调回威海，孙万龄左右无援，亦弃桥头西去。南路日军遂占桥头，并向温泉汤方向逼进。

30日晨，南北两路日军分别进攻凤林集东南高地和威海南岸堡垒群。南帮炮台官兵英勇抵抗，给日寇以大量杀伤，并击毙敌第十一旅团长安纯少将。当日军尚未逼近时，丁汝昌曾建议戴宗骞事急时卸掉南帮炮台的大炮炮门，以免日军利用，轰击港内军舰，但戴宗骞不同意。后来果如丁汝昌所料，日军从南帮炮台发炮轰击港内舰船，使北洋海军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当南帮炮台战斗激烈时，巩军统领刘超佩临阵脱逃，乘小轮渡奔北岸，南岸士兵各自为战。一部分官兵最后在港内军舰火力支援下，由长峰以东沙滩突围，退至威海卫。日舰队一部在南岸激烈陆战时，曾逼近东口，但被日岛清军的猛烈炮火击退。30日下午，南帮炮台全部陷落。

南帮炮台失守后，驻守北岸的绥军见南岸伤亡惨重，便望风溃退，刘树德也仓皇逃命。戴宗骞无奈，移驻祭祀台，从者皆散。2月1日，丁汝昌乘小轮将戴宗骞接往刘公岛（戴至岛即自杀），并炸毁北帮炮台及弹药库，以免资敌。于是，日军不战而占领威海北岸。至此，威海陆上据点尽失，北洋舰队和刘公岛陷入重围。

（三）北洋舰队的覆没

1月30日，一直停泊在荣成湾的日本联合舰队二十一艘军舰（留四艘警戒运输船），在南帮炮台两军激战时，于凌晨2时启航开向威海，7时抵达百尺崖南，先后配合陆军轰击杨峰岭、所前岭炮台。南帮炮台陷落后，北洋舰队因威海港东口暴露在敌军陆路炮火之下，遂移至西口。于是，日鱼雷艇得以破坏东口障碍物，且入港袭击北洋舰只。

在此不利的情况下，北洋舰队本应冲破日军舰队的封锁，出到海上，拚力一战。清廷早在1月23日即曾电谕李秉衡：“现在贼踪逼近南岸，其兵船多只，难保不闯入口内，冀逞水陆夹击之诡谋。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贼归路。”李鸿章于同一天电告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拚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但是，丁汝昌却表示：“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他决定株守港内，既不出战，又不转移。1月30日，李鸿章再次电告丁汝昌、

《军机处电寄李秉衡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十九，第36页。

李鸿章《寄刘公岛丁提督》，《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十九，第43页。

《丁提督来电》，《中日战争》（四），第316页。

戴宗骞：北洋舰队应冲出威海，“设法保船”。“万一刘（公）岛不保，能挟数舰冲出，或烟台，或吴淞，勿被倭全灭，稍赎重愆。否则，事急时将船凿沉，亦不貽后患。”但是，丁汝昌仍迟不执行。

2月3日，日舰及占据南帮炮台的日军以大炮水陆合击刘公岛及北洋舰队，双方相持竟日。刘公岛清军伤亡甚众。当夜，日鱼雷艇队闯入东口袭击北洋舰只，“定远”中雷重伤，不久自毁。但日军也有五艘鱼雷艇被击沉。“定远”毁后，丁汝昌移督旗于“镇远”舰。5日，日军又水陆一起发炮轰击，炸毁日岛弹药库及地阱炮。清军发炮还击，击伤日舰两艘。6日凌晨，日鱼雷艇又入东口，袭沉“来远”、“威远”及“宝筏”号。7日，管带王登瀛私率十二艘鱼雷艇从西口逃出，遭日舰追击，全部被俘。此时，刘公岛电讯已中断，形势岌岌可危。在北洋舰队服役的洋员唆使部分民族败类鸣枪过市，公开要求投降，引起刘公岛居民惶惧，军心涣散。9日，“靖远”被敌击沉。当天，刘步蟾自杀。此时，北洋舰队尚有“镇远”、“济远”、“平远”、“广丙”以及“镇中”等大小舰船十艘，但弹药将尽。10日，丁汝昌命令沉船，由于洋员的阻挠，无人执行。

11日，丁汝昌得到烟台密信，知李秉衡已远逃莱州，陆路增援已无希望，便召开会议，研究突围。当即遭到洋员瑞乃尔（德国炮师）、马格禄以及一小撮民族败类营务处道员牛昶炳等的坚决反对，迫使丁汝昌、张文宣等相继自杀。12日晨，一群贪生怕死之徒盗用丁汝昌名义，向日本舰队投降。于是，北洋舰队尚存的“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艇以及刘公岛炮台和军资器械，全被日军所掳。

日军从荣成湾登陆至占领威海卫军港，为时仅三个星期。和辽东半岛之战一样，清军在山东半岛之战中仍然采取消极防御的被动挨打方针，作战指导上产生了一连串的失误。首先，由于对日军攻占旅大之后的战略企图判断错误，在战略防御部署上重奉天而轻山东，山海关内外重兵云集，山东方面则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抽兵（总兵章高元所率嵩武军八营）北援辽东，以致日军由荣成西进时，山东清军无足够数量的预备队可供调遣，不得不从威海附近分兵堵截，造成顾此失彼的被动态势。其次，山东清军在部署上分兵把口，以致处处兵单，尤其是没有汲取日军于花园口登陆从侧后进犯旅大的教训，对敌人从远处登陆进行侧后攻击的可能性缺乏预计；当得知日军已从荣成方向登陆后，又未能及时集中兵力，组织有力的反击，致使登陆之敌得以两路并进，直扑威海。此外，李鸿章死守其保船避战的错误方针，既规定北洋海军“不得出大洋浪战”，又不准陆路各军半渡而击，主观地认为只要“固守大小炮台”，

依仗“能击四面”的新式大炮，即可使日军“断不敢近”，这无异于把战场主动权拱手授之于人，而使自己立于未战先败之地，加上丁汝昌最后抱定“惟有船没人尽而已”的愚蠢打算，拒不执行出口决战和突围退却的指示，终于酿成北洋海军坐以待毙、全军覆灭的可悲结局。恩格斯在评论俄土锡诺普海战时指出，土军分舰队的覆灭，是土耳其方面犯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

《复丁提督张镇》，《中日战争》（四），第320—321页。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期间，纳希莫夫海军中将指挥的俄国黑海舰队于1853年11月30日向停泊在锡诺普港中的土耳其分舰队发起攻击，由于土军舰队的坐以待毙，未进行任何海上机动，结果全军覆没。

的错误造成的。“考虑到失败绝对不可避免，因此只要风向许可，土耳其分舰队也许最好是起锚并倾全力向俄军攻击。这样做，虽然不可避免地要牺牲几艘舰船，但是至少可以保存部分舰船。北洋舰队重蹈土耳其分舰队的覆辙，同样是犯了一系列错误的结果。

第八节 辽东清军的溃败（1894年11月—1895年3月）

一、岫岩——赛马集之战

越过鸭绿江之日第一军继 1894 年 10 月 26 日占领九连城、安东之后，接着又于 27 日占领大东沟，31 日占领凤凰城，11 月 5 日占领大孤山。其后，日第二军攻占了金州大连湾，于是，第一军受领的牵制辽东清军、掩护第二军由花园口登陆的任务基本完成，大本营令其在暖河、大洋河两流域布置冬营，以待来年参加直隶平原决战。为确保冬营安全，日第一军决定以其第三师团之第五旅团长大迫尚敏率一支队（步骑约三千）由大孤山出发，进攻岫岩；以第五师团之第十旅团长立见尚文率一支队（步骑四千）由凤凰城出发，北攻赛马集，并分兵一部（一个大队和少量骑兵）由少佐三原重雄率领西进，协助大迫支队夹攻岫岩。

岫岩西通海城、盖平，北连辽阳，东通凤凰城，南达大孤山，是奉天南部的战略要地。11 月 14 日，日军大迫支队出大孤山，经土城子、老孙家堡、土门子岭，指向岫岩之南；三原重雄所部则出凤凰城，经高家店、黄花甸、黄岭子，指向岫岩之北。丰升阿、聂桂林分兵北扼黄岭子，南控土门子岭和洪家堡，抵御来犯之敌。18 日，三原重雄所部猛攻地势险峻的黄岭子山，清军不支，弃险而走，退守兴隆沟。此时，南面守军也为大迫支队所逼，退入岫岩。当晚，丰升阿等见南北两面受敌，率部夜奔海城东南的析木城，岫岩遂为日军所陷。

赛马集东近暖阳，西接连山关。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所部弃守宽甸之后，即退驻于赛马集一带。日军立见支队由凤凰城向赛马集进军时，分兵一部（步兵一大队、骑兵炮兵各一小队）由少佐今田唯一率领，经雪里站、通远堡、草河口，西犯连山关。当时，连山关、甜水站等处由吕本元、孙显寅所部盛军驻守，其西面的摩天岭由聂士成等部驻守。由于宋庆奉命率所部毅军并铭军南下救援旅顺，连山关、摩天岭一带防务由聂士成统管。

11 月 12 日，今田唯一所部骑兵抢夺连山关关口，大队继至，遂陷连山关，直趋摩天岭。聂士成部顽强抵抗，“扼隘路，以巨炮当其冲，张旗帜丛林间，鸣鼓角为疑兵，时出截杀，而露宿以守”。日军不得逞，撤回连山关。在西犯摩天岭的同时，日军一小队由暖阳偷袭赛马集，侦察依克唐阿部虚实，遭到依军痛击，死伤惨重。日军西则阻于摩天岭，东则败于赛马集，不得已已于 11 月 24 日撤离连山关，集结于草河口一带，阻隔聂、依两军通道。26 日，聂、依两军东西夹击，大败草河口日军。29 日，立见尚文以大队来援，分犯赛马集和草河口。清军竭力抵抗，战事呈胶着状态。日军前进受阻，又恐凤凰城老巢空虚，后路危险，便于 12 月 5 日弃草河口，返回凤凰城。此时，聂、依两军声势相通，拟合力南下，收复凤凰城。依克唐阿并分兵一部绕道暖阳指向凤凰城侧背。立见尚文留兵一部守城，自率大队北上迎击自通远堡南下的清军。9 日，双方激战于通远堡南面的金家河，彼此伤亡甚众。12 日至 15 日，清军连战皆败，终未能收复凤凰城。这时，日军第三师团已陷海城，辽阳危急。依克唐阿奉命西援辽阳，与宋庆及吉林将军长顺会合，以固沈阳门户。此后，辽阳以东防务主要由聂士成部承担。聂部以摩天岭阵地为中坚，

长期与敌相持，日军始终未能越岭西进。

二、海城、盖平等地的陷落

日第二军攻陷旅顺之后，其第一军司令野津道贯即建议大本营准其进军海城，以消除旅大方面日军的后顾之忧。日第一军既不能越摩天岭西犯，改由岫岩经海城而进逼辽阳，断摩天岭清军后路，必要时与第二军会师北上而威胁沈阳，自然有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海城实为中日两军必争之地。12月上旬，日第三师团于岫岩集结，准备进军海城。当时，由摩天岭奉命回援旅顺的宋庆所部毅军和铭军屯于盖平；由岫岩败退的丰升阿、聂桂林所部十余营驻析木城。12月10日，日军第三师团全队西犯：先以步兵第十八联队长佐藤大佐率兵一部指向盖平，牵制宋庆军；第三师团长桂太郎中将自统师团主力扑向析木城。11日，清军屡战皆败，丰升阿、聂桂林夜奔海城，析木城遂于12日为日军侵占。13日，日军乘势进攻海城。防守该地的清军有奉军等步、骑、炮队十七营，分扼城东的荞麦山及城西的晾甲山以为左右翼，而以荞麦山为防御之锁钥，置炮兵于该山南部及山麓，又以部分兵力占领沙河左岸箭楼子附近。日军进攻时，清军稍事抵抗，即退奔辽阳，海城为敌所占。于是，辽阳、盖平、营口（今营口市）、牛庄等处告急。清廷更觉奉天省城势危，急令依克唐阿、长顺各率所部西援，以护辽阳，令宋庆率所部自盖平北上，以护营口、牛庄，防敌西窜。

宋庆在盖平闻日军由岫岩长驱北进，已于12月10日亲率毅、铭军等二十余营移驻于大石桥（今营口县），拟救援海城。但12日析木城陷落，13日海城又入敌手，宋庆便改变计划，拟与北面诸军取得联络之后，再共图收复海城，于是将全军二十余营屯于距海城二十里的缸瓦寨，未能趁敌立足未稳之际发起攻击，丧失了战机。12月19日，海城日军大股来袭，宋庆军大败，由缸瓦寨退往营口、田庄台一带。

日军攻占海城后，以孤军（约六千人）入重地，颇觉力单，于是，野津道贯率第一军司令部和军预备队由安东移驻岫岩（1895年1月5日到达），同时，请求第二军分兵一部协攻盖平，以便两军声势相通。1895年1月初，日第一军派遣第一师团之混成第一旅团约八千人由普兰店（今新金）北上。当时，驻盖平之清军只剩下章高元所部山东嵩武军八营、徐邦道所部拱卫军十一营、张光前所部亲庆军五营。1月5日，徐邦道部奉宋庆之命移驻牛庄（以便联络辽阳清军），盖平兵力更单。徐部出发不久，宋庆以日军混成第一旅团逼近盖平，令其回援。6日，徐部返抵蓝旗厂（盖平北面二十余里），宋庆又改变命令，令其开赴田庄台。徐部又回师北上，刚过营口，宋庆仍令其回援盖平，于是又折而南行。这样，徐邦道所部往返奔波于田庄台、营口、盖平之间，四昼夜未得休息。9日夜，徐部前锋进至盖平境时，日军已扑攻盖平。扼守东门外凤凰山的张光前部闻敌即溃，日军一部乘势攻入东门，然后出南门，绕至扼守南门外的章高元部之后。章部不支，刚赶到战场的徐邦道部也因疲惫过度，不堪任战，于是各部齐退营口。10日上午，盖平陷落。

1894年12月初，日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大将“因病”免职，奉召回国，由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继任其职（不久晋为大将）。第五师团长则由原近卫旅团长奥保巩中将担任（12月中旬离广岛来华）。

日第一师团之第一旅团（旅团长为乃木希典少将）奉命北上时，会诸队而编为混成旅团。

从此，日第一、二军声势联络，辽东清军进一步陷入被动。

三、清军反攻海城失败

自平壤之战以后，清廷以淮军不可恃，便起用湘军旧将魏光燾、李光久等，令其募兵北援。1895年1月，光绪帝又召湘军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入京，授为钦差大臣，令湖南巡抚吴大澂、淮军总统宋庆共同帮办刘坤一军务。

1月14日，清廷以日军既据海城，又陷盖平，关外军情更紧，乃令新授钦差大臣刘坤一迅赴山海关驻扎调度，节制关内外各军。并令自动请缨的吴大澂统率新疆布政使魏光燾所部新湘军、总兵刘树元所率抚标军、吴元恺所率恺字军等，“即日拔队出关，分起进发，会合宋庆等军，相机进剿”，于是，宋庆于田庄台坐待援军。

这时，奉命扼守辽阳的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和吉林将军长顺深感责任重大，一致认为，与其坐待日军来攻，不如乘其占领未固之际，先发制胜，于是商定，以集结于腾鳌堡、鞍山站一带的五十余营约二万人的兵力，“分左右两路，步步前往，相机规海”。1月17日，依、长两军已前进至海城北面，距敌人前沿阵地仅二里许。西路（依军）包抄至二台子，东路（长顺军）包抄至头河堡，东西绵亘近三十里。日军扼守城北欢喜山和双龙山（山上均筑有炮台），并有步、骑、炮兵列阵以待。当清军发起攻击时，日军步骑数千人在炮火掩护下蜂拥齐出。清军大半使用土枪，射程小，射速慢，加之“旗汉兵团心志不齐”，相持不久，西路依军先退，东路长顺军继之，第一次反攻海城遂告失败。

1月22日，依、长两军又分左右两路会攻海城。依军自长虎台向欢喜、双龙二山之间的三里桥突击，为欢喜山日军炮火所阻，又折而北，经沙河沿绕出欢喜山之西，拟攻海城之西北角。长顺军则从头河堡向海城东北的双龙山发动进攻，终因日军炮火猛烈而不得进。下午，日军发起反击，依军大量伤亡，经大富屯向西北方向退走。东路长顺军亦退。第二次反攻海城又归失败。

此后，山东半岛军事形势日趋恶化，清廷主战派为了从辽东战场捞回一点面子，急欲乘日军战略重点南移之机，一举收复海城。2月7日，军机处奉旨电谕长顺和依克唐阿：“此时各军俱到前敌，亟宜克期合剿。著长顺与依克唐阿同心协力，严饬诸将奋勇进战，务期一举攻拔，再向南路与宋庆会合，节节扫荡，军事当大有转机矣。”依、长二将鉴于前两次攻海失败，深感兵力尚单，商请宋庆出兵会攻。2月11日，吴大澂到达田庄台，其所部除道员李光久军（老湘军五营）已先期出关屯于牛庄外，总兵刘树元所率亲兵六营亦已到达牛庄。又总兵梁永福所率凤字军五营，也于前一日由田庄台开入牛庄。于是，依克唐阿、长顺与宋庆等商定，于2月16日以九十余营三万余人的兵力，再次反攻海城。进攻部署是：依军自北面进攻大教场为中路；长顺军进攻玉皇山为东路；李光久和徐邦道各率所部从柳公屯进攻唐王山为西路。当天，东西二路进逼颇紧。日军先则坚伏不动，继则步、骑、炮兵一

《军机处电寄吴大澂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十八，第17页。

《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十七，第38页。

《军机处电寄长顺依克唐阿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一，第25页。

齐出击。东路长顺军伤亡甚众，中路依军亦阻于欢喜山炮火，相继败退。西路李、徐两部见势不妙，也纷纷西走。这样，第三次反攻海城又未成功。

2月21日，清军上述各部再次会攻海城失败。在第四次反攻海城的同时，宋庆依约率所部毅军、铭军（统领刘盛休已撤职，改由姜桂题接任）及河南嵩武军（总兵刘世俊统领）等五十余营近二万人进攻盖平北面的太平山日军，一则配合攻海，一则为日后收复盖平作准备。宋庆军一度占领太平山，并与敌相持三日。24日，日军三面来攻，清军大败，退回营口以东地区，防止日军西犯。

清军四次反攻海城，虽不是决定性的战役，但其持续时间之长、动员兵力之多、涉及地区之广、战斗规模之大，在整个中日甲午战争过程中是仅有的。清军总的战略方针是消极防御，然就反攻海城来说，则属于具体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固然是由于海城战略地位重要，它的得失，关系到清廷“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方针能否实现，但主要还是由于日本侵略者当时的战略重点是海陆进攻山东半岛，全歼北洋海军，而在辽东战场上基本上取守势的缘故。

四、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地的失守

清军第四次反攻海城失败之后，还想进行第五次反攻。当时，“环海城而军者：两将军（依克唐阿、长顺）、一巡抚（吴大澂）、一提督（宋庆）、一藩司（魏光燾），共百余营，六万余人（按：宋庆毅军时已增至三十营）”。吴大澂所部湘军分布海城西北，控制通往牛庄的大道；依军分布海城正北，扼牛庄通辽阳的大道；长顺军分布海城东北，扼通向辽阳的大道。

日军方面，为了扭转局面，决定趁冰冻未解之际，由盖平、海城、凤凰城分路进攻：一由盖平北趋营口；一由凤凰城经黄花甸、三家子赴鞍山站；一出海城北攻依、长两军，经甘泉堡指向鞍山站之南。鞍山站系牛庄至辽阳之孔道。日军欲夺此要隘，示形逼攻辽阳，实将袭取牛庄。因为牛庄一旦有警，海城西面的湘军势将由于退路受到威胁而停止攻海。

2月28日凌晨，未等清军发起第五次反攻，海城日军第三师团便分路出击。激战约三小时，中路依军败退。恰在这时，辽阳南九十里之吉洞峪为出凤凰城的日军第五师团袭占，辽阳大震。辽阳知州徐庆璋请援于依克唐阿，依便托词援辽，率部北走，长顺军也随之而去。日军跟踪追击，一举夺占鞍山站。不久，第五师团也间道来会。除留兵一部控制鞍山站外，日第三、第五师团合军西指牛庄。

3月2日和4日，魏光燾、李光久先后率部回援牛庄。两部新老湘军共十一营，均困守市内。4日，日军三路围攻牛庄，李光久等弃军而逃。军士们深陷危地，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殊死搏斗，与敌相持竟日，最后伤亡近二千人，被俘六百余人。日军也死伤近四百人，其中有今田唯一等将佐军官十五人。这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唯一的一次大规模巷战。参战清军英勇拚杀，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牺牲精神。牛庄失守后，吴大澂率部由田庄台退往双台子，宋庆则连夜率全军主力退扎田庄台，只留少数兵力守营口。3月7日，由牛庄出发的日军轻取营口，并与盖平北上的日军会师。

田庄台四面平坦，加之当时辽河仍然封冻，更是无险可守。3月9日，日军第一、第三、第五师团分路来攻，宋庆军大败，伤亡枕藉。被围于田庄台内的清军则被日军纵火焚烧，死者二千余人。

田庄台陷落后，宋庆、吴大澂等率残部退往石山站（锦州东）。从此，自田庄台沿辽河而东，自鞍山站而西，皆为日军所占。清廷以淮军既溃于先，湘军复败于后，北洋海军亦已覆没，日军海陆交乘，畿疆危逼，于是束手无策，屈辱求和之心更为迫切。日本方面，则认为“作战的第一期已经结束，因此令‘征清大总督府’进驻战地，即将开始第二期作战”。

《中日战争》（一），第281页。按：日军为实行第二期作战，以参谋总长陆军大将小松宫彰仁亲王为“征清大总督”，以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任总参谋长，置“征清大总督府”于旅顺，并增调近卫师团和第四师团来华，准备参加直隶平原决战，后因《马关条约》签订而罢。

第九节 东北和山东人民的英勇抗战

由于清政府的消极抗战，清军在各个战场上先后战败，溃不成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人民群众除积极支援前线作战外，还自动拿起武器，杀上战场，进行了一系列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抗日武装斗争。

当日本第二军由花园口登陆进犯辽东半岛时，辽东人民立即开展各种形式的杀敌活动。抗日英雄高武，曾组织碧流河一带八百余户农民，以锄头、铁锹等为武器，袭击敌人军营，杀死不少日寇，最后和部分农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金州青年壮士陈宝财，串联四十五人，组成“红枪帮”，进行抗日。当日军第十五联队侵袭亮甲店、陈家店，转向刘家店北面高地时，红枪帮埋伏于凤凰山下落凤沟内，乘敌不备，把日军打得狼狈不堪。金州城沦陷的次日，日军到处奸淫烧杀。城内西街曲姓院内，男人皆已随徐邦道部转战他处，只剩下姑嫂五人及五个儿童。日军闯入其家，五名妇女用菜刀杀敌，然后连同五个小孩一起投井。后人写诗悼念：“曲氏井，清且深，波光湛湛寒潭心；一家十人死一井，千秋身殒名不沉。”金州城南三道沟有个叫阎士开的塾师，日寇以金钱利诱其充当向导，他严词拒绝，并痛斥敌人的滔天罪行。日寇以死威胁，他慷慨写道：“宁做中华的断头尸，不做倭寇的屈膝人！枪毙刀杀，任凭你们”。日本侵略者无奈，竟将他开膛残杀。

日军在旅顺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旅顺人民奋起还击，英烈悲壮之事，更是不胜枚举。南山冈铁匠苑某，年岁虽高，但身强力大，日寇闯进其家，他以大铁锤一连砸死数人，力战而死。南山陈家屯的陈永发，隐身暗处，待日寇探头而入，他手起斧落，杀掉几名日兵，后与敌人同归于尽。一少年装扮成乞丐，潜入日军兵营投放毒药，被捕后，义正词严地说：“予为国杀敌，早拚一死，所恨者，药屑犹余，未杀尽汝等耳。”¹ 说罢，毅然以头撞柱，英勇牺牲。

日第一军攻占九连城、安东向辽东深入时，同样遭到当地人民的武装抵抗。辽阳、凤凰城、岫岩、海城等广大地区，农民、矿工、猎户、渔民和部分爱国士绅，纷纷组织起来，几乎“无民不团”，燃起了保卫家园的抗日烽火。岫岩州东南的桂花岭地方，有个复来社，“居民皆习淘煤，俗呼为‘煤黑’，连村数十，自练乡团，贼来犯之，乡团极力堵御，以抬枪毙贼无算”。

不但处于第一线的辽东人民自动组织起来抵御日寇，沈阳以北以及吉林一带人民群众，也义愤填膺，奔赴前线。吉林夹皮沟的武装群众三千余人在其首领韩登举（外号“韩边外”）领导下，奔赴海城打击日军。由于“韩边外之名为敌所畏”，依克唐阿和长顺都曾借用其勇，“皆得其力”。辽阳知州徐庆璋是坚决抗战的爱国将领，他练民团数营，招集韩登举等武装群众，名为“敌忾军”。日军占据海城后，曾声言“必取奉天度岁”，由于敌忾军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174页。

吉林省历史研究所调查材料，转引自《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第91页。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第5页。

易顺鼎：《盾墨拾余》，《中日战争》（一），第113页。

易顺鼎：《盾墨拾余》，《中日战争》（一），第112—113页。

易顺鼎：《盾墨拾余》，《中日战争》（一），第119页。

勇敢善战，“颇著声望”，使日寇“据海城而不敢遽攻辽阳”，更无法前往奉天“度岁”。

在保卫家园的战斗中，吉洞峪一带的民团表现非常突出。他们在团长徐珍率领下，用抬枪、鸟铳在吉洞峪南面的韩家岭、宋家岭等处据险扼守，曾阻止大股日军的进攻。“各乡勇昼张旗帜，夜燃火把，出没往来，虚实兼用”，用巧妙灵活的战法痛击敌人。1895年1月17日，日军一股由潜家大岭进犯韩家岭时，民团奋勇抵御，鏖战三小时，毙敌数十名。日军纷纷逃走，团民乘势追击，夺回潜家大岭。19日，日军再次进犯韩家岭，企图报复，团民们怒火满腔，针锋相对，歼灭日寇数十人，并阵斩其督队官，缴获不少器械衣物。28日，日军五百余人进犯梨宝沟岭口，民团迎战，毙伤不少敌人。日兵争相逃命，团民追击十余里，日暮方收队回营。对于民团的上述英雄事迹，连盛京将军裕禄也不得不称赞“甚为奋勇可嘉”，专电“奏请奖励”。

东北人民在收复宽甸、长甸的战斗中，也是打得很出色的。早在凤凰城、安东失守之后，这里的群众便陆续成立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十个民团，每团一二千人不等。他们利用清军反攻海城之机，配合清军张锡奎部，主动出击，于1895年2月25日一举收复了宽甸。仅欢喜岭一仗，就毙敌七八十人，并生擒敌之督队官一名。3月1日，民团又配合清军乘胜收复了长甸。不久，“宽甸境内肃清，倭人阻河为守，暖水以东无倭人踪迹”。

山东半岛人民同样给了日本侵略者以应有的惩罚。在威海，长峰村人民自动组织起来，以木棍、农具为武器，多次和进村抢劫的敌人进行搏斗。卫家滩村的人民也组织起来夺取敌人武器，打得日寇不敢久驻一地。在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清军终于在1895年2月底至3月初接连收复了宁海（今牟平）、文登、荣成等地，使强占威海之敌甚感孤立。

东北和山东等地人民的英勇抗战，表现了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和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日本侵略者虽然战胜了清朝统治者，却始终没有使中国人民屈服。

《中日战争》（三），第334页。

白永贞等：《辽阳县志》，《中日战争》（六），第314页。

《盛京将军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一，第24页。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一），第33页。

第十节 《马关条约》的签订

早在平壤、黄海两战之后，清王朝内部的主和派就企图借战败重开和议。不久，慈禧起用中法战争时被她罢职的恭亲王奕訢主持总理衙门。奕訢随即请求各国驻华公使出面调停。英国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目的，向美、俄、德、法等国提出联合调停的建议，因未得到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而无任何结果。

日军侵入辽东半岛以后，清朝政府中的主和派又请求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美国政府看到，如果日本继续扩大侵略，可能引起列强干预，对日本不利，因此，通过其驻日公使谭恩向日本政府提出议和建议。日本虽在军事上获得了胜利，但已出现兵力财力不足的困难，并预见到列强为维护其在华利益而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正在增氏，因而表示不反对美国“友谊的仲裁”。不久，旅顺陷落，清廷大震。在美国的操纵下，几经磋商，清政府被迫答应派总理大臣张荫桓、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这一屈辱求和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有人甚至要求处死李鸿章，坚决反对议和。清政府迫于全国舆论的压力，加之对日本政府极为苛刻的议和条件难于接受，不得不一面求和，一面备战。

1895年1月31日，张荫桓、邵友濂到达日本广岛。此时，日本“山东作战军”正在猛攻威海卫，辽东日军正准备对牛庄等地发起进攻，气焰甚为嚣张。日本政府为迫使清政府接受其全部侵略要求，并在和议达成之前把阴谋霸占的地区拿到手里，便借口张、邵二人“全权不足”，拒绝与之谈判。伊藤博文竟指名要奕訢或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赴日乞和。俄国深恐日本损害其在东北的利益，于2月14日告知日本政府：“现在日本向中国要求割地是当然之问题，而俄国欲在太平洋沿岸获得自由通路亦非一日”。“日本要求割让台湾，俄国对此毫无异议。若日本放弃岛国之地位向大陆扩张版图，则决非上策。”这就明确告诉日本不能同它妄图侵占中国东北的野心相抵触。日本政府一方面利用俄国这一立场胁迫清政府割让台湾，一方面又竭力掩饰其妄图永久霸占辽东半岛的阴谋。

2月中旬，清政府迫于威海失守、北洋海军覆没的紧急形势，通过美国驻华公使转告日本政府：中国政府已任命内阁大学士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授与一切全权。3月上旬，辽东清军惨败，京津危急，清廷更急于求和。13日，李鸿章与其儿子李经方等由天津启程赴日。20日，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与日方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开始谈判。当时，日本大本营虽已任命“征清大总督”和决定以其全部野战师团（包括以北海道屯垦兵为基干组成的第七师团和近卫师团在内，共计八个师团）侵略中国，准备进行直隶平原决战。但首相伊藤博文等毕竟看到了日军“大举出征，防卫几乎撤尽”，是无视列强干涉的危险行径，因而极力主张在充分攫取侵略利益的情况下媾和。在清王朝内部，光绪帝及帝党首要人物翁同和等人反对割地，主张以赔款为条件与日本达成和议。但多数大臣面对日方的强硬态度，赞成以割地和赔款两个条件求和。其实，当时屯驻于山海关内外的清军尚有二十余万人，日本企图以倾国之兵进攻中国，迅速夺取北京，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如果清政府有心抗

转引自[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172页。

参见[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日文版第181页。

战，即使北京失陷，也可迁都再战。日本侵略者越是深入中国，战线拉得越长，其侵略野心大与人力财力不足的矛盾必将更为突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必将更加激烈，日本与其它列强之间的矛盾也势必扩大。因此，日本政府是不敢使战争旷日持久地打下去的。然而，昏庸的清朝统治者却看不清国际国内形势，更看不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抗日积极性，在敌人的军事进攻和外交讹诈面前，迫不及待地期望媾和了事。经过反复争议，李鸿章于4月17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承认日本控制朝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银二亿两，分八次交清；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商埠，日船可以任意航行各口；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建立工厂，装运进口机器；允许日军暂驻威海；定于5月8日在烟台换约。

《马关条约》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的规定，激怒了俄国。俄国立即联合德国和法国警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并限十五天内答复。在此之前，俄国已在东三省边境屯驻了数万军队，并有不断增兵的态势。这时，三国的军舰也纷纷在日本附近游弋，并下令保持战备状态。俄国所以不惜一战而进行干涉，主要是日本抢占了它准备抢占的地方。法国是俄国的盟国，同意与俄国进行武力干涉，以表示对盟国的支持。德国则另有打算，它之所以参与干涉，是为了在远东加深英俄、日俄的矛盾，减轻俄法同盟在欧洲对德国东部的压力，并借此机会在中国取得一个海军基地。面对三国的干涉，日本十分恐慌。因为它国内海陆军军备已很空虚，不仅对三个强国无法应付，即使单独对俄作战也无把握。这时，日本请求英、美出来反干涉。英国表示不愿得罪俄、德、法三国而保持中立。美国也不愿陷入反干涉的旋涡，只表示可以协助日本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迫其迅速批准条约。日本政府在此情况下被迫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但向清政府又勒索了三千万两所谓“偿金”。

辽东半岛表面上是“赎”回来了，但不久即被俄国以“租借”的名义霸占了主要港口旅顺、大连。这是俄国妄图霸占中国的一个严重步骤。

第十一节 台湾军民的艰苦抗日（1895年5月—10月）

台湾是中国的第一大岛，南北延伸约三百八十公里，东西宽约二十至一百五十公里，面积三万五千七百六十平方公里，山地约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中法战争之后，清廷鉴于台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改为行省，先后以刘铭传、邵友濂为巡抚。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命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率兵两营、福建水师提督杨歧珍率兵十营渡台，加强台湾防御。刘永福至台北后，又增募六营，共八营，仍号“黑旗军”。刘永福奉命帮办邵友濂军务，但不久邵友濂署湖南巡抚，清廷以布政使唐景崧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派人回广东招募散兵游勇，作为亲军，驻守台北，而令道员林朝栋率部守台中，令刘永福率部守台南。当时，台湾驻军共有三万三千人左右，其中驻台湾北部者约一万三千人，中部约一万二千人，南部约八千人。

《马关条约》签订之前，日本大本营即已派遣由大佐比志岛义辉率领的混成支队（三个后备步兵大队），在联合舰队的配合下，于1895年3月下旬侵占了澎湖列岛，为进犯台湾岛作准备。

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界群情激忿，纷纷谴责清政府的卖国罪行，主张继续抗战。台湾人民更是义愤填膺，纷纷举行罢市，有的拥入巡抚衙署，有的上书清廷，抗议割让台湾，坚决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但清政府复电署台湾巡抚唐景崧，谓“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又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因此，根本不顾全国人民的抗议，竟于5月2日批准了《马关条约》，后又无耻地向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林董保证：“中国和议既定，断无噉使台民自主之理。”5月下旬，清廷委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为特派大臣，赴台与日本委任的“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商办割台事宜。他们畏惧台湾人民的反对，到达基隆港后不敢上岸，于6月2日在一艘日本军舰上匆匆办理交接手续。为了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台湾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一场反对割让台湾的抗日战争（参见附图十九）。

一、台湾北部的作战

日本政府在李经方尚未办理交割台湾手续时，就迫不及待地要夺占台湾。早在1895年5月下旬，其近卫师团和常备舰队就已杀气腾腾地向台湾岛扑来。

台湾以台北为政治、经济中心，而基隆、淡水又是台北的门户。日军经过侦察，发现基隆、淡水都不易攻取，最后确定以基隆东面的三貂湾为登陆地点。由于福建水师提督杨歧珍已于5月26日撤兵内渡，基隆防兵甚单，其东路之三貂岭及澳底诸处，更是无兵防守，仅有少数新募成伍的“土勇”。5月29日，日近卫师团于三貂湾澳底附近的盐寮开始登陆，次日即占领三貂岭。6月2日，日军进占瑞芳，3日即分路进攻基隆，广勇溃散，基隆和台北要冲狮球岭均为日军所占。

蔡尔康等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四，第59页。

俞明震：《台湾八日记（附唐维卿中丞电奏稿）》，《中日战争》（六），第385页。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三，第9页。

唐景崧自5月下旬接到清廷“着即开缺，来京陛见，所有文武大小各员，着即陆续内渡”的电谕后，便惶惶不可终日，根本无心抗战。在基隆失守的次日，他即携带库银由台北逃往淡水，6日又乘德轮逃回厦门。日军由于不知台北虚实，不敢轻进，6月7日才派出八十人的先遣队，占领了台北，接着大举入城，并于9日攻占淡水。驻守彰化的林朝栋等得知台北吃紧，连忙发兵增援，行至新竹，听到台北已失，也步唐景崧后尘，逃回了大陆。

6月14日，以桦山资纪为头目的“台湾总督府”进驻台北，开始了日寇在台湾的殖民统治。

二、台湾中部的作战

在唐景崧等官绅畏敌内逃之前，台湾各地的爱国军民就开始组织起来，准备迎击日寇的进攻，因而在唐景崧等内逃之后，立即出现了以人民为主体的台湾军民艰苦抗日的局面。

台南绅民推举曾在援越抗法战场上屡建奇勋的刘永福统率各路抗日义军。刘永福在爱国军民的拥戴下，立誓死守台湾。他布告说：“本帮办则以越南为鉴，迄今思之，无日不抚膺痛哭，追悔无穷。”“自问年将六十，万死不辞。……愿合众志成城，制梃胜敌”。他以黑旗军为骨干，团结各路义军，肩负起抗击日寇的使命。

鉴于台北陷落，台中空虚，台南孤立，刘永福作了如下部署：以知州刘成良（刘永福子）及提督陈罗、游击李英、都司柯壬贵等分别率部防守旗后（今高雄市）大坪山炮台及四草湖、白沙墩、安平等台南海口；台南内地的防守，则以副将袁锡中率部防后山埤南各处，参将吴世添率部巡守台南府城；各部勇营和各路义军也分别派员联络和统带，布防各地。

当时，台湾西北部的新竹一带义军云集。新竹附近各村庄，组织“民团”，公推生员徐骧为民团长；新竹北埔人姜绍祖招募壮丁，组织义军，驻守大湖口（今湖口）；原淡水县吏胡嘉猷率地方武装驻新竹东北山海镇一带；苗栗县官员吴汤兴率数百人赶到新竹御敌；原林朝栋部下傅德星也率兵二营防守新竹城。

日近卫师团攻占台北后，兵力单薄，无法南侵，于是抽调侵占澎湖的比志岛义辉混成支队约三千一百多人协同近卫师团作战。6月中旬，日军分东西两路南侵：东路循山路经三角涌（今三峡西南）、大科嵌（今大溪）、龙潭坡，西路沿大道经桃园（今桃园）、中坜、大湖口，合击新竹。东路敌军进入山海镇附近的竹林时，胡嘉猷率义军死拒，由于众寡悬殊，被日军包围。当时，大科嵌人民正举义起兵，徐骧率领的民团也已赶到龙潭坡，军势甚锐，于是三角涌、三峡庄一带人民群起响应，对敌军进行反包围。日军大佐樱井等六十余人被歼。台北日军为探听东路敌军被围情况而派出的二十名骑兵，也被歼灭，仅一人逃脱。最后，东路日军残部逃向大湖口，与西路日军会合。

西路日军于6月13日进犯大湖口，遭到吴汤兴、姜绍祖所部义军的阻击，退回中坜。19日，日军再次进犯，又遭吴汤兴义军和徐骧民团的夹击。但义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二，第18页。

蔡尔康等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四，第59页。

军饷械缺乏，不能久支，遂撤出大湖口。23日，日军自大湖口攻新竹，义军为避开敌人主力，事先已主动撤出新竹城。

7月9日晚，义军分三路反攻新竹：傅德星率部攻东门，管带陈澄波率所部攻西门，吴汤兴率主力攻南门，姜绍祖、徐骧则各率所部从间道先进。但义军的反攻计划被汉奸侦知，以致日军预先在新竹四郊设下伏兵。攻西门的陈澄波部遭敌伏击败退。吴汤兴部攻南门不利，会合傅德星部，与据城东二三里之十八尖山的敌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义军既无大炮，又缺子弹，因而十八尖山得而复失，终未能攻克。姜绍祖率部支援十八尖山战斗时，遭敌截击，不幸被俘，后自杀。义军反攻新竹失败后，退往苗栗以北的尖笔山部署防御。

8月初，日本大本营决定增调第二师团及白炮队、工兵队、要塞炮兵队、宪兵队等加强侵台日军。其第二师团之混成第四旅团于8月9日在基隆上陆完毕。8月12日，日近卫师团长能久亲王即率所部部分路进攻尖笔山。义军不支，撤出了尖笔山一线。这时，刘永福已派营务处吴彭年率黑旗军一部（约七百人）北上助战，未等赶到，苗栗已失。吴彭年会合徐骧等义军退守大甲溪。

大甲溪是一道天然的屏障。8月22日，日军南犯。吴彭年率黑旗军埋伏于大甲溪南岸，乘敌刚过溪岸不备，发起猛攻，敌兵大败溃退。正当敌回逃半渡时，徐骧民军伏兵又大呼而出，堵截敌军。日军大乱，纷纷落水，死伤甚众。日寇大败后，不久又增调兵力来攻。当时，吴彭年已率部回守彰化，大甲溪一带由黑旗军管带袁锦清部与徐骧所率民团共同防守。由于日寇收买汉奸从后面偷袭，义军被敌包围。袁锦清力战阵亡。徐骧率民团与敌死战，冲出重围，退往彰化，大甲溪一线遂落入敌手。

大甲溪失守后，刘永福令各军在彰化境内选择大溪扼守，并据守八卦山，同时，派守备王德标统带亲兵七星营三百余人前往增援。八卦山位于彰化城东二里处，是县城的屏障，形势险要。8月27日，日寇自大肚进犯，分多路围攻八卦山。双方激战一天，日军仍不得进。夜晚，敌收买汉奸作向导，从山谷僻径爬上八卦山。义军与敌人白刃相接，展开了日军侵台以来最大的一次肉搏战。吴汤兴和吴彭年先后英勇牺牲，军士伤亡殆尽，民团也死伤过半。最后，徐骧率民团余部且战且退，突围南走。日军占领八卦山后，乘势攻陷彰化县城。同日（28日），日寇乘义军败退之机，抢占了鹿港。此后，日近卫师团按照桦山资纪命令，除向台南方向进行搜索、警戒外，暂停向南进军，以免孤军冒进，招致更大损失。29日，日军一部经员林街南下，相继占领云林（斗六）、斗南、大莆林（今大林），直迫嘉义。

日军所到之处，残杀乡民，焚烧房屋，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广大人民极为愤慨，纷纷组织起来，配合义军杀敌。大莆林一带地方武装首领黄荣邦、林义成、简成功及其子简精华等，也都率部投奔义军，表示愿效死抗日。于是，抗日义军的力量又得到了补充，并准备向敌人展开反攻，收复失地。但因彰化失守，嘉义吃紧，台南为之震动，加之饷械不济，军队士气有所低落。刘永福“激以忠义，并亲赴嘉义前敌诸营，指授兵机，军威复振。”他令王德标率七星营守嘉义，令副将杨泗洪率军五营赴前敌作战。

8月30日夜，杨泗洪率领所部进攻大莆林，简精华、林义成等率义民数

千人助战。日寇占领该地后，散居民家，警戒疏忽。杨泗洪带领百余人摸到敌营附近，四处纵火。敌遭突然袭击，仓皇逃窜。义军乘胜追击，杨泗洪中炮身亡。管带朱乃昌率所部直趋大莆林，途中与敌遭遇，简精华亦率队赶来相助，激战半日，日寇大溃。朱乃昌挥兵急进，与抄敌后路的黄荣邦、林义成等义军前后夹击，一举收复大莆林。这次战斗，杀敌数百，但朱乃昌也中炮身亡。之后，刘永福令都司萧三发统福字军前敌各营，令简成功总统一切义民军，令黄荣邦率义民两千五百人，林义成率义民三千人，随简精华大队前进，收复失地。

9月1日，王德标率七星营与嘉义知县孙育万及简精华等义军进攻云林县城，日寇弃城狼狈溃逃。王德标等会合义军追击，简精华率队猛进，把日寇冲为两段。一股日寇窜入山林，被林义成部切断退路，予以全歼；另一股逃回彰化城。黑旗军和义军反攻获胜，极大地鼓舞了台湾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杀敌决心。

9月4日，萧三发督率各军包围彰化城。但由于彰化地势险要，日寇兵力集中，炮火猛烈，义军几次攻击均未能得手，只得就近择地屯驻。彰化日寇也由于连遭打击，士气消沉，无力继续南侵，唯有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

台湾人民抗战局势已有好转，但台湾孤悬海外，大陆同胞虽有心支援，却遭到清廷严令阻禁。清政府下令封锁海口，断绝大陆人民对台湾的一切支援。刘永福派文案吴质卿（吴桐林）回到内地向各省督抚请求接济，均遭拒绝，致使抗日义军在兵力、物力、财力特别是武器弹药等方面，遇到极大困难。

彰化围城义军数千人饷械不济，连日饥饿。萧三发与简精华等商议，认为“相持非久计，不如并力前进，夺回彰化，或可驻足”，便于9月23日督率包围彰化的义军发起总攻。敌军负隅顽抗，义军不能克。24日，黄荣邦率部猛攻炮台，中炮身亡。25日，林义成也在率部进攻敌炮台时受重伤。其后，敌大队反攻，萧三发指挥部队力战，受创甚重。徐骧、简精华率义民往援，敌军始退。此时，前敌诸军求饷更急，刘永福束手无策，万分忿懑地说：“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

三、台湾南部的作战

日本侵略军自6月中旬开始南侵以来，受到抗日义军的节节阻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进展迟缓。9月中旬，日军援兵大至，使侵台总兵力累计达到八九万人。日军随即在台北组成“南进军司令部”，由率领增援部队来台的“台湾副总督”高岛鞞之助中将任司令官，大岛久直少将任参谋长，由近卫师团和第二师团共约四万兵力分三路进攻台南：陆军中将能久亲王率领近卫师团（约一万五千人），自彰化经嘉义顺大路直指台南；陆军少将贞爱亲王率领第二师团之混成第四旅团（约一万二千余人），在嘉义西部布袋嘴登陆，向台南翼侧推进；陆军中将乃木希典率领第二师团之第三旅团（约一万二千余人），于台湾南部的枋寮港登陆，经凤山（今高雄县）北指台南。

台湾抗日义军忍饥受饿，面对日寇的大举进攻，仍进行了不屈不挠、英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一），第106页。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一），第106页。

勇顽强的抵抗。

10月初，自彰化出发的敌军大举南侵，各路抗日义军英勇阻击。战斗中，萧三发阵亡，黄荣邦等受伤；敌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其近卫第二旅团长山根少将受了重伤，不久丧命。

10月7日，敌军开始进攻嘉义，被王德标部诱入城郊地雷区，半夜雷发，死伤数百人，能久亲王也受重伤，不久死去。次日，敌军集中巨炮猛攻嘉义城，协同王德标防守该城的民军领袖徐骧亲上城楼持刀指挥作战，大量杀伤敌军。义军也伤亡甚众。午后，敌人冲进城内，经过激烈巷战，嘉义县城失守，王德标、徐骧等率队退守曾文溪。不久，日军进逼曾文溪，炮火齐发，马步并进。义军既无炮队、马队，又乏粮饷，但士气激昂。徐骧奋勇当前，王德标等率队跟进，在炮火连天中驱杀敌人。徐骧、王德标等先后英勇牺牲，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日南进军司令官高岛鞞之助于10月6日自基隆乘“东京丸”出发，8日到达澎湖，与已经到达该地的第二师团会合。10日，混成第四旅团在布袋嘴开始登陆。11日，第三旅团在枋寮开始登陆。敌人一踏上陆地，就遭到台南义军和人民的拚死抵抗。侵略者供称：当其混成第四旅团在布袋嘴登陆之后，“东西南北，到处无不战斗”。“良民奔窜四方，不与我亲近，侦察敌情甚感不便”。

10月15日，日舰“吉野”、“秋津洲”、“浪速”、“八重山”、“大和”等炮轰旗后炮台，守将刘成良亲自登台拒守。“奸民夜引倭由僻径登岸，突入大营陷之，进围炮台。”守台将士死伤枕藉，不得已乘间突围，退守台南。

16日，由枋寮登陆北进的日第三旅团占领凤山，台南处于日寇南北夹攻的危险境地。

18日，南北敌军兵临城下，台南城中粮食断绝，守军开始溃散。早在8月23日，日寇“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曾托英国领事持书劝刘永福投降，遭到刘永福的严词拒绝和驳斥。但时至10月中旬，刘永福面对嘉义等地相继失守，抗日义军领袖陆续牺牲，军粮弹药已告断绝的困难局面，抗战决心开始动摇，于是，向日方提出了厚待百姓、准许官兵内渡的“建议”，遭到日方拒绝。10月19日晚，刘永福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违背其“万死不辞”的誓言，抛弃正在与日寇殊死搏斗的抗日军民，与其僚属十人从安平乘英国商轮逃回了厦门。

10月21日，敌军进入台南城。11月，日军在占领台湾所有重要城镇之后，宣告“全台平定”。但是，台湾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在与日寇“不共戴天”的誓言下，坚持了长达七年之久的游击战。即使在1902年以后，台湾人民反抗日寇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过。

台湾爱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继续，是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次抗战由于清朝政府的卖国政策，最后归于失败，但是，它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写下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光辉篇章，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参见洪弃父：《台湾战纪》，《中日战争》（六），第346—348页。

陈信德译：《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六），第500—501页。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一），第107页。

台湾抗战证明，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在整个抗战的过程中，台湾人民参加的踊跃，动员的广泛，斗争的英勇，战果的显著，都是前所未有的。他们虽然武器简陋，缺乏训练，但有着宁死不屈的决心。“日军被困于‘有全台皆兵之势’的猛烈的游击活动和疟疾之中，投入了五万兵力、两万六千名杂役人员以及联合舰队的大部分，对居民进行了无区别的屠杀，结果反而加剧了居民的反抗。”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付出了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以下四千八百名死亡和两万七千名负伤的巨大代价”。台湾军民浴血奋战，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悲壮诗篇。被台湾军民击毙的日军近卫师团长能久亲王（左二）

第十二节 中国战败的原因

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阶段中一次较大规模的侵略和掠夺落后国家的战争。从1894年7月日军挑起丰岛海战到1895年10月台湾军民浴血抗战基本结束为止，历时一年零四个月。这次战争，就陆海军实力来说，中日双方并无大的悬殊，从地理条件看，中国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特别是中国进行的是一场反对外敌入侵的正义战争，能够取得全国人民的支持。然而，战争却以庞大的清朝帝国败于区区岛国日本而告终。这种结局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现从总结战争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战败的原因作如下探讨。

一、腐朽落后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中日甲午战争前数十年间，中国和日本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改革和自强措施，然而，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发生于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但毕竟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实行了社会的、经济的改革，有力地促使日本从封建制度转化为资本主义。由于这种转化从一开始便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性质，所以在完成民族自强的过程中，日本很快发展为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是一个组织完备的军国主义国家，基本上具备了发动一场速战速决的侵华战争的军事和经济能力。发生于中国的洋务运动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清朝的军事力量，并针对日本的侵华野心进行了一定的防御准备；但由于这个运动始终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宗旨，因而既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富强问题，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封建社会腐朽落后的局面。直至甲午战争时期，封建专制主义的官僚制度仍然禁锢着整个社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时，极大地束缚着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官兵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政治热忱和军事行动，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

当时，清王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独专朝政，“颇想有所作为”的光绪帝即使在1889年“亲政”以后，仍然受其掣肘，纵有改革之策，也因后党的梗阻破坏而不能付诸实施。在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慈禧竟挪用海军经费大修颐和园，筹备六十庆典。她毫不顾及国家民族利益，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力主忍让，“但求从速和解了结，免得耽误做寿”。光绪帝不敢公开反对，只得“示意亲近的朝臣，多上主战条陈，企图借清议压迫西太后”。在战争爆发之前及整个战争过程中，后党主和，帝党主战，帝后党争此伏彼起，和战大计动摇不定，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后党中坚人物李鸿章，实际上总揽朝廷军政外交大权。他与慈禧沆瀣一气，战前一直坚持其“息事宁人”和“以敌制敌”的消极方针，对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做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与估计，军事上漫无布置，“专恃外国公使从中调处，借作说和之客，以图退兵之计”。当日军大量入朝，战云密布之际，李鸿章仍“一味迁延，希图转圜了事”，“直待严旨切责，始添兵前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64—265页。

《礼部右侍郎志锐奏倭人谋占朝鲜事机危急诸速决大计折》，《中日战争》（二），第624页。

往，而朝鲜之险隘要害已早为倭人所据矣。”战争爆发之后，后党仍然竭力求和。当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本土，列强深恐影响各自在华利益而再次酝酿“调停”时，李鸿章等唯恐失去“良机”，多方诱使外国干预。而日本方面，则认为“外国干涉之端已开”，“尤须特别迅速，在外国干涉尚未达到十分棘手以前，不论占领何地，皆为必要”。日本希望迅速战胜，以免列强干涉，李鸿章等则消极应战，等待外国干涉，“这在军事上必然得出日军猛进华军速溃的结果”。迨至旅大、威海连陷，辽东清军全线溃败之后，后党更加一意孤行，不惜割地赔款，乞和求降。慈禧、李鸿章等如此昏聩无能，国柄操于此辈手中，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自然是不可思议的。

二、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清军失败的主要症结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和清军高级将领，尤其是“欺朝廷则智，筹攻战则愚，抗廷议则勇，御敌兵则怯”，“甘受凌侮，屡失事机”的李鸿章，缺乏积极抗战的战略思想，死守其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致造成了“敌人步步占先，中国著著落后”的被动态势。

战争爆发之前，清军派赴朝鲜在日军之先，可是，海军不扼仁川，陆军不入汉城，仅驻仁川附近之牙山一带，险要之地拱手让给敌人。由于首鼠不前，意存观望，坐失先机之利，以致首战失败，士气为之大挫。

战争爆发之后，清廷在宣战诏书中提出了一个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但具体执行时，非但海军避战自保，陆军也实行株守以待的消极方针。本来，清军云集平壤，意在南北对进，夹攻汉城一带日军，而李鸿章等却主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一再抗拒光绪帝关于迅速进兵的谕令，致使平壤清军“束手以待敌人之攻”。当然，四路援军抵达平壤之际，牙山清军已战败北走，南北夹击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但当时日军除大岛混成旅团外，其余部队正在赴朝途中，清军在朝兵力优于日军，如能当机立断，一面继续增兵，一面长驱南下，在朝鲜人民的支援配合下，予日军以重大打击，不是不可能的。日军分路进犯平壤时，每路为数不多，清军如能集中兵力，主动出击，打敌一路，则减煞敌之进攻势头，甚至歼其一路，也不是不可能的。对于清军应主动出击问题，连日本军界人士也认为，当时日军包围攻击平壤，殊为危险，如果清军“拒止一方”，集中兵力向某路日军“转取攻势，则可得逐次各个击破之机会”。由于清军将领消极怯战，决心犹豫，以致坐失战机。

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抗登陆作战中，清军同样实行单纯守点、分兵把口的消极防御方针。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并向金州方向前进，严重威胁旅大侧后时，李鸿章仍令守军“各守营盘”。徐邦道等建议向皮子窝方向主动出击，也遭到赵怀业的反对。山东半岛作战时，戴宗骞鉴于“大连湾守兵不并力陆

《河南道监察御史易俊奏请责令李鸿章对倭事通盘筹画迅奏肤功折》，《中日战争》（三），第41页。

[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92页。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65页。

《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奏请振刷军士激励帅臣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八，第6页。

《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奏陈北洋情事请旨密查并请特派大臣督办天津团练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九，第25页。

[日] 誉田甚八：《日清战史讲授录·附录》，中译本第21—22页。

援，旅顺诸军不据南关岭而株守营墙，均以失事”的教训，建议采取“虽布近局，仍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的积极战法，无疑是可取的；然而，李鸿章不予采纳，仍坚持其“扼要埋伏地沟”的消极方针，以致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加上守卫要塞的将领大多畏葸无能，没有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因而要点也无法守住。清军消极防御的另一表现是，只注重于分兵守点，没有集中必要的预备队，置于有利于对付敌之进攻的机动位置，以增强要点防御的稳固性。这种主观指导上的错误，在两次抗登陆作战中都招致了不可估量的严重损失。

三、军事思想落后，组织指挥笨拙，远不能适应近代作战的需要

随着新的作战工具的出现，“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对军事制度逐步地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革，使之与军事技术装备的发展相适应。而经过了几十年洋务运动的清朝政府，虽然也通过购买和仿制近代武器而改善了军队装备，并多少进行了一些军制方面的改革；但由于社会制度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军事制度也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步。由于同样的原因，清军军事思想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因而组织指挥笨拙，远远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形势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指挥不统一，不能协调陆海军之间的动作，发挥整体力量。在海陆军联合作战条件下，只有实施正确的不间断的集中统一指挥，才能在统一的战略意图下协调前敌各军的作战行动，发挥整体威力。日本军国主义一贯重视军队的建设和集中统一指挥，甲午战争前夕，又成立了直隶于天皇的战时大本营，作为海陆军的最高指挥机构，统筹和协调与战争有关的重要事宜。为了集中使用海军力量，它建立了联合舰队，并调整了海军头目，以积极主张侵华的桦山资纪为海军军令部长，接替主张舰队取“守势运动”的原军令部长中牟田仓之助。在战争过程中，其大本营能及时了解和前线军情，基本做到了从双方实际出发，实施不间断的集中统一指挥。清军则不然。由于帝后党争不已，清廷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战争的组织指挥大权基本上操于李鸿章一人之手。他在慈禧的支持和庇护下，对主战派的意见和光绪帝的作战谕旨或者阳奉阴违，或者置若罔闻，迁延不办。因此，非但最高当局始终不能协调一致地统筹战争全局，制定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实施集中统一指挥，前敌各军也大多由于李鸿章的“因循怠弛”，漫无布置，而互不统属，往往各行其是，一盘散沙。综观中日甲午战争的全过程，清朝海军与陆军之间、陆军各部之间，都不能进行密切配合。如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两次抗登陆作战中，北洋海军既未进行认真的海上侦察和巡逻，没有扰敌于上船、航渡、登陆等任何一个阶段，又未能向自己军队的濒海翼侧进行策应，配合陆军实施反登陆作战，因而迭遭失败。陆路各军的隶属关系更是紊乱。金州、旅大唇齿相依，但金州方面归奉天指挥，旅大方面由天津指挥。山东方面，全省防务由李秉衡负责，不受李鸿章的节制，而北洋所属各军又不归李秉衡指挥。前敌清军这种隶属关系上的错综复杂，势必

造成作战指挥上的混乱，严重影响海陆协同和陆军各部之间的密切配合，以致为敌所乘，各个击破。

第二，缺乏抗登陆作战的起码知识。抗登陆作战，特别是半岛抗登陆作战，应考虑到敌人可能从正面强行登陆，更可能从侧后远方登陆，对主要攻击目标实行海陆夹攻。这是常识问题。然而，清朝最高军事当局对此却无明确认识，更无有效措施。在两次大的抗登陆作战中，都没有事先在敌人可能登陆的地段布置防御，也没有在旅大和威海军港的侧后实行坚守防御的得力措施。日军由花园口登陆时，由于地形不利，遇到不少困难，行动相当缓慢，是清军实施反击，迫敌背水作战的有利时机。可是，无论陆军和海军，都没有及时发现，更未能半渡而击，或机动兵力，在滩头挫败登陆日军。当敌人由侧后抄袭金州时，守军除部分部队依托山地紧急修筑临时工事阻敌进攻外，仍未主动出击。金州南部地势狭窄，形似蜂腰，是旅大的陆路咽喉。清军未能及时调动部队坚守金州，扭转败局，以致旅大后方裸露，咽喉被扼，建设多年的海军基地很快沦入敌手。事后，清军最高当局仍未汲取教训，在山东半岛的作战中重蹈覆辙，使日军得以沿袭进犯旅大的故伎，一举攻占威海，全歼北洋海军。

第三，不懂得正确使用海军。清朝海军军舰大多购自外洋，全部是新式装备，但是，组织编制和作战思想并无多大变化。北洋海军是整个海军的精华，其主要指挥官海军提督丁汝昌却不是海军出身，不熟悉近代海战原则。权力很大的外国雇员汉纳根等也是滥竽充数，并非真有本事。海军作为一个军种，本应有自己的作战计划，并应考虑如何实施海陆协同作战问题。日军渡海作战，夺取制海权是实现其战略方针的关键一着。中国海军为粉碎敌人的战略意图，则必须有计划、有准备地进行必要的海上较量。从当时双方海军力量的对比来看，互有短长。中国四支海军如能在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密切协同，不分畛域，集中力量对敌，与日本联合舰队争夺黄海制海权或局部制海权，特别是牢固控制渤海海峡，是完全有可能的。即使在黄海海战之后，中国海军仍可实行近海积极防御的方针，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为依托，以旅大、威海各炮台的岸炮火力为后盾，采取陆海协同、岸炮与舰炮相配合的战法，在一定海域内游弋，监视和牵制日本联合舰队的行动，并寻找有利条件下的攻击机会。这样，便可发挥清军兵力优势和本土作战的长处，减煞敌海陆军队的进攻势头，甚至粉碎其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登陆的企图。可是，中国四支海军非但未能联成一气，而且唯一参战的北洋舰队也被李鸿章视为私产，借口“保船制敌”，实行避战自保的消极方针，放弃争夺制海权。而在日本联合舰队已经驻泊朝鲜西海岸港口，并急于寻求与中国海军主力决战之际，李鸿章等又令北洋舰队在思想和物资准备都不充分的情况下执行护送陆军赴大东沟的任务，结果遭到日本联合舰队的袭击，造成了黄海海战的失利。之后，李鸿章故意夸大北洋舰队的损失，进一步压抑爱国官兵巡海迎敌的要求。旅大失守之后，北洋舰队株守威海，作茧自缚，偶尔出口巡弋，西不过登州，东不过成山而已。这种避战自保，坐以待毙的消极方针，终于招致了北洋舰队的全军覆灭。

第四，忽视战略战役侦察。利用各种手段，诸如海上侦察、战场侦察、敌后侦察等等，及时准确地获取战前定下决心和战斗进程中实施正确指挥所必需的有关敌人的兵力配备、作战意图、主攻方向、武器装备等方面的情报，是保障作战胜利的首要环节。日军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战前对朝鲜全境

和中国东北等预定作战地域的地形、天候、海岸设防、军队编制、驻防情况等无不一一探明，了如指掌，并进行了充分的有针对性的战争准备。战争进程中，同样十分重视战略战役侦察，连续获取可靠情报，据以定下决心。清军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战争准备不足，对敌人的情况、战略意图等事先缺乏了解，战争过程中又忽视战略战役侦察，往往主观臆断，或被敌人的佯动所迷惑，以致对敌人主攻方向一再判断错误，造成极大损失。

四、军队腐败，纪律松弛，装备不良，训练不足，造成清军战斗力低下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虽在军事改革方面作过一些努力，但由于清军固习太深，上层钻营舞弊、士兵纪律废弛、陆军湘淮争斗，海军各分畛域等现象依然比比皆是。战争过程中，清军将领中虽然涌现出诸如左宝贵、邓世昌、聂士成、刘永福等勇敢善战的人物，但也不乏畏敌如虎、临阵脱逃的败军之将，如叶志超、方伯谦、龚照珩、赵怀业、刘超佩、李光久等等。连自动请缨的湘军将领吴大澂，也“一遁于双台子，再遁于石山站，以致前敌军皆不支”。

由于将领畏葸无能，多数清军纪律败坏。如鸭绿江防线失守后，“逃军溃卒，势如潮涌”，卫汝贵所部更是“沿途肆掠，所过之处，鸡犬骚然，海城、盖平一带，居民逃避几空，畏官兵甚于畏倭寇矣”。这样腐败的军队，其战斗力自然是十分低下的。徐庆璋曾痛切地指出：“所失各城，非失于贼之殊能，实失于我之不守。且前敌各军，尔忌我诈，我前尔却，胜固不让，败亦不救，甚至败则退，胜亦退，步步退让，贼焉得不步步前进。”

军事技术装备方面，清军在洋务运动中虽有所改善，但与日军相较，毕竟存在不少差距。据估计，清军在甲午战争中尚有近百分之四十的士兵使用大刀、土枪等落后的武器作战。就是装备近代武器的部队，也是品种繁多，规格杂乱，不但各省军队武器不同，一营之中也往往类型不一，大大增加了战时弹药供应的困难。

清军缺乏训练，特别是陆军和海军都缺少在基本的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等方面具有相当知识的军官（而这正是使士兵获得军事知识的先决条件），以致有的士兵常常使用自己并不熟练甚至未曾受过操作训练的近代武器，与战术技术训练有素的敌人对阵，尽管其中不少人具有勇敢坚毅的良好品质，也难免受制于人，为敌所败。

五、脱离群众，不支持人民抗日斗争，是战争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自然不可能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可是，当外国侵略者打进国土，危及国家民族存亡之际，人民群众必然自发地以各种形式同入侵之敌进行斗争。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人民

《余联沅奏吴大澂畏葸无能请交部严议并撤去帮办片》，《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五，第 42 页。

易顺鼎：《盾墨拾余》，《中日战争》（一），第 111 页。

徐庆璋：《辽阳防守记》，《近代史资料》1962 年第 3 期，第 51 页。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501 页。

群众纷纷武装起来，以非常简陋的武器与日寇拚杀，给了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台湾人民的殊死抗日，更表现出了中华民族决心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清朝统治当局尽管有时也能利用一下群众抗日的热情（如嘉奖辽阳民团等），但在妥协投降路线的指导下，防民甚于防寇，非但不真心支持群众抗日，而且予以阻挠破坏。甲午战争爆发不久，就有人提出在天津兴办团练的建议，结果遭到李鸿章等人的斥责。清政府连兴办团练都要加以斥责，对于真正的抗日群众武装，自然更不容许了。更有甚者，当台湾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时候，清廷竟借口“有碍和约”，不但不接济饷械，连刘永福派人到大陆募集的捐款也被扣留。这种助敌殃民的卖国行径，终于导致了可歌可泣的台湾军民抗日斗争的天折。

除上述各种主观原因外，中国之所以战败，还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这次战争不但是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战争，也是列强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要指出的是，狡诈毒辣的沙皇俄国政府，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狼狈为奸，积极参与了这场罪恶的侵华战争。在战争爆发以前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沙俄的扩张重点已经移向远东，但鉴于自己在远东的力量还不雄厚，无法与英国匹敌，因而极力拉拢日本，在朝鲜问题上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以排挤清政府和英国的在朝势力。这就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战争爆发前夕，幻想“以敌制敌”的李鸿章四处奔波，请求外国干预，尤其对沙俄寄予很大希望。沙俄佯称愿意调处，实则怂恿日军挑衅。当日军云集汉城、仁川，丁汝昌等一再请求积极备战时，李鸿章继续被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关于沙俄允许调停之说所骗，对前线将士的要求不予理睬。这就给日军以可乘之机，招致了丰岛海战和成欢之战的失败。清军初战失利，对以后战局的发展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迨至日军进攻中国本土，相继占领大连、旅顺等地，沙俄发现日本的侵略活动已越出其许可的范围时，它便积极配合日本进行诱降活动。“日本政府得悉俄国政府如此赞助，甚为欣悦”，于是更加有恃无恐地接连攻占牛庄、营口，直逼津京。《马关条约》签订后，沙俄等三国干涉还辽，最后使甲午战争按照俄、日对中朝的分赃协议结束。之后，沙俄又以还辽“有功”，诱迫清廷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东北地区沦为它的势力范围。恩格斯早在 1894 年就指出：“中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起来的。”甲午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完全证实了革命导师这种鞭辟入里的深刻揭露。

[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 173 页。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第 285 页。

第十一章 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1900年6月—1901年9月）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速了争夺中国的步伐，使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危机。清王朝不积极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反而镇压民众的反帝斗争和救亡图存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1900年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并阴谋乘机瓜分中国，借口清政府“排外”，纷纷调兵前来中国，进而发动了一场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联合侵华的战争。为了保卫家园，中国军民在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中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妄野心。

第一节 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一、帝国主义在华争夺势力范围

《马关条约》签订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更加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虎视鹰瞵、争相吞噬的一块肥肉。实际上，当 1895 年初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时，帝国主义者就发出了“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的狂叫。随后，“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拚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在行动上“开始瓜分中国了”。

德国政府早就注意到，中国山东的胶州湾“作为港口而论，它在各方面都有重要的优越性”，亟欲占领，以便建筑海军基地。1897 年 11 月，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派军舰侵占了胶州湾。次年 3 月，又强迫清政府与之订立《胶澳租界条约》，不仅在“租借”的名义下强占了胶州湾，并把山东省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俄国于 1897 年 12 月 15 日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随后，俄国一方面从海参崴（今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派兵来华，以四五十艘舰船在中国海口游弋；另一方面又贿赂李鸿章、张荫桓，诱迫清政府于 1898 年 3 月和 5 月分别与之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及其《续约》。俄国强租旅大后的第二年，竟擅改租借地为“关东省”，不仅霸占我辽东半岛，而且把东北全境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法国于 1898 年 4 月迫使清政府答应租让广州湾，不久便划两广和云南三省为其势力范围。英国以俄、法的扩张会妨碍其在华利益为借口，趁机于 1898 年 6 月 9 日强租九龙半岛及香港附近的岛屿，接着又强租威海卫为军港，并宣布广东和云南的一部分地区及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于 1898 年 4 月胁迫清政府承认福建为其势力范围。美国当时正忙于向中南美洲扩张，无暇东顾，但它并没有放弃侵略中国的野心。1899 年秋，它提出了一个各国在华利益“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以保持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自由开放，保护其在华利益。

帝国主义在华夺取势力范围，强租军港，构筑炮台，建立军事基地，控制了北自旅大南至广州湾的许多沿海战略要地，并可将军舰驶抵渤海湾内各重要港口，从而使中国门户洞开，京畿腹心要地也处于侵略者的军事威胁之下。

二、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宗教侵略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首先，它们趁清政府无力筹付对日战争赔款之机，三次强迫清政府以高折扣、重利息向外国银行借了约三亿一千万两白银的外债，加上其它各项债款，共约五亿两白银。当

[苏]鲍·亚·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册，1955 年俄文版第 34 页。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214 页。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77 页。

据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载，三次外债是：1895 年 7 月向俄、法借款四亿法郎，折白银九千八百九十六万八千三百六十九点八二两；1896 年 3 月向英、德借一千六百万英镑，折白银九千七百六十二万二千四百两；1898 年 2 月向英、德借一千六百万英镑，折白银一亿一千二百七十七万六千七百七十九点七八两。

时，清政府每年的收入约八千万两白银，支出约九千余万两，根本无法从国家的财政收入中逐次偿还外债和利息，只得以关税、厘金、盐课作抵押，同时用增加苛捐杂税和发行内债等办法，把财政赤字转嫁给农民、手工业者及中小厂商、中小地主。其次，各国还从攫取的铁路修筑权中获取高额利润。据不完全统计，自1895年至1898年，被它们攫取的铁路修筑权竟达一万零二百公里之多。同时，各国还通过在华开矿设厂及大量输出商品等渠道，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此外，帝国主义在华设立的银行，也从为其对华商品输出服务，变为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经济侵略中心。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垄断了中国市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使中国民族工商业受到压抑和摧残，广大农民、中小商人、运输业和手工业工人大批破产和失业。

在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帝国主义还利用宗教作为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各国传教士即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窜遍我国的通都大邑和僻野乡村。到1900年，西方的天主教、耶稣教、东正教等，已经在中国建立了约四十个教区，六十多个教会，有外籍传教士三千余人，中国教徒八十余万。在帝国主义各国的胁迫下，清政府给予传教士以各种政治特权。他们所到之处，拆庙毁寺，霸田抢房，敲诈勒索，包揽词讼，私设牢狱，无故殴毙贫民。他们还收买地主恶霸、地痞流氓入教，纵使这些人为非作歹，肆无忌惮地欺凌百姓。还有不少传教士，实际上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无孔不入地刺探中国的各种情报，有的还直接参与策划侵华活动。

据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供认，他对中国内地消息的探知，主要是由于天主教牧师的帮助。更为严重的是，当时许多教堂都拥有武装，有的教堂内甚至藏有数门大炮和几百支枪。对于这些无恶不作的传教士，中国人民无不切齿痛恨，不断掀起反洋教的斗争，并逐步汇集成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的朝政大权再次被泥古守旧的慈禧集团所控制，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不可能指望这样的政府抵御帝国主义的瓜分和侵略，只有自己起来进行殊死的斗争，以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民族的生存。波澜壮阔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瓦德西（1832—1904），普鲁士波茨坦人。1866年为陆军少校。1870年普法战争时为上校参谋长。1880年升少将。1882年升中将，任德国副总参谋长。1888年继毛奇（1800—1891）为总参谋长。1900年升陆军元帅。同年8月启程来华，后任八国联军统帅。1904年3月死于汉诺威。

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称《义和团》——第三册，第45页。

戊戌变法，亦称戊戌维新，系1898年（农历戊戌年）中国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政治改革运动。1895年清政府被日本战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政治要求的康有为等，在北京发动参加会试的一千三百余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其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在各地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和报馆，大造变法图强舆论，影响遍于全国。1898年，光绪帝接受变法主张，起用维新人士，从6月到9月陆续颁发维新法令，推行新政。9月21日，握有军政实权的守旧派头目慈禧发动政变（史称“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变法运动失败。

第二节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最早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今河北）交界地区。它是在义和拳等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有不少无业游民。义和团的名称最早见于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次年秋起，清政府在公文中也开始使用这一名称。此后，“义和团”一词逐渐取代了“义和拳”，或与“义和拳”并用。

山东的教会势力极为猖獗，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也就异常激烈。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军事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鲁西北地区，群众经过长期酝酿，奋起抗教，终于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发源地。至1899年，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冠县一带的义和拳，以及朱红灯、本明和尚（亦称心诚和尚）领导的茌平、禹城、平原一带的义和拳，已相当活跃，声势甚大。他们在反洋教斗争中相互声援，有力地打击教会侵略势力，使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为之震惊。

长期以来，直隶人民也不断反抗教会的欺压，参加斗争的群众相当广泛。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不时攻打教堂。

义和团兴起以后，提出了许多反帝口号，如“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和“兴清灭教”、“洋人可灭”等等。在斗争过程中，义和团也张贴过反清的揭帖，如“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等。

义和团以宗教和军事合一为其组织形式。基层单位是坛（或称厂、炉、场、团），各坛人数不等，多至百人以上，少则五十人或二十五人。几个或十几个坛组成总坛（总团）。各总坛之间互相独立，不相统属。作战时分编为哨、班，一哨有五十至一百人，负责人称哨长（或队长、百长），哨下分班，每班十人，设班长（或称十长）。就其总体来说，义和团是一个没有统一领导和指挥机构的松散组织，主要靠揭帖聚会，有事时“传单一出，千人立聚”，事毕即散。青年妇女也有类似组织，名为红灯照，蓝灯照等。她们一般担任勤务工作，有时也参加战斗。

义和团的总坛首领称老师或老祖师，各坛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大师兄平时掌管坛内各种事务，战时负责领队和指挥作战。山东地区的义和团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及分编哨队各名目。有的义和团还有大元帅、副元帅、大先锋、军师、总管粮台等称谓。其中总办、统领一般由

包士杰：《拳时上谕·杂录》，《义和团》（四），第147—148页。

朱金甫、庄建平：《筹笔偶存 史料价值初探》，《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天津义和团揭帖》，天津历史博物馆藏。

劳乃宣：《拳案杂存》，《义和团》（四），第456页。

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3页。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159页。

有威望的教师担任；前敌、催阵由勇敢能战者充当（作战时他们骑马当先，往来督战）。义和团主要使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并有少量鸟枪、抬枪、抬炮等火器。

义和团有较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宣扬神道相助，刀枪不入等。但义和团制定的某些团规戒律，如“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毋贪财，毋好色”等，则体现了义和团反对邪恶、反抗压迫、保护善良等劳动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义和团运动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淫威，曾先后多次下令“速为剪除，……实力搜剿”，“切实弹压，毋令滋事”，“从严惩办，以靖地方”。但是，清军的武力镇压，动摇不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决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胜“剿”。于是有些官吏认为，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势必“激之生变，铤而走险”，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军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以求民教相安。清政府这种改“剿”为“抚”、被迫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的政策，使义和团得到了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以致声势日大，更加有力地打击了传教士和教民的凶焰。

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10月中旬，朱红灯指挥义和团击退数百名清军骑兵的进攻，后又进至距平原县城仅十八里的森罗殿。不久，朱红灯率众冲出重围，转至茌平。同年11月，朱红灯及本明和尚被清军游击马金叙部逮捕，后在济南遇害。此后，鲁西北地区的义和团在高唐县人王立言等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廷决心把山东义和团镇压下去。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统兵前往镇压。12月25日，袁世凯统率装备精良的七千名武卫右军到达济南。他见山东“民情强悍”，义和团民“所在多有”，便“分布队伍逐处弹压”。至1900年夏初，“各处拳厂，均已撤闭”，有的“潜匿僻壤，私相演授”。王立言等首领相继牺牲，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坚持斗争。

二、义和团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发展

当义和团在山东蓬勃发展时，与山东交界的直隶大名府、河间府等地区的义和团也积极开展斗争，其活动迅速遍及直隶东南各州、县。直隶总督裕禄虽一再调兵镇压，但义和团冲破重重障碍，从1900年春季起，向冀中地区

《京都顺天府宛邑齐家司马兰村义和团晓谕》，《义和团》（四），第148页。

佚名：《天津一月记》，《义和团》（二），第142页。

《军机处寄山东巡抚李秉衡电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页。

转引自《山东巡抚张汝梅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2页。

转引自《山东巡抚毓贤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8页。

《御史黄桂鋆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5页。

《山东巡抚张汝梅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16页。

《山东巡抚袁世凯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8页。

《山东巡抚袁世凯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4—95页。

迅速扩展。至4、5月间，保定、清苑、定兴、涿州（今涿县）、新城等地，已成为义和团活动的中心地区。

1900年5月12日，涿水县高洛村的义和团围攻正在添枪增炮、扩大反动武装的教堂，邻近的定兴、涿州、新城、易县各地义和团也纷纷前来相助，将教堂焚毁。定兴县的仓巨村也发生类似事件。法国天主教驻北京的大主教樊国梁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清廷命裕禄派兵镇压。裕禄派练军左翼马队统领杨福同率骑兵前往涿水县高洛村，逮捕和残杀数十名团民，迫使义和团向定兴县撤退。接着，杨福同又率部前往定兴县。5月21日，义和团二三千人在石亭村设伏。22日，清军刚到石亭村外，义和团突然发起围攻，持械猛扑，用长矛将杨福同刺死。5月27日，义和团攻占涿州城，并乘胜继续北上。

为了阻止清政府调兵，义和团先后破坏了高碑店、琉璃河等处的铁路电线，烧毁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芦沟桥等车站，连慈禧、光绪乘坐的“龙车”也被焚毁。清廷急命裕禄饬令直隶提督聂士成“将芦保、津芦两路电线铁道专派队伍妥为保护，毋任再有疏虞”。聂士成命驻保定的武卫前军统领邢长春和杨慕时迅速带兵沿芦保铁路北上，分别驻扎于保定至芦沟桥的大小十七个车站（大站驻一哨，小站驻半哨），企图阻止涿水、涿州等地的义和团北上。由于义和团逼近北京，慈禧紧急调兵加强布防。除调武卫前军加强京南兵力外，又调端郡王载漪的虎神营、庆亲王奕訢的神机营加强京城各门的防御（除永定门加派五营兵力外，其余各门均加二营）。慈禧还命军机大臣荣禄亲率武卫中军至马家堡、丰台一带布防。荣禄以三个营驻防马家堡，五个营驻防丰台。但是，清政府的增兵防堵，阻止不了义和团进入清王朝的心脏北京。

1900年初春，北京城内就有了义和团的活动。开始仅在僻静之处，后来公开在大街小巷传授拳艺，并在交通要道和教堂周围张贴揭帖。6月上旬，京郊各县义和团分批涌进北京。同情义和团的守城士兵，不仅不予阻拦，反而给他们喝道让路。北京居民也积极参加义和团，数日之内，全城设坛千余处。至6月下旬，北京城内的义和团“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

北京城内义和团的迅猛发展，使清朝统治者极为不安，唯恐祸起肘腋，危及他们的统治地位，不得不采取“因而用之，徐图挽救”的控制利用政策，派庄亲王载勋等总统义和团事务。

6月15日，北京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17日，当慈禧听信载漪等人伪造的列强要勒令她归政光绪的假照会后，她便利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义愤，煽动义和团及武卫后军于20日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但是，慈禧集团不久即玩弄明攻暗保的手段，一面虚张声势，一面暗中向使馆运送粟米瓜果，为日后议和预留后路。

与此同时，天津义和团运动也在蓬勃兴起。早在1900年2月，天津南门外就有人设坛练拳。6月初，静海义和团首领曹福田、新城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和女首领林黑儿等，率领团众先后进入天津。旬日之间，神坛林立，铸刀之声日夜相继，参加者约五万之众。他们烧毁教堂，惩办贪官污吏，打开监

《军机处寄直隶总督裕禄电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07页。

《军机处寄各省督抚等电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7页。

《军机处寄各省督抚等电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7页。

狱释放被捕的义和团员，夺取海关道军械库，用新式武器装备自己。裕禄慑于义和团的声势，也不敢再以武力镇压，便转而采取笼络手段。他对义和团首领以礼相待，请张德成当军师，给曹福田“大令一支，使掌生杀之权，并可调用各兵队”。裕禄此举，既可避免义和团对自己的威胁，又可利用其对付洋人，同时又不悖逆慈禧的意图。而义和团也就在6、7月间，以合法身分英勇地参加了围攻天津租界内的侵略军以及抗击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城的战斗。

第三节 八国联军的组成与清朝军事概况

一、帝国主义合谋武装侵华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帝国主义即以此为借口，合谋武装侵华。为了协调侵略行动，美国表示要与英国“同舟共济”，“合力以相助”；英国还以增加财政援助为条件，鼓动日本多出侵略军；日本将此次出兵中国，看作是将来掌握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霸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因而特别积极；俄国则大肆鼓吹“只有列强有力坚决的合作才能制止运动”，它也是派兵最多的国家之一；法、德两国支持俄国的立场。于是，它们很快联合起来，共同进攻中国。

早在1900年4月6日，英、美、法、德公使即联衔照会清政府，要求在两个月内将义和团一律“剿灭”，“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5月30日，英、法、俄、美公使又至总理衙门进行威胁，声称“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的威逼，同意各国调少量兵员来京。5月31日至6月3日，英、美、法、德、日、意、俄、奥等八国以保护使馆为名，先后共派官兵四百四十二人进入北京。

帝国主义为了集中力量镇压中国北方的义和团，并保护其在南方各省的利益，决定采取拉拢南方各省督抚的办法。6月26日，以美国总领事为首的各国领事，同当时在上海的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串联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中心人物）以及上海道台余联沅会商后，订立了所谓《中外互保章程》。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上海制造局的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不久，四川、闽浙、陕西、山东等省督抚也起而附和。这个章程虽未正式签订，但实际上按此实行。这就使帝国主义侵华枢纽上海以及列强在中国东南各省的利益，不受人民反帝运动的冲击，解除了在北方用兵的后顾之忧；同时，增加了东南各省的独立性，削弱了清政府的权力，大大减少了清政府兵员、粮饷、军火的来源，严重影响了北方清军的作战。

帝国主义各国在协调彼此关系和拉拢南方地方实力派的同时，积极搜集直隶、京津地区的地形、气象、交通、通讯以及清军布防等军事情报，并大量调兵来华，积极进行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

二、八国联军的组成

从1900年5月开始，帝国主义各国分别从在华军事基地、殖民地国家和国内抽调兵员，由军舰和运输船载运至大沽、塘沽，并进入天津租界。至6

[日]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义和团》（三），第172页。

1900年6月7日《驻北京公使密电》，《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18页。

[日]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义和团》（三），第169页。

转引自胡绳：《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112页。

金家瑞、林树惠：《有关“东南互保”资料》，《义和团》（三），第338—339页。

月10日止，进入天津租界的日、英、俄、法、德、美、意、奥八国陆海军达三千余人。此后又陆续增兵，最多时总兵力达十二万八千余人（实际参战兵力约三四万人），装备火炮二百七十六门。各国军队的数额及编成情况大致如下：

英军两万余人。司令为盖斯里少将。其中有英国军官五百人，士兵五百五十人；印度军官六百人，士兵一万七千余人；海军陆战队一千二百余人。共编四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另有杂役团一万三千五百余人和向导一千三百余人。共约三万三千四百余人，随带火炮十四门、骡马两万余匹。

法军一万五千六百余人。司令为福里少将。共编两个旅：第一旅为本国驻军，下辖三个步兵团；第二旅为殖民地驻在军。另有海军陆战队四百余人。加上附属人员，共约两万人，随带火炮六十门、骡马一千六百余匹。

德军两万三千七百余人。司令为瓦德西元帅。计有本国常备军一万一千人，殖民地驻在军四千五百人，新征军七千人，编成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营，另有海军陆战队一千二百余人。共有火炮六十二门。

俄军两万人。司令为李涅维奇中将。由俄国的欧洲地区及东西伯利亚的驻军第二、五、六、七、九、十、十二、十五等八个步兵团、九个骑兵连、六个炮兵连等编成。加上附属人员，共约两万三千人，随带火炮四十四门。

日军两万二千余人。司令为山口素臣中将。主力是步兵第五师团的第九旅团（辖第十一、四十一联队）、第二十一旅团（辖第二十一、四十二联队），加上临时配属的步兵第十二联队，总计有五个步兵联队。另有骑兵第五联队、野战炮兵第五联队和第十六联队下辖的第一大队、工兵第五大队、辎重兵第五大队，以及临时派遣队的两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工兵中队。还有海军陆战队三百余人以及其它附属部队。共携带火炮五十八门。

美军五千八百余人。司令为沙飞上校。由美国本土及吕宋岛驻军编成三个步兵团（第九、十四、十五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营及一个炮兵连。另有海军陆战队约一千人。共携带火炮三十门。

意军两千余人。司令为伽略尼大校。由三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连、一个工兵排、一个辎重兵排编成。另有海军陆战队六百余人。共携带火炮四门。

奥军三百人。司令不详。主要是海军陆战队一个营。

八国联军中，除日军第五师团是整建制外，其余多系临时抽调编成。出兵较多国家的军队，一般均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铁道兵、舟桥兵等兵种，还有电信队、汽车队、医疗卫生队（或野战医院）、野战兵工厂、粮秣供给队、氢气球队（英军和法军）、杂役队等勤务分队。

八国联军开始没有联合指挥部，作战时通过司令官联席会议分配任务。联军在北犯之前就酝酿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但因各国为争夺总司令一职相持不下，一直拖到1900年8月17日才勉强同意由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担任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迟至9月下旬才到达天津。

侵华联军都装备有当时世界上比较精良的步机枪和火炮。其中步枪的口径在六毫米半至八毫米之间，射程为两千米左右，枪重不超过五公斤，单兵可携一百至一百五十发子弹。机枪主要有马克沁、哈齐开斯、勃朗宁等，射程为两千米左右，每分钟发射四百至六百发子弹。火炮大部为中小型的野战炮和攻城炮。所有枪弹炮弹均使用无烟火药。各国军舰的攻击力、防御力、载重量、舰速、机动能力和续航距离等，比以前均有很大提高。

三、清朝的军事概况及兵力部署

甲午战争以后，清军总数虽逾百万，但能战之兵不多。其中有早已形同虚设的八旗兵二十六万人和绿营兵近六十万人，战斗力很差的勇营、练军十万八千余人，淮军三万余人，以及北京城内的神机营、虎神营等。北洋舰队覆灭后，海军没有恢复起来。戊戌政变后，慈禧为了加强京畿防御，委派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荣禄节制北洋海陆各军。荣禄即奏请编组武卫各军。“以武毅军驻芦台为前军，甘军驻蓟州为后军，毅军驻山海关为左军，新建军驻小站为右军，别练万人驻南苑为中军”。武卫五军共约六万人，武器装备优于其它各军，编有步兵、炮兵、骑兵、工兵各兵种，初具合成军队规模。此外，清政府还命湖北提督张春发招募十营，编成武卫先锋左翼，江西按察使陈泽霖招募十营，编成武卫先锋右翼，以便声援京师。

武卫各军及淮军、练军主要装备近代枪炮。这些枪炮一部分直接购自国外，一部分由汉阳兵工厂及江南制造局用进口原料仿制。主要有毛瑟、马梯尼等步枪，克虏伯、格鲁森、阿姆斯特朗等厂生产的火炮以及仿制的中小型火炮。这些枪炮的射速、射程等主要技术性能，与侵华联军同种枪炮相差不多，但因枪弹炮弹大部分使用有烟火药，杀伤威力较差。

战前，在直隶、京津地区建筑的津榆、京津、芦保等铁路已经完工，可以用来调运军队。除铁路外，北京至天津、大沽、保定、山西、宣化、张家口、承德等地，都有质量不等的道路相通。此外，从通州至大沽，还可以经北运河、白河（今海河）运输兵员、军械、粮饷。同时，这一地区各府、州、县城之间，都有有线通信线路，并可与全国不少省城联系。全区各地还普遍设立了邮政局。所有这些，对于清军的兵力机动和改善作战指挥提供了条件。

战争爆发前夕，在直隶、京津地区的清军共有十一万三千人，其配置如下：

北京地区约六万五千人。荣禄自统武卫中军三十余营一万二千九百四十人，驻南苑；尚书衔武卫后军总统董福祥部二十个营六千七百八十六人，原驻丰润、玉田一带，6月10日后调驻北京东南郊；奕訢部神机营二十五个营一万四千余人，载漪部虎神营十四个营八千六百四十人，分守北京各城门；此外尚有八旗、绿营兵两万余人，驻北京城内。

天津地区约两万五千人。直隶提督、武卫前军总统聂士成部三十四个营（队）一万五千零七十人，驻芦台、开平一带；天津镇总兵罗荣光部淮军十个营四千七百五十人，驻大沽、天津等地；总兵李安堂部淮军五个营二千三百一十八人，驻北塘、圣头沽一带；总兵何永盛部练军六个营两千五百人，驻天津；工部侍郎、武卫右军总统袁世凯率七千余人去山东后，余部三千余人驻小站。

山海关地区约一万四千人。总统武卫左军、四川提督宋庆及会办武卫左军、浙江提督马玉昆部二十五个营九千八百零六人，驻山海关内外（6月17日后，宋庆、马玉昆部奉命陆续赴津）；淮军总兵吕本元部五个营两千五百人，驻山海关一带；八旗兵马步千余人守山海关城。

保定、正定、大名府等地驻有练军十六个营，约五千五百人。

宣化、永宁、古北口、热河（今承德附近）一带，驻有练军十一个营三千二百余人。

此外，清廷又于6月中旬谕令各省督抚迅速挑选马步队伍星驰赴京，听候调用，并令马玉昆、张春发、陈泽霖、袁世凯等迅速统兵来京；同时，招募民团、乡勇及一部分精壮义和团员，编练成军，以增强北京和天津的防御力量。但是，各省督抚接到谕令后，或借故推诿，或行动迟缓，真正应命前来参加勤王作战者寥寥无几。

第四节 大沽、天津之战（1900年6月—7月）

一、义和团及清军英勇阻击西摩尔侵略军（参见附图二十）

列强于1900年5月底6月初派兵四百余人进入北京后，6月9日，驻天津各领事又开会决定，再从驻天津租界的三千余官兵中抽调两千余人，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美国海军上校麦克拉率领，分批乘火车进入北京。

6月10日上午9时，西摩尔率第一批八百余人（携带火炮数门）乘火车自天津出发，后续部队拟于三日内分批离津北上。当时，京津铁路有些地段已被义和团拆毁，西摩尔派兵边修边进，次日下午方抵廊坊。当西摩尔督队抢修前方铁路时，附近的义和团员手持大刀、长矛冲上前去，同敌人展开白刃战，迫使侵略军逃向廊坊车站。义和团紧追不舍，将侵略军围困于廊坊。6月14日晨，侵略军正欲继续北上，义和团三百余人高声疾呼，冲向廊坊车站，毙伤敌兵多人。当日下午，义和团还对留守落垡车站的侵略军进行袭击，西摩尔不得不派兵回救。

鉴于前进无望，西摩尔于6月16日率部撤至杨村。18日14时30分，董福祥部甘军三千余人及义和团二千余人，向尚留于廊坊的侵略军两列火车发起进攻。经过八十多分钟的激烈战斗，毙伤敌五十余人。侵略军撤至杨村车站后，又遭义和团包围袭击，死伤近四十人。

6月19日晚，西摩尔侵略军已处于缺粮少弹、被动挨打的窘境，遂决定抢夺附近民船数艘，运载伤兵、军械，顺北运河撤回天津，部队则沿北运河东岸徒步行军。6月20日，侵略军从杨村撤退。

侵略军在向天津撤退途中，仍不断遭到义和团及清军聂士成部的袭击。6月21日14时半，在北仓、穆庄与聂士成部发生激战。聂士成亲自指挥作战。侵略军受创甚重，白天不敢行军，夜间拚命狂逃，于6月22日2时左右抵近天津西北郊的西沽。该处有清军的武库（军械局），内贮大量枪炮弹药，周围墙垣甚厚，防御条件较好。驻守该库的清军为练军卞长胜、陶良才部。此外，武卫前军左路统领杨慕时部也于6月21日上午10时左右由保定到达西沽。由于守军疏于防范，杨慕时部又仓卒赴战，武库于22日凌晨被侵略军攻占。西摩尔侵略军得到了粮弹补充，获得了喘息机会；但由于沿途连遭袭击，死伤已近三百人，又抽出数百人抬伤员，能战之兵已不满千，很难通过清军及义和团的驻区进入租界，只得暂驻西沽，并秘密派人前往租界求援。6月26日，侵略军摧毁西沽武库，在千余援军接应下退入天津租界。

这次作战，义和团及清军共击毙侵略军六十二人，击伤二百二十八人，彻底粉碎了西摩尔所率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特别是义和团的勇敢精神，使侵略军大为震惊。战后，西摩尔心有余悸地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灭。”6月20日，侵略军已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如果当时廊坊一带的董福祥部南下紧追，聂士成部在杨村、北仓一带全力堵截，同义和团数千人协同作战，有可能将敌全部歼灭。但是，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慈禧竟令董福祥部回京围攻使馆区，从而丧失了南北夹击逃敌的战机。聂士成部在杨村、北仓的阻击战中，大多以村庄为阵地，远离运河河道，遥向敌人开炮。虽然炮声隆隆，但杀伤敌人不多，

加之没有切断运河航道，致使侵略军得以乘夜暗窜越北仓，逃至津郊西沽。侵略军夺占了西沽武库后，在津清军未能集中兵力组织围攻。6月23日晨，杨慕时部一度攻入武库，但卞、陶两部竟观望不战，结果杨部因兵力不足，被迫退出。6月26日上午，西摩尔沿铁路撤回租界时，附近清军不积极出击，最后终于丧失了全歼该敌的良机。

二、大沽失守

正当西摩尔侵略军在廊坊受到义和团及清军阻击时，联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侵占了大沽。

大沽是天津的门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该处炮台进行了修复和改建。八国联军进犯前夕，南北两岸共有四座炮台：主炮台在白河口南岸，安设各种火炮五十六门，并有发电所、电信局各一处，探照灯两具；主炮台之南建有一座新炮台，安设各种火炮二十门。白河口北岸建有北炮台，安设各种火炮七十四门，并有电信局一处；北炮台之西北建有西北炮台，安设各种火炮二十门。这些火炮大部是克虏伯、阿姆斯特朗式和国内仿制的产品。

驻守大沽炮台的清军，有天津镇总兵罗荣光部淮军六营三千人及一个水雷营。此外，还有叶祖珪所率北洋海军“海容”号巡洋舰一艘和“海龙”号等鱼雷艇四艘，泊于白河口内。

根据以往的不平等条约，列强的舰船可以出入白河口而不受任何阻拦。1900年5月底，大沽守军拟增兵驻守火车站，控制大沽至天津的铁路交通，并在白河口布设水雷，控制外国舰船出入。帝国主义者得此消息后，6月15日在俄国旗舰上开会，研究确定了从水陆两路攻取大沽的作战部署，当即令先已驶入白河的十艘吃水较浅的千吨以下舰艇做好作战准备，并派遣日军三百名（随带火炮两门）于当晚至塘沽登陆。16日，各国海军头目又开会精心策划，并令已在白河内的各舰驶泊各自的作战位置：日舰“爱宕号”、美舰“莫诺卡西”号驶靠塘沽火车站附近的白河左岸边，以便保护车站；英水雷驱逐舰“惠钦古”号、“弗爱摩”号驶靠清军水雷营附近，监视北洋海军的四艘鱼雷艇；法炮舰“利天”号、德炮舰“伊尔契斯”号驶靠位于塘沽、大沽之间的海关附近；俄炮舰“基里亚克”号、“考里埃芝”号、“保布尔”号驶靠白河右岸东沽附近；英巡洋舰“阿尔舍林”号在俄舰北侧于家堡对岸，以便共同炮击南北炮台。各舰装备有七至二十厘米口径的速射炮，还有不少口径为三十七至四十七毫米的机关炮。当日，又有英、德、俄各军约六百人，由德国海军大校波尔指挥在塘沽分批登陆（连同15日晚登岸的日军，共有九百余人），准备从侧后进攻大沽炮台。至此，联军的作战部署已基本就绪。

这时，大沽守军也加强了炮台的守备，并于6月16日在白河口布设水雷，封锁航道，阻止敌军舰船出入。联军即以此为借口，由俄国海军副司令海尔布德朗出面，于16日19时半给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胡说清军在白河口布设水雷及加强大沽防御，“于我西人代平匪乱一事，实有不便”，无理限令中国守军于17日凌晨2时交出炮台。驻天津各国领事也将同样内容的通牒递交裕禄。罗荣光严辞拒绝，并立即传令各炮台准备战斗。

6月17日零时50分，距通牒限定的时间还差七十分钟，侵略军便开始进攻大沽炮台。泊于白河的联军舰艇首先发炮轰击南北两岸炮台，守军被迫还击。这时，集结在塘沽的联军分左中右三路直逼西北炮台。在敌军猛烈攻

击下，西北炮台于5时左右失守。6时许，联军未遇抵抗便占据了北炮台。之后，左岸陆路联军从北炮台，法、俄各舰从所在位置向南炮台猛烈轰击。同时，俄、德、法军一部，由北炮台附近渡至白河南岸，从侧后抄袭南炮台。南炮台守军腹背受敌，弹药库又中弹起火，伤亡不断增加，被迫撤退。至6时50分，大沽炮台全部失守，清军残部向新城方向退走。此次作战，清军阵亡七八百人，北洋海军“海容”号巡洋舰及四艘鱼雷艇也被联军掳走。联军死五十八人，伤一百九十七人，并有四艘战舰负伤。

联军夺占大沽炮台后，控制了大沽口和火车站，使海上援兵能够顺利地运往天津，给津京、直隶地区军民的防御作战增加了不少困难。

大沽炮台的失守，与清政府在兵力部署上采取重北京而轻津沽的方针有很大关系。6月上旬，各国军舰云集大沽，侵略军大批上岸的时候，清政府仍没有增派军队加强大沽、塘沽、北塘的守御，致使分守大沽炮台、火车站、海关等地的三千清军，在毫无外援和不能互相策应的情况下，被侵略军各个击破。其次，大沽炮台的失守，还与战备不及时有关。守将罗荣光，直至侵略军的十艘舰艇驶入白河作战位置后，才在白河口布设水雷，封锁航道；九百多名敌海军陆战队在塘沽登陆时，也没有及时采取应急措施，致使联军顺利实施水陆夹攻，在六个小时内即夺占了整个炮台。大沽炮台的失守，也反映出炮台构筑的落后，如炮位及军火仓库，都没有采取荫蔽、伪装和加强保护的措施，全部暴露在外，成为敌人轰击的目标。在守备战术上，罗荣光以绝大部分兵力分守几处炮台，台外缺少机动兵力，以致当敌人从侧后抄袭时，不能组织有效的阻击，粉碎敌人的进攻。事实再一次证明，孤立地防守炮台，总是难以守住的。

三、天津之战（参见附图二十一）

6月19日，清廷还不知道大沽炮台已经失守，但已接到6月17日裕禄关于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折，于是一面令裕禄固守大沽炮台，一面照会各国公使，抗议列强的无理行为，并要求各国驻华公使于二十四小时内从北京撤往天津。鉴于形势严峻，慈禧于6月16日至19日多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当时，光绪帝存有依靠列强恢复自身权力的幻想，因此，以他为首的帝党，对外主和，对内主“剿”。他们认为，“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并提出“乱民当早除，不然，祸不测”。中央和地方的洋务派官僚也主张与帝国主义媾和，全力镇压义和团。以慈禧为首的后党本来也不愿与帝国主义作战，但当时和帝国主义存在一些矛盾。特别是慈禧欲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大阿哥（帝位继承人），逼迫光绪让位，各国公使表示不予承认，这使她对帝国主义列强非常不满。在载漪等顽固派成员的怂恿下，她决定对各国宣战。6月21日，以皇帝名义发布了一个宣战诏书，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但是，慈禧的宣战并非出于真意，宣战不到十天，就以军机处名义命令驻外公使向各国解释宣战乃出于“万不得已”的苦衷，表示“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义和团》（一），第13页。

《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3页。

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这充分暴露了慈禧等人假宣战、真妥协的嘴脸。

其实，早在清廷发布宣战《上谕》之前，天津的义和团和清军已与紫竹林租界内的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当时，驻守天津城区的清军有：总兵何永盛部练军六营两千五百人，驻守天津城东侧、东机器局、马家口及西沽武库至三岔河口一带；水师营驻三岔河口北岸炮台及金钟河火药库；罗荣光部淮军四营一千七百五十人驻城东及紫竹林租界西侧；武卫前军聂士成部十营约五千人，分别驻守城西南的广仁堂、南门外海光寺、南机器局、紫竹林租界东北侧及老龙头车站北部一带。总兵力约一万人左右。参战的义和团约有二三千人。租界内的联军则不足两千人。

6月15日前后，天津的义和团激于义愤，焚烧了马家口及三岔河口望海楼等地的教堂。联军开枪镇压，义和团奋起还击。17日，当联军再次开枪镇压时，驻防清军也配合义和团进行还击。练军炮击紫竹林租界，水师营炮击老龙头车站，曹福田则率义和团民袭击老龙头车站及租界内联军，揭开了天津军民反侵略战争的序幕。从18日至22日，清军各部及义和团连续围困和炮击租界。意大利军司令官、英国的戒严司令官都受重伤。俄国领事馆、太古洋行、英租界的工部局、戈登堂及德军司令部都遭到炮击。被围联军因兵力单薄，只得实行缓兵之计，“皆高挂白旗，以示不战”。但义和团及清军没有停止攻击，只是由于缺乏统一的作战计划，仅限于炮击和袭扰而已。

从当时的兵力对比看，天津一带的清军至少比紫竹林租界内的联军多四至五倍，再加上义和团数万人，居于绝对优势。如果清军与义和团密切配合，实行分割包围的战术，有可能将分兵把守紫竹林租界的联军各个歼灭。但由于清军天津地区的最高指挥官裕禄根本没有决心真正同联军作战，以致丧失了有利战机。

至6月22日，双方在天津的兵力都发生了变化。这时，武卫前军杨慕时部三营一千余人已抵北郊西沽、红桥一带；聂士成已率武卫前军约五营两千余人回师天津；又有从大沽撤至津郊的淮军六营约两千人，其中一部驻租界西马家口附近。义和团主要有：曹福田部在老龙头车站附近，韩以礼部在天津西南郊一带，被称为“天下第一团”的张德成部五千人在马家口一带。

联军则于6月21日（一说18日）由俄国军官斯泰赛率领两千八百余人，从大沽乘火车增援天津。这股侵略军行至军粮城车站时，因铁路被毁，改为步行，后在老龙头车站附近遭到义和团曹福田部及部分清军的猛烈阻击，死伤五百余人，第二天才进入车站。6月23日，又开来一部分联军，在租界内联军的接应下，进入租界。至26日，连同从西沽武库撤回的西摩尔军，租界内的联军已增至七千余人。

联军的兵力虽然增加了，但处于义和团和清军的包围之中，缺少食物，房屋毁坏，医院中的伤病员拥挤不堪，处境仍然十分困难。联军各军司令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万不能向北京进发，只得暂在天津，以图自保。若再不能自保，不如退守大沽”。于是决定采取固守措施，由各军分区防守。

《军机处寄出使俄国大臣杨儒等电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03页。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义和团》（二），第18页。

[法]佛甫爱加来、施米依：《庚子中外战纪》，《义和团》（三），第293页。

紫竹林租界位于天津城东南，东临白河，北面隔河紧靠老龙头火车站。6月23日，联军各司令官会议决定：俄军防守老龙头火车站至租界东面的武备学堂一线，法军防守租界西北部；美军防守租界西南部；日、英、德、意、奥各军分守自租界西南端沿墙子河至梁园门一带。除加强租界区防守外，还分兵控制天津至大沽间的交通线。

6月22日至29日，围攻租界的清军约有一万六千人，义和团三万余人。但是，由于清军缺乏积极进攻精神，只是向租界开炮遥击，故联军损失不大。义和团虽曾多次主动出击，不断给敌人以杀伤，但也没有使联军受到严重打击。又由于清军没有切断天津至大沽间的交通线，致使联军能不断得到兵力和粮弹的补充。27日，联军集中近三千人的兵力，攻占了天津城东面的清军主要军火补给点东机器局。联军夺占该局后，既可免遭该处清军对租界的炮击，又可保证“与大沽通达消息之路”“平安无碍”，改善了防御态势，因而“视为极大之幸事”。

从6月30日开始，围攻天津侵略军的作战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天，裕禄向清廷提出了一个“先将紫竹林洋兵击退，然后会合各营，节节进剿，直抵大沽，……迅将大沽炮台恢复，以固门户”的作战方案。这一方案，是以清政府调赴天津的援军陆续到达为前提的。6月29日，浙江提督马玉昆部十五营六千余人，已由山海关进驻白河河东陈家沟、老龙头火车站附近；6月底7月初，聂士成部除留五营驻守芦台外，共二十五营一万余人陆续齐集天津，分驻于海光寺及盐坨、陈家沟等地；宋庆部十三营正在增援途中。同时，清政府又从天津水会七十二局中招募精壮万余人，成立芦勇、保卫军、安卫军，并将南门外数十个打雁户组成排枪队，驻守南门附近。至此，在津清军已增至两万四五千，各种民众武装约万人。此外，又有义和团两万余人从青县、静海、沧州、南庆、庆云等地纷纷来津。曹福田、张德成等趁机整顿队伍，使能参战的义和团增至五万人。

此时，在大沽登陆的联军约有一万四千人（随带火炮八十九门），已抵天津租界者约八千至一万人。

7月5日，裕禄、聂士成、马玉昆等同义和团商议，决定对租界内的联军实施“三面进攻之计”。其部署是：由义和团曹福田部及武卫左军马玉昆部从北向南进攻老龙头火车站，夺回东机器局，控制附近铁路线，切断联军至大沽的交通，并相机从北面进攻租界；驻盐坨的武卫前军前路统带周鼎臣部三营助攻车站及租界。由义和团张德成部及淮军罗荣光部、练军何永盛部，在马家口一带从西面进攻租界。由驻南门外海光寺一带的武卫前军聂士成部，从西南面进攻租界。武卫前军后路统领胡殿甲除派一部助攻东机器局外，率领各营四面游击，进行机动作战。其余练军各营、水师营及盐坨各营仍继续炮击租界。

三面进攻开始后，马玉昆部从北面炮击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周鼎臣部也配合轰击。义和团多次勇猛冲杀。俄军一度被迫退出车站；联军增派日、英、法军前往死守。从7月7日至11日，义和团及清军几乎每天都组织数百人规模的冲锋，战斗相当激烈，仅日军就被打死打伤七十一人。7月5日那天，马玉昆部还与胡殿甲部一起五次猛攻东机器局，虽未夺回该局，但杀伤

[法] 佛甫爱加来、施米依：《庚子中外战纪》，《义和团》（三），第294页。

《直隶总督裕禄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09页。

了不少敌人。

在西面，义和团张德成部及淮军蒋顺发、周行彪部于7月5日晚在靠近租界的马家口同联军激战。张德成事先将义和团群众埋伏起来，然后出其不意地发起围攻，歼敌甚众，并乘胜进抵租界边缘。7月6日，张德成部以火牛数十只为前驱，踩爆联军埋设的地雷，一度冲进租界。租界内的中国居民也利用夜暗打冷枪、烧仓库、施放信号，积极配合清军及义和团打击敌人。

在西南面，聂士成部于7月6日在小西门围墙土台上安置火炮，轰击租界。联军五六百人被迫退至跑马场地道内潜藏，稍后复出，又被清军炮火击散。当晚，聂士成部进驻八里台、跑马场等地，次日又攻至租界南部外侧的小营门一带。

联军为了解除南机器局、跑马场、八里台等处聂士成部炮火的威胁，决定向租界西南发起反击。7月9日凌晨3时，联军步兵一千人、骑兵一百五十人、炮兵两个连（携带火炮九门），以日军五百人为先头部队，出梁园门往南，进攻纪家庄一带的义和团，英、俄、美军则向跑马场、八里台、南机器局发起攻击。法军炮队自租界西南发炮助攻。5时半左右，联军逼攻跑马场，该处清军退往八里台。聂士成闻讯，从小营门率部往援。7时左右，联军夺占跑马场后，即涌向八里台围攻聂士成部。攻占纪家庄的日军也北上协攻。激战多时，聂士成重伤七处，仍挥军奋战，终因伤势过重而阵亡。日军趁势攻占南机器局，因该局离租界太远，不便驻守，遂将其烧毁。午后，联军又撤回租界。聂士成牺牲后，余部归马玉昆指挥。

义和团及清军实施“三面进攻之计”，取得了一定的战果。经过此次作战，使联军进一步陷入“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疲惫已极”的境地。但是，腐败的清政府不但不激励军民继续奋勇杀敌，扩大战果，反而急于求和。7月8日，清政府任命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未至津前由裕禄署理），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大臣，为求和作准备。害怕财产和商务毁于战争的天津缙绅，趁机奔走相告，一时和议之声传遍前线，加上聂士成部作战失利，大大影响了军民的抗敌意志。武器简陋的义和团，在连日进攻作战中，被清军胁迫“充先锋当前敌”，伤亡也很大。7月10日，宋庆率部到达天津（驻于西门外），13日便借故下令屠杀义和团，“半日间城内外树旗设坛者皆散去”，大大削弱了抗击联军的力量。联军则由于大沽援军不断到达，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7月12日，租界内的联军已增至一万七千余人。侵略者见清军的进攻业已停止，便准备进攻天津城。当日，联军指挥官会议决定分两路攻城，由俄国海军司令阿列克谢也夫任总指挥。其部署是：阿列克谢也夫率俄军两千六百名为前队，德军两个步兵连、法军一个炮兵连为后援，共约三千人，从白河东岸向北进攻三岔口水师营炮台及天津城东北，切断河东清军及义和团与城内的联系。由英军少将陶白率英军七百，美将白勒率美军六百，日将福岛率日军两千四百，法军大校派拉克率法军八百，共四千五百人，携火炮二十四门，进攻天津城南门。

当时，清军水师营守三岔河口炮台，马玉昆部十五营驻老龙头车站北侧

[法] 佛甫爱加来、施米依：《庚子中外战纪》，《义和团》（三），第299页。

佚名：《遇难日记》，《义和团》（二），第171页。

佚名：《天津一月记》，《义和团》（二），第156页。

地区，聂士成部二十五营由周鼎臣、胡殿甲等五个统领率领驻广仁堂、海光寺、南机器局一带，罗荣光（7月9日已死）余部驻城东南至租界西侧一带，练军何永盛部、淮军其余各部及水会等民众武装，守南门及分驻南门外各村落，宋庆部驻西门外，义和团则分散于城内外各地。从兵力部署看，清军建制杂乱，没有统一指挥，而且大部驻守城外各地，城内驻军很少，没有坚守防御的准备。

7月12日夜，白河东岸的俄军向北进攻，13日黎明炮击马玉昆等部阵地。13日上午7时左右，法军炮击城东北壕墙外的火药库，引起爆炸。俄军乘机强攻清军各阵地，并向水师营炮台进攻。至13日中午12时，清军被迫撤出各阵地，纷纷向北郊溃退，联军乘胜进抵东北城下。白河西岸的英、美、日、法军，以法军为右路，日军为中路，美、英军为左路，于13日凌晨出租界南面土墙，经海光寺向天津城南门进逼。英炮兵则在租界南面壕墙上炮击天津城区。南门外清军奋起抵抗，正西门附近的武卫前军炮兵开炮轰击海光寺附近的联军。此前，城门外居民已挖开河堤，使联军被阻于海光寺附近一带。日、英、法军指挥官决定架桥强攻。14日，日军渡过护城河，直抵南门城下，然后派工兵用炸药轰破城门，乘机攻进城内。南门城上原有清军驻守，后“为众绅民稟请撤去”，“众谓城上不用炮击洋人，洋人必不用炮击城内”。因此，南门内无兵防守，只有部分义和团及民众武装。他们先则在城墙上奋力抵抗，继则同侵略军展开巷战，打死打伤侵略军数百名，但终因经不住侵略军炮火轰击，被迫后撤。

联军从南门入城后，便北上配合城东北的联军夹攻水师营炮台。该处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虽腹背受敌，仍英勇作战，在毙伤敌人二百余名后撤离。当日，联军占领天津，洗劫全城。在城内抗击联军的义和团大部惨遭杀害，退出城外者又遭宋庆军屠杀，伤亡数千人。

在联军攻城时，驻扎城外的宋庆、马玉昆部七十余营两万余人，不但不迎击敌军，反而临阵脱逃。天津前线的最高指挥官裕禄，于城破前即同宋庆所部一起逃往杨村，马玉昆则率部逃往北仓，只有装备简陋的义和团始终英勇顽强地坚持抗战。

这次作战，八国联军死伤九百余人（其中校以上军官二十五名），是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伤亡最多的一次。

天津之所以失陷，主要由于慈禧集团推行以战求和政策和前线指挥官畏敌怯战造成的。天津的义和团及部分清军官兵，在围攻紫竹林租界时，杀敌热情很高，多次给联军以沉重打击。但是，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慈禧等人转战为和的态度日趋明朗。她派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不战而退的宋庆帮办北洋军务，当裕禄的助手。宋庆当即表示：“中东之役，仅与日本开衅，尚不能支，何况今拒八国？”可见慈禧令其前往天津，名为加强防御，实为媚外求和。宋庆心领神会，一到天津便大肆镇压义和团，露骨地破坏天津军民抗战的大好形势。在作战过程中，裕禄、马玉昆等人驱使装备简陋的义和团群众充当先锋，让清军殿后。义和团既遭外国侵略者的轰击，又遭清军的枪杀，伤亡极大。如在7月9日夜进攻租界的一次战斗中，义和团民阵亡二千余人，而清军伤亡甚少。对此，当时就有人披露，“是夕‘团匪’死者如此之多，并

佚名：《天津一月记》，《义和团》（二），第155页。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义和团》（二），第35页。

非皆洋兵打死”。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无疑会使义和团这支真正的反帝爱国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加上裕禄等人害有“恐洋病”，根本没有坚守天津的决心，遭敌进攻便弃阵西撤，以致本可固守的战略要地天津城，两天内即被联军攻占。

联军攻占天津后，使津沽之间连成一片，有了可靠的基地，军械、粮饷得到了补充，摆脱了被动的局面。清军则失去了重要军火供给基地和拱卫北京的主要屏障。事后，清政府给裕禄以“革职留任”、宋庆“交部议处”的处分，令其戴罪“联络各军，并将水会民团重加整顿，克期规复天津”。实际上，裕禄、宋庆等人已畏敌如虎，“坐困偏隅，一筹莫展”，根本没有收复天津的决心。

佚名：《遇难日记》，《义和团》（二），第 171 页。

转引自《直隶总督裕禄等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366 页。

第五节 北京之战（1900年8月）

一、清军在津京间的防御部署

天津失陷后，清廷一面令从天津撤离的部队在北仓、杨村等地设防，一面调派其它部队增强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防御。其时，马玉昆部十五营、聂士成余部四营、吕本元部五营、何永盛部五营、安卫军二营共约一万五千人退至北仓，宋庆部十三营退至杨村。芦台有武卫前军冯义和部十七营、胡殿甲部五营；北塘守军如前。此外，部分勤王之师也陆续到达：杨柳青有记名总兵蒋尚钧部豫军五营，北京附近有湖北提督张春发部武卫先锋左翼十营，江西按察使陈泽霖部武卫先锋右翼十营，总兵夏辛酉部嵩武军六营，总兵万本华部晋威军四营，陕西布政使升允部陕军八营，甘肃布政使岑春煊部甘军六营，北京城内有驻军六七万人。总计京津间兵力不下十万。此外，还有义和团七万余人，其中北京城内约有五万，另二万余人分散在津京间的交通沿线。

为阻止联军沿北运河北上，退至北仓一带的清军万余人在马玉昆的统率下，于北仓以南横跨运河构筑了两道防御阵地。第一道由刘家摆渡（今刘家码头）、韩家树（今韩家墅）、火药局（今杨家咀附近）、刘家房、唐家湾、穆庄（今天穆村）等据点组成，构筑了火炮阵地，埋设了地雷，由武卫左军、武卫前军及淮军、练军等九千人防守。第二道以北仓南的王庄为中心，构筑向左右各延伸三公里的垒墙，并在各要隘埋设地雷。在北仓东南和西北构筑了火炮阵地，分别配置十门和十四门火炮。北仓东南地势空旷，于马家庄筑坝开沟，引水淹灌。第二道阵地由武卫左军四五千人的防守。此外，北仓附近尚有一二千人作为预备队。

宋庆以杨村车站为中心，跨北运河构筑了正面约五公里长的垒墙，由五千人驻守；并沉大船二三十只于运河中，以堵塞水道。

7月18日，清廷派翼长长麟、文瑞分统北京义和团两千余人前往通州及其以南地区，挖壕筑垒，令其“扼要助剿，勿任敌兵北犯”。

二、联军北犯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立即派兵占据各要隘、炮台，修整工事，防御清军及义和团的反攻，并成立“都统衙门”，以维护其侵略秩序。同时，继续调兵遣将，准备进犯北京。

7月底8月初，联军在天津的兵力已增至三万四千人，北上作战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8月3日，侵略军召开指挥官会议，协调了彼此间的意见，拟定了进攻北京的计划，准备集中兵力，攻占北运河两岸各战略要点，最后夺取北京城。

8月4日夜，联军除以部分兵力留守天津、大沽等地外，集中一万八千余人及八十一门火炮，从天津出发，沿北运河两岸向北仓进犯。运河右岸为日、英、美军，共一万三千二百二十人，携带火炮五十三门；左岸为俄、德、

转引自《步军统领载勋等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48页。

都统衙门，为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共管天津的临时机构。

法、意、奥军，共四千八百五十四人，携带火炮二十八门。8月5日2时许，联军接近并进攻清军第一道防御阵地的刘家摆渡、韩家树、火药局等据点。清军稍事还击，即溃散撤退。5时左右，第一道防御阵地即被敌攻占。之后，日军从西侧，英军从中部，美军为后援，进攻清军的第二道防御阵地。日军由西侧“绕道十余里，出马军后”，马玉昆部“尽失其险”。在联军前后夹击下，清军腹背受敌，且战且退。当清军同联军接战时，附近义和团数千人赶来助战，虽然给联军以不小的打击，但也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当日上午9时，北仓防线及北仓据点全被敌人攻占。北运河左岸的联军因徒涉水淹地，行动迟缓，战斗结束后才赶到北仓。此战，联军共死九十五人，伤五百四十人。

8月6日晨，联军乘胜分路进攻杨村的清军阵地。俄、法军攻清军右翼，美军攻左翼，英军从正面进攻，日军为后应。宋庆军一触即溃，与马玉昆残部一起，向通州方向败退。直隶总督裕禄逃至南蔡村后，自杀而死。8月8日，南蔡村失守。

在清军丢失北仓、杨村前，清政府命李秉衡统率“勤王师”前往河西务御敌。李秉衡曾任山东巡抚，奉命进京前为巡阅长江水师大臣。7月25日陞见慈禧时，他自动请求赴前线杀敌。次日，清政府即任命他为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所有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均归该大臣节制”。8月6日，李秉衡率四军离京，7日抵马头，8日抵河西务。李秉衡令张春发部十营、万本华部四营驻守河西务；陈泽霖部十营驻守河西务西侧；自率夏辛酉部六营驻守河西务西北八里之羊房。9日晨，清军防御阵地尚未构筑完毕，两路联军即已包抄河西务。战斗打响后，张春发部稍战即退南苑，陈泽霖部也大部溃逃。万本华部虽同联军接战多时，但因兵力不足，无法击退联军的进攻。李秉衡督率夏辛酉部迎敌，升允也率马队两旗助战，经激战后均退马头。马玉昆率败退的清军路过河西务，竟遇敌不战，一直溃逃到南苑。该部同宋庆败军一起，沿途焚掠洗劫，人民深受其害。李秉衡目睹数万清军不战而逃，颇为愤慨，但又无法阻止。8月10日，李秉衡由马头退至张家湾，次日即吞金自杀。联军随即夺占张家湾，并派兵袭击通州。该城守军有险不守，弃城逃京。

8月12日晨，联军不战而据通州，尽获库中军械、粮饷。除留德、法军一部驻守外，联军直扑北京。

从8月5日至12日八天之内，不足两万人的侵略军竟然连续攻占了数万清军防守的北仓、杨村、河西务、通州等战略要地，直接威胁北京。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清军已被失败情绪所支配，战术上又采取了分兵守点的单纯防御，同时，各要点未构筑起足以阻敌前进的坚固阵地，结果在敌人并力猛攻下全线崩溃。李秉衡虽请纓上阵，无奈军心已散，所统各军又皆临时应命之师，不能同心协力御敌，以致无法挽回败局。

三、北京的陷落

通州失守后，清军七八万人齐集北京：宋庆、马玉昆部万余人驻南苑；

胡思敬：《驴背集》，《义和团》（二），第497页。

《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85页。

董福祥部二十五营驻广渠门、朝阳门、东直门；荣禄部三十营驻西华门、棋盘街；八旗、绿营两万余人驻内城九门、外城七门；虎神营、神机营等三十九营驻守各门城楼；八旗前锋和护军守紫禁城。义和团五万余人分别守卫东西河沿、东西珠市口、菜市口、花儿市等六大区。全部城防由荣禄负责，与徐桐、崇绮、奕訢、载漪等共商重大事宜，实际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

8月13日夜，联军一万五千余人携火炮百余门，分三路冒雨进逼北京：日军七千二百人，携火炮五十四门，从通州出发，经八里桥、定福庄、红庙、关东店，先头部队于14日7时半抵达朝阳门外东岳庙附近；俄军三千四百八十人，携火炮二十二门，沿通惠河北岸经八里庄、八王坟、郎家园，于14日黎明前抵近东便门；英军两千二百五十人，携火炮十三门，沿通惠河南岸经苏家沟、关厢附近，于14日上午11时抵近广渠门；美军一千八百二十人，携火炮六门，随英军后开进；法军四百人，携火炮十八门，循俄军路线开进。另有三千联军从天津出发，以为后援。

俄军先头部队于8月13日午夜到达东便门，因途中未遇任何抵抗，认为可以轻取城门，遂提前攻城；詎料清军和义和团“守护极严，急切未能得手”，只得向日军求援。日军派步兵一个大队前往助攻。日军于14日上午8时在朝阳门、东直门外一千五百米处开炮轰城，遭清军炮火还击。董福祥在得知上述三门受到攻击后，即调广渠门守军往援。上午11时左右，英军抵广渠门，乘虚攻城，14时进入城内。英军得知水门处河道枯涸，便涉淤泥进入内城，15时左右首抵使馆区，并分兵一部占领天坛。美军随英军之后，于17时许进入使馆区。进攻东便门的俄军在部分美军配合下，一部于14日午后从城门洞隙处匍匐而入，一部攀上城墙，打退守军，进入城内。进攻东直门的日军，不断以炮火猛烈轰城（发弹万余发），摧毁城墙上的清军火炮；然后派两个工兵队携带炸药包，于21时许对第一、第二门连续爆破，21时40分占领东直门。接着，日军北占安定门，南攻朝阳门，于22时许破门进入城内。法军也于14日午夜入城。联军入城后，被围近两个月的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之围随之解除。

8月14日，在京城即将被联军攻破时，慈禧欲召集六部九卿议事，但无一人应召，只得同入值大臣载澜商量出走事宜，并令载澜护卫。载澜借口无兵而推辞，并建议张白旗投降。8月15日晨，当联军进攻东华门时，慈禧挟持光绪帝出逃，分别着青衣素服，同载澜、载漪、奕訢、刚毅等王公大臣以及内监李莲英等人，在两千余名八旗兵的护卫下，仓皇出西华门和德胜门，经颐和园、居庸关等处，往太原方向出走。

联军进城后，清军大部溃散，仅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筑起街垒，继续同侵略军战斗。8月15、16日，联军攻占了各城门和紫禁城，17日占领全城。

此役，联军死伤四百五十余人，内有校以上军官二十五人。清军伤亡四千余人，义和团民牺牲甚众。

联军攻陷北京后，纵兵抢劫三日，皇宫、官邸、住宅、商店无一幸免。“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尚留在城内的义和团及不少无辜百姓，惨遭屠杀。侵略者无恶不作，奸淫掳掠之事，不可胜计。随后，联军成立“北京管理委员会”，将京城划为十一区，分别

[法] 佛甫爱加来、施米依：《庚子中外战纪》，《义和团》（三），第308页。

柴萼：《庚辛纪事》，《义和团》（一），第316页。

由各国侵略军占领。同时，联军继续增兵，加强京津间战略要地的守卫，并对北京周围五十公里以内的重要村镇巡回扫荡，沙河、八大寺、玉泉山、芦沟桥、良乡、庞各庄、礼贤镇等地先后被占。为了便于控制，联军在占领区内迅速恢复了铁路交通和通信联络。

9月25日，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到达大沽，10月17日进京，设总司令部于紫禁城的仪銮殿。此时，联军在华兵力已逾十万，驻京部队超过三万人。

防守北京城的清军四倍于敌，但在数日之内，清王朝的统治中心竟落敌手。之所以如此，除了清廷政治腐败，军队士气不振这一根本原因外，从防御部署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没有在联军进攻方向的正面和两侧集结必要兵力，阻击和侧击敌人，而是将七八万兵力密集于城区，使联军得以长驱直进，迅速兵临城下。其次，清军虽然装备了不少近代枪炮，但其守城战术仍然是过去的一套旧法，以八千名士兵分别守卫各城门的城楼和城垛，将近九百门新旧火炮配置于城上，冀以居高临下的炮击，阻止联军的进攻。结果，城上火炮被敌炮击毁，城墙遭敌工兵连续爆破，无险可守。城内各区守军，也因没有在主要通道口构筑巷战工事，以致东三门被联军突破后，全城很快沦陷。此外，北京的失守，还在于缺乏有权威、会指挥的最高统帅，以致各分区防守，互不统属，互不策应。结果，东城各门被联军分别攻破，其它各门、各区的守军也很快不战而散。

第六节 《辛丑条约》的签订（1901年9月）

一、清廷西撤后的军事部署及求和活动

慈禧携带光绪帝等离京出走后，不久马玉昆、董福祥、宋庆等人相继率部赶往山西护驾，荣禄等则南逃保定。为防联军进犯山西，清廷在北京的北、西、南三个方向部署兵力：北面的南口、居庸关、宣化、张家口等处，由马玉昆部驻守；西面的飞狐岭、紫荆关、灵丘等关隘，由升允所统陕军八营驻守；南面的保定、正定、井陘等地，由荣禄率武卫中军及从北京败退至此的八十余营清军驻守。张春发、陈泽霖等部则撤回南方整训。

早在8月7日，清廷即授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令其“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北京失陷后，慈禧继续加紧进行求和活动。8月27日，清廷令庆亲王奕訢（正在西撤途中）即日回京议和，令李鸿章迅速赴京“会同妥商办理”。为了向各国表示求和“诚意”，又于9月7日发出了一个对义和团毕露杀机的上谕，声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划除不可”。从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公开合流，共同镇压义和团。

二、联军攻占京津周围要地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占领区，胁迫清政府无条件地接受各国提出的各种“赎罪条件”，以“直隶一带，尚有华兵固守之要区，拳匪聚合之党队”为借口，从京津出兵四向攻掠。9月21日，德、俄军攻占北塘炮台，22日占领芦台。29日，联军七千三百余人向山海关进犯。英军恐俄军先占山海关，使关内外铁路联接起来，将业已侵入东北的势力进一步伸入直隶，影响英国的在华利益，便派出“碧克美”号军舰，于30日上午抢先抵达山海关。该地守将奉李鸿章不抵抗命令，主动让出炮台、车站。次日下午俄军到达后，英、俄两军几乎发生冲突。后经调停，确定由各国侵略军共同占领山海关。与此同时，德军三百余人攻占秦皇岛，英、俄、法军也相继赶到。至此，从大沽至山海关各海口均为联军所控制。

10月12日，联军派五千五百余人出北京，四千余人出天津，分两路会攻保定。13日，法军一部经霸州（今霸县）等地先行到达，守军闻风弃城西逃。直隶布政使廷雍竟开门“接待”法军入城。10月19、20日，由北京、天津出发的两路联军先后到达保定。联军占领保定后，四出侵扰，肆意抢掠烧杀，连开门揖盗的廷雍亦未幸免。各村义和团惨遭屠杀，保定附近地区大部被联军侵占。当月，天津一带的联军还向南窜犯，直至山东边界地区。

11月12日，德、意军两千五百余人开始向北京以北地区进攻。驻南口、居庸关的马玉昆部弃关而逃。24日，德、意军攻宣化，守军万余人不战而退。27日，京西北要地张家口也被联军侵占。

联军控制直隶东、南、北各要地后，便西窥井陘。井陘隘口林立，地势

《军机处寄直隶总督李鸿章电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46页。

《德宗实录》卷四百六十八，第18页。

[法] 佛甫爱加来、施米依：《庚子中外战纪》，《义和团》（三），第311页。

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荣禄曾部署大同镇总兵刘光才、湖北勤王兵将领总兵方友升等率军二十营一万余人驻守。1901年1月28日，法军百余人进犯井陘，被守军击退。李鸿章害怕影响求和，竟于2月下旬严令守军“退兵晋境，不准一人一骑东出”。3月下旬，联军从天津增调法、德军六七千人再度进犯。李鸿章又下令撤军。4月20日，刘光才部十五营退固关，方友升部五营退娘子关。22日晨，联军分四路攻娘子关，清军伤亡七百余人，弃关退走。中午，联军又分兵两路攻固关，刘光才部不战而逃。后由于英、法政府害怕山西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从中加以阻挠，所以侵入山西的德、法军又很快撤出。

经过七个月的攻掠，联军控制了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西至娘子关的直隶四周要隘。他们在占领区内往来梭巡，横行无忌。凡有义和团活动之处，均遭焚掠，有的全村遭劫，人民死伤、妇女被侮者不计其数。

三、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1900年9月3日，奕訢返抵北京，由日军负责“保护”；9月18日，李鸿章在俄军“保护”下到达天津，10月11日至北京。随后，两人代表清政府向联军卑屈求和。

12月24日，各国在协调了内部分赃和挑选代理人问题上的矛盾后，除了参加武装侵略中国的八国以外，又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向清政府提出了“议和大纲十二条”，并声称这些条件“无可更改”。李鸿章等将此电告业已逃至西安的慈禧。慈禧见条款上没有将她作为祸首加以惩办，如获大赦，即于12月27日复电奕訢、李鸿章，表示“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各国见侵略目的基本实现，便于1901年5月开始撤出部分在京联军，6月14日撤销联军统帅部。9月7日，清廷以奕訢、李鸿章为钦差全权大臣，同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及荷、比、西等十一国全权大臣，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通过此约，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上逼迫清廷向其“谢罪”，惩办主张抵抗的大臣与官吏，并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会社，“违者皆斩”，官民对此镇压不力者，“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在经济上，勒索战争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清，连本带息共九亿八千余万两。在军事上，强迫清廷允许各国在使馆区驻军，中国人不得在使馆区内居住；将大沽及北京至大沽沿路的各炮台一律拆除；各国可在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今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十二处留兵驻守；清政府在两年内不得向外国购买军火及其原料。条约签订后，各国于9月17日撤出在京兵员（驻使馆区兵员除外），22日开始撤离直隶（驻兵留守地除外）。次年7月15日，各国乘交还天津之机，又强令清政府不得重修大沽炮台和天津城垣；清军不得在各国军队驻津区二十里内驻扎；禁止中国军队在白河口、秦皇岛、山海关等处部署海防；在铁路沿线二英里内，各国军队对华人有弹压治罪之权。各国留驻上述十二处的兵额，第一期（联军由北京、直隶撤离时

王耀焕：《晋东防军纪略》，《义和团》（三），第318页。

《军机处寄全权大臣奕訢李鸿章电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53页。

《辛丑和约条文》，《义和团》（四），第498页。

期)为一万二千二百人,第二期(正常时期)为八千二百人,至1907年10月续有递减。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用武力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它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造成了更深重的民族危机。但是,慈禧却对帝国主义列强感激涕零,决心充当它们的驯服工具。清政府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从此,清朝统治者完全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

第七节 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重大历史意义和战争失败的原因

一、重大历史意义

中国军民被迫进行的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是民族自卫的正义战争，虽然失败了，仍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分子就狂叫要瓜分中国，纷纷来华争夺势力范围。但是，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利害冲突，在此次联合侵华战争过程中，常常为各自的利益而争执不下，如欲进而瓜分中国，则其内部矛盾势必加剧。更主要的是它们的侵略行径不断遭到中国军民的强烈反抗，以农民为主体的气势磅礴的义和团运动，更是这种反抗的集中表现。帝国主义者看到，在中国除了软弱可欺的统治阶级之外，还存在着不畏强暴、敢于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广大人民群众。正是这种“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的亿万人民群众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迫使它们放弃直接瓜分中国的罪恶企图，实行“以华治华”，即采取扶持和利用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继续充当其在华代理人的政策。但是，不管帝国主义如何变换侵略手法，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已经证明，中华民族是永远不可征服的。

在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中，义和团以简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躯，同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他们或者独立作战，袭扰和伏击敌人（如廊坊阻击战）；或者根据统一的计划，同清军并肩作战（如三面进攻天津紫竹林租界）；或者接受清军将领调遣，从中“挑选精壮，编列成军”，遂行战斗任务。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有效地牵制和打击了敌人，推动和支援了清军的作战。然而，由于义和团是由民间秘密结社转化而来的自发的反帝爱国组织，始终处于分散状态，没有发展成为具有严格组织纪律的能实行集中统一指挥的武装集团，更没有产生具有统帅才能的领袖人物，所以尽管在反侵略战争中作出了很大牺牲和贡献，却不能发展成为主要的军事力量，起不到主力军的作用。同时，由于义和团受宗教迷信束缚，无视近代枪炮的杀伤力，不注意讲究战术，使自己遭受许多不应有的损失。加之义和团在政治上提不出切实的斗争纲领和口号，并把某些并不妥当的做法视为勇敢行为，对清政府顽固派的奸诈行径又缺乏应有的警惕，以致最终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历史再一次证明，单靠农民自发的力量，是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的。尽管如此，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毕竟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打乱了帝国主义的侵华计划与步骤。同时，义和团运动也动摇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促进了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在六十多年前曾概括地指出：“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随着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日益高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潮流终于在神州大地上蔚然兴起，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1955年，周恩来同志指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

[德] 瓦德西：《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三），第86页。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4—175页。

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这是对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历史功绩的进一步肯定。

二、清军战败的原因

清军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的失败，有极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

（一）朝廷腐败，和战分歧

面对八国联军的武装入侵，清廷后、帝两党依然勾心斗角，和战分歧，加上东南各省督抚直接同帝国主义签约“互保”，以致朝廷内部分裂，中央同地方分裂。这样，最高统治集团不可能有统一的对内对外政策和统一的政令军令，不可能形成全国协同一致、团结御侮的政治局面，使侵略军得以集中全力，放手向中国的北方进攻。而实际把持朝政的慈禧集团，又从其本身的政治利益出发，玩弄“以团制夷”、“假夷灭团”的阴谋，时而煽惑义和团进行狭隘的民族排外行动，时而又出卖义和团，以奴才嘴脸乞求帝国主义的宽恕。慈禧集团的所作所为，是断送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大好形势、招致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财政拮据，饷械短绌

清政府财政拮据，“部库支绌”，只得命令各省紧急筹款和赶运粮食接济京师，令东南各省机器局星夜赶造军械，以应急需。但各省却以“经费奇缺”等为由，向朝廷叫苦；东南各省督抚为了迫使清廷停战求和，竟以“库储如洗”、“局存军火无多”为词，拖延和拒绝接济北方清军，致使参战清军饷械短绌。无疑，财力物力严重不足，也是清军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军事落后，指导无方

清军在直隶地区有十二万人，加上四万勤王之师，共有十六万人，还有数万义和团配合作战。而联军总兵力最多时虽有十二万余人，但实际参战兵力仅有三四万人，每次大的作战行动，一般不超过两万人。在天津和北京等处作战时，清军在兵力上都占有两倍以上优势，其所以屡战屡败，从军事方面看，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最高军事当局昏庸混乱。清廷在宣战以后，委任荣禄统筹战事，与徐桐、崇绮、奕訢、载漪并军机大臣一起会商京师军务。从形式上看，这是清廷成立的最高指挥机构，但实际上这个机构处在慈禧的控制下，根本不能真正行使集中统一的指挥权。荣禄等人都是后党的核心人物，政治上唯慈禧之命是听，军事指挥上墨守陈规，颠预无能。在战争过程中，经常消息不灵，情况不明，发布过时或不切实际的命令。如大沽炮台于6月17日晨已经

周恩来：《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2日。

失守，而朝廷却在6月19日发布了一个坚守大沽的作战命令。有时调动部队朝令夕改，反复多变。如6月初命董福祥部往天津助战，而6月中又令其回京围攻使馆区。又如从6月15日至7月24日的四十多天中，忽而令袁世凯带队来京，忽而令其原地驻守，忽而又令其派兵赴津作战。本来就不想参战的袁世凯，便乘机拖延推诿，事后也无法追究其责任。此外，部队调动缺乏应有的组织和计划。6月17日，在决定宣战前夕，朝廷令各省派勤王之师赴京调用，但是，关于各部队到京的时间、地点、应执行的任务和隶属关系，以及军械粮饷的供给等问题，均无明确的要求和周密的计划，致使各省勤王之师有的到京后不知所措，有的徘徊不前，有的半道撤回，有的一战即退，一片混乱景象。

第二，作战方法保守落后。联军进攻津京的作战，基本上承袭1860年英法联军用过的老办法。如果清军汲取历史教训，采取积极的防御作战方针，正面重点地部署守备兵力，同时集中强大的机动兵力于有利位置，协同守备部队夹击敌人，或主动攻击联军的薄弱环节，并有计划地和义和团配合，袭击敌人后方交通运输线，必然使远隔重洋的侵略军在人力物力的补充上日感困难，士气不断下降。经过多次打击，进而粉碎敌之进攻，夺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清军采取的是分兵把口、单纯防守的消极方针，在大沽、天津、北京各次防御作战中，都被敌人正面攻击与侧翼包围而一举攻破。同时，清军对于随着火炮的射速、射程和杀伤威力的提高而引起的作战方式的发展变化，缺乏认识，保守过时的战术，特别是在守城方法上，基本沿袭冷兵器时代的一套，因而尽管兵力居于优势，仍不免于失败。

第三，纪律松弛，赏罚不明。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涌现出诸如聂士成、董福祥等积极抗战的将领，由他们指挥的清军，能同义和团一起打击侵略者，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在清军高级将领中，恐洋畏敌、惧战溃逃者居多数。他们对所属部队平时不认真加以训练，战时又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以致与敌接战，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统筹天津战事的裕禄，不但不能与天津城共存亡，反而在城破之前率先逃跑。宋庆受命后迟不赴津，到津后不仅不与联军作战，反而枪口对内，残杀义和团，天津失守后便一路狂逃至京。马玉昆由北仓败经河西务时，遇敌不战，径逃南苑。李秉衡曾上奏清廷，请求严明赏罚，惩办溃逃之将。清廷虽命李秉衡对败逃清军执行军纪，但又包庇宋庆、马玉昆等人，说他们“忠勇可靠”，并将马提升为直隶提督。相反，清廷对抗战比较坚决的聂士成却屡加贬斥；说董福祥“骄难用”；对李秉衡也多方掣肘。这种包庇重用败军之将，排斥打击抗敌将领的做法，自然也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十二章 抗击沙俄入侵东北的战争（1900年7月—11月）

1900年夏，派兵参加八国联军侵华和最野蛮地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沙皇俄国，趁清廷京畿危急之际，又单独大量出兵侵入我国东北黑龙江、吉林、盛京（今辽宁）三省，以推行其罪恶的“黄俄罗斯”计划。侵略者铁蹄所至，烧杀掳掠，罪行累累。为了抗击沙俄侵略军的疯狂入侵，东北军民和义和团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

第一节 沙俄入侵东北的准备及部署

东北三省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是我国反抗外敌入侵的战略要地。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扩张由来已久。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沙俄政府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封建贵族向外扩张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规定沙皇为俄军的最高统帅，陆军大臣负责指挥全军的作战和训练；全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降低士兵服役年龄，扩大新兵来源；改进士兵训练和军官培训制度，提高官兵素质；在全国建立十五个军区，加强平时对军队的训练和战时对军队的指挥；整顿陆军体制，精简非战斗部队，将野战部队和炮兵各增加60%；改进和统一军队的装备，使用射程为两千米的纳甘特步枪和马克沁机枪，统一了野炮、骑炮、野战臼炮的形制，海军舰队也得到了加强。至十九世纪末，沙俄已发展成为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我国东北地区进一步成为沙俄推行其向远东侵略扩张政策的重要目标。在侵略我国东北地区的步骤上，沙俄当时有两种主张：以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和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为代表的封建军阀、贵族和军事工业资本家，主张直接进行军事占领；以财政大臣维特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垄断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则主张以经济掠夺手段实现最终征服。沙皇政府综合两种主张，决定采取双管齐下的侵华政策。

1896年，沙俄以联合德、法干涉日本还辽“有功”，诱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中俄密约》和《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攫取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中国段（中东铁路）的建筑权。这条铁路通过黑龙江、吉林两省，直达海参崴（今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不但便于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经济掠夺，而且便于军事侵略。维特当时就露骨地宣称：有了这条铁路，俄国就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线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并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1898年3月，沙俄又通过《旅大租地条约》，取得了从哈尔滨经宽城子（今长春）、奉天（今沈阳）至旅顺、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筑路权。同年5、6月间，沙俄大批铁路员工进入我东北三省，并从山东、直隶及当地雇用二十多万中国民工，分十九个工区，开始全线修筑铁路。通过筑路，沙俄得以派遣各种人员，搜集东北三省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同时，又以“护路”为名，向铁路沿线派遣了六千余名武装“护路队”。此外，还在哈尔滨设立有二千五百余人驻守的铁路警备司令部。

为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沙俄在抢修中东铁路的同时，又采取各种手段，控制东北地区的内河航运、公路交通以及外海通路。当时，东北三省的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等主要河流及其支流的航运，几乎均被沙俄所垄断。沙俄“阿穆尔汽船公司”拥有各种运输船三百余艘。其中有专为适合松花江航行而建造的汽船；有由十三艘大型汽船组成的运载量达一万五千余吨的海上运输队。1900年4月，中东铁路千余公里的路基和大部分铺轨工程已经完工，中东铁路支线除中段二百余公里外，也已竣工。至此，沙俄几乎完全控制了我国东北地区的交通命脉，为战时运送兵员和军需物资创造了条件。

参见《财政大臣维特的节略（1896年4月12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69页。
截至1900年10月中为止，沙俄政府为入侵我国东北，从海路运兵近两万人、物资一万六千余吨，通过

为了实现鲸吞我国东北三省的野心，沙俄还加紧进行大规模入侵的军事准备。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沙俄在我国东北边境地区的兵力日益增加，到1900年6月初，统辖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地区的沙俄阿穆尔军管区，已有兵员九万八千余人，马一万五千余匹。除要塞及留守部队外，这些部队大部驻扎于我国东北三省当面的俄国各边境城镇，如海参崴、双城子（今乌苏里斯克）、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海兰泡（今布拉戈维申斯克）、赤塔等地，直接窥视和威胁清军行动。

与此同时，沙俄还加强了旅顺军港的建设，使其成为具有一定独立作战能力的军事基地。至1900年7月初，沙俄驻旅大兵力达两万三千三百余人，游弋于黄海、渤海的各种钢铁军舰达四十一艘，水雷艇三十艘，控制了从黄海经朝鲜海峡及日本海抵海参崴的通路，沟通了南北各据点间的联系。

从1900年6月初开始，沙俄最高当局即密切注视着我国直隶地区义和团运动发展的趋势，寻找进攻我东北三省的时机和借口，同时加紧进行战争准备。6月8日，沙俄政府宣布关东一带进入战争状态，命令军队作好临战准备。6月15日，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命令驻伯力的阿穆尔军事总督格罗杰科夫中将，制订进攻东北义和团及清军的作战计划。6月17日，八国联军侵占大沽，沙皇尼古拉二世便于6月23日宣布，首先在阿穆尔军管区进行战争动员，全区进入战争状态，并立即编组先遣军。接着，在沙俄亚洲部分的西伯利亚、土耳其斯坦军管区以及欧洲部分的某些地区进行战争动员。7月6日，尼古拉二世宣布自任俄军总司令，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任总参谋长。不久，沙俄陆军部下令将原驻阿穆尔地区的西伯利亚军改编为西伯利亚第一军，并将新征调的部队进行统一编组和部署：

西伯利亚第一军：集结于旅大、海参崴。作战部队约三万四千三百余人，计有步兵四个旅（共三十二个营）、骑兵十四个连、工兵一个营又一个连、炮兵两个营又六个连（装备各种火炮九十六门）。

西伯利亚第二军：集结于伯力。作战部队约三万六千二百余人，计有步兵四个旅（共三十二个营）、骑兵一个混成师（共二十七连）、工兵一个营（一说一个营又两个连）、炮兵两个营又七个连（装备各种火炮九十门）。

西伯利亚第三军：集结于赤塔、涅尔琴斯克（原尼布楚）等地。作战部队约三万一千三百余人，计有步兵四个旅（共二十八个营）、骑兵一个师（共二十五个连，其中有一个装备六门炮的骑炮连）、工兵四分之三个营、炮兵九个连（装备各种火炮七十门）。

登陆军：集结于海参崴、双城子。作战部队约三万三千七百余人，计有步兵四个旅（共三十二个营）、骑兵十三个连（一说十一个连）、工兵一个营又一个连、炮兵三个营又一个连（装备各种火炮七十八门）。

以上共有作战部队约十三万五千余人，火炮三百二十八门。此外，各要塞和军区尚有留守部队四万余人。

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清廷因京城危急，已无力顾及东北三省的危局。沙俄陆军部抓紧这一时机，分别于7月18日和22日（俄历7月5日和9日）致电在伯力的格罗杰科夫和在旅顺的阿列克谢也夫，指示俄军三路从北部（铁岭以北，含吉林、黑龙江省）、一路从南部（盛京省）进攻中

西伯利亚铁路运兵五万四千余人、马万余匹、物资八千八百余吨，保证了作战部队和军用物资的输送。

参见日本参谋本部：《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日文版第六卷，第337页。

国东北地区：北部由西伯利亚第二军、第三军及登陆军一部担任主攻，司令部设于伯力，阿穆尔军事总督格罗杰科夫中将任总指挥；南部由西伯利亚第一军及登陆军一部担任主攻，司令部设于旅顺，关东省（沙俄擅自设立）总督阿列克谢也夫海军中将任总指挥。沙俄陆军部作战指示的要点是，多路出兵，攻取齐齐哈尔、哈尔滨、吉林、长春、奉天等重要城市，以实现分进合击、速战速决，迅速夺取东北三省的战略目的。经格罗杰科夫和阿列克谢也夫建议对上述方案作某些调整，沙俄陆军部最后决定按下述五路部署进攻：

西北路：以集结于赤塔、涅尔琴斯克的西伯利亚第三军一部为主力，越过阿巴该图，向东南进攻呼伦贝尔（今海拉尔市）、齐齐哈尔，尔后会同北路俄军及东北路俄军一部，向吉林、奉天推进。

北路：以集结于海兰泡的西伯利亚第三军一部为主力，渡过黑龙江，向南进攻瑗珲（今爱辉南）、墨尔根（今嫩江）、齐齐哈尔，尔后会同西北路俄军及东北路俄军一部，向伯都讷（今扶余）、长春推进。

东北路：除派兵一部支援海兰泡俄军作战外，以集结于伯力的西伯利亚第二军为主力，沿黑龙江、松花江水路，向西南进攻三姓（今依兰）、呼兰、哈尔滨，与“护路队”里应外合攻占哈尔滨后，分兵一部向东进攻宁古塔（今宁安），另一部向西助攻齐齐哈尔，尔后会同西北路和北路俄军，向吉林、奉天推进。

东南路（分两个方向进攻）：一部以集结于双城子、海参崴的西伯利亚第一军及登陆军为主力，向西进攻牡丹江、叶河宁古塔；另一部从克拉斯基诺出发，向西进攻珲春、鄂摩和。尔后合力向吉林、奉天推进。

南路：以集结于旅大的西伯利亚第一军和登陆军一部为主力。一部从水路进攻营口（今营口市）；另一部从陆路进攻熊岳、盖平（今盖县）。尔后向辽阳、奉天推进，并在铁岭同北部战场的四路俄军会合。

在部署上述五路进攻的同时，沙俄政府又向我东北三省铁路沿线增派“护路队”，使其由原来的六千余人增至一万一千人，借以牵制东北三省清军的行动，策应各路俄军的进攻。

第二节 清朝在东北三省的设防和战备

正当沙俄剑拔弩张，准备向我东北地区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之际，关内战事十分吃紧，因此，东北三省只能依靠原有驻军和防御设施，抗击入侵之敌。至1900年6月止，东北三省共有防、练军一百一十七营三哨。其中盛京省五十二个营，吉林省二十九营三哨，黑龙江省三十六个营。按编制计算，总数可达五万八千余人，但实际不足五万人。以后各省又进行扩兵，人数稍有增加。此外，东北地区尚有四万四千余名战斗力很低的八旗兵。这些清军装备的武器，除一部分由国外进口、内地拨给和吉林机器局仿制的毛瑟、曼利夏步枪及克虏伯、格鲁森火炮外，还有不少抬枪、抬炮及其它旧式火炮。

除清军外，东北三省还有义和团及人民群众协助清军抗敌。但义和团运动的规模不如关内，力量没有关内强，组织更为分散，所以难以承担较大的作战任务。

东北三省的将军及其他军政要员，在如何对待沙俄入侵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严重地影响了战争准备。

黑龙江将军寿山，在沙俄重兵压境，形势危急之际，多次上奏朝廷，历陈沙俄“乘我畿辅危急，日为增兵之谋”的种种事实，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提出了“不得不战”、“不可不战”、“不可失机”等抗战主张。他还分析了抗战的有利形势，认为：甲午战争以后，人们“负痛方深”；义和团的兴起，足见民心对沙俄之忿恨；在军事上，可扼守陆路要地，以静待动，截击深入我境、前后不能相顾的俄军。为了集中力量守卫边防，他建议朝廷“先清内患”，对沙俄“护路队”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盛京副都统、育字军总统晋昌，积极支持寿山的主张。他建议三省联为一气，并力抗战。伯都讷副都统嵩昆，也赞同寿山等人的抗战主张。但是，吉林将军长顺和盛京将军增祺，却极力反对寿山和晋昌等人的正确意见，认为“当此各国合谋，何可再树一敌”，主张对沙俄的进逼实行不抵抗主义。

由于上述分歧，三省无法进行统一部署。主战的黑龙江将军寿山，只能调派本省的力量，加强战略要地的防御。1900年7月8日，沙俄阿穆尔总督格罗杰科夫以“护路”为名，要求将数千俄军经瑗珲、齐齐哈尔运往哈尔滨。寿山严词拒绝了沙俄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并积极进行临战准备。他奏请清廷分别委任瑗珲副都统凤翔、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通肯（今海伦）副都统庆祺为北、西、东三路翼长，分别指挥三路战守；委任安徽候补知县程德全为行营营务处，负责来往联络。此外，还向清廷请求调拨粮饷，商请盛京、吉林两省匀拨枪械弹药等物，准备抗击沙俄的进攻。

畏敌怯战的吉林将军长顺则根本不作临战准备。练军六营约三千人仍然分布在各城镇；新募五营散驻于铁路沿线；主力靖边防军十八营三哨，分布在三姓、宁古塔、瑛春等七个城镇。同时，长顺还在6月底7月初以“奉旨招练”为名，对伊通、宽城子、伯都讷、哈尔滨一带的义和团进行严密控制，并遣散铁路沿线的大量民工。此外，对哈尔滨等地的沙俄“护路队”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任其在哈尔滨至双城子的铁路以及松花江沿线自由往来。

《寿山折》，《义和团运动史资料丛编》第二辑，第273—274页。

《吉林将军长顺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48页。在同一电报中，长顺极力推崇李鸿章关于“各国开衅，若再与俄决裂，全局皆危”的谬论系“深谋远虑”之见。

由于晋昌的积极主战及义和团斗争的影响，盛京省作了一定的防御准备：西部由仁字军、奉军共八营两哨驻守锦州、山海关一带；北部由仁字军、奉军共六营驻守开原、铁岭一带；东部有四营清军驻守凤凰岭、岫岩一带；南部由晋昌自率育字军十余营驻守熊岳、海城一带。

第三节 战争经过（参见附图二十二）

1900年7月下半月，俄军作战部署就绪后，即以“护路”和帮助中国政府“平定叛乱”为名，悍然对我国东北三省发动全面进攻。东北三省军民和义和团，为了保家卫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同侵略军展开了顽强的战斗。

一、瑗珲和呼伦贝尔方向的作战及黑龙江省的陷落

瑗珲（今爱辉县爱辉乡），位于黑龙江中游右岸，与它隔江相望的是江东六十四屯，由瑗珲副都统管辖。瑗珲北面的黑河屯（今爱辉县）则同沙边城海兰泡隔江相望。小兴安岭自西北向东南长约四百公里，海拔六百至一公里，是黑龙江省北部的天然屏障。瑗珲方向驻有清军步、骑兵十六个营，由瑗珲副都统凤翔指挥，守卫着南至富拉尔基屯、北至五道霍洛卡之间约七十五公里的江岸。守军装备有钢制火炮八门、旧式火炮十六门，水师营有小船十余艘。

俄军在海兰泡集中了步兵三个营又三个连、骑兵七个连、炮兵两个连，加上地方部队及其它武装力量两千余人，共约七千余人，配有二十八门火炮。由格里勃斯基中将指挥。

7月15日，海兰泡俄军企图从黑河屯偷渡过江，被清军击退。16日，俄军大肆搜捕海兰泡中国居民。次日上午，俄军将三千余名中国居民赶至黑龙江边，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至21日，五六千中国同胞惨遭杀害，致使“骸骨飘溢，蔽满江岸”。与此同时，俄军马队焚烧江东六十四屯，并将七千多居民驱入江中溺死。列宁曾在《火星报》上发表文章，强烈谴责沙俄侵略者“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等野兽般的暴行。

沙俄侵略军的兽行，激起了瑗珲人民和清军官兵的无比义愤。凤翔于7月17日晚派船接运难民，并令千余清军从下游过江，抄袭俄军后路。18日凌晨，渡江清军袭击俄军博尔多屯哨所，同五百名俄军激战四个多小时，毙伤敌人百余名，焚毁弹药库一座。当晚，清军撤回瑗珲。

为了保证黑龙江的航运和加强进攻瑗珲的俄军兵力，格罗杰科夫按照原定方案，于7月下旬从伯力和斯特列津斯克两地，调遣步兵九个营、骑兵三个连、炮兵一个连，携各种火炮四十门，组成两支增援部队，沿黑龙江两岸西进。这支俄军沿途捣毁清军各哨卡，于8月初抵达海兰泡。

8月2日，俄军开始进攻瑗珲。为迷惑清军，俄军一部由瑗珲对岸渡江佯攻，主力则由苏鲍齐奇少将率领，从黑河屯上游偷渡过江。驻守黑河屯一带的三营清军，在统领崇昆山指挥下凭壕坚守，同上岸俄军激战四小时后，

根据1858年《中俄瑗珲条约》，沙俄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但条约规定江东六十四屯内的满汉民户得永远居住，归中国政府管辖。

海兰泡原为中国居民村，俄国强占黑龙江左岸以后，在此建筑城市，并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至1900年，海兰泡已有三万余人口，半数以上为中国人。

《瑗珲县志·武事志》，第165—166页。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15页。

退守瑗珲。俄军一万四千余人，于4日晨越过瑗珲北面的卡伦山，从北、东、南三面进攻瑗珲城。守军三千余人顽强抵御，城内的义和团及居民也奋起参战。俄军以优势炮火猛轰城垣。激战一天后，守军不支，由凤翔率领撤至城西南四十余公里的北二龙和额雨尔（驿站）一带的山口。撤退过程中，有三百余名清军于城郊被俄军包围，最后全部牺牲。8月5日，俄军入城，城内居民同侵略者逐屋争夺，一千五百余人英勇战死。俄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俄军攻占瑗珲后，即调整部署。苏鲍齐奇被晋升为中将，并奉命前往旅顺，负责指挥奉天方向的作战，同时调一部分俄军随同前往，以增加南战场的兵力。其余俄军由伦年卡姆普夫指挥，继续追击清军。8月6日，伦年卡姆普夫率领四个半连骑兵组成的“快速支队”，携火炮两门，直逼额雨尔。其余俄军除守城者外，随后跟进。

退守额雨尔的清军，依山挖壕筑垒，凭险坚守。俄军逼近后，清军突发炮轰击，毙伤敌四十人，予俄军“快速支队”以迎头痛击。俄军在正面进攻受挫后，便派一个连从右翼迂回至清军侧后。凤翔见两面受敌，又见俄军援兵赶到，乃率部退守北大岭山口（今大青山）。

北大岭山口森林密布，地势险要，是小兴安岭的重要隘口。凤翔率部（八九个营约四千人）退守该地后，又从省城开来两营援军，兵力增至五千人，并有火炮十门。当地鄂伦春族人民，也组织骑队约五百人，自动前来参战。凤翔决定利用有利地形，于山口两侧挖掘战壕，将部队荫蔽于壕内，诱敌深入岭底，然后从两侧发起突然攻击。8月13日（一说8月10日），俄军“快速支队”进入北大岭山口，埋伏在两侧的清军，出敌不意，枪炮齐发，猛击俄军。鄂伦春骑队也勇敢杀敌。俄军遭此伏击，乱作一团，仓皇后撤。凤翔督军趁势追击三十余里，杀敌甚众。正当清军勇猛追敌之际，凤翔不幸坠马牺牲。凤翔自瑗珲交战以来，左腿右臂先后受伤，仍然身先士卒，指挥清军英勇顽强地抗击数倍于己的侵略军，是一位出色的爱国将领。他牺牲后，由镇边新军后路统领恒玉署理北路翼长，率领清军继续构筑工事，扼守北大岭山口。

伦年卡姆普夫在“快速支队”两次受挫后，认为“以现有骑兵部队的兵力不可能在山地作战”。8月15日，其后续部队到达后，便调整部署，改变战术：先以炮兵逼近北大岭山口，用二十余门火炮轰击山口两侧的清军阵地；同时利用山林和夜暗，派出两营步兵迂回至清军侧后，攻击清军的辎重队。清军腹背受敌，被迫于16日撤往墨尔根。此时，该路清军仅剩七百余，由恒玉率领退守讷谟尔河南岸。8月17日，俄军占领墨尔根后，暂停进攻，等待西北路俄军到达后，再会攻齐齐哈尔。

正当北部清军在瑗珲抗击俄军时，西北部呼伦贝尔一带的清军也展开了抗击俄军的作战。

西北部的清军由呼伦贝尔副都统兼翼长依兴阿指挥，共有步骑兵十个营，装备克虏伯炮四门、小钢炮两门。呼伦贝尔西北有大道直通粗鲁海图，西面则有正在修建的中东铁路通往阿巴该图方向。

沙俄陆军部原命西北路俄军由粗鲁海图发起进攻。依兴阿发现俄军这一企图后，“以重兵北扼粗鲁海图，……复以偏师驻扎海拉儿[尔]河两岸，西

[俄]瓦西里亚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三卷，中译本第370—371页。

扼阿普[巴]该图”。俄军发觉清军上述部署后，便改变了进攻路线。7月25日，奥尔罗夫少将率步兵四个营又一个连、骑兵一个团又三个连、骑炮兵一个连，随带六门火炮，改从阿巴该图进犯完工车站。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闻讯后，急派统领全德率步骑五个营驰往完工迎战。该部于7月29日出发，次日同敌军遭遇。俄军以火炮轰击清军，步兵由正面进攻，骑兵冲击清军左翼。清军立足未稳，仓卒接战，伤亡九百余人。呼伦贝尔城一带的守军纪律松弛，且有不少是新募之兵，当得知完工战败的消息后，即“漫散逃走，衙署官兵亦皆因之逃窜一空”。7月31日，依兴阿放弃呼伦贝尔，率部退守雅克岭，“以为省城西路之藩篱”。俄军占领呼伦贝尔后，血腥屠杀居民三千余人。

雅克岭原有义胜军左路五营防守，加上从完工撤退的清军，共约九个营。8月8日，俄军“快速支队”约六七个连追至岭前，见地势险峻，未敢进攻，就地停止待援。8月10日，清军各路统领会商，决定由统领保全率镇边陈军四营、统领吉祥率义胜军二营出岭截击孤军深入的俄军。8月11—13日，出击的清军三战三胜，“踏破俄营九座，压迫二百余里”。14日晨，清军紧追至呼伦贝尔附近的小桥子、黑山嘴一带。由于同样犯了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的错误，被俄军大队四面包围。清军在突围中死伤甚众，统领保全中弹阵亡，吉祥被迫督队后撤。不久，奥尔罗夫率俄军主力向雅克岭发起攻击，并派先头部队从火燎沟口抄袭清军后路。清军前后遭敌炮击，部队溃败，雅克岭被俄军侵占。

北路小兴安岭的要隘北大岭山口和西北路大兴安岭的重要据点雅克岭阵地的失守，使省城齐齐哈尔失去了两大屏障。俄军遂从北路、西北路长驱直入。8月21日，北路俄军进入博尔多（今讷河），抵达讷谟尔河北岸。在此严重形势下，寿山指令恒玉坚守讷谟尔河南岸，令副都统萨保在省城齐齐哈尔挖壕固守，同时还加紧操练义和团，“恃为长城”。正当寿山准备继续抗战时，忽然接到了清廷于8月7日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向八国联军求和的上谕。鉴于“朝廷业已遣使求和”，东北亦不能例外，寿山遂派程德全赴讷谟尔河北岸俄军军营议和。8月25日，双方议定：俄军不得进入齐齐哈尔城内，只驻于城外。8月28日，俄军抵达城郊时，竟背信弃义地炮击后撤的清军。寿山见大局已不堪收拾，于8月30日自杀身亡。俄军于当天占领齐齐哈尔，清军南撤至伯都讷。西北路俄军在越过大兴安岭后，于8月30日占富拉尔基，9月4日与北路俄军会师于齐齐哈尔。俄军将市内的军械、粮饷、财物抢劫一空。9月6日，伦年卡姆普夫率突击队由齐齐哈尔出发，向伯都讷、长春、吉林方向进犯。

在黑龙江省的抗战中，全省大部分军民表现出了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黑龙江将军寿山，在上受朝廷压制，周围有投降派梗阻的情况下，仍然积极领导黑龙江省清军英勇抗敌。在他的影响下，不少爱国官兵拚死作战，血染战场。尤其可贵的是，寿山在临死前仍上奏朝廷，建议将来收复黑龙江省之后，实行招民开荒，屯垦戍边，充实边防的政策，使黑龙江成为“内政

《黑龙江将军寿山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82页。

《齐齐哈尔副都统萨保折·又片》，《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697页。

《盛京将军增祺折·附黑龙江将军寿山遗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96页。

孔修，外侮足御”的富强之省。象寿山这样积极抗战，至死不忘祖国山河的清军将领，在当时是为数不多的。

黑龙江省如此迅速地失陷，从客观上看，主要由于清军兵械两绌。以三十六个营分守四千多公里的水陆边界和腹地要点，兵力显然不足，且分兵各处，难于互相应援，因而在大小兴安岭主要隘口失守后，清军已无力组织有效的抵抗。从主观上看，与寿山的作战指挥不尽得当也有关系。7月初，寿山虽相对集中兵力，加强了边沿城镇的防御，也有扼守陆路要地和截击深入腹地之敌的考虑，但在实际部署上，却没有真正做到。边沿城镇失守后，部队只得在后撤过程中临时构筑工事，仓卒防御。这种防御，只能阻挡小股俄军于一时，难以抗击其主力部队的进攻。在战斗中，清军只注意正面阻击敌人，忽视了俄军的迂回包抄战术，以致几个重要隘口都是在腹背受敌情况下失守的。此外，寿山最后轻信“协议”，准许俄军进驻齐齐哈尔城外，又不采取有力的防范措施，结果在后撤时遭敌炮击，齐齐哈尔为俄军轻易攻占，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策。

二、拉哈苏苏、双城子、琿春方向的作战及吉林省的陷落

当北路俄军在海兰泡大肆屠杀中国居民时，东北路俄军由萨哈罗夫少将率领步兵四个营、骑兵四个连、炮兵两个连及一个工兵排、一个电信排、一个医疗救护队，随带火炮二十六门，分乘二十二艘江轮和五十六艘拖轮，从伯力出发，沿黑龙江西进，于7月22日到达拉哈苏苏（今同江）。驻守该地的清军稍事抵抗即行撤退。俄军占领松花江口这一要点后，留兵一部驻守，主力随即溯松花江进犯三姓城。三姓位于松花江南岸，西濒牡丹江，东临倭肯河，是吉林北部水陆交通重镇。三姓副都统农英阿率八营清军（有火炮二十二门）驻守该地，沿江还驻有水师营。7月27日，俄军攻占了城外北面和西面的清军阵地，接着于28日上午9时，水陆两路夹攻三姓城。守军英勇抵抗，激战至下午4时，击沉俄轮一艘，毙伤敌军多人。终因俄军炮火猛烈，其后续部队又相继登岸，清军伤亡严重，被迫撤退。俄军占领三姓，枪杀居民，焚烧房屋，然后登轮向哈尔滨进犯。

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的枢纽，原驻有沙俄“护路队”两千余人，因受义和团的攻击，各地“护路队”陆续向哈尔滨集中，此时总数已逾四千人。寿山在部署黑龙江战守时，奏请清廷委任肯肖副都统庆祺为东路翼长，率领六营清军，驻扎于松花江口至呼兰沿线各站，防御俄军从东面入侵黑龙江省。鉴于哈尔滨为三省腹心之地，又严重威胁黑龙江省的后路，寿山于7月初曾约请吉林清军会攻哈尔滨，先清除哈尔滨“护路队”，然后专注北方边防。由于吉林将军长顺极力阻挠，此计未能实现。

7月26日，当俄军逼近三姓，形势极为严重时，寿山毅然命令庆祺率清军四营，统领定禄、穆隆阿、公培珍及营官富德等各率所部清军，进攻哈尔滨沙俄“护路队”司令部。因敌人已有戒备，清军遭到伏击，伤亡三百余人，退守呼兰。8月3日，萨哈罗夫所部俄军进占哈尔滨，同“护路队”会合。

俄军夺占哈尔滨后，迅速沟通了与双城子方向俄军的联系。9月1日，又派遣一个支队乘坐满载粮食弹药的列车，前往齐齐哈尔，以加强该处俄军。

9月12日，俄军从哈尔滨发兵北攻呼兰，清军弃城退走。俄军在呼兰大肆抢劫勒索，并将清军库藏军火“尽数搬出，或毁或运，或投深井，或掷大河”。

在萨哈罗夫率东北路俄军向哈尔滨方向进犯的同时，集结于双城子、克拉斯基诺的东南路俄军，分别向宁古塔和琿春发起进攻。

7月中旬，奇恰戈夫少将率俄军步兵两个营、炮兵一个连、骑兵两个半连及“护路队”若干人，携火炮六门，从双城子向宁古塔进犯。宁古塔是牡丹江畔的历史名城，吉林东部的重要屏障。该城驻有清军十余营，连同杨玉麟的民团组织镇东军及义和团，共约六七千人，分守叶河炮台、牡丹江渡口和宁古塔城。7月18—19日，俄军进攻叶河及牡丹江渡口，被清军击退。时值雨季，山洪爆发，俄军骑兵行动受阻，加之兵力不足，便于铁路附近“坚筑高垒”，等待援军。

7月27日，艾古斯托夫少将率俄军步兵六个营、炮兵三个连、骑兵两个连、工兵半个连，携带火炮二十门，从克拉斯基诺出发，向琿春进犯。琿春西濒图们江，北倚大盘岭，由清军帮办英联率靖边军六个营驻守，并有刘永和率领的忠义军协助防守。清军重点防守城南九十里的黑顶子和城东南八里、城西南十里的三处炮台。7月30日，俄军首先炮轰黑顶子炮台，接着进攻其余两座炮台。清军及忠义军发炮还击，毙伤俄军二百余人。激战至下午2时，城外炮台相继被毁，同时，城内外国商民趁机纵火作乱，英联被迫率部退至城外。俄军占领琿春后，因进攻宁古塔的兵力不足，艾古斯托夫即率部折往双城子，旋即西向增援宁古塔方向的俄军。

进攻宁古塔的俄军得到增援后，于8月26日夜逼近叶河。次日晨，控制了清军阵地对面的高地，同时，其骑兵直插叶河至宁古塔的大道。叶河守军恐后路被断，便主动退往宁古塔。

当清军和刘永和的忠义军在叶河、宁古塔坚守时，躲在省城吉林的长顺却加紧进行投降活动。8月13日夜，他煽动部分受官府控制较严的义和团民杀害了义和团首领敬际信及四十名团众。8月25日，又令已革记名副都统黑龙江协领达桂前往哈尔滨，向俄方卑屈求和，约定两军相见，以白旗为先，各不开枪，让路而行。随后，又令各路防军“遇俄兵时切勿开枪，免致重开衅端”。消息传至宁古塔，守军即退至鄂摩和。俄军于8月29日进入宁古塔，9月7日又占鄂摩和。9月22日，俄军先头部队进入吉林城。与此同时，伦年卡姆普夫率齐齐哈尔的北路、西北路俄军南下，于9月23日进入吉林城。9月30日，进占宁古塔的东南路俄军大队也赶至该处。侵略军入城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吉林银元厂的白银数十万两被抢劫大半，城内的兵工厂和炸药均被毁坏。厚颜无耻的长顺，却对俄军格外优待，备牛羊以犒俄师，对俄军所索军需差役，全部应承，并令吉林所属各府厅州县，“遇俄兵至，均照和约款接”，充分暴露了卖国贼的可耻嘴脸。

三、海城、辽阳一带的作战及盛京省的陷落

八国联军于7月14日攻占天津后，沙俄陆军部即于7月22日命令驻旅

《呼兰副都统倭克金泰等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95页。

《吉林将军长顺等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13页。

《吉林将军长顺等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14页。

顺的俄军暂停向直隶增兵，迅速前往营口，攻击清军和镇压铁路沿线的义和团，进占辽东半岛。阿列克谢也夫立即集中步兵二十个营、骑兵十六个连、炮兵五个连，分两部向北进攻：一部沿中东路支线北上，一部由水路增援营口、大石桥（今营口）的俄军。尔后进攻海城、辽阳、奉天。

盛京省邻近直隶，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声势甚大，7月初就拆毁了海城至开原的铁路桥房，并经常成群结队，以刀斧、铁棍、火枪同沙俄“护路队”交锋。7月中旬，辽阳、鞍山一带的义和团及清军，将辽阳的“护路队”二百余人围困三昼夜，迫使其向营口逃窜。7月15日，驻大石桥的“护路队”在米辛克上校率领下反扑海城，夺占唐王、亮甲各山，接连向城内开炮，击毁城楼。义和团及清军奋力抵抗，毙伤敌七十余人，并乘势追击，迫使沙俄“护路队”龟缩于大石桥、营口一带，不敢轻易出动。

7月25日（一说27日），沿铁路北进的俄军占领熊岳，8月1日占领盖平。8月4日，沿水路向北进攻的俄军在营口登陆，占领营口道署。驻守营口的清军骑兵三个营又三个哨，稍战即溃，仅义和团三百余人同俄军英勇搏斗。

主张抗战的盛京副都统晋昌，见形势危急，于8月上旬亲赴海城指挥作战。海城位于中东路支线上，西、北两面为平原，东、南两面为山地。当时驻有育字军、奉字军及县属地方武装四千余人、义和团千余人，共有火炮八门。晋昌抵海城后，决定依托城西南十多里的唐王、亮甲等阵地抗击敌人。8月9日，俄军少将弗列舍尔率步兵两个团又两个连、骑兵四个连、炮兵五个连，从大石桥出发，分三路进攻海城。8月10日，俄军炮击虎獐屯（今虎庄屯），清军退守邓家台，11日又退守唐王、亮甲等山。俄军追至唐王山，集中炮兵火力轰毁清军各阵地。晋昌率部退守城东北的双山。8月12日，俄军夹攻双山。晋昌恐后路被断，即撤向辽阳，俄军乘势占领海城。

正当海城前线激烈战斗之际，增祺伙同盛京户部侍郎清锐，于8月11日竟在奉天杀害了义和团首领刘德禄、张海及六十余名团众。接着又下令各州县将抗战的义和团众“一律查拿法办，以绝根株”。海城失陷后，增祺急忙派员至营口向俄军乞降，遭敌拒绝。在这种险恶形势下，晋昌多次上奏朝廷，请求“收整队伍”，“广招民团”，同侵略军进行持久作战，并斥责投降派一遇敌人“均执旗迎降”的丑恶行径。

俄军进占海城前夕，正是八国联军向北京大举进犯之时。沙俄为在关内攫取更大的利益，决定抽调辽东战场的部队，迅速“从营口或经旅顺投向大沽口”。这样，俄军侵占海城后，只得屯兵等待，不敢继续北犯。清军也未乘机反击，与敌处于相持状态。

9月初，沙俄从其欧洲部分抽调来的两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连抵达旅顺。9月21日，苏鲍齐奇中将也奉命到达营口。旅顺俄军遵照沙皇8月6日发出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旅顺俄军的“主要任务将是攻占奉天，并征服盛京全省”的指令，加紧进行北犯的各种准备。

《盛京户部侍郎清锐等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13页。

俄国陆军部学术档案馆：《1900—1901年对华军事行动资料汇编》，俄文版第二部分，第二册，第38页。

俄国陆军部学术档案馆：《1900—1901年对华军事行动资料汇编》，俄文版第二部分，第二册，第136页。

至9月下旬，营口、海城一带的俄军已有步兵十一个营、骑兵四个连、炮兵十个连，随带火炮四十门。侵略军分左、中、右三路向北进犯：弗列舍尔少将率左路进攻牛庄；苏鲍齐奇亲自指挥中、右两路进攻鞍山。

当时，驻守牛庄、鞍山、辽阳一带的清军，除晋昌的育字军外，还有全营翼长寿长率领的奉字军、仁字军等，共约五十余营，加之义和团踊跃参战，兵力尚属可观。但因增祺一再鼓吹停战议和，并多次调兵回保省城和增援北路，因而削弱了辽阳方向的作战兵力。

9月24日，左路俄军攻牛庄，寿长率清军十余营及部分义和团进行还击。由于俄军以速射炮连续轰击，守军不支，退守大望台，旋又退守刘二堡。俄军于当日占领牛庄后，将数千名中国居民围住，挥舞马刀来回砍杀数小时。这就是沙俄侵略者吹嘘为“赫赫武功”的“牛庄战役”。

9月26日，中、右路俄军在摧毁清军阵地后占领鞍山，接着向辽阳进攻。27日，寿长收集溃军，在沙河南八卦沟一带与俄军“复决死战”。但俄军“炮多力猛”，清军伤亡惨重，不支而散。当时，辽阳一带尚有清军步兵两千人、骑兵六百人、火炮三门。但在增祺的不抵抗命令下，城内遍插白旗。9月28日，俄军穿城而过，越太子河，直逼奉天。

这时，从黑龙江、吉林南下的各路俄军也已逼近开原、铁岭，对奉天形成南北夹攻的态势。奉天军政官员惊慌失措，争相逃命。增祺携带将军印，偕左右逃往新民厅所属的广宁一带。寿长、晋昌则收集溃军退往法库门（今法库）一带。10月1日，俄军不费一枪一弹进占奉天。10月6日，南北各路俄军于铁岭会合。至此，我东北三省各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全被俄军侵占。

在占领奉天前夕，沙俄从旅顺派出两个团又一个连，乘军舰四艘，于10月1日（一说9月30日）在山海关登陆。接着，这支俄军沿铁路北上，于10月4日占领锦州，中旬占领新民厅，控制了直隶通往东北三省的铁路交通，切断了关内外的联系，以便实现其独吞中国东北三省的目的。

11月11日，增祺在沙俄的军事压力下，派代表与沙俄侵略者于旅顺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其中规定：清军一律遣散，交出军火，拆毁炮台、营垒及火药库；俄军驻奉天及盛京各地；奉天设俄国总管，与闻重要公事。《章程》名为俄军向清政府“交地”，实则是在俄军控制下，让盛京各地官僚返回任所，充当傀儡，把盛京省变为沙俄的殖民地。

投降派的不抵抗主义和残酷地镇压义和团，是盛京省失陷的根本原因。此外，清军在作战部署和指挥上也有不当之处。如部署防御时，南部兵力过少，因而俄军从旅顺出兵后，得以乘虚而入，迅速占领熊岳、盖平、营口等重要城市。晋昌亲赴海城指挥作战时，也没有根据敌强己弱的情况，采取机动作战的方针，而是单纯地实行“敌来则打，敌退则守”的阵地防御战，加之缺乏坚固的防御工事和足够的火炮，而且士气低落，结果在俄军优势炮火的轰击下，被迫撤退，造成失败。

第四节 东北人民继续进行武装抗俄斗争

东北三省虽然被沙俄占据了，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被侵略军的淫威所屈服。他们纷纷组织起来，在北起大小兴安岭，南至黄海、渤海之滨的广阔地域内，进行“御俄寇，复国土”的武装斗争。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给德皇的报告中说：“俄国占领满洲一事，曾遇不少困难”。中国东北地区“常有武装完备之骑兵数百成群，袭击俄军，使其坐卧不宁”。在东北三省中，吉林省的群众武装抗俄组织声势最大。力主投降议和的吉林将军长顺曾奏称：吉林省各处“土匪”四起，“聚集大股”，“负隅自固，往往俄兵前往剿捕，亦屡多挫失”。

在吉林抗俄群众武装中，规模较大者有三支：一是以刘永和（绰号刘单子或刘弹子）为首的忠义军；一是以王和达、董教敏为首的义和团余部及农民军；一是以杨玉麟（又称杨毓林）为首的镇东军。刘永和原籍山东，猎户出身，早年在吉林琿春一带投身“绿林”，因枪法出众，成为首领。1900年7月，他率部协助琿春副都统英联所部清军在琿春一带抗击俄军。琿春失守后，他率部西走，沿途吸收了一部分被打散的清军兵弁，后在磨盘山（今盘石）一带继续抗击俄兵。11月，刘永和率部进攻朝阳镇（今辉南），击败前往镇压的清军海龙总管依凌阿部，进入通化县境，并于12月攻克通化县城。王和达是贫苦农民，董教敏是通化县的老道，他们率领的队伍活动于海龙、通化交界一带的山区。杨玉麟是盛京省盖平人，先在长顺收编的清军镇东营唐殿荣部任帮带，唐被部下刺死后，杨被推举为该部首领。杨即以镇东军官军名义进入朝阳和海龙，后因部下不愿“受官家约束”，便独立活动于附近各地。1901年1月下旬，上述三支抗俄义军以及被吸收的地方团练李贵春部，在海龙实行联合，统称忠义军，刘永和被推举为总统，统率全军。忠义军基本沿用绿营编制，总统以下有帮统、统领、营官、帮带、哨长等。与刘永和兄弟相称的刘秉和（绰号黑刘）为帮统，王和达、董教敏、李贵春、杨玉麟等为统领，各统率数营。忠义军共编有四十营，拥众数万。

除民众抗俄武装外，还有晋昌、寿长率领的清军万余人，在奉天失陷以后，于法库门等地继续坚持抗俄斗争。

忠义军有力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他们利用通化、海龙一带的有利地形，时而荫蔽于深山密林之中，时而出现于交通要道之间，或声东击西，或据险设伏，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惶恐万状。忠义军英勇抗俄的行动，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斗志。辽东各地群众抗俄组织纷纷打起忠义军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以致连盛京省官员也不知虚实，认为忠义军有“二十万，非饰词也”。

当时，俄军驻盛京省的司令部设于奉天故宫内，并在辽阳、奉天一带驻有重兵。为了加强与吉林俄军的联系，在奉、吉之间设有传递哨多处，有七十余名哥萨克骑兵往来联络。此外，在铁岭设有四个哨所，每天派出军官侦察队，侦察忠义军的行动。

为了瓦解抗俄力量，沙俄侵略者勾结投降派长顺、增祺等人，进行种种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三），第140页。

《吉林将军长顺等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15页。

《海龙县志》卷十七，第30页。

阴谋活动。长顺等以“背叛朝旨”、“拥兵自卫”、“贪功肇衅”等罪名，多次奏参晋昌。当时，清廷以慈禧、李鸿章为代表的投降派，正在京师向主战大臣问罪，故将晋昌开缺查办，将其所统清军交投降派清锐接统。这样，俄军得以集中力量镇压忠义军。

1901年4月中旬，俄军分路向忠义军发动进攻：由吉林伊通发兵进攻海龙的杨玉麟部；由奉天发兵进攻通化的刘永和部。

杨玉麟部闻俄军来犯，为避敌锋芒，主动撤离海龙，于大围场与前往镇压的敌军遭遇，因寡不敌众，复退至昌图，后又转入蒙古境内。杨玉麟率部撤离海龙县后，李贵春、董教敏于5月初出敌不意地率两千余人冲入海龙县西南的山城镇，在十天左右的时间内三进三出，缴获俄军屯积的军粮二十余车，并捣毁官衙，烧掉粮册，严惩了与俄军勾结的奸商。

通化地区的忠义军刘永和部，在俄军进犯时，采取避敌锐气，攻其必救的战法，以主力绕至敌后，直捣新宾堡（今新宾北），重创该处俄军，随后直逼兴京（今新宾）。兴京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的第一个都城。城西的永陵，是清廷祖先的陵寝所在地，由兴京副都统灵熙率兵护卫。灵熙得知忠义军将至，向增祺告急，无耻地要求俄军出兵，帮助保护清廷祖先的坟墓。增祺闻讯后，增派营官刘振发所部前往协守，附近的俄军亦驰往助战。4月19—20日，忠义军在兴京附近同俄军、清军激战两日。俄军死伤惨重，乃将进攻通化扑空的部队调回援救兴京。刘永和等鉴于军火不继，而通化的威胁又已解除，遂主动将部队撤回通化一带。

忠义军转回通化后，进行了新的部署：由刘永和、董教敏率大部分队伍先就地休整，制造军械，筹集粮饷，然后乘虚出击；由王和达、李贵春率一支队伍驻守山城镇，准备阻击企图从奉天、吉林再度来犯之敌；由郑兰亭（绰号老君炉）率一支骑兵，向凤城挺进。至6月21日止，忠义军连克怀仁（今桓仁）、太平哨、宽甸、凤城、安东（今丹东）等城镇，收复了盛京省东部、吉林省南部大片领土。此外，刘永和还率领忠义军主力，联络附近百余里的各支义军围攻海龙。各路义军彼此支援，互相配合，一时威震吉林、盛京两省。

忠义军的节节胜利，使沙俄侵略者及其走狗长顺之流坐卧不安。在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再电令下，阿列克谢也夫于6、7月间派遣大队人马，围攻通化、海龙、凤城等地的忠义军。同时，派遣叛徒、密探潜入忠义军中，进行挑拨离间，分化瓦解。长顺等人还号召地主豪绅举办团练，配合俄军的“围剿”，并阴谋收买忠义军中的动摇分子。

忠义军利用通化、海龙、凤城一带的有利地形，采取适合自身特点的战术与敌人周旋。在敌人猛扑过来时，先将队伍撤至深山密林中，尔后昼伏夜出，袭击敌军，胜则乘势追击，败则退据深山；对俄军大部队，“不与力战”，“只于云阴月黑之夜劫营”，“用善枪者近敌营，伏暗中狙击，别以他卒鸣枪诱之，俄军出则狙击之”；若俄军“伏匿不动”，则“俟其懈，出其不意击之”；若“自料不敌，则蛇行引退”。忠义军实行这一套灵活的打法，不断地消耗敌人兵力，有效地保存了自己的力量，使俄军的“围剿”落空，且受创甚巨。

参见《盛京将军增祺等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200页。

《海龙县志》卷十七，第35页。

敌人的武力“围剿”，并没有把忠义军打垮，但敌人的招抚伎俩，却取得了效果。忠义军的成员，除了农民、猎户、筑路民工、矿工、伐木工人、小商贩以外，还有大量的清军溃卒游勇和地方乡勇富户、地痞恶棍等，趁忠义军势力发展之际，混迹其中，以致成分相当复杂。而忠义军的领导人刘永和等，不但毫无警惕，反而以此“自诩其众”，“以虚声相炫耀”。在这些人中，虽然有一部分人具有不同程度的反帝爱国热忱，但对清王朝的认识却很模糊。刘永和本人对清廷也抱有幻想，一度几乎接受招抚。所以，在物资匮乏、斗争环境艰苦或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有些人极易被拉拢收买，倒戈背叛。如投机商人林成岱，曾为清军哨官，在自称忠义军后，四次攻克新宾堡，但不久便被俄军收降，改编为“花膀子队”，充当了镇压忠义军的鹰犬。此外，李贵春在通化被叛徒刺杀，刘永和的得力助手、忠义军帮统刘秉和在怀仁被俘牺牲，使忠义军的力量日益削弱，以致刘永和、杨玉麟等主要领导人再次动摇，于1901年冬先后与长顺接洽受抚事宜，结果被俄军劫持到伯力。不久，俄军又将刘永和解回珲春，利用他的名义收缴其部下的枪械，瓦解忠义军。1901年冬，忠义军的抗俄斗争便基本上失败了。

忠义军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东北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仍在继续进行。沙俄侵略者虽然可以在东北三省的统治者中找到忠实于自己的走狗，但是却逃脱不了人民的惩罚。正是由于东北三省人民的英勇斗争，以及其它帝国主义出于自己的侵略目的，反对沙俄独吞中国的东北，才迫使它在1902年4月8日，同清政府签订了《中俄收交东三省条约》。条约规定，俄军于十八个月内分三批撤出东北三省。于是，沙俄企图把我国东北三省变成“黄俄罗斯”的梦想终于未能实现。

第五节 清军失败的原因

沙俄一面参加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一面单独发动侵吞我国东北三省的战争，从开始进攻到侵占三省主要城市，各路侵略军会师铁岭，前后不到三个月。清军失败如此之快，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慈禧集团推行投降卖国政策

沙俄入侵我国东北三省之时，正是八国联军进攻和占领京津地区，慈禧、光绪出京逃亡之际。慈禧集团为了保全自身的统治地位，正一意乞和。他们唯恐东北三省的抗俄行动打乱求和部署，在沙俄开始入侵东北之日，便匆忙下令压制抗战将领，纵容投降派镇压义和团，为“将来收束地步……豫为筹计”。因此，东北三省的抗战将领横遭贬斥，倍受掣肘，而投降派则有恃无恐，公开推行不抵抗政策。沙俄政府正是利用英、美、法、德、日、意、奥等国用兵关内，无暇顾及东北三省之机，抓住慈禧集团急于求和的心理，加紧收买投降派，寻找走狗，协助其从三省内部遏制、阻挠和破坏爱国军民的反抗行动，为其大规模入侵扫清障碍，最后终于实现了长驱直入，迅速占领东北三省的罪恶阴谋。

二、前线将领和战分歧，不能统一指挥

东北三省的两个将军直隶清廷，互不统属，加之其中一人主战，两人主和，这就无法在三省之间建立统一的指挥机构，实行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集中三省军民的力量进行积极的抗战，以致形成各行其是，此战彼和的局面。黑龙江将军寿山，虽不怕朝廷的指责，不顾长顺等人的梗阻，竭尽全力进行抗战，但兵力单薄，又无后援，终于孤掌难鸣，为敌所败。吉林将军长顺和盛京将军增祺，在朝廷庇护下公开进行求和活动，不但不积极备战，反而镇压义和团，不准部下抗敌，严重影响了清军的士气，破坏了军民的抗战。

相反，沙俄政府为了统一指挥对华军事行动，成立了以沙皇尼古拉二世为总司令、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为总参谋长的战争指挥机构，统一动员和调动军队，进行战场建设，制订作战计划，明确各路军队的作战任务和各级指挥官的职责，协调各路军队的作战行动，保证军令畅通无阻。由于准备充分，指挥统一，因而保证了入侵计划的顺利实现。

三、边防空虚，门户失控

由于清廷财政亏空，无力充实边防，致使东北边疆防务空虚，要隘不固。三省之中，黑龙江省尤为薄弱。寿山到任之后，虽多次“整顿旗务，办理边防”，但边界太长，兵员太少，该防的要点无法防，该堵的隘口没有堵。加上未实行招民开荒，屯垦戍边政策，边境人烟稀少，每平方公里只有两人，

《军机处寄盛京将军增祺等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60页。

《盛京将军增祺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95页。

所以民力短缺，粮饷窘绌。至于兴安岭以南，更是“地势平衍，无险可扼”。吉林省除了八十年代吴大澂督办防务时对三姓、宁古塔、珲春的防务有所加强外，以后“自兴修铁路以来，边禁、江禁均弛”。俄船可溯松花江直逼三姓，火车可直达宁古塔。珲春与俄境接近，也旷无障碍。盛京省自旅大被沙俄强占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沙俄侵略者攫取了中东铁路建筑权，三省边界的许多山口、通道，任其自由出入，清军关卡哨所几同虚设，冲要之地门户失控，因而战事一起，俄军得以乘虚而进，迅速占领各个战略要地，进而控制东北全境。

四、兵力不足，部署分散

在沙俄进攻期间，三省只有驻军一百一十余营（八旗兵除外），约五万人，其中有不少是新募之兵，战斗力很弱。五万兵力中，参加抗战者不足四万。以四万兵力抗击十六七万俄军的进攻，兵力对比过于悬殊。同时，四五万清军又分布于广大的东北三省，形成极为分散的部署，因而在每一个作战方向上，俄军都能集中至少三倍于清军的火炮和数倍于清军的兵力。这就决定了清军失败的必然结局。在作战中，俄军又比较善于集中优势火力杀伤清军的有生力量，致使清军每战损失甚大。

五、装备落后，指挥笨拙

东北三省的清军不仅数量少，而且编制杂乱，装备落后，训练废弛，素质很差。

东北三省清军的武器装备极为落后，不少部队“均系以抬枪来福枪及各种土枪搭配散发”，有的部队“即抬枪土枪亦无从搜给”；“即分发各营之枪，持用多年，亦多窳败，且有不堪修理者”。战争开始以后，关内的武器弹药无法运去，只有靠吉林机器制造局补给；而其生产能力有限，且又掌握在投降派手中。清廷虽曾谕令长顺酌量给其它两省调拨军械，长顺却要求从盛京及南方各省调拨枪炮支援吉林。因此，战争过程中，清军“粮饷枪械子弹均不敷用”。而俄军装备精良，又控制了交通运输网和建立了战场物资供应基地，所以可以及时得到充裕的弹药补给，在作战时能以优势的火力压倒清军。

东北清军高级将领中，长顺、增祺不但在政治上是主和派，在军事上也是胸无韬略、长期未经战阵的庸碌之辈。主战的寿山虽参加过甲午战争，但在作战指挥上表现得机械呆板。战前，他把有限的兵力大部分散于边境前沿，不注意充分利用地形加强纵深设防，因此，一旦前沿城镇失守，就无法在纵深进行有效的防御。另外，不注意利用民众力量，配合清军于侧后袭击俄军，破坏俄军的水陆运输、物资补给，迟滞俄军的进攻，消耗俄军的有生力量。

《齐齐哈尔副都统萨保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44页。

《吉林将军长顺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26页。

《盛京将军增祺折·附黑龙江将军寿山遗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97页。

《吉林将军长顺折·又片》，《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33页。

《黑龙江将军寿山等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79页。

在这方面，还不如忠义军灵活多变。

与清军的情况相反，参战的俄军将领大多经过军事院校的专门培养和战争的锻炼，懂得近代战争的战略战术，其中有不少熟悉我国情况，是专事侵略我国东北地区的冒险家。在进攻作战中，他们善于指挥步、骑、炮兵协同作战，尤其善于发挥军队数量锐减，黑龙江省最后几乎到了已无再战之兵的地步。骑兵的快速突袭和炮兵的火力优势。他们以哥萨克骑兵和骑炮兵组成快速支队，突袭清军阵地，使清军仓卒应战，措手不及。后续部队到达后，即以优势炮火猛轰清军阵地，并派兵包抄清军侧后，前后夹击，攻占阵地。在清军败撤后，又以哥萨克骑兵进行追击，达到扩大战果，进一步杀伤清军有生力量的目的。当然，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俄军也暴露了战线长、兵力分散、翼侧暴露等弱点。但是，由于清军将领不善于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俄军的这些弱点才未充分暴露，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和惩罚。

沙俄动员了十七万左右的兵力进攻我国东北三省，比八国联军的总兵力还多两三万人。其所以要进行如此巨大的赌注，是为了在得到八国共同分赃的份额之外，独吞东北三省。由于中国人民的抗俄斗争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牵制，沙俄不得不暂时放弃独吞之举，但它根据《辛丑条约》勒索的赔款，却占清政府向各国赔款总数的 29%，居各国所得赔款的首位。因此，连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也承认，1900 年的对华战争为“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然而沙俄的欲壑难填，它吞并我国东北三省之心不死，不久又增兵东北，进一步地同日本争霸中国东北，终于酿成了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再次把战争的惨祸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

[苏]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 218 页。

第十三章 抗击英军入侵西藏的战争（1903年12月—1904年9月）

1903年夏，英国趁日、俄两国为宰割我国东北地区而进行激烈争夺之机，以要求“谈判”为借口，派兵侵入我国西藏地区。侵略军大肆烧杀淫掠，激起了西藏爱国军民和广大僧侣的强烈反抗。他们凭险设卡，英勇战斗，到处伏击敌人，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终于粉碎了英帝国主义妄图分割我国西藏地区的图谋。

第一节 英俄两国对我国西藏的争夺

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北接新疆、青海，东接四川、云南，西面是克什米尔，南面与印度以及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和缅甸等国相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英、俄两国侵夺西藏的野心由来已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俄在亚洲争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阿富汗、伊朗和中国西藏等地区。英国亟图占领西藏，打通由印度进入四川，顺长江而下，直出东海的通路，以便把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沙皇俄国则不仅妄图吞并我国的东北三省，而且把蒙古、新疆、西藏都包括在它的“黄俄罗斯”计划之内，还想把侵略势力从中亚扩展到南亚次大陆，直达印度洋。因此，我国的西藏就成了英、俄两国为谋求亚洲霸权所必争之地。

一、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

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先后将尼泊尔、哲孟雄、克什米尔、不丹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哲孟雄境内的大吉岭设立军事基地，控制了那个“印度入藏门户”，随后又修筑通往西藏的道路。1876年，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其后，便以条约中有关允许英人入藏“游历”、“探路”等条款为依据，多次派人窜入西藏搜集情报，收买上层分子，挑拨班禅和达赖的关系，进而要求入藏“通商”和常驻“使节”。英国的这些要求，遭到西藏僧俗大众的坚决反对。为了防止英国的侵略，西藏地方噶厦派兵二百名在隆吐山（龙头山）修筑堡垒炮台，设卡自卫。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但是，英国为了打开进入西藏的大门，先则无理声称藏军“设卡之地距大吉岭甚近，意在阻止通商”，后又提出这是“横截廓尔喀东通印度之路”。1887年，英国干脆撕下伪装，令其驻北京公使发出照会，胡说隆吐山属哲孟雄领土，要求限期撤卡，否则，将采取军事行动，武力驱逐。这一无理要求，遭到西藏地方政府的严词拒绝。英国见讹诈不成，遂向边界调集军队和物资，积极准备入侵西藏。西藏地方政府得悉，立即派四品仔本（仔本）多尔济仁增赶赴隆吐山，并从各地抽调军队，准备随时增援。而清政府在英国恫吓下，竟一味退让妥协，命令“将隆吐兵速即撤回”。但是，西藏人民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决心坚定不移，对清政府的媚外行径进行了坚决抵制。

1888年3月20日，英国悍然派兵四五百人，向隆吐山西藏守军发起进攻。多尔济仁增率领藏军用火铳、弓矢等简陋武器进行抵抗，毙敌军官一人，英军被迫后撤。次日晨，英军再次进攻。藏军依托阵地誓死抵御，毙伤英兵百余人。

英军不甘失败，调来援军和重炮。8月24日，英军在格累姆上校指挥下，以猛烈炮火向隆吐山前沿阵地轰击。藏军不支，退守纳汤，隆吐山遂被英军侵占。藏军据守纳汤北侧高山，在一夜之间筑起一道四五里长的齐胸墙垣，

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由三俗一僧共四人组成，其成员称为噶伦、噶布伦或司伦，受驻藏大臣和达赖管辖，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三大寺大众等公禀》，《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67页。

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牍·刘秉璋奏牍》，第1页。

奋力抗击敌军。后在英军优势火力轰击下，被迫退却。英军占领隆吐山、纳汤后，一面整修道路，一面增调军队，准备继续向前推进。

西藏地方政府为了组织反攻，下令征调前后藏各地民兵前往增援。不久，陆续集中于亚东（今老亚东）前线的藏军约有一万余人，与英军形成对峙局面。为了加强前线的指挥，西藏地方政府又委派噶伦拉鲁为哲孟雄马噶基巧（兵营总管），负责前线总指挥，以仔本擦绒为帕里马噶基巧，负责后方运输事宜。以后又派噶伦然巴为帕里马噶基巧，与三大寺负责喇嘛一同前往加强领导。

正当西藏地方政府加强前线兵力和指挥，准备继续抗敌之际，清政府为达到与英国谈判媾和的目的，把主张抗英的驻藏大臣文硕革职，改任昏庸畏葸的升泰为驻藏帮办大臣，并下达撤兵媾和的命令。升泰在赴任途中，下令江孜守备及统领藏军噶布伦“严束藏兵，不准妄动”，并将藏军撤回帕里一线，只准防守，不得出击，“如违节制，立即严参”。在升泰的压制下，藏军虽未听命，但抗英士气受到了严重挫伤，抗英部署也受到了影响。同年8月中旬，藏军为了收复失地，拟组织反击，也被升泰制止。9月24日，英军二千余人向捻纳藏军营地发起进攻，藏军不支，被迫撤退。其后，英军相继占领了则利拉、亚东等地。

由于清政府执行妥协投降政策，西藏军民的第一次抗英战争终于失败了。但是，英国侵略者从这次入侵过程中，看到了西藏军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不可侮，不得不暂时放弃深入西藏内地的企图，同意与清政府进行“和谈”。1890年3月，升泰屈服于英国的压力，与之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承认哲孟雄归英国保护，并以则利拉为藏哲边界，使中国失去了大片领土。1893年，中英再订《续约》，清政府同意开放亚东为商埠。有关划界、通商、游牧等问题，容后再议，后来又成了英国进一步侵略的借口。

英国用武力撬开西藏大门后，随之以贸易手段进行疯狂的侵略和掠夺。英印货物充斥西藏市场，严重排斥了中国内地货物在西藏的正常销售。在通商的幌子下，英国还不断派人深入西藏腹地进行勘察，向清政府勒索开矿的特权。1899年至1901年，英国以印度总督名义多次致书十三世达赖，企图越过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当局直接谈判，阴谋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结果遭到达赖的拒绝。但英国并不甘心，1902年又派哲孟雄政治专员怀特率兵二百余人，以“划界”为借口，侵入西藏的甲岗和思补布纳一带，蓄意挑起边界冲突。他们拆毁中国的哨卡和原有国界标志的大石堆——鄂博，私立石堆，擅插英国国旗二十一处，并掠走大批牛羊。

二、俄国觊觎西藏，与英国进行争夺

在英国入侵西藏的同时，早就觊觎西藏的沙皇俄国为了“在亚洲打败英国（夺取整个波斯、蒙古和西藏）”，多次派遣间谍，组织武装“探险队”、“调查团”，经蒙古、甘肃、青海潜入西藏，搜集情报。1883年，在英军进犯隆吐山之际，借“游历”为名进入西藏的俄国间谍，乘机给西藏地方某些

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牍·刘秉璋奏牍》，第2页。

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牍·升泰奏牍》卷一，第5页。

列宁：《论单独讲和》，《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28页。

头目密函三件，“约令遇有急难，将函驰送俄境，即可电达，助兵援应”，妄图以“助藏抗英”为幌子，达到其侵占西藏的目的。1900年11月，窜入西藏的沙俄武装间谍在察木多（今昌都地区）琐图地方烧毁藏民房屋，抢掠马匹，制造了杀死杀伤藏族同胞四十人的流血事件。此外，俄国还派遣宗教特务德尔智打入西藏农奴主贵族中间，并窃取了十三世达赖侍讲的要职。德尔智用俄国供给的金钱收买西藏上层分子，大造亲俄舆论，挑拨藏族与祖国的关系。达赖见清廷软弱无能，在德尔智的煽动下，产生了联俄抗英的倾向。1901年，达赖派德尔智以“西藏特使”的身分，率领所谓“西藏使团”赴俄活动，并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接见。俄国借此大造舆论，称达赖决定与俄国缔结最友好之关系，“俄国为唯一能破英国阴谋的强国”。随后，俄国又派出两支全副武装的队伍，分别以“科学探险”和“经商”的名义，用二百头骆驼、五十五匹马和二百头牦牛驮载枪弹器械，取道库伦、青海运往拉萨。从此，“俄商及军队潜踪入藏者络绎于途”。

英国见沙俄加紧进行侵藏活动，多次向俄国提出质问。1903年2月，英国外交部提出警告：“俄若派兵西藏，英必效之”。俄国亦针锋相对，提出“如果该地方现状发生变乱，则俄国政府不能置之不理”。于是，英俄两国为争夺中国西藏，大有剑拔弩张之势。但是，当时俄国的侵略矛头主要是指向中国的东北，且与日本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拖住了它的手脚。英国趁此时机，利用1902年与日本缔结的反俄军事同盟，怂恿日本进攻俄国，自己则积极准备再次武装入侵西藏。

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牍·鹿传霖奏牍》卷三，第1页。

参见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牍·安成奏牍》，第22页。

德尔智，原名德尔捷耶夫，外贝加尔湖以西上乌丁斯克省人。此人被沙俄间谍机关收买后，即带着大批活动经费，以“学经”名义，前往西藏各大寺活动。他使用各种拉拢手段，爬上了达赖十三世侍讲（副经师）的高位。

朱锦屏：《西藏六十年大事记》，第7页。

《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致英国驻俄大使斯科特电》，转引自《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5年第4期，第98页。

第二节 英国的战争准备与西藏的战备设防

一、英国的战争准备

西藏位于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西南部，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全境为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所环抱。南面的喜马拉雅山横贯边界，平均海拔六千米以上，山高坡陡，沟谷深窄，断崖陡立，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7—9月为最暖季节，雨水较多，12月至次年3、4月为严寒季节，一般平均气温在摄氏零下十至二十度之间。有些高山终年冰封雪冻，昼夜温差高达摄氏三十度左右。加上河岸陡，水流急，道路少，人烟稀，桥梁简陋，通行非常困难。中国的近邻尼泊尔、哲孟雄、不丹等国虽然被英国用武力和各种阴谋手段划入其势力范围，但由于历史渊源和宗教信仰的关系，这些国家的广大人民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因此，英国军队要攀越重山峻岭，进行高寒山地作战，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英国为了解除后顾之忧，首先拉拢尼泊尔、不丹参战。根据1856年的藏尼条约，西藏在受到外国攻击时，尼泊尔有援助的义务。因此，英国政府认为，要入侵西藏，孤立藏军，必须始终“与尼泊尔宫廷[廷]一致合作”。1903年，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亲自出马邀请尼泊尔首相到印度德里会谈，向尼泊尔政府施加压力。尼泊尔首相终于同意与印度政府合作，不援助西藏，并为英军提供大量人力、物力支援。英国在不丹拒绝在其境内修筑通往西藏的道路以后，担心不丹与西藏联合抗英。英国侵略者认为：如果这样，“不丹即可从仁进冈到都拉截断英人的交通线。不丹人身体强壮，他们若要反对英军，可以动员同藏军一样的兵士，组成第二支军队”，打击英军。为此，英军在进犯西藏之前，派大吉岭道尹（英人）到不丹活动。在英国的压力和收买下，不丹终于断绝了与中国的正常关系，派人参与侵藏活动。

为了解决高原运输，英国动用了巨大力量，抢修尼泊尔、不丹、哲孟雄与西藏接壤的许多通道。在修路过程中，对工兵进行了驾驶二轮牛车（载重八百磅）和轻便马车（载重四百磅）的训练；向尼泊尔当局征用牦牛四五千头和相当数量的骡马，并进行了现地运载试验；因牲畜染疫大批死亡，又从各地雇用民夫七千人，以保障物资的前送。此外，英国还在印度加尔各答一带组织骡马后备队，以应付紧急运输任务。

1903年6月，英国“谈判使节”荣赫鹏以两名间谍被西藏地方政府扣押和要求通商划界“谈判”为名，率兵二百及随从数百人，再次进犯西藏，由甲岗直趋干坝。西藏地方政府立即下达征兵动员令，派七百余人赴干坝一带构筑工事，组织防御。侵略者以要求谈判为由，在干坝以南地区盘踞数月之久。

1903年10月初，英国政府正式批准了进占江孜、拉萨的计划。荣赫鹏于10月11日折返印度，与寇松具体筹商进攻西藏的军事部署。12月10日，侵略军全部在纳汤集中，计有第二十三锡克步兵营七百人、第三十二锡克步兵营七百人、第八廓尔喀步兵营七百人、骑兵一百人、孟加拉和马德拉斯工

《印度政府外务部致英国印度事务大臣汉弥尔顿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184页。
[英]埃德蒙·坎德勒：《拉萨本来面目》，英文版第100—101页。

兵各一队、野战医务队五队和其它后勤保障部队。共配有步枪二千八百支、火炮六门、马克沁机枪若干挺。全军由少将麦克唐纳为指挥，易喀尔丹为参谋长，布雷哲尔负责后勤运输，另有大批随从人员，总计一万余人。英军筹集了一个月的粮食和十天的饲料，为了解决防寒问题，给士兵配发了帐篷、取暖燃料、羊皮、毡毯、毛织围巾、厚毛衣、毛袜等。

英军的进攻计划，原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荣赫鹏率领进攻干坝，然后由干坝趋江孜；另一路由麦克唐纳率领，越过则利拉山口入藏，占领春丕（今亚东南二公里），然后向北进攻，在江孜与荣赫鹏所部会合。由于干坝方面西藏民军有了戒备，麦克唐纳认为，如果执行两路出击的计划，“将冒很大危险，且运输接济之部署，亦感困难。”最后决定：干坝一带的英军，仍以派遣使节进行“谈判”为名，牵制中国守军，而荣赫鹏、麦克唐纳则率领主力越过则利拉山口，直趋春丕谷。尔后，干坝方向的英军再向春丕转移，与主力会合，集中兵力，向拉萨进攻。

二、西藏的战备设防

西藏的自然条件对防御作战是非常有利的，但由于清政府和多数驻藏大臣腐败无能，不重视边防建设，致使防务废弛。清政府在西藏的驻军不仅数量少，而且装备非常落后。自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驻藏大臣福康安奏请建立了常备军，申定兵制、兵额以后，军队数量一直保持在三四千人左右。其组成及驻防情况如下：

一是绿营兵步骑六百余人，从四川派遣，大部分驻于前藏，充当驻藏大臣的卫队，一部分驻于日喀则、江孜、定日等地，协助西藏地方部队进行训练和驻防。绿营官兵随同驻藏大臣三年更换一次。遇有战事，由驻藏大臣奏请川、滇拨兵支援，事平之后，仍留原额。其装备有亨利—马梯尼、斯涅德等各种类型的线膛步枪及部分火炮。平时虽有训练，多半为了应付校阅考核。此外，拉萨至四川打箭炉（今康定）一带还设有绿营兵八百余人，主要任务是保护粮台和运输，战斗力很差。

二是西藏地方军（即藏军），定额三千一百六十二名。凡二十五人为一定本，五定本为一甲本，二甲本为一如本，二如本为一代本。代本直接听命于驻藏大臣。这些军队平时驻拉萨、日喀则各一千零五十四人，定日、江孜各五百二十七人。除定额外，尚有守卡兵三百一十二人分守各关卡。藏军装备，定本以上军官配有线膛步枪，士兵十分之五使用土枪，十分之三使用弓箭，十分之二使用刀矛、藤牌。部队受宗教影响很大，战士佩有“护身符”，出征时求佛护佑，虽作战勇敢，但军官指挥能力低，战术落后。

此外还有民兵，遇有战事，由噶厦向各地征集，自备武器和口粮，由营官率领，前往指定地点参战。他们熟悉地形，富有吃苦耐劳精神，能越野，

据[英]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和坎德勒《拉萨本来面目》载，第三十二和二十三锡克步兵营为工兵，并称“队”或“团”，而不是“营”。

春丕谷，指帕里经春丕至亚东一带的雪山之峡。

营官，属地方官，亦称知事、郡长，受西藏地方政府和驻藏大臣领导，遇有战事，受代本直接指挥。驻地要冲皆筑碉房，形似地堡，故称营。营官数额，依地方大小和人口多少设一至二人，有大营官、中营官、小营官、边营官之别。其职责，平时主管民政、税收等，战时管军务。

善骑射，服从性强，作战勇敢，但装备差，缺乏训练，进攻时无一定队形，撤退时不易管束。

1888年隆吐山抗英时，藏民不顾升泰的反对，于纳金山（干坝正南）设边墙十余段，同时在丈结山建卡驻兵，后升泰为讨好英帝国主义，竟强令撤离。在帕里以南，自亚东辟为商埠后，升泰曾于1890年设卡三处，但其目的主要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举办通商”，“所有西人即准抵关贸易，不能擅入关内，以示限制”。在英国侵略面前，尽管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了动员，但缺乏统一的部署与计划，对敌情的了解也不够，仅在险要地点构筑了一些临时工事，进行防御。但西藏军民具有光荣爱国传统，为了保卫国土，他们敢于面对强敌，英勇战斗。

第三节 曲眉仙角、古鲁之战（1903年12月—1904年3月）

1903年12月11日，麦克唐纳率侵略军一千一百五十名，携火炮四门、马克沁机枪四挺，越过则利拉山口，于13日占领了仁进冈，14日进占通向江孜的重要门户——春丕。由于西藏地方政府对英军入侵方向判断错误，主要兵力在干坝一带设防，以致亚东至帕里一带险要地点无兵把守，敞开了门户。结果，英军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了春丕一带的边寨要地。接着，荣赫鹏率后续部队到达，春丕成了侵略军的兵营和军事物资贮存地。这时，西藏地方政府急调军队去帕里防守，但为时已晚。12月18日，麦克唐纳率由七百九十五名步骑兵组成的轻装纵队继续北犯，20日抵达帕里，夺取了帕里宗政府储存的火药和武器。由于风雪严冬，道路险狭难行，英军的给养极为困难，“燃料几完全缺乏”，再向前推进已不可能。麦克唐纳只得命令两个连驻扎帕里，自率其余部队返回春丕，筹措给养、燃料。这时，赶到帕里前线的藏军准备组织反击，却被驻藏大臣裕钢下达的“沿途地方文武官，只能理阻，不准与英兵生事”的命令所阻，结果失去一次歼敌的极好机会。

1904年1月4日，麦克唐纳与荣赫鹏又率军从春丕出发，越过帕里，于8日推进到堆拉。荣赫鹏率部分侵略军留在堆拉，与拉萨派来的代表进行“谈判”，麦克唐纳则率部再次返回春丕，进行休整和筹集给养。

西藏地方代表多次要求英国侵略军撤回亚东，均被荣赫鹏拒绝。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从各地征调的军队两千余人，已赶到堆拉以北的曲眉仙角（堆拉北七里）和古鲁（堆拉北二十里）一带，构筑了两道石墙，组织防御。3月初，守军又增至三千余人，共六个代本。其中来自拉萨两个代本，日喀则两个代本，江孜、丁日各一个代本。这些部队属于临时调集，未经训练。其总指挥降巴丹增，前线指挥莱丁色，副指挥郎色林，都无战争经验，以致在兵力部署、作战指挥等方面都存在许多漏洞。

占领堆拉的英军仅是一支力量不大的先遣队（有步枪四百支、火炮二门、机枪二挺），而且天时地利对其非常不利。侵略军不适应高原缺氧和风雪严寒的气候，很多人患有肺炎，已有十二名死亡，不少人冻伤致残。由于风雪猛烈，前后方联系经常梗断，加之牲畜劳累和染疫而死者十之八九，以致运力剧减，供应十分困难。而西藏守军仍未趁机向英军发起反击，也未切断敌人兵力薄弱的运输线，结果又丧失了一次有利的战机。

3月中旬，英军完成了进攻江孜的准备。3月28日，麦克唐纳率工兵四个连、步兵三个半连及野战救护队、战地工程队等，携炮四门、马克沁机枪若干挺，抵达堆拉。与此同时，荣赫鹏致函新任驻藏大臣有泰（升泰之弟），横蛮地提出要进至江孜“谈判”，并威胁西藏守军不得抵抗。3月31日，麦克唐纳、荣赫鹏率侵略军一千三百余人，由堆拉出发，分三路向北推进。西藏当局派代表前去劝阻，要求英军撤至亚东谈判，荣赫鹏不予理睬。当英军接近曲眉仙角藏军阵地时，荣赫鹏又耍阴谋诡计，要求双方停火谈判。藏军受骗，未予射击。麦克唐纳却暗中调动兵力，命令第八廓尔喀步兵营从左翼迂回，抢占山头。西藏守军发觉后，竟放弃山上阵地，退至拦阻墙内。随后，英军于山之右侧部署了机枪和炮兵阵地，骑兵在平地展开，从三面将一千五

[英] 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中译本第129页。

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牍·裕钢奏牍》，第8页。

百余名藏军包围。这时，荣赫鹏原形毕露，限令藏军在十五分钟之内缴械投降。藏军前线指挥莱丁色严词拒绝，麦克唐纳便突然下令开火。藏军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毫不畏惧，用手中的大刀、长矛、铁叉与英军展开白刃格斗，打死打伤英军官兵十五人。后在敌人的交叉火力射击下，莱丁色、郎色林和七百余名藏军相继牺牲，余部撤向古鲁，守卫第二道防线。英军追至古鲁，藏军再次奋起抵抗，终因伤亡过大而后撤。

曲眉仙角和古鲁之战，藏军共伤亡一千四百余人，“但是没有一个向敌人屈膝投降”，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和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英国侵略军的残酷屠杀，更加激起了西藏人民的无比愤怒，进一步点燃了广大西藏人民群众反侵略的熊熊烈火。

第四节 江孜之战（1904年4月—7月）

一、江孜的陷落

1904年4月5日，英军从古鲁出发，向江孜进犯。从古鲁撤退的藏军会同拉萨调来的援军，扼守康玛一带的山谷要地，并组织小分队，沿途袭扰敌军。当地藏民也自动拿起武器，纷纷参加抗英斗争行列。英军进至康玛南五六里的雪那寺时，遭到藏军二三百人的顽强抵抗。侵略军用步骑兵从三面包围了该寺。藏军英勇战斗，给敌以沉重打击，自己亦伤亡一百余人，被迫退往藏姆章防守。英军占领康玛后，大肆抢掠。西藏民军翻穿羊皮袄，混在羊群中引诱敌人，一次即杀伤侵略军二三十人，使敌人再不敢贸然出来抢劫。

4月9日，英军从康玛继续北犯，当行至距康玛十五里的山峡时，遭到据守藏姆章两侧高山的藏军阻击。藏军千余人依托山地工事，连续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使英军不能前进。最后，英军集中全部兵力，在炮火的支援下，一部兵力从正面进攻，一部兵力从翼侧迂回，包围了藏军阵地。藏军战士经过英勇搏斗，被迫突围。第二天，英军乘势侵占绍岗，11日进迫江孜。

江孜为宗政府所在地，南邻年楚河，周围是一片平原，其西有一条路直达日喀则，向东越过山顶（江孜东七十公里）通往拉萨。宗政府设在江孜城区最突出的宗山顶上，是个坚固的堡垒。在宗山的西北，与之相连的一座小山上有全城最大的寺院——白居寺。由于驻守江孜的军队大部分调往南面各隘口防守，交战失利后，又没有及时收拢，因而与英军相比兵力悬殊。在此情况下，江孜守军主动后撤。4月13日，英军占领江孜。侵略者抢夺了近百吨粮食和数吨火药，并对附近的寺院及村镇大肆烧杀抢掠。

英军占领江孜后，为了减轻运输压力和做好进犯拉萨的准备工作，留下一支拥有五百余支步枪、两挺机枪、两门火炮的部队和三个星期的食品，随同荣赫鹏驻扎于江孜年楚河畔的江洛林卡，其余部队由麦克唐纳率领撤回春丕。

二、卡罗拉战斗

江孜失守后，达赖立即动员各地藏民组织民团武装，向江孜一带集结。5月初，共有近万人到达江孜周围各隘口，其部署是：江孜附近二千五百人，绒谷一千五百人，浪卡子二千五百人，热隆一千人，日喀则一千五百人。此外，还在卡罗拉设卡守卫。卡罗拉前通江孜，后通拉萨，向南可以直插康玛，切断英军的运输线。该处设有一道横跨山谷的五百余米长的拦阻墙，由二千名西藏民军把守。英军于4月28日派骑兵一个连进行侦察，被卡罗拉守军击退。荣赫鹏担心藏军在日喀则、江孜一带募兵，5月2日下令扣留了江孜守备，并决定在藏军尚未完全集中之前发动进攻。由于驻藏大臣有泰对于西藏军民的抗英斗争非但不支持，反而横加指责，执行一条“任其战任其败”的可耻方针，助长了敌人的侵略气焰。

5月3日，荣赫鹏派驻守江孜的三分之二兵力，即工兵三个连、步兵一

宗，相当于内地的县。宗政府相当于县政府。

参见[英]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中译本第154页。

个连及部分骑兵，携带火炮二门、机枪二挺，向卡罗拉进犯。经过三天行军，英军抵达卡罗拉藏军前沿阵地附近。侵略军企图先从两翼迂回，控制拦阻墙后面的制高点，再发起攻击。由于绕路过远，且两翼岩石陡峭，攀登困难，后又放弃了这一计划。5月7日上午10时，英军被迫从正面发起进攻，以一个半连沿河床前进，以一个连向藏军左侧阵地攻击，以半个连向右侧攻击，其余部队随同炮兵行动和守卫营地。西藏民军依托有利地形，顽强抗击，大量杀伤敌人。经四小时激烈战斗，毙敌军官一人、士兵十七人，迫使英军龟缩在山峡中，陷入“绝望之境地”。下午2时，英军再次发起进攻，在优势火力支援下，占领了藏军右翼一段拦阻墙。藏军增援部队五百人立即集结向前机动，准备夺回失去的阵地。但由于英军预备队已从藏军右翼投入了战斗，藏军的机动受阻。藏军为了改变不利态势，在左翼连续组织了三次阵前突击，均因遭敌机枪火力的拦击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此时，从右翼突入之敌占领了藏军侧后高地，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藏军被迫退守浪卡子。

这次战斗，藏军在作战指挥和战术运用上都有了很大进步，改变了单纯防御的战法，注意了组织进攻。但由于装备落后，加之训练差，射击不准，尽管在兵力上占有优势，战士亦不乏勇敢精神，终未能阻止英军的进攻。

在卡罗拉战斗激烈进行之际，英军得知江孜驻地被袭，乃于占领卡罗拉后，急忙撤军回救。

三、江孜反击战

驻江孜英军分兵东犯卡罗拉后，仅剩一百七十名士兵防守，力量非常薄弱。集结在日喀则一带的西藏民军获悉这一情况，乃于5月4日晚出动一千五百人，直插江孜，很快占领了帕拉村、白居寺、曲龙寺和宗政府等要点，控制了整个市区，并包围了荣赫鹏驻地江洛林卡。

5日黎明前，潜伏于英军营地周围的西藏民军趁敌不备，突然发起进攻。他们一边喊杀，一边冲向敌营，抢占围墙枪眼，向敌营房射击。敌人遭此突然袭击，慌乱不堪，有的来不及着装就被消灭了。但由于民军未能及时冲入围墙，近战歼敌，致使英军得到了喘息时间，组织抵抗。一部分英军爬上屋顶，一部分把住了东北营门，拚命向民军射击。民军几次攀越围墙，均遭敌火力杀伤而未成，天明后被迫后撤。由于组织不严密，撤退途中，又有许多战士牺牲。在以后几天的战斗中，西藏民军仅依靠宗政府的堡垒火力进行封锁，而未乘敌孤立无援之机，再次发起进攻，彻底歼灭敌人。英军残部利用时间加固了工事。

5月9日，进犯卡罗拉的侵略军返抵江洛林卡，江孜英军的防御能力得到加强，但仍无法摆脱被围的困境，不得不采取守势，整天“蛰居斗室，不能越雷池一步”。西藏民军逐步缩小包围圈，相继占领了英军驻地周围的几个村庄，并派兵截击敌之通邮小分队，威胁其后方交通安全。英军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决定对附近村庄进行“扫荡”。在民军顽强抗击下，进行“扫荡”的英军虽然取得了一定战果，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当英军发现民军准备袭击其营地时，即匆忙撤回。

[英] 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中译本第157页。

[英] 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中译本第165页。

5月24日,从春丕出发的英援军先头部队二百余人,携带十磅火炮两门,越过乃尼寺(江孜东南十一公里)的火力封锁,抵达江孜。英军在得到增援以后,为了保证后方运输线的畅通,决定向乃尼寺发起进攻。但当英军到达该寺时,西藏民军已转移他处。

当时,对英军安全威胁最大的是驻帕拉村的民军。该村位于英军营地约二公里处,房屋坚固,利于防守,并可直接攻击英军防御工事薄弱的翼侧。5月26日,英军派步兵三个连及部分工兵,携爆破器材从正面强攻,炮兵则迂回占领了一个可以俯瞰帕拉的山脊阵地,支援步兵战斗。但英军几次冲击均被西藏民军击退。由于房屋墙壁高厚,英军的榴霰弹失去作用,遂以工兵进行爆破,企图突破民军的防御。但英军爆破一次,仅能进入一个庭院,无法扩大突破口。西藏民军依托有利地形,与英军逐屋逐院展开争夺,先后毙伤敌官兵二十三人。经过十一小时的艰苦战斗后,民军始被迫后撤,英军随即占领帕拉村。之后,民军致力于加强宗政府堡垒的防御,并不断前出袭扰敌人,使英军不得安宁。英军由于兵力单薄,不敢贸然向宗政府发动进攻,以致仍处于被围状态。6月5日,荣赫鹏率四十名骑兵驰回春丕求援,途经康玛时,受到三百多名藏军的袭击,几乎毙命。西藏民军在江孜反击作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可惜的是,民军缺乏严密的组织和得力的指挥,因而未能一鼓作气,彻底歼灭敌人。江孜战局的变化,使英国政府手忙脚乱。

英印事务大臣布罗德里克声称:“政府业已决定,不管什么生力军,只要印度政府认为必要,均可调往江孜去。”6月中旬,侵略军的增援部队在春丕集结,计有:四个土著士兵营二千八百人、英皇家步兵连四百人、英山炮连二百五十人、土著山炮连一百人、土著山地步兵连二百人、民夫和运输人员七千六百人和配属的其它小分队,总计在一万一千五百人以上。除来福枪、手枪外,尚携有火炮十二门、机枪数挺。此外,还备有牲畜七千五百头,运输车一千六百五十辆。

6月13日,麦克唐纳和荣赫鹏率援军相继从春丕出发。途经乃尼寺时,遭到八百名西藏民军的顽强阻击,死伤十五人。在江孜英军接应下,才于23日抵达江孜。为了解除西藏民军对江洛林卡及帕拉村的包围,英军首先向江孜外围的民军据点发起攻击,先后占领了江孜北面和西面的十二个村庄。6月28日,英军进攻江孜西北三公里的则城寺(即翟金寺)。一千二百名藏军苦战一天,经激烈白刃格斗,最后撤出战斗,江孜至日喀则的交通随之断绝。至此,英军从三面包围了江孜宗政府及江孜街的守军,并控制了水源。江孜民军面临一场更加严酷的战斗。

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更大的伤亡,西藏地方政府再度作出忍让的决定。7月1日,达赖派出的宇妥噶伦、大喇嘛、大仲译及三大寺代表到达江孜,与英军谈判。但是,荣赫鹏无理要求西藏民军于7月5日正午前撤出宗政府,谈判终于破裂。

7月5日下午,英军向宗政府和江孜街发动进攻。进攻江孜街的英军分为左右两翼。守卫江孜街的藏军利用已筑起的围墙和房舍,奋勇还击,毙伤敌官兵多名。直至傍晚,英军方占领了江孜街。在宗政府方向,英军先派出

俄国《新时代报》1904年5月4日(17日)。转引自[苏]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中译本第79页。

指廓尔喀、锡克兵。

步兵六个连和骑兵一个连，携炮二门，从左翼佯攻炮台之岩石方面，以牵制西藏民军主力，使其误认为是英军的主攻方向。黄昏后，英军撤回，趁夜暗又遣步兵十二个连、骑兵一个连、工兵半个连，携炮十二门，进至宗政府东南的外围阵地。这一带多悬崖绝壁，系民军指挥所所在地，是整个防御的要害。阵地前比较开阔，有民军修筑的多道围墙。但英军认为用火炮可以将其摧毁，故选择这一方向进攻。7月6日，英军在炮火支援下发起攻击，经数小时激战，付出了重大伤亡，始抵达宗政府脚下的边缘阵地。当日下午，英军集中所有炮火向围墙轰击，始炸开一个缺口。这时，一个藏兵装药不慎，引起山上火药库爆炸，加大了墙垣的缺口。英军立即发起冲锋，蜂涌而上。西藏民军虽用火力封锁缺口，但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遂拆下墙上巨石投向缺口，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打死打伤敌人数十名。最后，在敌人优势火力攻击下，西藏民军被迫突围，向拉萨方向撤退，江孜重新沦于敌手。

英勇的西藏爱国军民，在江孜抗击英国侵略军达三个月之久，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五节 拉萨失陷与《拉萨条约》的签订（1904年8月—9月）

1904年7月14日，麦克唐纳和荣赫鹏率领步骑兵二千人（携带火炮八门）及后勤人员二千余人，从江孜出发，向拉萨进犯。自江孜失陷后，西藏抗英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妥协势力抬头，终于向西藏军民发出了停止抵抗的命令。噶伦降巴丹增放弃了指挥，再未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但西藏人民并没有屈服，在卡罗拉、浪卡子等地，自动组织起来袭击侵略者，给敌以重大杀伤。达赖几次派代表要求英军退回江孜谈判，均遭荣赫鹏拒绝。7月25日，英军抵达雅鲁藏布江边，达赖见大势已去，遂将政务委托给噶勒丹池巴大喇嘛，自己前往青海。8月3日，英军侵入拉萨。

英国侵略军进入拉萨以后，到处烧杀抢劫，存于布达拉宫的各种珍宝、文物和宗教书籍几被掠夺一空。侵略者的罪恶行径，进一步激起西藏人民的心中怒火。拉萨各寺曾组织大批喇嘛，准备抗击敌人，但因无人指挥而未成功。侵略军不但面临着可能再次出现的西藏人民的巨大反抗，而且还面临着冬季大雪封山、补给更加困难的严重威胁。哲孟雄至拉萨沿途高山，9月初就开始下雪，因而9月中旬以前英军必须撤出拉萨，否则就会被风雪所阻，孤军难返。达赖出走后，荣赫鹏找不到谈判对象，时间的拖延，对英军十分不利。荣赫鹏曾自供说：“余在拉萨只许居留一月半乃至两月，冬令前即须言旋。余既受此束缚，乃不得不加速进行条约之谈判，而外表则仍行所无事，似有充分闲暇者。要之，余此时内慌怯而外镇定”。又说：“余因期限短促，殊有进退维谷之慨。”

但是，抱着“息兵求和”方针的清政府和有泰等人，不敢得罪英国侵略者，极力图谋通过妥协忍让的方法，尽快平息事端，这正好帮了英军的大忙。就在英军进入拉萨的第二天，有泰即亲自到英军营内，“以牛羊米面犒其士卒，及以礼物酬应办事诸员”，并向荣赫鹏表示，愿意“协同工作，迅速努力于条约之完成”。他严格限制和阻挠喇嘛和藏民的反抗，一再命令三大寺“不准再开兵衅”，并指令以噶勒丹池巴喇嘛为首的噶厦代表团出面与英军谈判。荣赫鹏见有泰如此软弱无能，更加肆无忌惮。谈判中，侵略者对藏方代表提出的公正要求，一概不予置理，叫嚣“惟有接受我方之条件，否则惟有听我继续以武力压迫”。

1904年9月6日，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军的威胁下，与英国侵略者在布达拉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拉萨条约》。由于文案何光燮的劝阻，有泰才没有在条约上签字。这项条约规定：开江孜、噶大克（今西藏噶尔雅沙）、亚东三处为商埠，向英国赔款五十万英镑，自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一带的炮台、堡寨一律削平，所有驻防军队全部撤去，西藏一切内政外交都要请示英国，他国不得干涉。根据这个条约，西藏实际上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拉萨条约》签订后，英国侵略军于9月23日匆忙从拉萨撤走。

但是，该条约签订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清政府迫于人民的压力，也感到条约有损中国主权，令有泰切勿画押。12月，

[英] 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中译本第207、237页。

《有泰奏英人入藏阻战开议暨筹办情形折》，《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213页。

[英] 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中译本第217页。

[英] 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中译本第224页。

清廷派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赴印度与英国重新交涉。直至 1906 年 4 月，中英双方于北京重新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虽然英国取得了原《拉萨条约》中规定的许多特权，但新约中规定“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使英国变西藏为殖民地的阴谋未能得逞。

第六节 战争失败的原因

这次反抗英国入侵西藏的战争，是在高寒山地进行的，尽管中国在地形气候、兵力动员、物资补给等方面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但是最后仍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除了清廷政治腐败外，在军事上也有许多值得重视的教训。

一、清政府对外妥协，实行不抵抗政策，使西藏地方政府和军队陷入孤立无援境地

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冲击下，元气大伤，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对帝国主义更加卑躬屈膝，以求苟安一时。战前，清政府对于中国的近邻尼泊尔、不丹、哲孟雄等国不积极进行联合抗英的争取工作，结果在英国的威胁利诱下，这三个邻国成了英军侵藏的基地，增加了西藏军民抗英战争的困难。英国武装入侵后，清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严令各地文武官员“不准与英兵生事”，严重束缚了西藏军民的抗英手脚，使英国轻易地占领了许多隘口、要塞。曲眉仙角之战，英军残暴地屠杀我国人民，清政府不但不加谴责，反而称颂侵略军“恩威并著，造福西藏”，其媚外行径到了极为可耻的程度。为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听其号令，清政府对西藏人民的抗英斗争不仅不予支持，反而采取“釜底抽薪”的反动政策。驻藏大臣有泰甚至颠倒黑白，把战争的起因归咎于藏民“不遵约束”，“执拗无理，胆大妄为”。他声称“今欲折服其心，非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因而对西藏噶厦屡次请调援兵和资助军饷等不予置理，对达赖征调援兵也百般阻挠，故意寻找借口，躲在拉萨不与英军谈判，任其长驱直入，起了英国侵略军帮凶的作用。正是由于清朝中央政府不仅不支持西藏地方政府和军队的抗英战争，反而进行阻挠破坏，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的失败。

二、不重视边防建设，以致西藏地区部队少，训练差，武器装备非常落后

由于清政府不重视边防建设，致使西藏防务废弛，很多隘口、险路既未修筑工事，也未派兵防守。西藏地区辽阔，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而驻军兵额只有三千余人，显然不敷分配，难免形成有险无防的局面。1857年（咸丰七年），驻藏大臣赫特贺曾针对西藏地区兵力单薄，缺额严重，武器装备残缺不全的状况，提出了改革方案，建议在额设三千人之外，另增二千一百六十五名“余丁”，妥加训练，以杜“临时猝办”兵不习战的旧弊。可是，腐朽的清政府竟以“苦累番民”的罪名将其革职查办。由于军队平时缺乏训练，组织纪律不严，因而战斗中进攻防守无一定队形。西藏民军虽然作战勇敢，但不善于利用地形，不懂得在隘口两侧构筑既能发扬火力，又能隐蔽自己的工事，结果在敌人火力射击下，伤亡很大。此外，藏军武器装备极端落后，近一半人还在使用大刀、长矛。火器主要是火绳枪，仅有的几门旧式火炮，亦缺少瞄准装置。这些武器不仅射速慢，射距近，而且精度极差，不能有效

《有泰致荣赫鹏照会》，《清代西藏史料丛刊》第一集（吴丰培辑），第59页。

《有泰致外务部陈藏印开衅情形电》，《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202页。

地杀伤敌人。所有这一切，也都是这次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三、不懂得因地制宜，趋利避害，以己之长，击敌之短

这次抗英战争是在高寒山地进行的，有它自身固有的特点。这些特点对敌我双方的作战行动都有巨大的影响。对英军来说，虽然部队训练有素，武器装备精良，作战指挥能力较强，但很多士兵不适应高原气候，染病、冻伤等非战斗减员不断增加，加上入侵异国，师出无名，以致士气低落。高原气压低，空气密度小，风速风向变化莫测，从而影响了射击的精度，相对减弱了英军的火力优势。西藏地区人烟稀少，物产贫乏，英军的一切供给，都要依赖于后方。由于道路少，部队愈深入，运输线愈长，供应愈加困难。据统计，用一头骡马驮粮，从印度至江孜，只能剩下四磅可用的东西，其余都在路上吃掉了。又因交通容量有限，牲畜大量死亡，前送物资数量受到极大的限制。所有这些，决定了英军不可能投入大量的兵力。英军侵入西藏后，为了保障运输线的畅通，必须派出部队维护交通，因而能用于前线作战的兵力，必然逐步减弱。由于接济困难，侵略军在进军拉萨途中，不得不二次返回春丕就粮。这说明它只能采取缓慢推进的方针，不可能长驱直入，也不可能实施大范围的迂回机动。这些都是英军难以克服的弱点。西藏部队虽然在训练、装备、指挥等方面不如敌人，但人数众多，士气旺盛。他们适应环境，熟悉地形，可以就地筹粮募兵，依险据守，或出敌不意地袭击敌人。这些优越条件是敌人无法比拟的。可是，藏军未能因地制宜，趋利避害，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作战过程中，往往队形过于密集，以致被敌炮火大量杀伤。江孜反击战，虽能利用夜暗隐蔽接敌，但在冲锋时过早大声呼叫，被敌发觉，加之行动迟缓，以致影响了奇袭效果。敌人侵入我境后，因供应困难而影响前进速度，但藏军却未能有计划地切断敌人后方运输线；在被迫撤退时，亦未实行坚壁清野，结果使敌人在江孜、拉萨获得了不少军火和粮食。对于运动之敌，虽曾有一部民军沿途进行袭扰，但未能选择隘口险路预先设伏，截击敌人。在曲眉仙角之战中，藏军只注意依托设在大道上的拦阻墙消极防堵，却不注意利用两旁山险侧击敌人，更不注意从敌后袭击，反而遭敌迂回侧击，被迫后撤。事实证明，设墙防堵是无法抵挡侵略军炮火轰击的，但藏军却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这种打法。江孜之战，民军主动出击，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围敌三个星期而未主动攻击，结果失去了一举歼灭敌人的机会。所有这些表明，忽视了因地制宜，趋利避害，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作战原则，是无法夺取主动，摆脱被动，避免失败结局的。

